

目錄

上 冊

前言.....	黃郁茜	i
「鯤」作品說明.....	張家瑜	xiv
致謝.....		xvi

主題一：與「物」共生

在時間之中：箔子寮與下崙的藝術實踐與日常 轉化.....	張家瑜	1
與蚵仔共生成：關於人與蚵在雲林海線著生、 流動與等待的故事.....	黃予弦、 吳靖	75

主題二：靈力再現

舊廟新願：章寶宮如何作為下桂山地方想像的 載體.....	林宜臻、 蔡詠潔、 蕭則安	191
神明偌「興」：探討公廟私壇有無乩童之多元 靈力展現——以箔子寮為例.....	康瑋廷、 陳旻心、 廖德智	329
疊影成神，以神聚人——金湖萬善爺之研究....	余侑蓁、 郭羽喬、 李僑諦	435

下 冊

主題三：地方照護與再造

醫病／醫心：三條崙年長者的疾病與醫療.....	朱昱威、 鄭采宜	491
當記憶與展望相遇：三條崙海水浴場的生命史 和交織性.....	林士譽、 姜宥甄	587

主題四：日常政治與數位連結

作為家人：看見雲林高齡村落女性村長實務中 的性別處境.....	王昱婷	683
從代理到自主：雲林四湖女性村長如何憑藉性 別及經濟因素重塑村里治理.....	吳俊達	735
螢幕間的想像與想望：雲林縣四湖鄉長輩的手 機使用、生命經驗與地方連結.....	王皓正、 游聿堂、 盧嘉宏	797

後記

如果在冬天，一場場文化田野實習.....	郭天祐	843
學做人？學做「人」。.....	盧佳秀	851
慢不下來的田野.....	蘇穎欣	859
田野的最後一哩路.....	一名 114 學年度修 課同學	863



主題三： 地方照護與再造

醫病／醫心：三條崙年長者的疾病與醫療

朱昱威（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人類學系五年級）

鄭采宜（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生命科學系三年級）

摘要

雲林縣四湖鄉三條崙受到區域發展不均的影響而面臨醫療資源不足的處境。本文關注三條崙年長者面對各種症狀與疾病的應對方式，藉由 Arthur Kleinman 提出的「解釋模型」（Explanatory Models, EMs）及 Penchansky and Thomas 分類的「可近性」（access）框架討論醫療選擇背後的種種因素。同時，透過於三條崙及鄰近地區的田野調查，本文也探討並重思疾病與醫療的意義。本文主要的論點、主張與發現有以下幾點：第一，我們提出「多元醫療」的體系以突破過往醫療體系的分類方式，並指出多元醫療的體系在三條崙年長者的生活中並存著。第二，透過分析診斷過程、勞動及社會關係的影響，我們認為，在中文及台語語境中，「病」的概念跨越主／客觀及醫學／社會等面向，因而無法簡單以醫療人類學及社會學慣用的 illness、disease 及 sickness 等概念來分類。第三，藉由考察年長者對「有效」的追求及「先生緣」概念的運用，我們主張醫療的意義不能只停留在對於科學性、客觀疾病的消除上，而應進一步關注患者的心理及情緒感受。

關鍵詞：三條崙，疾病概念，多元醫療，心理關懷，醫療人類

Keywords: Santiaolun, concept of disease/illness/sickness,
diverse healthcare, psychological care, medical anthropology

一、前言¹

「任何對病痛的真正的人類學記述都不能再僅止於關照客觀疾病及文化表達，而將主體經驗含括進某種黑箱之中。」

——Byron J. Good (1994: 117-118，筆者自譯)

「醫療的核心價值從來不是技術，而是對人的關懷。」

——廖俊智 (2025 年 9 月 23 日)²

「昱威，你們知道現在有哪裡可以看醫生嗎？」田野期間一個星期日的早上，電話鈴聲忽然響起，那頭的聲音帶著好奇與急迫。後來我們才知道，在田野中有同學承受不住冷冽海風與熬夜寫作的雙重壓力，身體出了狀況。回顧這段插曲，不禁令人深思。平時身在都市的我們渾然不覺看醫生不是件易事，尋找在週末營業的醫療院所也從不曾難為，更不用說前往就醫的方式選擇多樣——既可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又可以選擇叫計程車前往，近一點的甚至可以騎自行車或走過去——直到我們親身走入沿海鄉村地區，醫療資源不再唾手可得，交通不再暢行無阻，才明白遇上臨時的就醫需求，有多麼令人措手不及。³

¹ 本文使用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協助轉錄錄音檔及逐字稿，輔助釐清部分概念架構，並協助潤飾部分文句。

² 出自中央研究院院長廖俊智於 2025 年 9 月 23 日於臺北榮民總醫院發表之「未來社會：科技與演化」講座內容。

³ 本文為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114 學年度文化田野實習與方法課程之期末報告，特別感謝黃郁茜老師、盧佳秀、蘇穎欣兩位助教的指導與協助。也要感謝四湖鄉衛生所、三條崙海清宮、沙崙湖文史關懷協會吳雙喜先生及張杏慈女士、三條崙吳秀梅女士及吳宥瑀女士、三條崙長青食堂的長輩們、箔子寮蔡茂昌先生及蔡茂源先生、善水咖啡王柏惟先生及丁俞伶女士、春天民宿蔡文進先生及周招伶女士、普天宮王隆

我們兩人在鄉村及都市區域都有一定時間的生活經驗，在我們的成長背景中，都曾觀察到鄉村地區及都市區域的人，對於醫療院所及醫療資源的使用方式不太相同。在設有大型醫療院所的都市區域及周邊交通方便的衛星區域，許多人稍有不適便動輒前往大型醫院看診（如臺大醫院及三軍總醫院就總是有許多去看感冒、頭痛的人），但在醫療資源相對少的鄉村地區，我們則觀察到很少人會因為感冒、發燒等症狀或是不影響日常行動的傷勢就前往醫院或診所尋求醫療協助。而對於醫療需求相對增加的年長者而言，這樣的差距更是顯著。

不論在平時生活或田野中，我們都觀察到，年長者們相對於壯年人或年輕人，在面臨就醫需求時有著更多的不便與顧慮。年長者們面對行動不便的身體，較難快速、自如地尋求醫療協助。在交通發展較完備的都市區域，便利的大眾運輸或可以提供一些協助，但在交通較不便的非都市地區，想要及時取得醫療資源有時卻是困難重重。

這樣的經驗與觀察使我們想要關注雲林縣四湖鄉沿海地區年長者的醫療狀況及問題。我們思考在醫療資源缺乏的地區，人們面對醫療資源易得性低的情況，或許會對醫療體系及病的概念有不同的想像、感知及應對，並有著根植於地方生活方式的就醫行為。我們想要了解，在醫療資

智先生及高淳斐女士、普天宮廟委會、福建熱炒及下崙王耀新先生的熱情招待與協助，並特別感謝所有熱情且友善的報導人及醫事人員對我們的幫助和支持。此外，感謝梁宸維學長及參與發表會的鄉親對本文的評論及建議，也感謝姜有甄、林士譽同學協助校正格式。最後，感謝王昱婷、吳俊達同學分享田野資料，也感謝在田野中和我們一起討論、努力並互相幫助的同學們。惟文責由兩位作者自負。

源相對匱乏的情況下，當地的年長者會如何處理身體症狀及不適？又有哪些因素影響著他們的想法、反應及選擇？

此外，在田野過程中，出乎我們意料的，即便我們有意詢問，我們也未能從任何一位年長者口中聽到「病」這個字，這也使我們想進一步探究，在他們的行動中「病」及「醫療」是什麼樣的概念？又有什麼樣的意義？

二、區域醫療發展

區域發展不均衡一直是臺灣發展過程中的一大問題（羅玉姍、鄭寧 2015：參之四，未著頁碼），整體來看，臺灣的醫療資源分配亦不平均。長期以來，雲林的醫療發展並不突出，醫療資源及人口的綜合評比下，雲林的醫療狀況位居後段的行列（李佳勳 2026）。臺大醫院雲林分院院長馬惠明曾在受訪時表示雲林縣醫療量能不足（李文德 2025），報導也指出雲林醫療資源「不足又不均」（黃淑莉 2026，引號為筆者所加）。然而，相比其他許多產業或資源，醫療的量能及發展與人們的生命安全息息相關，因此也影響人們的生活品質及模式。

相較於都市地區，雲林沿海區域分配到的醫療資源非常稀少。而該如何看待三條崙的醫療資源狀況？是「缺乏」還是「分布不均」？這曾是我們煩惱的問題。在田野初期，一位報導人對我們提到：「該說是匱乏嗎？應該說是分布不均。」但在我們之後的訪談及親身體驗中，仍接收到許多人對於醫療資源的不足的感嘆。雖然我們未能釐清每一位報導人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但我們思考，或許「整體的分布不均便會造成局部相對的匱乏」。因此，在針對我們的

田野地的視角及論述中，我們仍認為可以使用「資源匱乏」這樣的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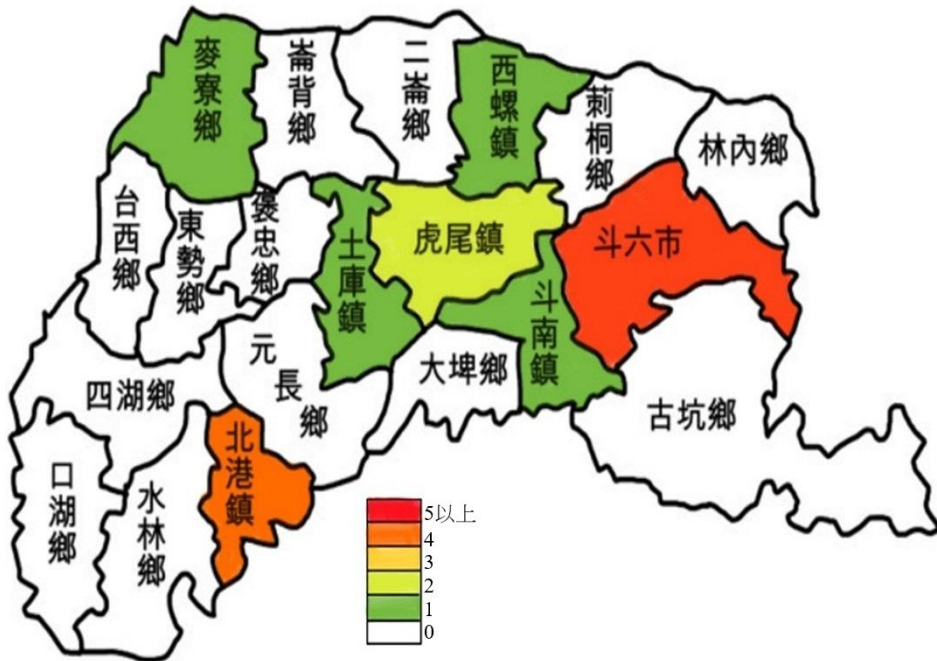
以下將從雲林縣、四湖鄉及我們的田野調查地點三條崙這三個層次，由廣至微的概述這些區域醫療資源的發展與變化，以呈現發展及規劃背後的問題及資源分布的狀況。

（一）雲林的醫療資源及臺大雲林分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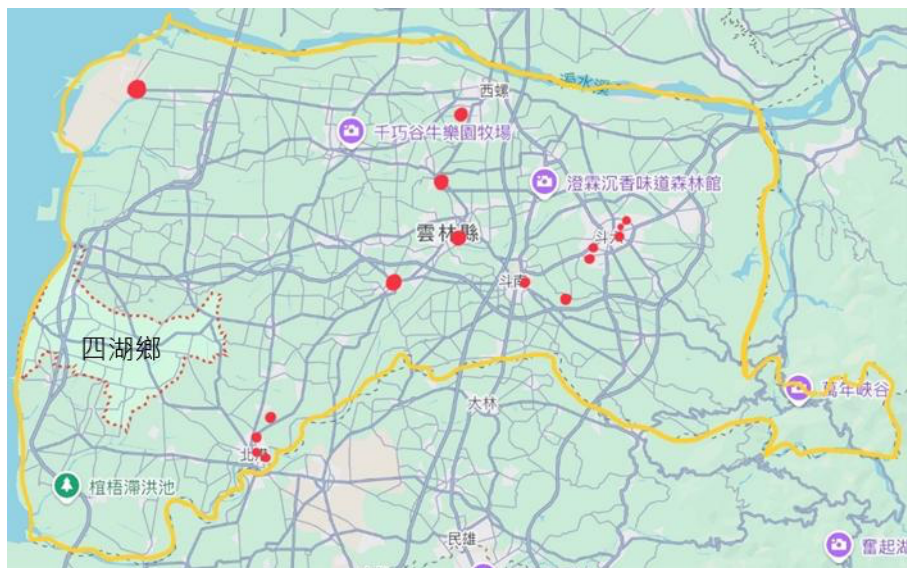
隨著高齡化的人口結構轉變及國人醫療衛生知識提升，⁴臺灣醫療產業的需求及發展都快速提升，但面臨著國際互動、政策環境及相關產業的複雜交互作用，醫療產業亦重視持續穩固及提高競爭力，近年有人呼籲醫療產業應朝向發展規模經濟、範疇經濟以增加收入、降低成本，追求企業化的營運績效（林威玲 2013），但追求醫療經濟的同時，可預期區域發展會因此更加失衡。除了嚴重的人口老化問題，雲林縣長期以來受到臺灣區域發展不均的影響，監察院報告曾指出雲林多數鄉鎮存在嚴重醫療健康不平等問題（監察院 2021），根據衛福部針對 2024 年的統計資料，雲林縣有 15 間醫院，其中 6 間位於斗六、4 間位於北港，斗南、虎尾、西螺、土庫各 1 間；診所的部分有 492 間，其中也有超過七成集中於這六個鎮市（衛生福利部 2024）。這六個鎮市僅占雲林縣約 50% 的人口（內政部 2025），卻擁有大部分的醫療資源，區域分布相當不均，且許多沿海地區大眾運輸系統不發達，居民需要花費大量交通時間才能到達

⁴ 臺灣的老年人口比例已於 2018 年超越 14%，進入高齡社會（國家發展委員會 2022），並於 2025 年超越 20%，正式進入超高齡社會（楊蘭軒 2026）。

大型醫院（監察院 2021），更增添居民前往尋求醫療服務的困難度。



圖一 雲林縣各鄉鎮市醫院數量分布圖
（鄭采宜、朱昱威製圖；張崴崙 2023；雲林縣政府 2025c）



圖二 雲林縣各醫院位置圖⁵

(鄭采宜製圖；雲林縣政府 2025c；Google Maps 2025)

曾任臺大雲林分院副院長的陳建弘臨床遇到的實例清楚點出了雲林縣內交通不便的情況——來自雲林的阿嬤選擇兩百公里外的臺北臺大醫院門診，而非縣內同為醫師所駐的門診——其原因竟不是因為儀器設備與醫師之差異，而是因為該地之大眾運輸不發達（朱乙真等 2022：23）。阿嬤獨居北港，交通方式只能依賴大眾運輸，對她來說與其轉數趟公車到達雲林分院虎尾院區，搭車去嘉義高鐵站搭高鐵，再透過捷運系統到達臺北臺大醫院是更方便跟省心的選擇（同上引：23）。這樣的就醫行為與選擇動機正是因醫療分布不均而生的「距離感」重新塑造的。

從衛福部之統計資料來看，2024 年雲林縣的死亡率高達每十萬人口 1229.1 人，居全臺第二，僅次於嘉義縣（衛生福利部 2025）。陳建弘醫師分析雲林醫療遇到的問題為：

⁵ 點狀標記大小差異為製圖誤差，與圖中資料及數據無關。

「疾病識能不足或病識感低、社會經濟因素，再加上交通不便等諸多原因加總，讓許多患者小病拖成大病，直到無法再忍痛才就醫（轉引自朱乙真等 2022：29）。」由上可見，疾病的預後良好與否與發現的時機脫不去關係，但就醫的方便與否也決定了這些病痛能否被診斷成疾病，並進一步推展治療的可能。而沿海偏遠地區的困境正在此處，對於醫療的可近性（access）、距離重塑的急迫感、病痛經驗等，如何影響及改變當地人的想法及行動，這些皆是本文希望論及的主題。

綜合以上，雲林縣的醫療體系主要面臨幾大挑戰：一、人口老化嚴重；二、沿海鄉鎮的大眾交通不便；三、醫療資源的分布不均；四、高死亡率與病識感不足。這些除了是政策規劃上需要面對的問題，也是影響人民就醫行動的複雜因素的一部分。

1968 年，縣政府奉准在斗六興建省立雲林醫院，1977 年開始提供門診及醫療服務。1995 年全民健康保險開辦後，隨著人事制度的調整，省立雲林醫院醫師急遽減少，1999 年改為署立（簡稱署雲）後仍未能挽回情勢，醫療資源的削減促使居民須遠赴其他地區就醫（臺大醫院雲林分院 2019a：11）。2000 年前後，臺大醫院決定在雲林設立分院，2000 年 7 月先取得了虎尾院區用地，其後時任臺大醫院院長李德源應當時衛生署副署長李龍騰之請，派出臺大醫療團隊支援署雲，2003 年 SARS 疫情爆發，急需資源因應，在多方周折後，臺大醫院正式於 2004 年四月起接收署雲，改制為臺大醫院雲林分院斗六院區（同上引：11-13）。在臺大資源的匯入及各方協力之下，臺大醫院雲林分院斗六院區發展為雲林唯一的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同上引：28），

並持續致力於發展心血管疾病、癌症等重大疾患的醫療處置能力。

為了因應雲林偏遠鄉鎮醫療取得不易，雲林分院的醫師們持續於水林、東勢、崙背、林內、元長、大埤、九芎等地推動巡迴醫療及外展門診服務（臺大醫院雲林分院 2019b：46-51）。2018 年起推動遠距醫療及區域合作等模式（臺大醫院雲林分院 2019a：47-49）。2019 年推動「阿波羅計畫」進一步串聯社區高齡健康照護（臺大醫院雲林分院 2024：112-113），期望補足雲林醫療資源的缺口。

然而，雲林分院的設置並沒能徹底翻轉雲林縣整體的醫療境況。許多計畫的持續推行縱然有許多成效，但巡迴診療的科別有限，院區亦終究落於斗六及虎尾，對沿海區域在地醫療資源的匱乏及居民往返就醫的交通問題幫助有限；雖提升了雲林縣的醫療能力及品質，但在縣內仍然存在明顯區域不均衡的情況。在我們田野期間訪問到的報導人之中，大部分的人都未曾實際接觸到雲林分院提供的相關資源，也未曾去過雲林分院。

（二）四湖及其醫療發展

四湖鄉位於雲林縣最西端，明崇禎年間始有移民入墾，現今由 21 個村組成，占地約 77.1 平方公里，當地盛產文蛤、牡蠣等海產及西瓜、花生、玉米等多種農產，亦有海清宮、參天宮、三條崙海水浴場等歷史古蹟及觀光景點（雲林縣四湖鄉公所 2025）。根據 2025 年 11 月的統計，四湖鄉約有 20,250 人，其中 20 歲以下的兒童、青少年約有 1,900 人，65 歲以上的高齡人口則有約 5,250 人（雲林縣政府 2025a），當

地人口高度高齡化，因而我們推論當地有較高的醫療照護需求。

比對政府資料及陳世賢（2010）的研究可知，在 1980 年代，⁶四湖醫療資源就已缺乏，且當時醫療大環境及衛生觀念尚未改善，密醫、偏方盛行，陳世賢（2010）介紹在四湖鄉服務多年的高逞徽醫師時便提到：

過去在四湖鄉合格的診所很少，有些醫院使用的醫師執照甚至都是租來的，密醫充斥，遑論那些似是而非、甚至完全錯誤的醫療保健觀念，就拿感冒藥水來說吧，感冒、頭疼喝，貧血、肚子痛也喝，幾乎所有鄉間的男女老少都有這種『飲癖』……面對民眾習以為常的『自助醫療模式』，高逞徽只能耐心引導、說明，告訴他們這世上沒有這種『仙水』可以治百病。（陳世賢 2010：129-130）

這雖突顯了早期人民在醫療不足的環境下的無奈之情，但不安全的醫療環境及錯誤的保健觀念也為居民健康造成風險及隱憂。

隨著整體醫療體系的發展及衛生觀念的改善，租用執照及密醫、偏方的狀況已改善許多，但四湖鄉仍深受區域健康不平等之苦。從衛福部針對 2024 年的統計資料來看，四湖鄉沒有大型醫院，僅有九間診所及一間衛生所；在職業醫事人員的部分僅有 40 位（其中中醫師、牙醫師各僅有 2 位），數量相當少（衛生福利部 2024）。其次，四湖鄉衛生所雖是全雲林第一例群體醫療中心，也是全臺最早開設的十二間之一（陳世賢 2010），然現今之四湖鄉衛生所僅編有

⁶ 根據政府資料，高逞徽醫師於 1986 年任四湖鄉衛生所醫師（國立政治大學 2025）。

牙醫師、不分科醫師各一名，護理師七名、藥師及醫檢師各一名，⁷無法負擔大量且全面向的醫療需求。⁸此外，臺大醫院雲林分院的巡迴診療也沒有抵達四湖。醫療機構的稀缺、人員及資源的不足層層堆疊，使得四湖的醫療資源顯得更加缺乏。以 2025 年 11 月的人口統計資料計算，四湖鄉人口數有 20,244 人（雲林縣政府 2025a），亦即平均一間診所（含衛生所）需服務約 2,024 人，對比全臺灣人口最多的新北市板橋區，平均一間醫療院所僅需服務約 868 人（內政部 2025；衛生福利部 2024），可見其間巨大的差距，亦再再突顯雲林沿海地區醫療資源的不足及區域發展的不均衡。

對於當地醫療資源的嚴重不足，梁宸維、王安珩（2024）提到四湖茆子寮聚落曾有赤腳醫生、宮廟藥籤及在廟旁開「衛生所」的老醫生，但如今赤腳醫生消失、老醫生過世，這些舊時的醫療管道都已不復可見（梁宸維、王安珩 2024：216），不過根據我們的訪問及調查，密醫其實仍然存在，只是營業型態有所改變，營業地點趨於隱密且只接熟客。此外，在下崙的資深醫生也提到當地醫療資源缺乏，醫師人力不足，密醫不安全的診療行為又導致許多肝病病例產生，他只能到處做巡迴及居家醫療（同上引：216）。然而，僅靠少數醫師四處巡迴，能提供的服務效果依舊十分有限，亦無法充分回應所有人的需求。

除此之外，1990 年代，引起當時高度爭議的六輕在麥寮設廠，重工業的空氣汙染影響周邊區域居民的健康（雲林縣政府資訊管理科 2012），四湖雖不在影響最嚴重的區域

⁷ 衛生所網站上的資料跟我們現場訪問時得到的資料不同，在此以現場訪問得到的資訊為主。

⁸ 受訪的衛生所人員也跟我們表示，基層衛生所業務繁雜但人手不足，導致分工不明確，職員常需身兼多職。

內，但仍距離不遠，冬季東北季風吹拂，亦帶來許多污染粒子，影響環境品質。2010 年 7 月，六輕兩次工安火災後續開始在麥寮、台西地區興辦全民免費健康檢查服務（盧敬文 2022：266），但僅與台西一溪之隔的四湖卻未能受到同樣的服務。工業發展下的環境污染增加疾患的風險，相形之下醫療資源更顯缺乏，使四湖彷彿被遺忘於醫療發展的陰影之中。

（三）三條崙及其醫療資源

「這裡真是冷清。」這是我們到達三條崙時最初的感受。根據《四湖鄉志》（劉曜華主編 2006）記載，先民到達時，因沿海有三條南北向的大沙崙，因而將聚落命名為三條崙，三條崙在清領時期即為三條崙莊，日治時期更名為三條崙，現今在行政區劃上則由雲林縣四湖鄉的崙北村及崙南村組成，聚落與海相傍，是四湖鄉最西端的地區（同上引：111），當地居民主要從事稻米、花生等農業及蚵螺醃漬等（雲林縣政府 2025b）。崙北村的人口曾達 3187 人，崙南村人口最多也曾有約 1800 人，但在 1980 年代之後與其他雲林沿海地區聚落同樣面臨人口外移而漸漸減少，近年人口變化雖漸趨於穩定，但也遠不如以往的繁榮（劉曜華主編 2006：114）。當我們問起人煙稀少的街景，當地人向我們解釋：這裡的居民大部分已屆高齡，隨著人口漸漸老去，三條崙的人口仍在一點一點的減少，這也連帶影響此處商店及設施漸漸關門或搬走，而使得生活機能下降。

時間帶走了這裡的人們，也帶走了提供生活機能的資源及設施。目前的三條崙已沒有能提供診斷的醫療機構，我們實際走訪後發現，除了崙南村有一間位於外地人很難

找到的小巷中的中藥房外，其餘的診所及藥局都早已歇業。其次，距離位於北港的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媽祖醫院）或臺大醫院雲林分院虎尾院區，各需約 30 分鐘及 40 分鐘的車程，若沒有自己的車，搭乘公車更要花上一到兩小時（Google Maps 2025）。此外，海清宮仍有乩童可供問事，也提供藥籤供信徒求取，但信徒需要自行持籤方到中藥房抓藥。整體而言，三條崙距市區遙遠，大眾運輸系統又不發達，因此醫療資源的取得可說是更加困難。在醫療資源層層缺乏的情況之下，我們希望深入當地，了解當地居民如何認知、面對這樣的情況，又以何種方式在這樣的環境中展現堅韌、安身立命。

三、文獻回顧與研究方法

（一）「病」的概念

醫療人類學及社會學者將「病」的相關概念分為 *disease*（「疾病」）、*illness*（「病痛」或「患病」）及 *sickness*（「惡疾」或「生病」）三類。*Disease* 指涉較客觀、透過科學性的醫療診斷而得出的病理；*Illness* 指涉主體對於疾病及身體狀態的感受及體認；*Sickness* 則指涉具社會異常的面向或社會對於生病狀態的認可及接受（Kleinman 1995[1988]: 2-5；葉肅科 2008：6-7）（參考圖三）。這樣的分類方式儘管似乎已成為學界默認的觀點，但主要仍是以英文語境對於名詞的分類邏輯來理解。



圖三 「病」相關概念象限圖
(朱昱威製圖)

在我們的分析視角中，更希望回歸我們日常生活及田野地的地方語境來思考「病」(*pēnn*)的概念。我們認為在地方語境的運用及思考中，「病」(*pēnn*)的指涉與意義並沒有那麼截然三分的區別。我們希望關注三條崙的人們實際上如何理解及想像「病」(*pēnn*)，並探究疾病概念的生成及使用條件。

有關疾病概念的生成及人們如何理解疾病，許多醫療人類學及醫療社會學研究都著重於人們對於疾病原因的探究與解釋。如 Foster and Anderson (1992[1978]: 55) 指出疾病理論體系「關心因果關係，及人們對於失去健康身體提出的解釋」；葉肅科 (2008: 12-13) 整理相關學者的研究成果，指出庶民會依照侵入、退化、機械、平衡等四種邏輯思考疾病，並強調庶民「不但解說原因，也為它的發生尋找責任歸屬」。他們的討論雖是從許多經典民族誌的案例及前人研究中歸結而來，但似乎過於強調對於「找到原因」

的執著，且論述中也較忽視地方性、文化性的差異，而過於強調共通性。

在地方性的部分，孫薇薇及董凱悅（2018）發展 Geertz 的「地方性知識」概念，並分類列舉「泛化的個人歷程與經驗」、「家庭習得與親屬權威知識」、「群體共識與社區文化」、「族群文化與社會價值」四個維度，嘗試說明地方性知識如何影響人們對於疾病的解釋及因應。他們認為人們對疾病的解釋會影響其最終選擇的應對方式，亦提出：比起疾病的原則及原因，人們更關心治療的效果（孫薇薇、董凱悅 2018：66）。

在文化性的部分，宋錦秀（2011）研究台灣宮廟的藥籤文化，探討藥籤在台灣的分類情況，並從藥籤文本《呂帝先方》的分類探討藥籤反映出的疾病概念。文中指出疾病的定義是經由文化塑模及社會化的過程而習得，且除了疾病經驗，疾病及症狀的命名、分類、描述、歸因，乃至相應的應對選擇都受到文化脈絡的影響（宋錦秀 2011：85）。

孫薇薇、董凱悅及宋錦秀的視角關注到了地方及文化差異的面向，且很實際地呈現許多人面對疾病的想法，以及傳統文化中不同的疾病概念，這對我們很有啟發性，但我們希望進一步聚焦在年長者，並關注「病」的概念生成的條件及時機，以及在人們尋求療效的背後反映的社會文化意義。

（二）年長者、勞動與病的社會意義

三條崙是個高齡化嚴重的社區，我們的研究因而主要聚焦於年長者的感受、經驗、想法及行動。根據《老人福利法》第二條的規定，在我國的法規脈絡下，老人指的是

年滿六十五歲的人（全國法規資料庫 2025）。但在我們的觀察中發現，三條崙人對「老人家」、「長輩」的用法具有相對性，像是一位 70 歲（在我們的認知中應該也算年長者了）但仍能自由活動的大哥會用「老人家」稱呼比他更大但不方便活動的人，卻不太會稱自己是年長者。因此在本文的脈絡中，會使用「年長者」一語，以突破「老人」被法規框限住的解釋方式。

在對四湖沿海地區年長者的相關研究中，梁宸維、王安珩（2024）研究雲林沿海箔子寮地區的人們的健康感受及照護行為，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初步的構想方向。文中呈現高齡者對健康的看法、四湖的醫療資源分布，以及茶會作為田野切入點的取徑。他們指出：「健康」的概念在醫學發展下，逐漸成為依附在獨立知識體系下的數值化標準。透過對於箔子寮的田野調查，他們嘗試引入「照護」的概念，探討對於當地高齡者而言「健康」到底是什麼（梁宸維、王安珩 2024：215），並希望藉此將普世化的健康概念轉換到重視多樣性及個別性的地方視角（同上引：217）。

在受醫療資源分配不均影響的箔子寮，梁宸維與王安珩認為相較於「何謂疾病」，「什麼是健康」才是理解高齡者的關鍵點（同上引：217）。他們援引 Bach「人格的社會構成」（social constitution of personhood）理論、速水洋子強調的「共在」（共にいる；お互いに共にいる）及 Annemarie Mol 的「照護的邏輯」探討高齡者自我照護及在互動者實現主體間照護的情形，指出：首先，「動」是理解箔子寮高齡者健康概念的核心（同上引：221），身體的動作（工作、運動）及動頭腦除了是他們用以回應健康問題的方式（同上引：222），也是他們區別自己與都市年輕人

的主要面向（同上引：224），而在面對不能動的情況，他們也認為「歹活」不如「好死」來得「有福氣」（同上引：226）。其次，除了透過動、工作及飲食進行自我照護，茆子寮的高齡者也透過「茶會」、相互拜訪間的互相關懷及互助體現主體間的相互照護（同上引：228-232）。文中強調，與朋友的交往與相互關心在構成照護的同時，也建構了當地阿嬤們對於「活得好」的想像（同上引：232）。

對於茆子寮的高齡者而言，健康的概念並不是一種事先存在的行動方向，而是在日常實踐中生長出來的一種自我覺知，一種在接觸「他者」時感受到的「差異」。健康的價值，即對「活得好」的想像並非普世化的概念，而是緊密鑲嵌於地方社會互動的環境之中的（同上引：234）。梁宸維與王安珩（2024）的研究聚焦於沿海地區高齡者的健康感受及照護實踐，但我們認為「病」的概念既然在對話中缺席（同上引：217），應有其特殊的意義，因而我們希望探究「病」概念的生成與意義。此外，他們關注「動」在健康概念中的意義，視角似乎較偏重身體性，但我們希望進一步關注更具社會經濟面向的「勞動」對病及醫療的意義與影響。⁹

在這樣的關懷上，同樣研究台灣西海岸高齡者的康舒雅亦關注勞動的意義。康舒雅（2024）的《留下來的的人：偏鄉高齡者的生命紀事》研究彰化縣台西村高齡者的生活方式及生命軌跡，並關注老化的意義與影響。透過生命史式的敘述方式，作者深入描摹台西村高齡者們的生活細節，

⁹ 本文使用的勞動概念參考張晉芬（2013：23-25）的觀點，近似「工作」，採廣義的定義，包含勞心及勞力等形式，同時亦含括生計性、生產性之經濟性勞動及協助活動或團體運作的志願性勞動。

書中的高齡者們在一天天相似的日常生活中漸漸衰老，體力的下降、身體機能的瓦解、社交關係的變化共同建構了「老」的樣貌，但老人家們對待生活及自己的態度，卻使「老去」的陰影無法抹滅生命堅強的光輝。如書中有報導人在離世前仍然穿戴整齊打算要開卡車出門，生活不因年老而終止，也不因年老而只能被動（康舒雅 2024：225-226）。

對康舒雅（2024）筆下的台西村高齡者而言，老化是在日復一日的生活中逐漸發生的過程，疾病與傷痛像是在老去的過程中必然到來的考驗，而勞動則填補了高齡者生活很大一部分的意義及目標。對那些高齡者而言，他們工作了一輩子，即便晚年因為行動不再方便而逐漸放下工作，但勞動的經驗及對他們的意義卻未曾抹滅。康舒雅的研究聚焦於高齡者如何走過生命並面對老年生活及老化過程，她對於高齡者如何面對生命、如何持續透過勞動及意志維持主體性的敘述讓我們深受影響。不過，疾病、醫療及照護雖佔據了高齡者晚年很大部分的生活經驗，但在書中並非敘述焦點，書中亦未深入探究病與醫療的意義。我們也希望探討：年長者如何面對身體病痛？他們的行動背後有何複雜的因素？其中又體現出什麼樣的意義？而這便牽涉到醫療的多元途徑。

此外，呂源三等人（2006）研究雲林縣斗六周邊社區老人在健康與照護方面的實際需求。其對於老年人執行及拒絕執行健康檢查的動機，老年人對於疾病的心態，以及老年人對中西醫的情況的資料提供我們很大的啟發及幫助，但他們的研究採用量化的問卷方式，因而僅能從數字的統

計中歸納結果，而我們希望能採用質性的田野研究方法更深入理解年長者們的想法及行動。

（三）多元醫療

醫學或公共衛生的研究及關注，長久以來都以西醫為主的「正規」醫療為主，二十世紀末，學者亦開始關注輔助與替代醫療（**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CAM**）（丁志音 2008：29）。但我們希望將醫療的系統擴展到更多非科學的面向，並主張一種「多元醫療」的觀點，以更貼近人們的生活經驗。此外，此處提出多元醫療的體系，亦希望強調以更開放的框架呈現本研究的視角，期望能以開闊視野看待多樣醫療。¹⁰以下先簡要回顧在西醫之外的 CAM 相關研究，並說明其概念上的不足，以引入我們的觀點。

在當代自然主義西方醫學盛行的情況中，許多人對於醫療的概念皆強調科學性及客觀性，並視醫療為一種提供科學診斷、醫治與疾病預防的制度化體系（葉肅科 2008：8），而許多非西醫的治療方式則被排除於「正規」醫療之外。在西方醫療與非西方醫療的接觸與互動中，另類醫療的研究亦成為一個重要的主題（張珣 2008a：4）。近年來，一些公共衛生學者亦開始從輔助與替代醫療的視角關注台灣的醫療狀況（丁志音 2003；林寬佳等 2009；章美英等 2013；吳雅琦等 2021）。輔助醫療是指可以與西醫一起使用的療法；替代醫療指可以取代西醫的療法，如中醫；而輔

¹⁰ 感謝評論人梁宸維學長對於我們提出「多元醫療」觀點的提問，在此補充說明：此處主要為了強調本研究看待醫療的視野，並不與後文作為分析方式的 Kleinman 的體系相衝突。

助與替代醫療（CAM）則指包含各種方式與產品的、不屬於西醫的醫療方式（吳雅琦等 2021：381）。研究指出，65 歲以上老人使用 CAM 的比率較其他年齡層高（林寬佳等 2009：64），而 CAM 的使用可以緩解慢性病治療的副作用（吳雅琦等 2021：388），並讓患者「感覺比較好」（同上引：381），這也呼應了我們的關懷及對醫療的觀點。這些學者們的研究雖提供了很堅實的資料基礎，但主要皆是以量化方式完成，我們希望進一步透過田野調查的方式去深入理解三條崙年長者的選擇與思考。

上述對於輔助與替代醫療的研究集中於公衛領域，而許多人文社會學者亦開展了相關研究。鄭惠珠（2008）探討中醫專業在臺灣的興起與變遷，指出中醫比西醫更重視身體整合性及與自然的對應，並強調中醫強調的養生及生活關在現代醫治為主的醫療體系中常被忽略（鄭惠珠 2008：43）。林文源（2014）從醫療社會學及 STS（科技與社會，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的取徑研究中醫，並批判當前醫療社會學研究不自覺受醫療霸權與實證醫學的典範牽引而忽視中醫（林文源 2014：49）。他強調中醫在臺灣社會中的重要角色，並指出：

儘管在正式教育、政策、制度管道，中醫一直處於劣勢，然而，卻持續〔與〕生物醫療並存而影響著本地社會的醫療、認知、飲食與社會生活，構成在地醫療認識叢集與現實。（同上引：44，中括號內為筆者所加）

這突顯了在臺灣的社會文化之中，並非完全由西醫主導人們的生活與想法，中醫的存在與運作亦起到很大的影響與作用。然而，在臺灣社會之中不只有中醫，還發展了許多以本土文化為基底的民間醫療系統（宋錦秀 2011：57）。

許多醫療系統都使用藥物來對付疾病、治療問題，但在一般認識的「藥」之外，還有一些介於藥與非藥的模糊地帶的療法，保健食品及「食療」亦是臺灣社會常見的自我療癒方式。安勤之（2010）採馬克思及 Appadurai 的觀點，以「物的生命史」取徑探討四物湯在臺灣的發展與轉變。他的研究指出，即便國家透過法規及政策行使認證及分類機制，但在民間生活之中，人們有著自己的一套想法及應對模式。他認為民間擅長踰越國家建立的範疇，並主張人們常「把藥品當食物吃，把食物當藥品吃」（安勤之 2010：138）。他的研究雖然聚焦在四物飲本身及國家、市場的交互行動，但其強調一般人民藥食不分的文化情境，與我們在田野中的觀察相互映襯，也提供了我們一個思考基礎。

上述這些皆算是 CAM 框架內所認可的醫療方式，然而，學者亦質疑 CAM 的視角仍排除超自然相關的療癒方式，有著濃厚醫學中心主義意味（丁志音 2003：157）。在本研究中，我們不採用 CAM 的分析框架，而主張多元醫療方式的並行，並希望在此基礎上探究醫療的意義。在此觀點上，張珣（2008b）研究臺北保安宮的祭解儀式，觀察並探討人們如何透過祭解得到療癒。她指出，信徒或病人透過參與祭解儀式的行動，或是其中的種種言說行為來吐露困難、改善病情（張珣 2008b：16）。文中提到的平安符、神印等近乎超自然的治療方法難以置入西方本位的 CAM 框架中，但在我們的分析視角中，亦是醫療方式的一種。

此外，藥籤亦運作於宮廟體系及傳統社會之中，雖與中醫同樣會使用到草藥、湯藥，但診斷的方式截然不同。宋錦秀（2011）即研究臺灣藥籤療癒文化的發展及運作，並指出藥籤本質較屬於「宗教醫療」（宋錦秀 2011：57）。

他說明「藥籤」是指編號在籤條紙上，印寫藥物品名、用量及其適應症狀的一種寺廟籤文，主要可分為「方論型」、「方藥型」、「空籤」及多種另類藥籤，且有多種發展的樣貌，但其歷史悠久，藥籤型式與神明的對應關係亦不明確。他亦認為藥籤文化與臺灣傳統社會的道德文化相關，求籤者即是透過籤詩賜予的藥方或道德教訓去尋求可以理解的病因與解釋（同上引）。這些具有宗教色彩的醫療形式皆須由多元醫療的視角才能完整包含，而在多元醫療方式並存的體系中，人們如何選擇、醫療究竟是什麼意義，皆是我們希望論及的重點之一。

（四）醫療選擇與醫療的意義

我們認為，在多元醫療系統並存的情況下，人們如何選擇其醫療方式、背後又有何因素影響，是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關注整體醫療資源分布情況對人們的感受及選擇的影響，對此，可近性（access）的概念提供了我們一個思考方向，有助於分析醫療資源分布及在地人感受間的關係。

Penchansky and Thomas（1981）基於一項對紐約州健康照護計畫相關調查的資料提出了一個分類學式的可近性定義，將模糊的概念拆解為一組可以被具體定義且可發展操作性測量的構面（Penchansky and Thomas 1981: 128）。他們將可近性定義為一個代表使用醫療服務的客戶與醫療服務系統之間適配程度的概念，並通過歸結現有研究論著，將此概念切分為五大分析構面：

1. 可得性（availability）：醫療供給量及類型與需求量及類型間的關係。

2. 可及性 (accessibility)：醫療供給與醫療需求所在位置之間的關係，考量距離與成本。
3. 可供性 (accommodation)：醫療供給的取得方式及客戶適應能力與感受間的關係。
4. 可負擔性 (affordability)：醫療服務價格與客戶負擔能力、對成本效益的感受間的關係。
5. 可接受性 (acceptability)：醫療服務客戶對提供者個人特質與服務類型的態度與實際特性間的關係。(ibid.: 128-129, 筆者自譯)

可近性的差異被認為不僅影響病人對醫療服務系統的滿意度，也影響醫療利用量及提供者職業模式，三個面向的因素會交互影響，而五大構面在各面向的影響力是未來研究的重點方向 (ibid.: 139-140)。此研究拓展了可近性的應用層面，但他們的方法主要為精密統計分析的量化方式。我們希望挪用可近性的概念到質化方法中，嘗試在田野工作的脈絡中分析當地人對醫療的感受。

可近性重視醫療端的物質層面，但文化因素對於瞭解人們的想法和行動也至關重要。宋錦秀 (2011: 85) 指出文化會影響人們對疾病的感受及相應的醫療選擇，這提供了我們發展想法的基礎。而在方法論上，Arthur Kleinman (1980) 提出的「解釋模型」(Explanatory Models, EMs)，有助於我們分析田野對象的疾病觀以及其就醫的選擇動機，並提供理論框架去描述「當地人認為的醫療體系」與「實際上醫療體系」能提供的支持間的差異。「解釋模型」框架，是一套人們對於疾病成因、症狀、意義及適當治療方式的認知體系，並非僅存於專業醫療部門，而是同時運作於專

業醫療部門與民間部門之中。在醫療資源不足的環境下，後者往往扮演更關鍵的角色。以臺灣為例，「鬱傷」(*ut siong*) 這個概念在民間廣泛使用，涵蓋了從胸悶、失眠到心理壓力等多重症狀，但在西醫醫療體系中卻缺乏對應的診斷範疇，說明了當地人的身體感受深受文化語彙的形塑 (ibid.: 84-87)。

當專業醫療與通俗信念產生衝突時，人們的就醫抉擇往往反映出其解釋模型的優先順序。Kleinman 研究中提到的案例便顯示，家庭成員可能同時持有「體內熱毒失衡」與「鬼魂作祟」等多重解釋，並據此選擇傳統儀式或生物醫學介入治療 (ibid.: 87-88; 93-94)。Kleinman 的框架連結了對自我身體的認知與後續的醫療行動，但我們也希望關注社會互動於其中的影響，並探究人們對身體、疾病與療癒的社會文化想像如何引導他們感知症狀、詮釋病因，並在有限選項中做出符合其世界觀的抉擇。

許木柱 (1981) 整理了 Kleinman 對於臺灣醫療的洞察，並更深入地描寫可能影響民眾就醫的社會心理因素。其中，作者指出家庭與親屬因素深深影響人們的就醫行為，人們可能會聽從親屬的方法去選擇治療方式，而有時這包含不就醫，甚或是疏離、隱藏或躲避他人避免閒話批評 (許木柱 1981: 32-33)。文章闡明民眾對西方醫學與中國傳統醫學之醫療功效都有基本的認知，也會依據之去自行選擇醫療手段 (同上引: 32)。另外，許文提及：

如果是輕微的症狀，如微微發燒、隱隱作痛、少量出血或不能確定的疾病時，通常先行自我醫療，或者自我醫療與向藥房求醫兩者同時進行，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如果無效，則轉而求治於中醫或西醫。(同上引: 32)

文中提到了對於療效的感受會影響患者對醫療的看法及後續選擇，這與我們的想法相呼應，我們希望探討醫療的效果如何建立，而在物質、文化、療效等重重因素交織中，醫療又有何意義。

對醫療意義的討論上，張珣（2008b）從民俗醫療的角度切入，並指出民俗醫療是指一個民族對付疾病的方法（同上引：9），但這似乎預設了患者對疾病的認知，我們認為在疾病概念生成之前的感受也影響著醫療的意義。在疾病概念之前，身體不適的症狀及疼痛佔據了重要的部分。Strong and Cogburn 指出「疼痛經驗同時具有身體性、心理性、情緒性、社會性與靈性面向（Strong and Cogburn 2025: 98）。」而心理及情緒的部分是我們關注的重點，但也是醫療的意義常被忽略的面向。對此，Collins and Pinch《醫學的張力》（2021[2005]）一書給了我們進一步思考的方向。該書指出醫療的不確定性，以及在醫療互動中安慰效果的重要角色。書中亦提到「只有當顧客剛到髮廊時對頭髮的那種不滿意消失掉之後，『生病的』頭髮才算是『治癒』（Collins and Pinch 2021[2005]: 31)」，除了強調病人的主體感受對於醫療是否有效是關鍵的因素，也提供將醫療的概念拓展到一般認知的醫藥領域外的可能性。此外，書中亦討論「安慰劑效應」的意義與影響。

他們指出，安慰劑效應是指在沒有明顯物質介入的情況下，心靈治療身體的力量，在當今的醫學發展中，這主要用於在新藥物或療法的研發過程中提供對照。他們亦認為應區分「真安慰劑效應」及「偽安慰劑效應」，前者指病人對治療的預期實際影響了其生理方面的改善，後者則指對治療的預期沒有產生任何生理反應（ibid.: 45-49）。然而，

他們仍較重視實際生理層面的改善，且不認為安慰劑效應是「真正的治療」(ibid.: 60)。他們的研究給予我們一個思考的起點，我們希望進一步討論心理與情緒在醫療中的角色與重要性。我們主張，醫療不應只是強調從生理、科學層面對抗「疾病」、治癒「身體」，更重要的是在心理層面提供支持，並關照患者的實際感受。

綜合而論，我們透過質性的田野方法，深入探究三條崙年長者面對身體病痛的方式及思考，背後的影響因素，以及複雜因素背後的意義。我們關注「病」的概念生成的條件及時機，以及勞動與情感對於病的概念及意義的影響。在醫療的層面上，我們主張多元醫療的視角，以突破科學性或醫學中心本位的思考方式。我們也關注在多元醫療體系下人們如何選擇，以及社會互動於其中的影響。最後，我們希望探討醫療的效果如何建立，並進一步討論心理與情緒在醫療中的角色與重要性。

（五）研究架構與方法

本文的討論及分析是基於 2026 年 1 月 5 日至 1 月 15 日在雲林縣四湖鄉三條崙、茆子寮、四湖市區及口湖鄉的下崙進行的約兩週的田野調查。雖然地理上大致分成不同的社區，但其間居民的往來還算密切。我們的調查包括在衛生所、診所、西藥局、中藥行、宮廟、長青食堂、咖啡廳、路邊及年長者家中進行的觀察及半結構式訪談。田野期間，我們參與了四湖衛生所在茆子寮實施的疫苗接種，從旁觀察、與醫療人員及前來接種的年長者交談，並協助固定衣物及發送禮品。我們亦參與了社區長青食堂的備餐工作，協助備料、烹調、盛裝餐點，並與年長者們一同用餐。最

後，我們還參與了長青食堂辦理的對年長者的育樂課程，在其中擔任臨時講師，並與年長者們互動。此外，與我們同時在四湖及口湖進行田野調查的其他研究小組所分享的資料，不同小組成員間的討論，以及相關文獻的理論、資料，也對我們的分析框架提供了啟發及幫助。

接下來，我們將先討論三條崙年長者們對於各種身體症狀的處理方式，以及其中交織的複雜因素。接著從年長者的生活方式，討論「病」與醫療的概念與意義，並突顯醫療的重要關懷。

四、面對病痛的人們¹¹

田野開始以來，從箔子寮到四湖市區的路程變成了我們暫時的日常。一開始，我們將機車托運至四湖市區，取車後再騎回暫住的箔子寮，田野期間，為了訪談，我們也時常往返兩地，騎機車單趟至少要花費 15 分鐘。迎面而來的海風有時推動我們，有時則像是城牆般，無形區隔了市區和沿海村落。

田野迎來尾聲，我們又來到四湖市區，將機車寄回臺北。在冬日的西南沿海正午，海風變本加厲，豔陽依舊，失去了交通工具的我們，思索著該如何回到民宿。打開在臺北常用的叫車程式（Uber）即顯示「您所在地區未提供服務」，這時我（鄭）想起在宮廟布告欄偶然拍下的叫車服務，這是我們回到箔子寮最便捷省力的最後手段。電話中的葉大哥聲音鏗鏘有力，¹²聽到我們是昨晚相見共享晚餐的

¹¹ 感謝評論人的提問，協助我們深化對報導人敘述情境的描述。

¹² 為了保護報導人，除了我們兩人及文獻資料中提到的人物外，本文中所有的人物都經過匿名或一定程度的去識別化處理。

臺大學生，又聽到一筆生意消息，來回確認我們所在的位置後，他請我們在全聯等待大約 10 分鐘，他會從茆子寮的家出發。

我們使用的，即是行動不便的年長者除了大眾運輸以外，在四湖地區另一種常見的交通方式——白牌車——其指未經合法營業登記、使用白底黑字車牌的自用小客車載客。這是田野調查第二天時，藥局老闆娘亞萍告訴我們的。白牌車在偏遠地區常見，是介於計程車與鄰里互助間的存在，而其存在的原因之一，正是因為該地欠缺紅牌計程車所提供的交通服務。無法親自接送年長者前往醫院就醫的民眾常會選擇這種方式，以載送行動不便的長者們，為了平攤費用，有時還會幾位長者相約一同搭乘前往就醫。當地年長者常前往北港媽祖醫院、¹³嘉義朴子長庚、麥寮長庚等大型醫院定期回診，除了客運、公車與行走指定路線的醫療服務專車以外，白牌車是行動不便的長者們往返醫院與家最方便也最快速的選擇。葉大哥說自己提供的服務像是包車接送的形式，也會遇到老人家結伴就醫的情況，有些時候這些長者們也會趁著去市區的機會，順道買些生活用品回家。

在本章節中，除了欲探討三條崙的人們（尤指年長者）面對各種身體症狀的處理方式外，也欲進一步還原在距離的外在作用下，年長者們如何重新認知病痛，創造一套如何處理症狀與病痛的知識。我們希望能藉本章重現年長者們的能動性，以探究其就醫之選擇。我們深諳，即便在距

¹³ 北港媽祖醫院全名為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是最靠近四湖鄉的大型醫院，當地人常以北媽簡稱之。此外，根據報導人的說法，三條崙附近的救護車也會優先送往北港媽祖醫院。

離重構的不便之中，年長者仍有一套屬於自己的身體知識，這是一套幫助他們面對病痛，判斷是否就醫的，影響行動的依循。

（一）距離重塑的醫療可近性

茆子寮至三條崙的路上，路旁田地以旱田為主，三合院四處座落著，但路上人煙稀少。風力強勁，西邊不遠處延伸至海天一線的是不斷轉動的風力發電扇。行至三條崙北部跟廣溝，可以看到很多住戶門口都堆有許多蚵殼，使得路邊像是住家的延伸，不時被蚵殼覆蓋著。

藥局老闆娘亞萍與丈夫蘇藥師現居在三條崙，平時兩人一同在下崙經營藥局。亞萍憶起，在她嫁來三條崙之初，這裡的人口數量還算正常，可近十年來人口數越來越少，她認為大概少了五分之三，而三條崙曾經有過的診所，也隨著人口減少歇業了。下崙的藥局緊鄰著診所，與診所合作處理處方箋，協助民眾領藥，也有配合醫院領取慢性病連續處方箋的服務。田野初期首次拜訪藥局，我們希望了解的是當地人的就醫習慣，希望看到診所跟藥局在沿海鄉村醫療中扮演的角色，但亞萍與蘇藥師給了我們更多長者在生活中實際面對的醫療困境。

走進藥局，兩側的貨架上擺放著各式各樣的成藥，門口處則擺放生活用品，如太陽眼鏡、乳液、潔身液、爽身粉等。一側的貨架前堆置著營養補充品，另一側的貨架前設有座椅，一箱箱的感冒藥水堆在椅子下。一開始招呼我們的是蘇藥師，他說自己是本地人，大學畢業後回來做藥局二、三十年了。在藥局的期間，不時會有民眾前來購買成藥，民眾來買成藥的原因各異卻有一種熟悉的相似，為

了解決身體上的不適，感冒、頭痛、咳嗽等。大部分出現的是相對年輕的中年輩，除了為了快速緩解自己身體上的不適，也有部分是出於家中年長者迫切對藥物的需求，為了在沒有人即時照護的獨處時間快速處理疼痛與不適感。人們處理病痛的方式，除了使用成藥，前往專業的醫療機構就醫也是常見的選擇，然而「距離」在偏鄉地區年長者的就醫過程中被放大。蘇藥師提到，附近居民遇到較嚴重的問題時會到嘉義朴子的長庚醫院、北港媽祖醫院就醫；而針對咳嗽、痠痛等小症狀，常會就近來藥局買藥，但藥局還是會建議病患到診所看看比較好，不要直接買成藥自行處理。端看蘇藥師的建議，會發現他不只是以藥局的經營面向來思考，他的想法是，即便民眾不來購買成藥，也需要好好處理小症狀。

為了檢視距離對年長者的影響，以下以田野中報導人們最常述及的北港媽祖醫院為例。北港媽祖醫院設有巡迴交通車，有固定的發車時間，而且有多條路線，如元長線、四湖線等，大致以不同鄉鎮區分。但專車班次不多，隨路線而暫停於零星定點，也因此能串聯起的地區有限。下崙位於口湖鄉，緊鄰箔子寮，兩地居民沒有明顯界域，常在幾個社區間移動。在田野第一天時，我們先後走訪箔子寮與下崙，當時就可以感覺到兩地生氣之差異。相較三條崙、箔子寮等地，下崙無疑是相對熱鬧的地區，可當地年長者的就醫仍屬不便。亞萍也同我們說，從下崙這邊要搭公車過去北港總站轉車，媽祖醫院離總站有一段距離，還是很麻煩，這裡也沒有計程車。

年長者的就醫困境不只出現在亞萍的經驗生活裡，早在我們閱讀區域相關文獻時即可略窺一斑。在區域文獻中

我們看到的案例是，獨居在北港的阿嬤選擇離開雲林，前往臺北就醫，同樣都是在臺大醫院就醫，也是看同位醫師的門診，故可推論其因非為儀器或醫師的差異。阿嬤的行動高度依賴大眾交通工具，對她來說，在臺北轉乘大眾運輸工具相較於在雲林縣內轉乘方便得多。雲林縣內交通不便重塑了阿嬤的距離感，也使臺大醫院總院的近性高於雲林分院，這是阿嬤選擇醫療院所的判斷標準。這樣的就醫行為與選擇動機，正是因醫療分布不均而生的距離感重新塑造的。

三條崙長青食堂的阿眉，有濃厚的海口腔，平時穿著整齊體面的黑色外套，衣服則常穿著鮮豔，其上常有花朵、愛心等可愛元素點綴。阿眉的台語講得又急又快，可能是因為我們介紹自己是來做研究、做調查的臺大學生，她不時會在談話裡關心我們能不能聽不聽得懂她說話。阿眉不願多透露年齡，有點俏皮的希望我們猜她現在的年歲（*nî-huè*）。她以前的工作是家庭主婦，操持家務、在家照顧子女。阿眉的行動能力正常，近的地方她常是藉由機車來去自如，若是自己有身體不舒服會就近騎去四湖市區看，之前最遠會騎去台西看牙齒。阿眉告訴我們，若是有需要她也會自己搭公車去嘉義的大林慈濟醫院。從三條崙的住家到大林要將近一個小時的車程，門診的人次不少，等待看診、等待回程車班發車的時間加上去，早上八點從家裡出發，下午兩點過後才回到家，阿眉的一整天也差不多過去了。阿眉的例子呈現出，對於三條崙年長者而言，如何方便地取得醫療資源是一大問題。

前述提及 Penchansky and Thomas (1981) 對醫療近性之研究雖採量化分析，但其所反映的不僅是物質層面上

的醫療供給，更試圖將可近性的意涵推及至心理層面上的感受。在可得性（availability）的評估下，雲林沿海地區除了醫療院所在數量上的不足與分布不均外，人口老化的照護壓力無疑是催化可得性不足的要素之一。此外，可得性討論的並不只是醫療總量的問題。雲林沿海地區雖然有一般內外科，但在心血管急症、復健科、精神科等年長者高度需求的專科上，可得性顯得相當不足（監察院 2021）。在醫療資源的結構性失衡下，這種類型不均迫使病患必須跨區至斗六或嘉義市區就醫，顯現出當地醫療資源在功能性上的供給失能。

為回應本節主旨距離如何重塑醫療可近性，我們需要特別關注可及性（accessibility）的面向。可及性專指提供醫療服務的地點與使用者居住地之間的空間關係，內容包含車程所耗費的時間心力、使用的交通工具與地理上需要克服的障礙等（Penchansky and Thomas 1981: 128-129）。由於醫療資源高度向內陸鄉鎮集中（衛生福利部 2024），沿海居民被迫陷入長距離、高耗時的就醫路徑。在缺乏效率大眾運輸與完善接駁體系的支援下（監察院 2021），地理上的邊緣化轉化為心理與經濟的沉重代價。對他們而言，就醫不只是醫療行為，更是一場涉及體力、交通工具與時間成本的長途跋涉。這樣的「距離」或許為傍海而生的人們增添了一種韌性，會自行判定病痛嚴重與否，也有一套「簡單處理一下」的知識。

「這裡的人要去外面才有醫院。」吳先生說，只有離開四湖鄉，才有大型醫院，也才会有更完整的儀器、更迅速的檢查結果、更全面的緊急處置。然而，也有四湖沿海居民認為「進了○○醫院之後就出不來了」，顯示部分當地

人對周遭醫療的不信任與擔憂，而這也是偏鄉地區醫療正面臨的困境。¹⁴鄧醫師過去接受內科訓練，來到四湖之後幾乎是不分科別的幫忙看，從內科、小兒科、疫苗接種評估到外傷處理都會幫忙，在地服務多年的他也在當地建立了良好口碑。鄧醫師向我們說明，基層醫療資源（衛生所、診所等）能提供的協助有限，遇到急重症或是「看不懂的問題」常需要建議民眾轉診。此外，他也提到醫療風險的壓力：

但是問題就變成說，你判斷的情況之下，他應該是急症，要趕快送醫院那一種。有時候你這個遲疑或是你判斷、覺得這個吃藥就會好，那這個東西就會變成，我們會有醫咎。我們缺的是，我們不是說我們不能做，但是我們做的情況就是說我會不會延誤醫療。
（2026/1/11 訪談紀錄）

鄧醫師的擔憂很現實地指出了偏鄉醫療的困境——缺乏更高階的檢測儀器與檢驗結果來精準診斷——醫師既擔心留下來觀察會延誤治療，但若每個疑似個案都往外送，又會造成病患長途跋涉的負擔。倘若真的變成延誤醫療的話，責任就轉而壓在基層醫療院所的醫師身上。在法律責任與判斷失誤的風險面前，基層醫護不僅要處理患者的病痛，還要承擔「誤診」與「延誤」的雙重道德與法律壓力。在醫療資源不均的地區，這種壓力會導致基層醫療人力流失，將可能進一步惡化當地的資源可得性。醫療不均不僅

¹⁴ 感謝地方鄉親於本文發表後分享其他當地居民的觀點。我們在田野中進行訪談時，也有報導人提到：認為當地某間大醫院的醫生診療品質不好。這顯示客觀的醫療資源布局與當地人對醫療資源的感受可能有所差距，也強化了雲林醫療資源的不足。

體現在硬體資源的缺乏，更體現在基層醫護人員在診斷決策上必須承擔不成比例的風險與心理壓力。這種因資源侷限而產生的醫法衝突，是造成偏鄉醫療量能萎縮的隱形主因。

（二）是藥還是保健品？

在三條崙，藥物的使用方式並不總是依循正規醫療的邏輯。年長者對於藥物——尤其感冒藥水——有一套節儉的、根植於自身經驗的使用方式，這套方式有時與藥師及醫師的建議相悖，卻在當地形成了一種普遍的自我照護實踐。本節將透過在藥局的觀察與報導人的描述，呈現這種用藥方式的樣貌，以及它正在發生的緩慢轉變。

在下崙的藥局裡，我們實際遇到了前來購買感冒藥水的民眾。¹⁵男子年紀約略中年，好像是因為寒風吹拂冷到頭痛、覺得快感冒才來買藥水。他準確說出自己要買的藥水廠牌，以及罐數，顯然早有定見，不過亞萍最後讓男子買了比他預期還少的數量。

事後，亞萍不解地向我們說起這個現象：當地年長者甚至中年族群會買很多感冒藥水，且很多人都是嘗試很多牌子之後，靠自己的經驗選擇習慣、喜歡的品牌。他們會把感冒藥水「當保健用」，都用超過劑量，覺得喝多一點效果比較快，也會說自己一次只喝一點點而已，可累積起來的劑量也相當可觀。亞萍覺得這群人像「上癮」了，不喝就全身不舒服，吃了藥才覺得正常。¹⁶也常遇到會想買整箱

¹⁵ 現今市售的感冒藥水屬於指示藥，應經過專業的醫師或藥師指示服用。

¹⁶ 事實上，感冒藥水會成癮的原因除了心理上的慰藉以外，成分中含有的咖啡因、甲基麻黃素，以及可待因磷酸鹽或鴉片酊，長期或過量飲用會容易成癮（林佑澤、林香汶 2024）。

回家囤放的民眾，只因為覺得這樣取用會更加方便。特別的是，有些年長者甚至會把買來的藥水藏起來，不讓子女知道，因為清楚這個習慣在家人眼中是不被允許的，卻仍然選擇繼續。

對於上述情況，藥局的經營者有自己的兩難。賣感冒藥水的利潤不高，對藥局而言非但不是賺錢的商品，且身為醫療從業人員，亞萍也不樂見看到把成藥當成保健品使用的情況；而身為經營者的他們，在經營考量下還是得販售。亞萍解釋：感冒藥水對當地年長者是「很基本的東西」，若是沒有販售的話，會給消費者一種「這間藥局不夠專業」的感受，而因此失去客源。在兩個身分的拉扯下，亞萍選擇了較為折衷的方法，她會仔細詢問前來購買的民眾用途，並給予設身處地的建議及專業的用藥指示，也會以圓滑的方式拒絕經評估不需要或大量的購買要求，既不直接影響消費者的感受，也不讓他們能在這裡採購以囤藥。

感冒藥水的過度使用只是三條崙年長者用藥文化的一個切面。關於年長者的藥物使用，曾在箔子寮參與老人據點活動的黃大哥認為，這裡的年長者對醫療的觀念是「能省則省」，會覺得省著吃藥的話就可以多用一段時間的藥，在去大醫院就醫時也會想多開一些藥，才不用頻繁回診。同時也因為節儉的習慣，年長者傾向把先前沒吃完的藥留下來，等到下次需要的時候再服用，有時也因此吃到不對症的藥，而造成身體負擔。此外，黃大哥也提到，有些年長者仍會委託別人去市區採買成藥，如：國安感冒液、液態感冒藥或蠻牛、康貝特等，¹⁷他們會自己配藥、混著喝。這套「能省則省」的邏輯，是在就醫不便、資源有限的條

¹⁷ 根據政府的分類，康貝特、蠻牛等其實不是藥品，而是健康機能飲品。

件下，盡可能用手邊能取得的資源以維持身體舒適與正常運作。

近年來，年長者對用藥的態度開始出現轉變。黃大哥觀察到，在年長者面對身邊人的驟然離世時，他們會開始思考背後的原因，像是開始懷疑是不是「喝了太多藥水喝死了」，或是亂吃藥的後果。長此以來，這樣的疑慮於鄰里間口耳相傳並引以為戒。這個轉變說明，三條崙年長者的用藥方式雖然有其慣性，但並非封閉不變，而是在與不同情境與生命經驗的不斷接觸中，緩慢地被重新形塑。

（三）悄無聲息的慢性病

若說感冒藥水的過量使用為年長者用藥邏輯中較為顯眼的面向，那麼慢性病的管理則為另一種截然不同的存在。慢性病不以急迫症狀引起人們注意，而是在日復一日的生活中悄然累積。據衛福部民國 112 年統計資料顯示，國人十大死因中，心血管慢性疾病占有所有死因約三成，而三高（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與其中五項高度相關（慢性疾病防治組 2025a）。至於 65 歲以上國人之三高盛行率，高血壓佔 64.2%，高血糖佔 30.5%，而高血脂則佔 42.5%（慢性疾病防治組 2025b）。綜觀上述資料，三高無疑已成為國人，尤其年長者們亟需正視的健康威脅。此外，衛福部國健署也將預防保健年齡下修至 30 歲（慢性疾病防治組 2025a），可見慢性病在臺灣已越來越被社會各界重視，防治工作也逐漸從「治療」轉向「預防」。這些數字的意義不只停留在研究資料中，也不陌生於三條崙的年長者身上——我們在寒假田野中遇到的年長者，大多都有一或多種慢

性病纏身。本節將從三條崙年長者的生活經驗出發，分析田野中的觀察，呈現慢性病日常生活中被對待的樣貌。

社區藥局提供的慢性病連續處方箋服務，讓年長者不需要頻繁返回大型醫院領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就醫的時間與交通成本。然而，定期回診追蹤仍然必要，在交通不便、不願麻煩他人的條件下，回診對許多年長者而言是需要額外安排的事。

不過比起回診困難更根本的認知落差，仍深深根植於年長者的日常裡，阿美的例子就顯示出這樣的問題。我們第一次拜訪長青食堂時，就遇到留下來幫忙整理場地的阿美。阿美今年 71 歲了，看起來比實際年齡還要年輕，會留意自己的穿著打扮，戴著顏色俏皮的帽子，也喜歡唱歌跳舞。過去阿美的丈夫黃阿公也會來食堂用餐，她當時就會來幫忙食堂的活動，但如今黃阿公的身體機能隨年紀增長而漸漸退化，無法繼續前往食堂參與活動，轉而尋求長照資源，後來就只有阿美自己來了，不過她用餐完仍會外帶一份回去給黃阿公。

食堂的活動結束後，阿美邀請我們到她家作客。客廳的桌上擺放著血壓計、量測紀錄，也有一些藥膏，同時也堆置著許多烏魚子、甜食、臺式麵包及油炸澱粉類的食品。有些是阿美愛吃的，談話中她也會熱情地問我們：「這很好吃，你們要不要吃？這我早上有吃過，很好吃，要嗎？」我們認為，這個情況似乎顯示，即便有慢性病纏身，但飲食習慣並不會因為醫師診斷而輕易改變。在缺乏持續衛教的條件下，長久以來累積的習慣很難改變。黃大哥也觀察到類似的情況，他提到：這裡的年長者普遍維持著重鹹、

重油、重糖的飲食習慣，即便已被診斷為慢性病患者，飲食結構也鮮少有實質的調整。

患有慢性病的年長者在用藥行為上也有類似的情形。延續上一節討論的「能省則省」邏輯，年長者在面對慢性病用藥時，也常依照自身的經驗與判斷與醫囑之間尋求平衡。黃大哥提到，有些年長者會在回診時多開一些藥，以減少返院的頻率；也有人把沒吃完的藥留著，等下次症狀出現時再服用。另一方面，長青食堂的阿崙告訴我們，有些年長者在感覺身體狀況好轉後，會主動詢問醫師能否減藥，這也反映了年長者試圖在醫師的建議與自身感受之間尋求協商的空間。

這些現象共同說明，慢性病的悄無聲息並不只是醫學上症狀隱匿的特性，更是診斷發生之後，年長者的日常實踐與醫囑之間存在的距離。在醫療資源不足、衛教支持薄弱、交通不便的條件下，即便年長者已經得知自己的病況，維持良好的慢性病控制仍然困難重重。慢性病就這樣在年長者的生活中靜靜累積，成為一種隱而不顯卻持續作用的存在。

（四）親屬與鄰里關係的作用

在三條崙，親屬與鄰里關係不只是年長者生活的情感支柱，也是影響其就醫決策與醫療行為的關鍵。在專業醫療資源不足的條件下，家庭與社群承擔了相當程度的照護功能，也形塑了年長者對就醫的感知與選擇。本節將說明這個非正式支持網絡如何運作，以及它在彌補專業醫療空缺的同時，也如何構成年長者就醫行為的隱形限制。

我們認為，年長者的就醫決策遵循著一個清楚的分層序列。鄧醫師觀察到，會來到四湖市區找他看診的年長者們，基本還能跑能走，而對這群年長者而言，他們會選擇「能動的時候就自己來」。鄧醫師的發現側面印證了年長者們第一個層次的行動，即只要身體狀況允許自行處理，他們通常優先選擇自行解決，不輕易拜託家人處理。但當個人無法獨立應對時，決策的重心便移轉到家庭層次：子女在哪裡、能否幫忙接送，即成為就醫地點選擇的主要依據。鄧醫師也指出，有些年長者在行動還算方便時，會選擇就近的診所拿藥；但等到「不能動了，孩子可以載他去」，反而又回到大醫院就診。

阿梨阿嬤的例子清楚回應了這個層次的行動邏輯。阿梨今年 85 歲，行動不便的她坐在輪椅上，後方有看護照看著。阿梨有三個兒子，平時與二兒子和三兒子住在三條崙，大兒子則在嘉義工作。阿梨提到自己「心臟毋好（*simsōng m̄-hó*）」，加上過去做「土水（*thôo-tsuí*）」積累的勞損，以及五年前晚上右腳拐到而跌倒受傷導致行動不便，而需要常常吃藥去減緩身體的疼痛。阿梨阿嬤每三個月要到嘉義長庚回診一次，她選擇就醫地點的考量之一是子女的工作地點，在嘉義的長子可以把阿梨接去同住，回診與探親就可以同步進行。換句話說，阿梨能夠選擇讓自己舒適自在的居所，家庭關係使得阿梨即使行動不便，也能行動自如。Kleinman 指出，大眾部門（popular sector）中的家庭與社群對疾病的理解與處置方式，往往在正式醫療介入之前就已發揮作用（Kleinman 1980: 50-53）。三條崙年長者的就醫決策序列，正是這個大眾部門運作的具體呈現，家人的位置、能力與意見，構成了年長者就醫行為最重要的背景

條件。根據健康照護系統的架構，大眾部門由個人、家庭及親屬社會網絡所組成，是絕大多數疾病最初被辨認、定義，以及初步醫療決策產生的關鍵場域（ibid.: 111, 113）。此部門的運作方式為對專業知識進行「大眾化」（popularizations）的轉譯，將正式的醫療概念吸收並轉化為口傳信念（ibid.: 92）。

阿梨的例子說明了子女的位置如何決定就醫的選擇，而在另一些情況下，家人的介入則更為主動。阿美的丈夫黃阿公有高血壓和帕金森氏症，他們的女兒瑜姐說，送阿公去日照中心的原因之一是因為他不愛運動，在機構裡有人督促、有輔助設施，比較能讓他多動。天氣好的時候，瑜姐也會親自陪黃阿公出門走路。從黃阿公的例子可以看到，家庭成員不只是就醫的接送者，也是慢性病日常管理的主動參與者，在正式醫療體系之外，持續介入年長者的身體照料。

然而，對三條崙的年長者而言，家人並不總是在場。沿海村落嚴重人口外流的影響，顯現在沿海村落地景中的廢棄三合院和空無一人的別墅及透天厝，給人一種寂寥的感受。¹⁸在子女多在外地工作的桑榆之年，年長者的日常照護往往需要依賴鄰里互助與在地機構的支撐。黃大哥曾提到，當交通不便又不好意思麻煩人時，鄰居之間會互相幫忙接送。而蘇藥師的藥局就在地方的支持網絡中，承接了原屬家庭要擔負的責任。藥局不只提供慢性病連續處方箋的領藥服務，也承擔了聯絡子女、協助就醫、持續追蹤年長者健康狀況的功能。蘇藥師說，許多在外地工作的子女

¹⁸ 對於這個現象的成因，亞萍曾向我們提到，這些空屋很多是因為老年人的子女不回來，沒人住了所以像是荒廢了一樣。

會主動留下聯絡方式，請藥局代為照看父母、提醒拿藥（慢性處方箋），久而久之，藥局反而比子女更清楚父母的健康狀況。此外，亞萍也提到，很多人到診所，不只是為了看病，也是為了有人說話——在地醫療場所因而同時承載了社交與情感支持的功能，成為年長者日常生活中重要的聚點。Kleinman（ibid.: 50-53）所描述的大眾部門，在三條崙的脈絡下，不只包含家庭，也延伸至這些在地的非正式照護。¹⁹

在親屬與鄰里的支持網絡中，怕打擾他人的心理是一道隱形但有力的門檻。年長者在面對身體狀況時，往往優先考量的不是如何取得最適切的醫療協助，而是如何在不打擾他人的前提下處理問題。黃大哥提到，交通不便固然是障礙，但「不好意思麻煩人家載」同樣是年長者延遲就醫的重要原因。呼應本章第一節的討論，Penchansky and Thomas 指出可及性（Accessibility）的內涵不僅指涉就醫所需克服的地理距離，還包含取得醫療服務過程中所耗費的時間與心力（Penchansky and Thomas 1981: 128-129）。對三條崙年長者而言，麻煩他人接送本身就是一種需要克服的代價，而這道代價在怕打擾他人的心理作用下被進一步放大，使得即便有人願意協助，年長者也可能主動迴避開口求助。可及性的障礙因此不只來自交通與距離的客觀條件，也內化於年長者的社會價值之中，使得即便醫療資源在理論上可及，年長者也可能因為這道內化的門檻而主動迴避。

¹⁹ 此處引用張宏哲（2010）的概念，「非正式照護」是指家庭成員、親戚、朋友、鄰居所提供的沒有薪給的照顧，不論是維持日常生活或輔助性日常活動的協助、情感上的支持、或協助老人做決定都包括在內。

綜合本節討論，親屬與鄰里關係在三條崙年長者的醫療實踐中，既是不可或缺的資源，也構成了隱形的限制。家庭的位置與能力不只決定了就醫的可能性，也在日常生活中主動介入慢性病的管理；另一種情況下，鄰里互助與在地機構則在親屬缺席時填補照護的空缺，但怕打擾他人的心理，致使啟用這個支持網絡本身就需要克服一道情感上的門檻。在醫療資源不均的結構下，這個由家庭、鄰里與在地機構共同構成的非正式支持網絡，既補足了正式醫療的空缺，也承載了它無力承擔的重量。

（五）神明的處方「籤」

在三條崙地區中雖然缺乏正規醫療資源，但年長者們並非只有自行就醫、簡單處理及忍耐等選擇，民俗醫療使他們的病痛得到另一種解方。Kleinman（1980）將醫療體系劃分為專業（Professional）、民俗（Folk）與大眾（Popular）三個部門（sector）。專業部門代表了制度化的醫學體系；民俗部門包含世俗與神聖的療癒傳統，其診斷與治療往往植根於特定的文化傳統（如道教或民間信仰）之中；大眾部門則主要根據生活經驗處理日常的健康問題、評估症狀、提供情緒支持，並給予建議。

其中，民俗部門涵蓋傳統治療師與宗教療癒者的解釋與實踐，有其內在的邏輯與運作方式。本節將透過田野中在宮廟、中藥行與中醫診所的觀察，說明民間信仰中藥籤與問事如何作為民俗部門的醫療實踐運作於三條崙地區，並指出其使用程度與正規醫療可近性之間的反向關係——正規醫療越難取得的地方，民俗醫療越活躍。

三條崙海水浴場親水公園旁，幾無建築物，而是由鬱鬱蔥蔥的木麻黃林圍繞。在一片蒼翠裡，有間三合院隱藏其中，一旁的鄭成功雕像挺立而有神，屋簷下面的匾額寫著「開台尊王文物陳列館」的字樣。（圖四）走進正廳，門的左側裝有籤櫃，櫃上的傳單小冊中載有過去尊王殿中的藥籤介紹：

.....在醫療與健保尚未健全的年代，不少信徒在生病時，會向開台尊王祈求藥籤，藥籤中的藥方均是中草藥〔，〕求藥籤的過程是與求籤詩之形式相同。求籤者先焚香膜拜，稟報姓名及個人住所，並向尊王秉告求藥籤的目的與身體狀況.....根據藥方買中草藥來熬煮服用。根據耆老訪談，開台尊王的藥籤相當靈驗，能治癒一般醫師無法處理之痼疾。（社團法人中華開台尊王協會 年代不詳，文中中括號內為筆者所加）



圖四 開台尊王文物陳列館外觀
（鄭采宜攝）

這段文字點出了藥籤在醫療資源不足的年代所扮演的角色：它提供信徒一套有所依循的解釋與處方，讓病痛得到制式醫療體系以外的回應。而在我們的田野中，這樣的實踐並非只存在於歷史文字之中。我們認為在醫療資源分布不均的沿海村落，與在都市地區不同的除了前述正規醫療資源的可近性外，我們也觀察到許多宮廟內仍延續著抽藥籤、問神明求助的習俗。以下透過我們觀察到的幾個案例來說明這樣的民俗醫療實踐。

在田野中我們發現，無論是在四湖市區的參天宮、²⁰箔子寮普天宮，²¹抑或是三條崙海清宮皆設有藥籤（圖五、六）。²²此外，也在先民來臺初期即可見藥籤對醫療不便地區的作用，其提供信徒依循，找到另一種除了當代醫學以外的紓解（宋錦秀 2011：57）。追溯藥籤發展的沿革，可至各宮廟建立之初，惟每間宮廟留存的藥籤形式各異，參天宮的藥籤有男科、女科、眼科等，而普天宮與海清宮的藥籤則只有男、女科的分別。每位神明的藥籤內容與籤詩數量也不盡相同，此點與運籤的形制很不一樣。²³

²⁰ 主祀關聖帝君。

²¹ 主要供奉溫府千歲。

²² 三條崙海清宮坐落於崙北村，主祀神祇閻羅太子包公拯。包公因靈驗神蹟而吸引外地民眾朝拜進香，香火鼎盛。

²³ 運籤的內容基本一致，但會因為神明的個性不同，而在求籤者問相同事情時給出不同的籤詩。



圖五 三條崙海清宮藥籤：女藥籤（上）；男藥籤（下）
（朱昱威攝）



圖六 四湖參天宮藥籤

外科、眼科、婦科一櫃（左）；男科一櫃（右）

（朱昱威攝）

然而，這樣的民俗醫療資源並非理所當然地存在。三條崙原有的長安中藥行在老闆過世後便已歇業，鐵捲門重重垂下，門外的牌子載明營業時間與公休日，是它曾經存在的唯一痕跡。三條崙的人口減少帶走了維繫這些資源的條件，也使得藥籤的使用渠道隨之窄化。我們在附近遇到瑜姐，向她打聽中藥行的消息。瑜姐告訴我們附近也有一間中藥行，不過位置很難找。

瑜姐提到的中藥行隱身在阡陌之間，外觀基本同一般住宅，只是門上懸掛著中藥房的匾額。我們在門外踟躕不前，阿嫲走出來詢問我們來意。阿嫲是中藥行第三代的經營者，我們詢問她海清宮藥籤的事情，她隨即將桌上擺著的藥籤簿遞給我們看，簿子的紙頁泛黃，感覺年代久遠，使用痕跡清晰可見，上面也留有修補的膠布。我們接著提

問：「現在還有很多人會來拿藥籤嗎？」她回應：「剛剛還有老人家拿著藥籤來抓藥。」阿嫲的回應說明，在三條崙一帶，藥籤並非僅具歷史意義的文化遺跡，而是仍在日常生活中持續運作的醫療實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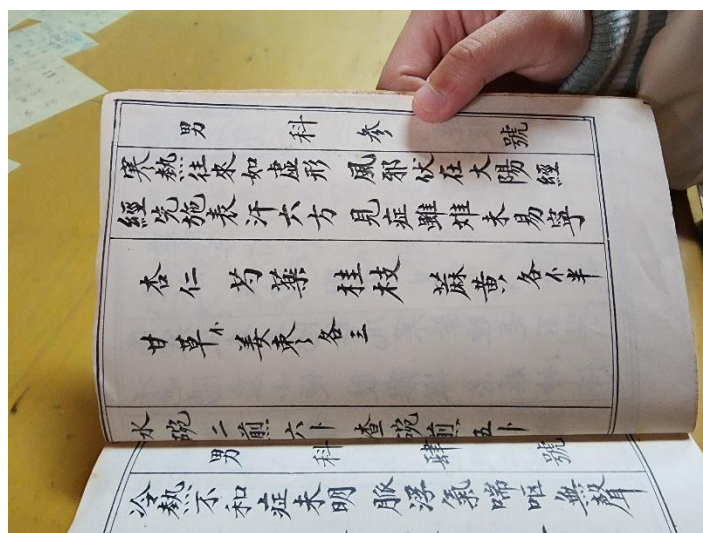
在四湖鄉的中藥房幾乎都配有各代表性宮廟的藥籤簿，但讓我們意外的是，連中醫診所中也能看見藥籤簿的身影。蓮姐是胡醫師的妻子，兩人在四湖市區共同經營一間中醫診所。我們透過半透明的玻璃門，依稀可見的是作工精細的百草櫃（圖七），²⁴漆亮的表面光彩不減，吸引我們駐足。同時，我們也欲更詳細地探問藥籤的資訊。



圖七 中醫診所藥櫃（左）及藥盅（右）
（朱昱威攝）

²⁴ 另稱百子櫃、中藥櫃。百草櫃是傳統參藥行中最具代表性的裝設之一，由上而下分為四層。最上層是拉門，其上常會書寫藥店最名貴而具代表性的中藥材名稱；其次是擺放藥盅的展架；第三層是一排排的抽屜，會被用來放置常用藥材，抽屜內常有一格格的藥斗將藥材分門別類；最下層的抽屜則用來放較少使用的藥材（周益記 2020）。百草櫃的設計能讓所有的中藥材一目了然，幫助使用者快速地尋找藥材。

一走進診所，即可見百草櫃的拉門底下雕有飛龍，映入眼簾的瞬間給人一種氣派。展架上藥盅在後若隱若現，被一排排的科學中藥罐遮擋。蓮姐站在中藥櫃前，與身後的恢弘相比，她散發的氣場柔和而敦厚。蓮姐在嫁來三條崙之前，在臺北出生長大。如同我們對診所的好奇一般，感覺她也對兩個從家鄉來的陌生學生充滿了好奇。簡單向她說明來意後，她拿出藥籤簿給我們閱讀（圖八）。蓮姐拿出來的參天宮的藥籤簿，是手寫再被影印的版本，從書封跟紙質看起來，這些藥籤簿似乎不再有使用的痕跡，翻動的時候有股陳舊的氣味，灰塵也隨手揚起。蓮姐告訴我們，以前診所會幫人抓藥籤，所以才留有參天宮跟海清宮的藥籤簿。她解釋：「藥籤是以前醫療不發達的時候（用）的.....現在醫療比較方便了，比較不用。」



圖八 中醫診所的參天宮藥籤簿
（朱昱威攝）

除了求藥籤以外，海清宮亦仍存有乩童問事的傳統。²⁵廟方人員向我們透露，每週二、四、六在後殿有乩童提供問事服務。某天，我們在後殿遇到了來問事的民眾。做儀式的是一位阿姨，她的頭髮用鯊魚夾束著，看起來隨意卻不隨興。來問事的是一個中年男子，旁邊跟著一個不斷走來走去，神情看來十分緊張的女子，兩人的頭髮都有些銀灰，後來我們從對話得知女子應該是男子的姐姐。做儀式時，阿姨不停地將香火繞在供品桌上，口中念念有詞，聽不太清楚在說什麼，似乎用吟唱的方式說著。待儀式結束之後，阿姨關心男子情況有沒有好轉，我們才知道男子是因為精神問題才來諮詢。據男子所述，他認為看醫生也沒有用，長期地莫名精神萎靡，一直處於疲勞才來做儀式。此外，阿姨也有問姐姐要不要一起做只要將名字一起寫上去就好。他們不是第一次來問事，男子補充，姐姐之前做完儀式後精神狀況也好了不少。問事基本不會額外向民眾收費，可男子最後還是遞給阿姨紅包，表示心意。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到，問事所處理的，是西醫體系難以給出明確診斷或有效回應的身心困境。在這樣的情況下，民俗部門提供了一套不同的解釋邏輯，使求助者得到另一種形式的回應與安慰。

藥籤與問事在三條崙地區仍然普及，在阿嫲的經驗裡，年長者來拿藥籤是常見的事，可在蓮姐等人的經驗裡，對於醫療資源相對容易取得的四湖市區來說，似乎已經漸漸乏人問津。阿嫲與蓮姐的對比，呈現出民俗醫療使用程度與正規醫療可近性之間清晰的消長關係：在正規醫療相對

²⁵ 乩童的台語一般讀為「童乩 *tâng-ki*」，有鄉親於本文發表後分享四湖常見的另一種讀法「乩童 *ki-tóng*」，在此表達感謝。

容易取得的四湖市區，藥籤與問事已經退出日常，²⁶而在醫療資源更為缺乏的三條崙，它仍然是年長者真實可用的選擇。如 Kleinman (1980) 所指出的，三個醫療部門在實際生活中並非截然分立，而是依據資源、文化與個人經驗動態並存、相互補充，三條崙的田野經驗正是這個論點的具體呈現。在正規醫療資源稀缺的條件下，民俗醫療填補了空缺，也構成了年長者在面對病痛時真實可用的選擇範疇。而年長者如何在這個多元的醫療體系中判斷、選擇與行動，則是下一節將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六）年長者的能動性

前五節呈現了三條崙年長者在面對病痛時的種種樣貌：距離重塑的就醫困境、植根於經驗的用藥邏輯、悄然累積的慢性病、親屬與鄰里構成的支持網絡，以及民俗醫療提供的另一種解方。貫穿這些樣貌的，是年長者們在資源匱乏的條件下持續展現的能動性。我們認為，他們並非被動承受限制，而是在可用的資源範圍內，主動判斷、選擇與協商。本節希望在前五節的基礎上，進一步說明三條崙年長者如何在多元醫療體系中展現這種能動性，並指出多元醫療體系如何反過來形塑了他們對病痛的認知方式。

Kleinman (1980) 指出，解釋模型是人們對於疾病成因、症狀意義及適當治療方式的認知體系，同時運作於專業醫療部門與民間部門之中。人們在面對疾病時，並非只依賴單一的醫療部門，而是同時運用專業部門、民俗部門與大眾部門的解釋模式，並在三者之間根據自身的經驗與處境動態取捨。從前五節的田野材料中可以看到，三條崙

²⁶ 根據我們的了解，參天宮目前沒有提供乩童問事的服務。

年長者正是如此。他們不只接受來自衛生所或診所的專業醫療建議，也同時援引家庭與社群的大眾解釋模型，如子女的位置決定就醫地點、鄰里的口耳相傳形塑對醫師的評價，並在西醫無法給出令人滿意的回應時，轉向藥籤或問事等民俗解釋模式尋求另一種答案等。這三種模型在年長者的實際生活中並非截然分立，而是視情境需要被靈活調度的資源。這種能動性在幾個面向上有具體的展現。

首先，是年長者在多元醫療體系中的選擇與拼裝。我們看到，三條崙年長者的解釋模型並非來自任何單一知識來源，而是在與不同情境、不同人、不同生命經驗的持續接觸中，被動態地拼湊與調整。在這樣的理解下，年長者以自身的生活經驗、親友的口耳相傳、民俗信仰的邏輯，乃至有限的醫療專業知識，共同構成了一套屬於自己的疾病解釋與應對體系。

其次，是年長者與專業醫療知識的協商。年長者們並非被動接受醫師的診斷與處方，而是持續以自身的感受和判斷與醫療體系進行協商。²⁷這些調整在醫療人員眼中是危險的外行實踐，但在年長者的邏輯裡，他們是以自身經驗為基礎、對藥物效果進行評估之後做出的主動決定。

第三，是年長者在距離與資源限制中謀求解方。年長者利用就醫前往大醫院的機會，採買或結伴以相互照應，使就醫不只是醫療事務，也成為維繫社會關係的機會。這些安排都說明在限制之中，年長者仍然持續在可用的資源範圍內，主動謀求對自己而言最可行的解決方式。

²⁷ 耐人尋味的是，有鄉親於本文發表後分享，在地年長者對於身體的認知及對處置方式的想法有時使得一些受過專業醫療訓練且有企圖的醫師感到力不從心。在此表達感謝。

這樣的能動性，也重新形塑了可近性（*access*）的意涵。Penchansky and Thomas（1981）提出的可近性框架，原本從醫療資源的供給端分析使用者與醫療系統之間的適配程度。然而，從三條崙年長者的實踐中可以看到，可近性不只是一個由外部結構決定的客觀條件，也是年長者在主觀判斷與行動中不斷協商出來的結果。地圖上的距離、班次稀少的交通車、在三條崙以外的診所，這些是客觀的限制；但哪個醫師值得信賴、什麼時候值得花這半天時間出門就醫、哪種處理方式在當下最可行，這些判斷則是年長者自己做出來的。正是這些判斷，使得同樣的資源條件對不同的年長者產生不同的可近性。

我們深知，即便在距離重構的不便之中，年長者仍有一套屬於自己的身體知識，這是一套幫助他們面對病痛、判斷是否就醫的行動依循。這套知識並非固定不變——它在與不同情境、不同的人、不同的生命經驗的接觸中持續被調整與重塑。而在這個持續調整的過程中，「病」（*pēnn*）對年長者究竟意味著什麼，又為何在他們的敘述中幾乎缺席，這正是下一章希望深入探討的問題。

五、病（*pēnn*）的陰影

在與不同的年長者對話的過程中，我們發覺到，三條崙的年長者們在敘述自己身體的不適或狀況時幾乎不會使用「病」（*pēnn*）這個字眼。即便我們嘗試刻意提到，像是詢問「有沒有生病？」「平時生病怎麼辦？」「生病時會去哪裡？」等，得到的回覆經常都像是「我背無爽快（*bô-*

sóng-khuài)」、²⁸「我心臟毋好 (*m̄-hó*)」等。相較於描述疾病的名稱或直說自己生病，他們更常透過直接敘述對身體狀況的主觀感受（如「無爽快」）或特定症狀（如「嗽 (*sàu*)」、「喘 (*tshuán*)」等）來表達自己的身體狀態。像是有一回在長青食堂，我（朱）問 83 歲的阿朗：「你生病的時候都去哪裡看？」阿朗沉吟了一下，回應道：「不舒服的時候要去下崙仔那邊。」在田野研究期間，類似的對話在我們與不同對象訪談的過程中出現過很多次。

這樣的回應方式使我們意識到「病」(*pēnn*) 的語言在三條崙年長者敘述中的缺席。不同於我們在平常生活中常提到的「要請病假」、「要打流感疫苗」、「他得了諾羅」等，在我們的訪談之中，受訪者對「病」語言及概念的使用似乎有著不一樣的模式。宋錦秀（2011）指出不同群體對疾病的概念受文化及社會的影響而有差異，我們亦認為三條崙年長者對於病的概念及想像應有根植於當地文化脈絡及社會生活的特殊意義。

本章節將探討「病」(*pēnn*) 在三條崙年長者間的社會及心理意義，這會涉及對於勞動能力的影響，與親戚、朋友、鄰里互動的關係，並形成一種令人內心不安的感受。我們將檢視勞動在三條崙年長者生活中的角色，對子女的情感，以及他們面對檢查、送醫時的反應及想法。但在進入內涵及意義的討論之前，我們認為需要先思考「病」的概念是何時生成的，而這也是許多對於醫療及疾病的研究常忽略的面向。

²⁸ 有鄉親於本文發表後分享四湖沿海居民較常使用「艱苦 *kan-khóo*」描述不適感，在此表達感謝。

(一)「病」(*pēnn*)的生成²⁹

疾病的概念牽涉到對於醫療、身體狀況的知識，而對於醫學及疾病的知識深刻影響著人們如何面對、處理身體的狀況。對於醫學及疾病的知識較充足的人，當出現特殊情況時，比較能知道要進行什麼處置並迅速反應。反之，相關知識較少的人則可能無法立刻做出判斷及反應。從醫療實踐的角度來看，第四章提到的許多案例，都反映出了三條崙的年長者們在面對自身身體的特殊處境時，會自行拼湊、接合、詮釋醫學知識，以提供實踐的基礎（林文源 2008：145）。但在對於「病」的概念的認知上，還牽涉到與醫者的互動。以下將以兩個醫病互動的例子說明兩者的關係。

我們訪問的鄧醫師跟我們說，四湖地區的年長者普遍對於健康、醫療的知識比較不足，因此在身體出現狀況時，常常不知道要怎麼正確的處理。阿美的經驗在某種程度上呼應了鄧醫師的看法。在我們問及就醫經驗時，阿美有些無奈地提到她之前曾經因為頸椎損傷動過手術。阿美說，當初問題剛發生的時候，她只覺得脖子怪怪的，一開始以為是年長者常見的頸部問題，覺得沒什麼，便沒有去就醫，也沒有去照 X 光檢查，而直接去復健機構「拉脖子」。然而持續的復健沒有改善症狀，後來某天，阿美發現她的左手不太能動，也拿不了東西，才發覺不對勁，趕緊到醫院檢查。醫生初步檢查之後，護理師帶著阿美去照 X 光，阿美還想說「手的問題為什麼要照脖子？」後來，經過醫生的解釋，才知道原來是因為頸椎「開」掉，壓迫到手部的神

²⁹ 感謝評論人對於本節分析方式的提問，在此做說明：本文希望透過捕捉診斷前後語言使用的差異來討論概念生成的時機與條件。

經，導致手不能施力，而當初去拉脖子的方法不僅沒有幫助，反而使頸椎被越拉越開。從阿美的經驗中可以看出，在還沒有就醫、檢查之前，年長者可能會因為不清楚身體究竟發生什麼狀況，而依靠主觀經驗及認知，優先選擇自己認為可行的處理方式。我們可以說，正是因為並未意識到「病」，因此才會選擇以較簡單的復健方式嘗試舒緩狀況，而不是去就醫、做檢查。

關於醫學知識如何形塑，以及「病」(*pēnn*)的概念何時在三條崙年長者的認知中生成，我們認為與醫療人員的參與，即衛生教育（衛教）、檢查及診斷有關。在這幾個面向，醫療專業人員的知識傳授與醫患間的知識協商，構成人們建構自身經驗知識過程的一部分（紀慧君 2023：32-33）。

在衛教的部分，談到癌症篩檢的情況時，在衛生所服務多年的甄姐感嘆道，教育及認知的落差導致年長者不知道篩檢的重要性，因此常會忽略甚至拒絕篩檢，他們只能透過加強衛教、說明後果及影響，讓年長者更了解癌症和慢性病的嚴重性，才能使對方較願意配合篩檢。透過醫療人員在衛教工作中的解說，年長者能夠稍微增進對於疾病的原因及影響的了解，但要真正將病的概念及知識與自身產生連結，要談到檢查，以及檢查背後更重要的「診斷」。

診斷是定義和管理疾病的關鍵，且在協商知識的過程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Rosenberg 2002: 240；中譯參 Rosenberg 2013[2002]: 67）。診斷的過程包含就醫者對自身感受及經驗的敘述，各種形式的檢查，以及診斷者依據訓練、知識及經驗所下的判斷。在診斷過程中，診斷者與就

醫者協商出一種對於就醫者身體狀況的論述、命名及詮釋，以做為進一步治療及處理的基礎。

我們認為，診斷的過程將「病」(*pēnn*)的概念引入就醫者的認知中，也即，就醫者對與自己切身相關的「病」(*pēnn*)的概念在診斷中生成。我們訪問中醫診所的胡醫師時，與胡醫師討論到關於病患的狀況，並詢問患者會如何敘述症狀。胡醫師提到，大多數的病患都是直接敘述主觀感受的症狀，如頭痛、胸悶；少數人會直接說出自己的病名給醫師參考。那些能夠準確說出自己病名的人，幾乎都是已經接受過西醫體系的檢查、診斷，甚至在西醫體系治療過後，又來中醫診所看診的。從這個現象上可看出，是否經過檢查、診斷，對於會不會以「病」(*pēnn*)來詮釋自己的身體狀況有所影響。

對於診斷前後描述方式的差異，也可以從阿美與阿海的經驗對比來討論。阿海在三條崙海清宮服務，一開始跟他對話時，阿海的話不多，回應的語氣也比較生硬，在反覆拜訪之後，他才開始比較深入的談論自己的狀況。因為台語口音的關係，我們有些部分沒能聽得很清楚，但在談到阿海的身體狀況時，阿海用國語明確地說出他有看「新陳代謝科」，並告訴我們他有「高血壓」及「糖尿病」。相比阿美在就醫前對於自己的身體具體狀況比較不清楚，也不知道要檢查什麼部分，阿海在經過就醫、診斷過後，明確地指出自身的疾病及對應的醫療科別。透過診斷，阿海建立了一種「病」(*pēnn*)的概念，並與自己的症狀相連結，進而用以詮釋自身的身體。

從上述三條崙年長者的經驗中，我們看到醫療專業人員的參與對醫學知識生成的影響，顯示醫學知識是在病患、

醫療人員等不同行動者的社會互動之中形成的（林崇熙 2008：124）。透過衛教中的雙向詢答，年長者們逐漸建立對於疾病及醫療知識的認知，並進而擴增可能的行動方向。但從衛教建立的知識仍停留在自身之外，尚未與自身身體狀況連結。



圖九 診斷對「病」(*pēnn*) 概念的影響

診斷的過程將病從客觀存在連結至主體經驗，
使患者能將主觀的不適感轉化為客觀的病理學概念。

（朱昱威製圖）

而從診斷前後年長者們描述自己身體狀況方式的差異中，我們認為，診斷的過程生成了「疾病」的概念。透過診斷，年長者們生成一種對「病」(*pēnn*) 的概念的理解，並將「病」與自身狀況相連（如圖九），從而重新詮釋自身，而形塑一種不同的敘述方式。

然而，只是說明概念生成的時機並不足夠，在此基礎之上，我們更關注三條崙年長者們如何想像及體會疾病，亦即「病」(*pēnn*) 對於他們的意義，而這就牽涉到他們的勞動與社會生活。

（二）勞動生活

勞動在四湖沿海年長者的生活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其中的生產性、經濟性面向亦影響著他們對於身體狀況及疾病的反應與想法。像是甄姐就曾跟我們提到，對於那些不願意花時間去衛生所進行癌症篩檢的年長者，要很清楚地說明患病的嚴重性以及對經濟層面的影響，他們才會比較願意前去作檢查。這顯示經濟的層面對於他們十分重要，也影響他們跟醫療機構的互動方式。以下舉四個例子說明。

茆子寮的黃大哥也跟我們提到，他阿公以前從事稻作跟養殖業，因為工作環境的關係，都需要打赤腳下去工作，長期摩擦之下，腳底都積了很厚的角質層，便常常需要磨腳皮。但也因為常常打赤腳，腳部沒有保護，因此受傷後傷口難以保持乾淨，於是就常引發細菌感染。對於傷口，黃大哥的阿公為了不耽誤工作，也因為醫學知識不足的影響，因此想說用口水塗抹一下就好。因為沒有做好清潔及治療，有次傷口感染引發了敗血症，而阿公又剛好有糖尿病，導致腳嚴重受損，因而截肢。後來，腳部的感染又轉移到腸胃而產生腫瘤、變成癌症，也因為癌症的關係，黃大哥的阿公最後因病過世了。對於阿公為了不麻煩而忽略小傷，最後釀成大病的故事，黃大哥亦有感而發的說：「有疾病的時候，不要小看它。」

不只黃大哥的阿公，在參與茆子寮社區疫苗接種活動時，我們也看到年長者們很關心疫苗對於工作的影響。有位阿嬤在準備要接種時，緊張地詢問現場的護理師：「打這個會不會痠痛？」阿嬤說她回去之後還要做事，怕痠痛感影響手部行動。也有一位阿嬤頂著大風，搖搖晃晃的前來打疫苗，我（朱）關心阿嬤大風天騎車要小心時，阿嬤跟

我解釋道她是為了之後直接去工作才騎腳踏車來。此外，還有一位阿嬤來接種疫苗時，手指裹了很多繃帶，我們詢問之下，她微笑著說自己是因為工作剝花生而手指受傷，自己用繃帶裹起來比較不痛、不影響工作。從這些阿嬤的回應中，可以看到工作對於他們生活的重要性，即便是久久一次的疫苗接種，也不想因此影響工作進行。且從黃大哥的阿公及第三位阿嬤的案例中，可以看到工作的需求影響著他們處理傷口的方式，為了不影響工作，他們選擇只是簡單包紮、處理，而避免較花時間的治療。

在三條崙，我們也可看到勞動對於年長者生活的重要性。有一天，阿美邀請我們去她家作客，一進門，阿美就熱情地塞了很多點心跟飲料給我們，我們一邊吃著點心，一邊跟阿美和她的女兒瑜姐聊天。在交談過程中，不同於我們坐在沙發上吃著東西，阿美站在吧檯式的木桌邊，手中一直在處理要賣的檳榔。阿美已經賣檳榔幾十年了，雖然現在早上會去長青食堂幫忙及參加活動，且瑜姐也都會幫忙她處理檳榔，但她還是在不需出門的時間自己處理很大部分的檳榔。從阿美的生活模式中可以看到，工作在她的生活中占據了很大部分，即便有人能接手，她還是持續從事已經做了很久的工作。

除了經濟性的勞動，志願服務是勞動的另一種方式。海清宮的阿海已年逾七十五歲，儘管已退休，且行動比較緩慢，他仍常到宮裡協助。有次我們在海清宮前遇到他時，發現他一邊腳的拇指包著紗布，我們問他怎麼包成這樣，他面無表情地說他的腳之前踢到東西受傷，所以自己用藥膏擦一擦之後拿紗布纏起來，這樣不影響走路。雖然從我們的角度阿海的傷口看起來有點嚴重，但他沒有去診所消

毒、處理，而選擇自己簡單包紮處理，之後仍照常到海清宮報到。

從前面提到的許多例子中，可以看出不論是經濟性或是志願性的勞動，都在這些年長者的生活中佔據重要角色。如同康舒雅（2024）筆下的高齡者們用勞動填充晚年的生命，我們看到的年長者們也在勞動中度過生活。雖然他們的工作並非不能放下，也確實有許多人在年紀漸增、體力漸弱的情況下慢慢地不再工作，但許多人仍然進行著一些簡單的、能負擔的勞動。

在將勞動視為三條崙及周邊區域的年長者生活重要部分的基礎上，我們可以進一步討論勞動與疾病意義的關係。針對勞動重要性與疾病的影響，Hay（2010）研究美國病患的經驗，指出當患者因疾病而無法符合社會對於勞動生產力的期待，便會感受到能動性的喪失，進而加劇他們的苦難。雖然三條崙年長者的社會不如 Hay 研究的美國社會中如此強調個人的生產力，但我們認為在這裡，疾病的概念亦隱含了對於持續勞動可能性的負面影響。

如同前面提到的許多例子所顯示的，「病」的概念常伴隨著身體的不適及對行動能力的影響。身體上一些容易忽略的小問題，亦隨時都有可能在無意間發展成嚴重的狀況。當疾病對身體的侵害影響到年長者的行動能力，如使人必須截肢，或是對於神經、肌肉等其他部分的干擾，便會進一步影響到他們能否繼續從事勞動。而當疾病的影響使得年長者難以工作，也就等同於影響了他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因此我們認為，對於三條崙年長者而言，疾病的概念亦帶著一層會在負面方向「影響工作」、「影響生活」

的意義，也使病的概念從醫學層面擴展到社會面向（如圖十）。



圖十 勞動對「病」(*pēnn*) 概念的影響

（朱昱威製圖）

雖然前述的討論似乎將勞動描繪得像是較具個人生活習慣方面的意義，但我們所看到的那些年長者們的勞動其實亦關係到家庭經濟、團體事務及活動的運作等，因而「影響勞動」所賦予疾病的負面意義，亦牽涉到年長者的家庭情感及社群情感。下一部分將從親情及鄰里、朋友間的互動、感受的相關面向，討論對於三條崙年長者而言，病所隱含的另一層意義。

（三）親情與朋友³⁰

在訪問過程中，我們發現陪伴、互動和情感，對於三條崙年長者而言非常重要，而這也很大程度影響了他們如

³⁰ 本節部分敘述的基礎來自王昱婷、吳俊達提供的資料，謹此再次表達感謝。

何面對自己的身體狀況。以下舉五例說明。阿朗獨居在三條崙北邊，家裡有一隻狗陪伴他，每次在長青食堂吃飯，他總會留一些打包回去。其他人告訴我們他是要帶回去給他的狗吃，雖然阿朗總說他的狗很吵，但說話時的笑容可以感覺得出對小狗的喜愛。阿朗告訴我（朱），他的手腳不太好，而且走路走多了會喘，因此每兩個月都需要去北部的醫院檢查、拿藥。阿朗有個兒子在北部當國小校長，每次阿朗需要回診時，他兒子都會來載他，他也就順便去北部住幾天。當問到他為什麼不乾脆隨兒子搬去桃園時，他說住在北部不習慣，白天時小孩要工作，家裡都沒人在，自己一個會孤單，還是住在三條崙這邊比較好，有認識許久的朋友們可以聊天，平時也不需要麻煩小孩照顧。

跟阿朗的故事相似，周邊村落的一位杜村長也提到，三條崙附近有很多獨居年長者，不是因為他們的子女都不孝順、不在乎父母，是因為年長者自己不想去都市住。杜村長說：

他們去都市，有的不會按電梯，然後就都關在房裡。
然後有的媳婦都喜歡晚起床的話，他們也不好意思吵到他們，可是他又都習慣早起，就是生活作息上沒有辦法在那裡習慣，所以他們就喜歡在鄉下，有鄰居啊。
（轉引自王昱婷、吳俊達 2026/1/13 提供之訪談紀錄）

阿朗的故事及杜村長的感受突顯了三條崙年長者們對於人際間情感的重視，他們重視與朋友的情感聯繫、互動，也重視子女的生活，不想太依賴子女。這樣的情感關懷，深深影響了他們的生活方式。

在我們調查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三條崙的年長者們會「怕麻煩」，怕麻煩子女、怕麻煩鄰里朋友。甄姐也跟我

們提到過：「很多長輩怕子女麻煩，都不願意叫子女回來協助。」亞萍也告訴我們，許多年長者遇到身體有狀況時，因為會害怕麻煩子女，所以寧可忍著狀況自己想辦法解決，也不想聯絡子女，怕子女擔心，也怕影響子女的工作，很多時候要由藥局主動介入聯絡，子女才知道父母的狀況。此外，鄧醫師亦同意，許多年長者因為怕打擾、影響兒女的工作與事業，而在遇到問題時不敢告訴子女。

從甄姐、亞萍跟鄧醫師的說法中，都可以看出，許多年長者們重視子女的事業，也怕自己的狀況會引起子女的擔憂。雖然因為醫療資源取得不便，若要就醫常需要有人接送，但因為不希望占用子女的時間，因而在遇到身體狀況時隱忍不言，而嘗試尋求其他解決方式。

而除了子女外，年長者們也不願意麻煩鄰里朋友。我們在診所遇到的一位講話很快的阿嬤就跟我們說，她朋友知道她要去診所看醫生後，原本說要陪她去，但她想說「不要麻煩朋友」，於是就自己一個人去看。由於重視與鄰里朋友間的交情，且相處久了也了解彼此的生活型態跟模式，因此他們也不希望因為自己的情況去影響、打擾其他人。

進一步而言，當身體有狀況的時候，年長者們常不希望驚動鄰里，也怕鄰里知道自己的狀況，會讓其他人擔心。阿楠的故事就顯示了年長者不願意鄰里擔憂的想法。阿楠獨自住在三條崙南邊，有一天有人跑去跟杜村長說阿楠狀況不好，杜村長便到阿楠家關心，阿楠說他肚子很痛，杜村長就想幫阿楠叫救護車。阿楠拒絕了杜村長的提議，說想要叫計程車自己去就好。根據杜村長的轉述，因為救護車來回的過程為一路鳴笛，阿楠擔心會驚動周遭的住戶，

因此不想叫救護車。但杜村長擔心阿楠自己去會沒人協助、沒人攙扶，覺得還是請救護車，有專業救護人員比較安全。最後杜村長表示要請救護車接近的時候不要鳴笛，阿楠才答應。從阿楠的例子可以看出，即便會讓自己更不方便，且風險提高，他也寧可自己默默前去就醫，而不願意因為救護車的聲音驚擾其他人，讓鄰里擔心自己的狀況。

我們認為，對於三條崙年長者，疾病的概念隱含一種對人際情感的干擾及困難。更明確來說，疾病概念隱含了會麻煩子女、影響朋友、驚擾鄰里的意義。疾病所指向的醫療需求，與行動不便的身體、可近性低的醫療資源交織，使年長者們若要取得妥善的醫療協助，很可能需要子女、鄰里、朋友的協助。在這樣的條件下，一方面年長者需要協助，另一方面又不希望麻煩、影響他人，因此他們便面臨了抉擇上的兩難。這使得在三條崙年長者間，疾病有了一重「需求與情感兩難」的意義，使疾病在他們的心中創造了不安的感受。下一部分將統整本章的論述，以討論「病」(*pēnn*)的概念對三條崙年長者的心理意義。

(四) 不安的心

經過前幾節的討論，我們認為，診斷召喚了「疾病」的概念，而勞動、親情、鄰里關係的重要性為疾病賦上了「影響生活」的隱喻。經由診斷的過程，原先陌生的疾病概念被協商而連結到求醫者的身體。而當疾病狀態被宣告，生病的狀態便指向醫療需求，進一步連結影響工作的可能性及需求與情感的兩難。面對疾病，也就意味著要改變生活及人際互動的節奏，或可以說，疾病的侵襲，就是一個

破壞與限制患者整體生活世界正常運轉的存在困境事件（黃瓊儀 2011：110）。

疾病隱含了「異常」的概念（Rosenberg 2002: 251；中譯參 Rosenberg 2013[2002]: 76，引號為筆者所加），諭示著平常的生活將被打破。對於重視生活節律、經濟生活、親情與鄰里關係的三條崙年長者而言，疾病的概念便籠罩一層了令人恐懼的陰影，並喚起他們心中的不安。

進一步而言，疾病隱含的對生活的影響加深了表面上的嚴重性。對疾病的不安，乃至聽聞他人生病的結果，都會影響年長者們的行動。像是衛生所的琳姐在跟我們談到疫苗接種情況時，提到平時儘管衛生單位有在推廣，但很多人還是不願意花時間去打疫苗，她強調「這裡的人幾乎都是『有事情才來』。」甄姐舉例說，像是之前鬧得沸沸揚揚的「大 S 事件」後，³¹就有許多人突然願意去打疫苗，使得那批疫苗特別快就打完了。藝人離世的事件使其中的疾病成為一種如 Sontag（2000[1978]）所討論的超出醫學意義的象徵。死亡指涉的「生命、生活的終結」使得疾病令人不安的陰影變得前所未有的大，使許多原先不了解疫苗，或不願花時間去打疫苗的人因此改變行動。³²

另一方面，疾病的影響性使「生病（或台語：破病（*phuà-pēnn* 或 *phuà-pīnn*）」成為被希望避免的狀態，³³而我

³¹ 指 2025 年初藝人徐熙媛（大 S）傳出因流感併發肺炎，於日本離世的事件。此事件因大 S 的名氣及牽涉到的許多民事糾紛而引起廣大關注，相關時間及事件可參東周刊（2025）。事件過後，許多醫師及醫療衛生單位，如大林慈濟醫院胸腔內科主任陳信均醫師等亦出聲強調疫苗的重要性（大林慈濟醫院 20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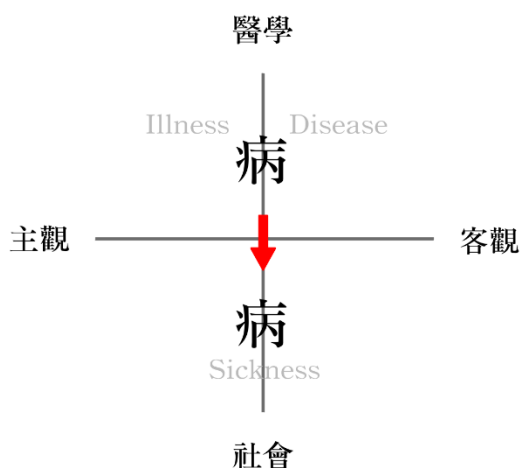
³² 這個例子亦牽涉到媒體、數位傳播等對於醫療知識建構的影響，但這並非本文的主要論題，因此本文不欲進一步討論。

³³ 感謝鄉親於本文發表後分享四湖沿海居民對「病」的常用讀法（後者）。

們認為這影響了許多年長者對檢查、診斷乃至來自專業醫療機構的醫療的抗拒。檢查為診斷的一環，而診斷構成醫療的前提，使這一整個過程都與疾病概念的生成及生病狀態的宣告有關。對患有疾病的不安因此使得人們拒絕接受診斷及檢查。像甄姐說在向年長者宣導癌症及慢性病篩檢時，會一個一個打電話，而許多人接起來聽到內容就會掛斷，甚至大罵衛生所的人員。即便登門造訪，有的人也會深鎖大門、拒絕檢驗。對此甄姐亦表示無奈。

從年長者因新聞事件而短期內更積極打疫苗，到對於篩檢的激烈抗拒，其中的矛盾性更顯現出疾病在年長者心中渲染的不安。而影響生活、干擾人際情感等隱喻意義，亦使疾病象徵了對社會生活安定感的破壞（參考圖十一）。綜合而言，可以說，不論是對於阻礙勞動的擔憂，對於麻煩子女、驚擾鄰里的不情願，到與醫療單位的矛盾互動，都隱含了「病」對年長者心理上的負擔及影響。我們因而認為，「心的不安」貫穿了「病」（*pēnn*）的生理與社會意義，進而使疾病的陰影變得鮮明，而放大了疾病的負面形象。³⁴

³⁴ 有鄉親於本文發表後分享，他認為當地年長者的病常像是「心理的病」，呼應本文觀點，在此表達感謝。



圖十一 勞動生活與社會關係對「病」(*pēnn*) 概念的影響
對於勞動及社會關係的影響使病的概念從醫學層次擴展至社會層面。
(朱昱威製圖)

而對於如何袪除疾病的陰影，並使病痛中的人們重回平常生活，我們認為這就需要醫療的介入與協助。下一章將討論三條崙的年長者們如何看待醫療，而醫療應如何回應，並發揮其意義。

六、何謂醫療

從第四章中可以看到，在三條崙年長者的生活世界中，有著多樣化的醫療形式並存著。常被視為正規的西醫體系、輔助與替代醫療 (CAM)、民俗醫療 (張珣 2008b : 9-10) 或宗教醫療 (宋錦秀 2011 : 57) 等部門共構了「多元醫療」的體系，而人們在此體系中穿梭、交互應用，以解決身體的問題，及抹去疾病的陰影。疾病為人們帶來了苦難、病痛及不安，而醫療的介入便被期望能消除這些負面的感受，使人們的生活回歸原狀。

然而，為何會有這麼多樣的方式與體系並存著？人們面對不同的資源、方法時，又有什麼樣的想法？這些都是我們想要追問的問題。本章將探究三條崙年長者在與醫療資源互動的過程中深層的行動原因。首先，我們將討論他們對於「有效」的追求，並分析背後的原因。其次，我們討論「醫師緣」被用以詮釋醫療選擇與醫病關係的方式及文化意義。最後，歸結本文的論述，以主張醫療不只是針對疾病與症狀進行處置，更重要的是「心的關懷」。

（一）追求「有效」

症狀為年長者帶來不適，而疾病為年長者帶來了困境及不安，因而化解症狀、消除疾病便成了迫切要解決的事情。醫療作為解方，在此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但並不是所有的醫療都能達到作用，需要符合求醫者想要的方式及結果，才能被求醫者接受。

對此，三條崙年長者們會追求「有效（*ū-hāu*）」，以期更快、更好的解決面對的問題。「有效」包含了「有效果」及「有效率」，亦即能夠解決問題、且能夠快地解決問題。林文源指出在慢性病的治療中，患者會選擇性的拼裝各種知識，以尋求自己認為最有效的方法（林文源 2008：138-139），而在三條崙，年長者們也會透過在醫療選擇中實踐自己的追求及想法，以追求自己認可的「有效」。

尋求密醫的協助就是一種追求「有效」的實踐。不如一般的專業醫療機構有著複雜的管制及程序，密醫的營運依靠緊密、穩固的人際網絡及地方默契，因而其診療追求快速為患者解決病痛。³⁵像是阿眉有跟我們提到她曾去看

³⁵ 我們所知的密醫主要皆是以偏向西醫的方式進行診療。

「無牌牙醫」，無牌牙醫的服務內容通常是拔牙跟補牙，雖然不會像牙醫診所一樣開藥及做精密治療，因而不能處理太嚴重的問題，但其快速、方便的性質，可以使患者很快達成目的。

除了牙醫，也有專門處理身體內部的不適的密醫。鄧醫師就跟我們提到，有些人會去找密醫「注射（*tsù-siā*）」，³⁶雖然他認為應該循正規的途徑得到診療才安全，但他也承認許多人喜歡透過密醫來快速處理。從我們的訪談中，我們發現「注射」是最常被與密醫畫上等號的處置方式。像是瑜姐跟我們說「老人家喜歡去注射，因為效果比較快。」胡醫師也觀察到許多年長者追求快速見效，因此即便只是患了感冒，也想去「注射」，以求快速緩解症狀，以繼續日常勞動。平時去診所或醫院看診，較常碰到的情況即是醫師進行問診及檢查，並開立處方箋，接著患者領藥回去服用，並不總是採用注射的方式。但許多人認為，比起單純吃藥，注射能夠更快速的發揮藥效，因此雖然密醫並不合法且具有更高的風險，仍然會選擇去找密醫注射。從求助密醫的行為中，可以看到，追求療效的想法有時會掩蓋風險，也突顯「有效」對於年長者行動的強烈影響力。

對於快速的追求，也體現在三條崙年長者對中醫的態度上。長青食堂的阿善跟我們說，雖然她自己較喜歡看中醫、吃中藥，但她周圍的年長者們不願意看中醫，且「不管怎麼勸都勸不動」。如同住在三條崙的蘇藥師說，年長者們普遍認為是「吃補用中藥，看病看西醫」，在年長者們的想法中，西醫比起中醫，更能快速對症下藥、解決問題，

³⁶ 即打針，包含較常見的皮下注射、肌肉注射、靜脈注射（俗稱吊點滴）等及其他類型。

而中醫則被認為比起治病更多在於調養身體。就連經營中醫診所多年的胡醫師也說，很多年長者「不吃西藥就艱苦（*kan-khóo*）」。這樣的想法顯示，透過對於有效的追求，不同的醫療體系被進行排序，也反映出年長者們對於醫療效果的預期，影響了他們的行動選擇。

然而，即便西醫被認為是能快速見效的方式，但並不總是能達到「效果」。若西醫不能夠幫助求醫者解決問題，他們也會求助其他部門。如胡醫師提到，雖然很多人認為西醫較快速有效，但也有些人會因為透過西醫復健的療程沒有感到好轉，轉而找中醫傷科處理。這顯示即便中醫在速度的競爭上輸給西醫，但仍能在效果上發揮很大作用。

不只中醫，宗教醫療也常接手西醫無法「有效」解決的問題。像瑜姐說以前有帶媽媽阿美去海清宮求過藥籤，因為當時阿美身體不舒服，去看了西醫診所，但是效果不好，所以便想說去求看看藥籤。雖然瑜姐打趣地說：「老人家比較信這個神明啦！」但仍然可以看出，宗教醫療補足了西醫體系在某些情況下對有效性的喪失。以上聚焦於醫學體系的選擇層面，以下將討論「追求有效」如何反映在用藥的面向上。

在用藥的方面，三條崙年長者們也會基於經驗、預期及想法，自行調整劑量。長青食堂的阿崙就說，有時候年長者按照醫囑上的規範吃藥，但是感覺吃起來效果不太對，他們便會透過諮詢認識的藥師或依自己的經驗而自行調整用藥的量。從醫療人員的角度來看，因追求有效而改變藥的劑量可能不是安全的行為，如胡醫師談到有些患者可能會為了求快，選擇將多次的份量一次吃完，以為這樣可以更快痊癒，但有些時候這些藥是不能多吃的，可能會因某

些成分劑量過大影響身體。亞萍也提到很多年長者都把感冒藥水「當保健用」，覺得喝多一點效果比較快，但其實都超過建議的劑量。即便面臨風險，但這樣的行動方式顯現三條崙年長者們如何詮釋「有效」並因此而行動，且透過選擇性的遵從醫囑，年長者們在對有效的追求中展現對於自己身體的理解及與醫療專業協商的能力。

總體而言，三條崙年長者們追求的有效不僅是有效果，且要能迅速感受到。而這裡的「效果」及「速度」，也並非從醫療人員的立場所認為的消除感染源、病因、傷口復原，以及受專業預期的作用時間。不論是效果還是效率，能否達到求醫者認同的有效，都取決於他們自身的預期跟想法。如同衛生所的人員跟我們說，如果沒有符合年長者對於治療的預期，即便就醫師的角度判斷有達到應有的療效，年長者們也往往會覺得醫師只是「做做樣子」，沒有真正幫助他們。

換言之，有效與否的認定影響著年長者們對於醫療的感受及評價。而有效的意義在於能關照、滿足年長者內心的急切追求。胡醫師亦同意：病患主要是要求安心，不論療程是否實際有幫助他們改善身體。唯有能觸及心的感受，才能達到真的有效。

承接第五章對病的意義的討論，我們認為對「有效」的追求乃是為了迅速撫平疾病帶來的衝擊與不安，並將生活導回常軌。而有效與否的認定，影響著三條崙年長者們的思考、選擇與行動，也影響著他們與醫療人員、醫療體系及醫療指示的互動關係。像胡醫師就認為，在年長者們的心中「有效勝於一切」，要是沒有效，他們就不會繼續去看診。而這個過程中，如何選擇及認定有效的醫療，便牽

涉到「醫師緣」的概念。下一部分即討論「醫師緣」的概念如何實踐，又反映了什麼意義。

（二）先生緣，主人福（*Sian-sih iân, tsú-lâng hok*）

在我們的田野中，許多的報導人都不約而同地對我們提到了「先生緣，主人福」這個諺語。像是阿崙就提到過，並對我們解釋說，每個人有自己覺得適合的醫療方法及醫療的地方。胡醫師也解釋道：

很多人來到這裡看診拿藥，吃了覺得適合，就會再來，如果吃了覺得沒幫助，就會跑去別的地方看。所以說遇到適合的醫生是病患的福氣。啊有些醫生技術不一定好，但很會說話，讓病患很喜歡。

「先生（*sian-sinn*）」是台語裡面，傳統上對於醫生的尊稱，「先生緣」即是「醫師緣」。人們透過「先生緣，主人福」的諺語，來解釋醫患間適應與否、能否促成有效的醫療的情況。成令方認為由於診治效果與醫病之間的溝通不良，病人會「逛醫師」、四處比較（成令方 2008：127，引號為原作者所加）。而這種「逛醫師」的行為亦即是一種尋求「醫師緣」的連結的實踐。

陳主顯研究臺灣的醫療俗諺，指出「先生緣，主人福」反映了人們將醫治寄託緣分（陳主顯 2016：205）。胡醫師亦對我們說：「來者有緣，信者有福」，認為會來到他的中醫診所的人就是與他有緣，對中醫比較了解、有相信他這位醫生的人才會來他這裡看中醫。換言之，透過「有緣」的概念，醫師與患者間建立了一種信任關係及理解，並使得醫療成為可能。

「緣」主要起自佛家「因果報償」與道家「順應自然」的哲學人生觀（徐欣萍 2012：83，引號為原作者所加）。雖然在當今三條崙的語境中，「緣」原先帶有的宗教哲學色彩不那麼濃厚，人們也不太會運用因果報應的思考方式來談論事情，但「緣」的概念仍然被使用在不同的情境。如亞萍對我們分享自己的情感歷史，說她的父母之前有出租房子，而蘇藥師恰巧來租他們家的房子，兩人因此認識，後來就結婚至今。她並非以同事或同學，而是以房東女兒的身分遇到丈夫，這樣奇妙的關係讓她覺得兩人很有緣分。

在本土心理學研究中，「緣」是一個很重要的領域。張思嘉及周玉慧說明，緣的主要功能包括引發人際知覺及後續的行為，並在人際歷程中成為回溯與反思的工具（張思嘉、周玉慧 2004：86）。也就是說，「緣」作為連結過去事件與未來行為的橋樑，一方面用以詮釋已發生或未能產生的人際關係互動，一方面提供未來行動方式的指引，並給予理由。

在此基礎上，「有緣」則代表了人際間繼續互動的可能性（同上引：88，引號為原作者所加）。像「有緣」就創造了亞萍與蘇藥師的相遇及婚姻。而在醫療的層面上，「有醫師緣」不僅如胡醫師所說的創造了與醫師的相遇，在「先生緣，主人福」的實踐脈絡中，更象徵著患者能夠尋得他們所認可的、對他們有效的醫療部門、醫者及醫療方式。若醫師的診療、處方能夠讓患者感覺良好，並願意再度回診、延續與醫師的互動機會，便可以被解釋為與那個醫師「有醫師緣」。

徐欣萍認為，「緣」能引領人們在面臨生活事件或關係困境時，採取適宜的行動以達成心理調適（徐欣萍 2012：

89)。當醫療的效果不符合預期，或是求醫者不滿意醫師的診斷、治療，則「醫師緣」的概念也會被用來解釋這種狀況，並作為轉換醫療選擇的理由。

「緣」所帶有的「天註定」的意義也常與宗教實踐有關係，當其他的醫療部門不能滿足求醫者的需求，幫助他們解決問題，許多人便會尋求神明的介入及決定。從我們觀察到的案例而言，像是阿美在西醫沒有效時去求藥籤，黃大哥也提到身邊的年長者在中西醫都看不好時去求藥籤。藥籤作為神明的診斷及處方，在求醫者認為與其他醫師都沒有緣時，透過神所連結的天的意志化解這個困境。

同樣的，神明的意志有時也會被認為能提供求醫者他們「與何種醫療方式有緣」的指引。像黃大哥提到年長者在吃了坊間的藥沒有作用時，可能會去神明面前擲筊，自己去想一些配方，並詢問神明意見。瑜姐也提到阿美曾去廟裡擲筊，透過神的指示決定自己要看哪間診所。如同許多人到廟中拜月老或註生娘娘，希望求得與另一半或子女的良緣，並斬斷不好的緣分，可以說，年長者們藉由求助神明，希望避免遇到「無緣」的醫師或醫療方式，而尋求「有醫師緣」的處置方向。

從「先生緣，主人福」的實踐中，可以看到「有緣」與「有效」互相纏繞。若醫療的過程與結果能讓年長者們覺得有效，那他們便會覺得與醫者有緣。反過來，他們也會認為，是因為有緣所以才會有效。「有緣」與「有效」互相成為因果，也相互詮釋，而這也突顯了「有效」的心理意義。

透過「先生緣，主人福」的詮釋，年長者們選擇他們認為對自己最有幫助的醫療方式，並藉此突破科學性的框

架。另一方面，「醫師緣」也呼應每個人對於治療效果的不同感受，改變他們的行動方向，並形塑不同的醫療習慣。像鄧醫師便提及「先生緣，主人福」會被用以解釋受個性、個人習慣影響的藥物服從性。亞萍也強調個人思維不同、習慣不同，選擇也不同，每個人也會有不同的看診偏好。而這些也對應到每個人與其他人的緣分不同。

綜合而言，不論是第五章敘述的疾病的陰影及隨之而來的不安，年長者們極力追求的「有效」，還是用以解釋醫療效果的「醫師緣」，都隱含著心理的情感及價值在年長者醫療實踐中的重要意義。下一節即要討論，從三條崙年長者的醫療經驗及想法來看，在醫療實踐的場域中，心理因素的重要性為何，醫療又該走向何方。

（三）心的關懷

在醫療相關場域的互動中，醫療人員的態度、情感表達及行動方式塑造出的氣氛，深刻影響著年長者們的回應方式。當醫療人員在與年長者們的互動中展現熱情及真誠，年長者們能感受到醫療人員的關心，便較容易給出良善的反應，並接受對方的意見及協助。像是我們在箔子寮看到，在疫苗接種過程中，護理師會帶著微笑細心地跟年長者解釋怎麼打、什麼時候會比較好，他們對話的語氣都很輕鬆，像是在與朋友聊天，而不是形塑一種專家、精英的態度。許多年長者不會寫字，當遇到一位能自己簽名的阿嬤，護理師還開玩笑的對她說：「你有讀大學（*thák-tāi-hák*）喔！哪會遐爾厲害（*Ná ē hiah-nī lī-hāi*）！」聽到這句話，阿嬤也靦腆的笑著。友善、親近的對話語氣形塑出輕鬆、自在的氣氛，也使得年長者們能夠放下擔憂，配合醫療。

鄧醫師曾告訴我們：「不是我們建議他（病患）就一定會接受。」如果病患覺得自己有被關心，就會比較願意聽從醫師的建議。衛生所的人員也跟我們提到，有些病患會覺得衛生所的人是來「賺他的錢」而拒絕訪視或協助。這些都顯示了，若缺乏足夠的關懷，醫療的行動便難以推展，也難以達到治療的效果及目的。

診斷及醫療的過程，都需要醫者與求醫者相互協商、交流及配合，若溝通難以進行，或是無法達到共識，那醫療就無法進行。在我們訪談的過程中，可以明顯感受到，當我們用心傾聽年長者們的話語並積極的回應，年長者們便更樂於向我們傾訴生命經驗及想法。甄姐也和我們分享，與年長者接觸時，若表現出真心喜歡對方的姿態，用情意去感動對方，就比較能拉近距離，使溝通能夠進行。

我們主張，醫療的意義不僅在於能夠緩解症狀、消除被診斷出的疾病，更重要的在於對於患者的心的關懷。對於三條崙年長者而言，疾病除了指涉身體的變化，更隱含了影響、干擾勞動與整體生活的意義，進而生出內心的不安。而醫療的有效性亦建立在能否符合年長者們的需求及期待，並使他們真正感覺到狀況變得更好。換言之，若無法從心的層面去觀照、協助及理解，那麼疾病的陰影就無法散去，醫療也無法被視為是有效的，進一步的也在資源已經稀缺的情況下，又降低了醫療的可近性。

相反地，若能使年長者們的內心感到被照護、被理解，且能化解他們的擔憂，那麼即便不是科學、專業乃至法規認可的醫療，也能夠達到醫療的效果，治癒他們的心。像是透過擲筊自我用藥、問事、藥籤等，雖被屏除於專業醫療的視角之外，甚至被許多專業人員批判，但它們確實在

三條崙年長者們的生活中發揮著醫療的意義。又如同 Collins and Pinch (2021[2005]) 所不認可的安慰劑效應，雖無法在實施醫療行為之前給予患者對療效的承諾，但從結果而言，患者感受到了慰藉及改善，那醫療的效果某種程度上便也有達成。

在許多醫療研究及專業醫療體系的視角中，醫療主要被強調其解決疾病的功能及目標（葉肅科 2008；張珣 2008b；Collins and Pinch 2021[2005]）。但如同本文不斷強調人的想法本身對於疾病認知及醫療實踐的影響，我們應當謹記，醫學醫治的對象更不僅是疾病本身，而是一個具有機生命的人（黃瓊儀 2011：109）。

在田野中我們看到，比起透過科學性、客觀性的方法來應對症狀與疾病、給出治療，或是嚴肅的依據醫療專業給出建議跟說明，年長者們更需要心理上的關懷及慰藉。像是阿梨提到她會排斥做手術，因為覺得手術會有風險，害怕副作用或出問題。也有一些人因為害怕、不理解而拒絕檢查及疫苗接種。這種心理上的擔憂便需要有人去傾聽、去理解，並給予回應。但如阿崙跟我們說的，三條崙除了一般認知的醫療資源，更缺乏的是關心、諮詢的資源。除了西方醫學上認知的疾病本身，心的感受在醫療中也需要被關注及重視。

三條崙的年長者在醫療資源缺乏、區域發展不均的情境下，仍然認真的生活，且珍惜鄰里的情感，並熱愛這片土地。從他們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中展現對於生活的重視、對自我的理解，以及對於生命的堅持與能動性。他們透過自主及串連的行動，與醫療專

業的單方面詮釋角度再協商，³⁷並主張醫療的多元性、心理意義與價值。透過理解他們的行動及想法，我們得以反思、重新檢討醫療的意義，並在醫療的視野中擴展人類學式的關懷。

七、結論：重思病與醫

傳統的醫療人類學及社會學慣於將「病」的相關概念分為 *disease*、*illness* 及 *sickness* 三類，而這三個詞在中文並沒有統一的翻譯方式（Kleinman 1995[1988]: 2-5；葉肅科 2008：6-7）。然而，從我們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在三條崙年長者所使用的中文及台語語境之中，「病」（*pēnn*）的概念同時包含了許多不同層面的意涵，而多樣的意義於「病」的概念背後相互交織，除了顯示「病」於語意學上的多樣性，也使我們得以重新檢討醫療人類學對於病相關概念的分類方式及相關定義。

我們認為，「病」（*pēnn*）的概念無法被簡單的劃入任何一個象限（參考圖十二），它在診斷過程、勞動與社會關係的影響下在不同象限中位移，因而「病」同時涵括了不同層面及角度的意義。不只是醫學上所使用的客觀的疾病分類概念，「病」的概念亦隱含了社會層面對鄰里、子女等人際關係的影響，以及對勞動生活的阻礙，進而在主觀的生理痛苦外又形塑不安的情緒感受。三條崙的年長者們不願為了自身不適而麻煩子女及親友，亦不希望因耗時就醫而耽誤工作，這使得「疾病」的陰影為他們創造了極大的

³⁷ 感謝評論人對用詞的提醒。

心理壓力。這也使得醫療不能只注重解決客觀意義上的疾病。

在醫療資源的部分，我們認為，單看地理距離及資源分配的數據並無法實際反映實際的情況。交通不便使得就醫的時間被拉長，求醫者對於與醫師是否「有緣」、對診療是否「有效」，及對資源品質的感受，都影響著醫療資源對於年長者們的可得性（availability）、可及性（accessibility）與可供性（accommodation）。單從地圖上的數值，未能了解到年長者們對於醫療資源及體系的真實體驗。這也使得處在分配不均及資源不足處境下的三條崙年長者，離正規醫療資源更加遙遠。相對而言，多元醫療體系藉由提供個人化、更親近患者生活及信仰的處理方式，彌補了正規醫療資源分配未能顧及的面向。年長者們不只考慮物理距離，而是在個人經驗、想像、親友意見、勞動需求等各項因素的考量中展現能動性，並選擇自己當下最能接受的醫療方式，因而多元的醫療方式能在三條崙年長者的生活中並存。



圖十二 中文及台語語境中「病」(*pēnn*) 的概念象限圖

診斷使主觀經驗連結客觀「病」概念；

勞動及社會關係又使「病」概念從醫學擴展到社會層面。

(朱昱威製圖)

在診斷的場域中，透過醫患間的協商與共識，「病」的概念被生成而與主體連結，從而也連結了對人際關係、勞動生活等面向的心理壓迫及負面影響。這使得病的意義與象徵變得複雜，也使得診斷與檢查對許多人而言成為心理上希望避免的環節。長久以來，醫學作為一門專業學科，醫者被視為專業人士，醫療因而也成為專家獨有的知識及技能，但僅從醫療人員的角度看待醫療，便容易忽視求醫者、患者等角色的感受及能動性。我們認為，必須要理解那些尋求醫療資源的人的想法，從「非專家」的角度思考，方能看見醫療的全部意義。

從三條崙年長者的醫療經驗中，可以看到醫療的效果不僅是生理意義上的影響，更受制於患者心理上的接受與

體驗。透過我們的研究，我們主張，醫療的意義不能只停留在對於科學性、客觀疾病的消除上，而應進一步關注患者的心理及情緒感受。病的存在連結了生理上的不適及心理意義上的不安定感，若無法使患者主觀上感受到變好，那麼醫療就不算「有效」；反之，若醫療能夠關懷患者的心，消除他們心中的不安及苦痛，那患者才會感受到被治癒，感受到與醫師「有緣」，醫療也才能達成其目的。

本文希望藉由呈現三條崙年長者們面對症狀、疾病與醫療的方式及他們的生活，反映三條崙地區醫療資源的缺乏，同時重思既有研究框架中對於疾病概念的理解，探討人際、經驗及生活節律對醫療可近性的形塑，並重新主張心理層面對於醫療的價值與意義。然而，本研究的田野調查時間短暫，訪問到的報導人也較有限，因而未能深入捕捉完整的地方生活脈絡。其次，我們並未接觸到接受精神科或身心科診療的案例，因此這類的疾病及症狀也未納入本文討論的範疇中。而有關醫療端與患者端認知的差異、世代間的不同理解，乃至其他群體的思考方式，亦有待未來研究進一步探討。

參考資料

中文文獻

丁志音

2003 〈誰使用了非西醫的補充與另類療法？社會人口特質的無區隔性與健康需求的作用〉。《台灣公共衛生雜誌》22(3)：155-166。

2008 〈代代相傳的另類醫療〉。刊於《醫療與社會共舞》。成令方主編，頁 27-35。新北：群學。

朱乙真、林惠君、陳建豪、黃星若、黃筱珮、黃筱潔

2022 《一群人，讓這裡更美好：雲林改變臺大，臺大守護健康》。臺北：天下文化。

成令方

2008 〈醫病關係的新視角：醫「用」關係〉。刊於《醫療與社會共舞》。成令方主編，頁 126-135。新北：群學。

安勤之

2010 〈論中藥作為保健食品：以四物湯的生命史為例探討藥品與食品範疇的革命〉。《科技醫療與社會》11：89-148。

宋錦秀

2011 〈寺廟藥籤療癒文化與「疾病」的建構〉。《臺灣文獻》62(1)：55-96。

呂源三、莊玉嬪、詹德欽、莊家銘、洪弘昌

2006 〈老人健康需求與長期照護觀點〉。《台灣老年醫學雜誌》2(1)：1-11。

吳雅琦、林苑如、廖健男

- 2021 〈輔助與替代醫療的現況〉。《家庭醫學與基層醫療》36(11)：380-389。

林文源

- 2008 〈專屬個人知識的轉化：以洗腎病患為例〉。刊於《醫療與社會共舞》。成令方主編，頁136-146。新北：群學。
- 2014 〈對稱化醫療社會學：STS對健康、醫療與疾病研究的啟發〉。《科技醫療與社會》19：11-72。

林威玲

- 2013 《台灣醫療產業發展之分析》。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林崇熙

- 2008 〈從免洗餐具的誕生看台灣醫學知識的社會建構性〉。刊於《醫療與社會共舞》。成令方主編，頁118-125。新北：群學。

林寬佳、陳美麗、葉美玲、許中華、陳逸倫、周碧瑟

- 2009 〈輔助與替代療法之使用及其相關因素之全國性調查〉。《台灣公共衛生雜誌》28(1)：53-68。

社團法人中華開台尊王協會

- 年代不詳 《五股開台尊王國姓公百年文物》。雲林：社團法人中華開台尊王協會。

紀慧君

- 2023 〈反思帶病的身體：經驗知識觀點〉。《新聞學研究》157：1-41。

徐欣萍

- 2012 〈華人關係互動中的緣分運作及其心理適應歷程〉。《本土心理學研究》37：57-97。

孫薇薇、董凱悅

- 2018 〈疾病的解釋與應對：基於地方性知識視角的解讀〉。《思想戰線》44(6)：55-67。

康舒雅

- 2024 《留下來的人：偏鄉高齡者的生命記事》。臺北：游擊文化。

許木柱

- 1981 〈影響民眾就醫之社會與心理因素〉。《人類與文化》15：28-35。

張宏哲

- 2010 〈長期照護正式和非正式體系之間關係的模式—研究和實務議題的探討〉。《社區發展季刊》132：263-277。

張思嘉、周玉慧

- 2004 〈緣與婚前關係的發展〉。《本土心理學研究》21：85-123。

張珣

- 2008a 〈導讀〉。刊於《醫療與社會共舞》。成令方主編，頁 2-7。新北：群學。
- 2008b 〈為何要人也要神〉。刊於《醫療與社會共舞》。成令方主編，頁 8-17。新北：群學。

張晉芬

- 2013 《勞動社會學（增訂版）》。臺北：政大。

章美英、劉介宇、朱美綺、吳宗懋、陳美麗、朱梅綾

- 2013 〈國人使用輔助與替代醫療現況及其相關因素：2011 年全國性調查分析〉。《台灣公共衛生雜誌》32(1)：85-99。

梁宸維、王安珩

- 2024 〈何謂「健康」？如何「照護」？雲林茆子寮高齡者的照護實踐〉。刊於《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112 學年度文化田野實習與方法成果專輯》。黃郁茜編，頁 215-223。

陳世賢

- 2010 《醫在雲林：雲林縣醫師公會 60 周年特刊》。雲林：雲林縣醫師公會。

陳主顯

- 2016 〈南門媽祖宮，西門蘭醫生－台灣俗諺映射的醫病和醫療觀念〉。《神學與教會》41(1)：189-216。

黃瓊儀

- 2011 《從疾病的意義論醫療倫理的核心思維》。南華大學哲學系碩士論文。

葉肅科

- 2008 《健康、疾病與醫：醫療社會學新論》。臺北：三民書局。

臺大醫院雲林分院

- 2019a 《讓夢想起飛：立足雲林 挑戰無限：臺大醫院雲林分院 15 週年》。馬惠明總編輯。雲林：臺大醫院雲林分院。
- 2019b 《臺大醫院雲林分院社會責任報告書》。劉宏輝總編輯。雲林：臺大醫院雲林分院。
- 2024 《生根·雲林 深耕無限：臺大醫院在雲林實現無限可能》。江文莒總編輯。雲林：臺大醫院雲林分院。

鄭惠珠

- 2008 〈中醫專業的興起與變遷〉。刊於《醫療與社會共舞》。成令方主編，頁 42-49。新北：群學。

劉曜華主編

- 2006 《四湖鄉志》。雲林：雲林縣四湖鄉公所。

盧敬文

- 2022 〈醫病、身體與污染感知：從流病研究到免費健檢〉。刊於《福利之鄉·煙囪之城：麥寮與六輕的矛盾共生》。陳瑞樺主編，頁 237-294。新北：群學。

羅玉姍、鄭寧

- 2015 《我國公共建設先期作業審議機制及預算分配之探討》。立法院預算中心專題研究。

Collins, Harry, and Trevor Pinch

- 2021[2005] 《醫學的張力：醫學自帶的安慰劑效應、療效不確定和群我衝突》(Dr. Golem: How to Think about Medicine)。李尚仁譯。新北：左岸文化。

Foster, George M., and Barbara G. Anderson

- 1992[1978] 《醫學人類學》(Medical Anthropology)。陳華、黃新美譯。臺北：桂冠。

Kleinman, Arthur

- 1995[1988] 《談病說痛——人類的受苦經驗與痊癒之道》(The Illness Narratives: Suffering, Healing and the Human Condition)。陳新綠譯。臺北：桂冠。

Rosenberg, Charles E.

- 2013[2002] 〈診斷的暴政——特殊疾病與個體體驗〉(The Tyranny of Diagnosis: Specific Entities and Individual Experience)。楊璐瑋譯，余新忠校。刊

於《醫療、社會與文化讀本》。余新忠、杜麗紅主編，頁 64-81。北京：北京大學。

Sontag, Susan

2000[1978] 《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刁筱華譯。臺北：大田。

外文文獻

Good, Byron J.

1994 Medicine, Rationality, and Experience: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y, M. Cameron

2010 Suffering in a Productive World: Chronic Illness, Visibility, and the Space beyond Agency. American Ethnologist 37(2): 259-274.

Kleinman, Arthur

1980 Patients and Healers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e: An Exploration of the Borderland between Anthropology, Medicine, and Psychiatr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enchansky, Roy, and J. William Thomas

1981 The Concept of Access: Definition and Relationship to Consumer Satisfaction. Medical Care 19(2): 127-140.

Rosenberg, Charles E.

- 2002 The Tyranny of Diagnosis: Specific Entities and Individual Experience. *The Milbank Quarterly* 80(2): 237-260.

Strong, Adrienne E., and Megan D. Cogburn

- 2025 Pain Management.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54: 97-112.

網路資料

大林慈濟醫院

- 2025 〈大 S 流感併發肺炎突過世 重症醫師分享預防流感方法〉。「大林慈濟醫院智慧醫療創新中心」，
<https://dalin.tzuchi-healthcare.org.tw/index.php/mei-ti-bao-dao/das-liu-gan-bing-fa-fei-yan-tu-guo-shi-zhong-zheng-yi-shi-fen-xiang-yu-fang-liu-gan-fang-fa>，2026 年 4 月 25 日查閱。

內政部

- 2025 〈人口統計資料-鄉鎮戶數及人口數〉。「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46>，2026 年 8 月 5 日查閱。

全國法規資料庫

- 2025 〈老人福利法〉。「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37>，2026 年 4 月 6 日查閱。

李文德

- 2025 〈賴清德主持雲林百億醫療大樓動土 喊話「中央全力支持」〉。「自由時報」，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5263047>，2026 年 4 月 14 日查閱。

李佳勳

2026 〈用圖表呈現台灣醫療資源分配〉。「用數據看台灣」，<https://www.taiwanstat.com/statistics/medical-resources/>，2026 年 4 月 14 日查閱。

林佑澤、林香汶

2024 〈感冒藥水的誘惑——為什麼有人這麼喜歡喝？不好嗎？〉。「康健雜誌」，
<https://www.commonhealth.com.tw/blog/5894>，2026 年 5 月 17 日查閱。

東周刊

2025 〈「大 S 徐熙媛旅日猝逝」事件全回顧 | 一文睇從發病到離世及遺產撫養權爭奪風波時間線〉。「東周網」，
<https://eastweek.stheadline.com/focus/9974/%E5%A4%A7S%E5%BE%90%E7%86%99%E5%AA%9B%E6%97%85%E6%97%A5%E7%8C%9D%E9%80%9D%E4%BA%8B%E4%BB%B6%E5%85%A8%E5%9B%9E%E9%A1%A7-%E4%B8%80%E6%96%87%E7%9D%87%E5%BE%9E%E7%99%BC%E7%97%85%E5%88%B0%E9%9B%A2%E4%B8%96%E5%8F%8A%E9%81%BA%E7%94%A2%E6%92%AB%E9%A4%8A%E6%AC%8A%E7%88%AD%E5%A5%AA%E9%A2%A8%E6%B3%A2%E6%99%82%E9%96%93%E7%B7%9A>，2026 年 4 月 25 日查閱。

周益記

2020 〈鴻安堂藥櫃〉。「國家文化記憶庫」，
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Object&id=629612，
2026 年 4 月 28 日查閱。

張崑崙

2023 〈雲林縣行政區圖〉。「搜秀資源網」，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0B4k2pTG85o9RfIZ4R01ZUUV3T1FIYVkyATJvTkpWVWl3cUJKNV92akFUVllaZ0Y4N293djQ?resourcekey=0-eiBHT1_qrpjtz_KFRImbNA&usp=drive_link，2025
年 12 月 25 日查閱。

國立政治大學

2025 〈高逞徽〉。「中華民國政府官職資料庫」，
https://gpost.lib.nccu.edu.tw/view_career.php?name=%E9%AB%98%E9%80%9E%E5%BE%BD，2026
年 4 月 14 日查閱。

國家發展委員會

2022 〈高齡化〉。「國家發展委員會」，
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2688C8F5935982DC，2026 年 4 月 14 日查閱。

雲林縣四湖鄉公所

2025 〈認識四湖-歷史沿革〉。「雲林縣四湖鄉公所」，
<https://zuhu.yunlin.gov.tw/cp.aspx?n=5070>，2025 年
12 月 5 日查閱。

雲林縣政府

2025a 〈性別年齡人口數-四湖鄉〉。「雲林縣戶政入口資
訊網」，

https://householdtemp.yunlin.gov.tw/DemographicsReport_New.aspx?n=19277&sms=22118，2025 年 12 月 5 日查閱。

2025b 〈四湖鄉 三條崙社區 社區產業特色〉。「雲林縣政府農村農美全球資訊網」，
https://development.yunlin.gov.tw/Ruralarea/News_Content.aspx?n=14775&s=338264，2025 年 12 月 5 日查閱。

2025c 〈雲林縣醫院名單〉。「雲林縣政府」，
<https://ws.yunlin.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TIwL3JlbGZpbGUvMTM0NjEvMjcwNjE4LzFhOWE2OTQ4LTQ4YWEtNDJjMi05ZDFjLWQ3YTNjZDY5MjE3My5wZGY%3D&n=6Zuy5p6X57ij6Yar6Zmi5ZCN5ZauLnBkZg%3D%3D>，2025 年 12 月 25 日查閱。

雲林縣政府資訊管理科

2012 〈六輕新聞-100 年度沿海地區空氣污染物及環境健康世代計畫研究結果〉。「雲林縣政府計畫處」，
https://planning.yunlin.gov.tw/News_Content.aspx?n=5175&s=192011，2025 年 12 月 5 日查閱。

黃淑莉

2026 〈偏鄉 13 年無牙醫！牙痛要奔數 10 公里 暖心醫師每日往返 2 小時駐診〉。「自由健康網」，
<https://health.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5331888>，2026 年 4 月 14 日查閱。

楊蘭軒

2026 〈台灣成超高齡社會 65 歲以上人口占比台北 24.18%最高〉。「中央通訊社」，

<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2601090098.aspx>，2026 年 4 月 25 日查閱。

臺大醫院雲林分院

- 2025 〈雲林樟湖村巡迴醫療啟動 台大、成大攜手提供照護〉。「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https://www.ylh.gov.tw/?aid=112&pid=0&page_name=detail&iid=74，2025 年 12 月 5 日查閱。

慢性疾病防治組

- 2025a 〈定期健檢、及早發現三高風險〉。「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878&pid=19034>，2025 年 5 月 16 日查閱。
- 2025b 〈成人預防保健服務下修至 30 歲 逾 30 萬青年受惠〉。「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878&pid=19707>，2025 年 5 月 16 日查閱。

監察院

- 2021 〈110 社調 0004 調查報告〉。「監察院全球資訊網」，
<https://www.cy.gov.tw/CyBsBoxContent.aspx?n=133&s=17589>，2025 年 11 月 27 日查閱。

衛生福利部

- 2024 〈動態指標查詢／醫事機構現況及服務量〉。「衛福部統計查詢網」，
<https://stis.mohw.gov.tw/HWSDWeb/inquiry/InquireAdvance.aspx?qcode=B0105>，2025 年 11 月 27 日查閱。

2025 〈視覺化查詢／死因統計〉。「衛福部統計查詢網」，
<https://stis.mohw.gov.tw/HWSDweb/dashboard/Dashboard.aspx?code=A>，2025 年 12 月 5 日查閱。

Google Maps

2025 〈雲林縣〉。「Google Maps」，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E9%9B%B2%E6%9E%97%E7%B8%A3/@23.679208,120.2336313,10.5z/data=!4m6!3m5!1s0x346eba2773c7f341:0x7ae4c47c03d12a95!8m2!3d23.7092033!4d120.4313373!16zL20vMDM1Zl80?entry=tu&g_ep=EgoyMDI1MTIwMi4wIKXMDSOASAFQAw%3D%3D，2025 年 12 月 5 日查閱。

AI 使用聲明

聲明日期：2026 年 5 月 20 日

本文作者於撰寫本作業之過程中，使用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輔助部分寫作程序，特依本課程「生成式 AI 使用規範」之要求，如實揭露如下。

一、使用之模型與版本

雅婷逐字稿、Claude Sonnet 4.6

二、使用方式

1. 逐字稿整理或初步清稿（已使用本地工具或匿名化版本）
2. 協助釐清民族誌概念或理論（查詢意義、比較不同學者用法）

3. 練習闡述自身想法與思考（以 AI 作為對話對象，練習表達論點）
4. 參考潤飾意見並修改（文字最終由作者本人決定）

本聲明由作者自行填寫並確認，所載資訊均屬實。

當記憶與展望相遇：

三條崙海水浴場的生命史和交織性

林士譽（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三年級）

姜宥甄（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歷史學系三年級）

摘要

在基礎建設的認識中，通常會將基礎建設指向單純物質上的討論，抑或是經濟與發展導向，如道路、電力等。但在當代人類學的討論中，基礎建設不僅僅是關乎到人類物質上的討論，更涉及人之間的關係、與自然環境的互動、人的情感和對地方的感受。更甚至，基礎建設計畫中的土地，本身就有著影響力，會干擾原有的計畫排佈，產生無法預期的成果。三條崙海水浴場從日治時期到田野當下，已經有近百年的歷史，期間經歷數次興衰。此次田野觀察主要著重於民國 106 年啟動的三條崙海水浴場風華重振計畫（下文簡稱重振計畫）。該計畫除了涉及行政層面的政策、經費、法規等方面，也牽涉到自民國 90 年代之後，三條崙海水浴場自繁華逐漸衰敗的情感影響。而在以人為主導的時代敘事下，組成海水浴場的種種自然因素一直在影響著這塊土地。淤積與漲退潮、含鹽土壤與保安林、強風與飛沙，這些環境因素與重振計畫的執行者們產生互動，產生的結果有些令人驚喜、有些令人挫折。上述的種種因素都對重振計畫造成影響，讓計畫不僅是從研討到定案再執行到達成目的的單一進程，而是一張內含因素相互影響的關係網。風華重振的計畫就像是場實驗，面臨挑戰不斷修正。

人與行政、時代、情感、回憶、環境不斷交纏，這些因素是如何塑造三條崙海水浴場？而海水浴場又如何反過來影響種種因素？將是我們文章要討論的重點。

關鍵詞：基礎建設、地方塑造、人與環境、關係網、地方發展。

一、緒論

（一）前言

「叔叔，您知道三條崙嗎？」、「三條崙...哦，那個齁，以前中部很有名的海水浴場在那裡對吧。」

「三條崙？那裡很偏僻欸，你們跑到那邊是要研究什麼？那邊有什麼東西嗎？」

以上兩段對話，乃是在我們向家裡長輩提起寒假田野調查計畫時，對我們田野地的評價。回想初到四湖鄉那天，我（姜宥甄）驅車沿西濱公路一路北上，海景天藍、陽光明媚，進入到箔子寮村落，靜謐、祥和等予人舒服之感的詞彙浮現腦中。雖為初次來到，景貌對於我們來說卻也不至於完全陌生，無論是坐於自家門口前的老者、隨風搖曳的荒草，還是不高的樓房。不過，低矮磚瓦旁的成疊蚵堆、雲 131 鄉道沿途鑲嵌著蚵殼的電線桿、一窗又一窗的漁塭，以及進到三條崙村落時，不同於他市應該繁忙的星期一，街道上一股寧靜又沈穩的氛圍，一再提醒我們，即將展開認識三條崙海水浴場的調查。¹

¹ 本文係為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114 學年度「文化田野實習與方法」課程之學年成果報告。特別感謝黃郁茜教授悉心指導與引領，以及盧佳秀、蘇穎欣兩位助教在課業與行政事務中的諸多協助與陪伴。誠摯感謝本研究受訪者，A 教練、B 教練、C 先生一家、老蚵農、吳伯伯、吳阿姨伉儷、吳雙喜理事長、海釣大哥、雲林縣荊桐鄉的柯基先生、管先生、蘇俊豪議員、蘇國瓏議員等。也謝謝給予我們田野期間運行順利的箔子寮居民們，王柏惟與丁俞伶老闆伉儷（善水咖啡）、吳勁葦鄉長（四湖鄉鄉長）、吳連進會長、李龍飛鄉長（口湖鄉鄉長）、蔡文進老闆伉儷（春天民宿）、蔡茂昌大哥、蔡茂源先生等。以及三條崙的海宮宮廟宇、廟前廣場攤販老闆娘、熱情款待的章寶宮吳主委，還有十一天裡散發最驚喜能量的啊嗚、吐司柯基、C 先生家笑口常開的狗狗無花果（以上所有姓名由筆畫排序）。同時感謝淦峻清學長給予本研

先將時光拉回 2025 年的九月，在文化田野實習與方法課程裡，我們認識了雲林縣四湖鄉一地。在課程引言中，老師笑稱可能班上大多數同學或許對於雲林不甚熟悉，也許是第一次聽到四湖鄉？而隨著課程持續進行，端坐在臺北大安區教室裡的我們，隨著網路光纖、透過電腦看見了三條崙這樣一處位於雲林西側、在突出的麥寮台塑工業園區南方的海鎮。傳統的產業分級以第一級農林漁牧業，第二級原料製造加工的工業，再到第三級以服務活動或以物質產品以外服務為主的服務業。現任雲林縣縣長張麗善臉書亦指出，「根據最新統計，113 年度雲林的農業總產值達到 948 億元，其中農業 460 億、畜牧業 447 億、漁業 41 億，三大產業穩居全國前列。」（雲林縣新聞處－公共關係科 2025）然而高度依賴農業的社會，也面臨到極端氣候頻繁、人口老化與勞力短缺等問題。在這些困境下，傳統農業模式面臨了許多結構性的轉變壓力。

在文化田野課程中，身為「在臺北的大學生」進入到「臺灣中部雲林『此前不被特別關注』的沿海村落」形式作為田野調查，過去兩年裡希望學生嘗試從一個相對陌生或較無經驗的場域中，提出好奇、發展問題意識、搜集素材、並整理與內化出研究報告。而兩位組員一位出身林木茂密的山城，一位則是自富有稻作農畜產業活動的臺南溪北地區成長。從成長背景來看，我們也未能就此誇口甚是

究珍貴的肯定、建議與評論，使得撰文能夠更精細與順暢。此外，謝謝這學年共同修課的同學們，在學期間和在雲林的所有扶持與鼓勵，一起發現與探尋許多的未知和克服挑戰。最後，感謝田野期間所有給予我們幫助與支持的三條崙海水浴場與四湖鄉的人事物，所有的風、海、沙、木，都成就了我們，共創出這份人類學嘗試成果。文責一切皆由兩位作者自負。

了解以漁業養殖為主的靠海漁村之生活樣態。只是當我們在看地方治理時，若是只從大範圍的居高視角來看區域論述時，沒有加以探詢在地人的觀點與想法，忽略居民間的網絡關係、知識和創造力時，不免仍流於將都市視作鄉村線性發展的必定方向，並將鄉村成為都市人的後花園與好奇苑之幻想地。

因此，我們想試著脫離以發展高速的、從在地視角出發，探討當地方治理欲藉新式規劃或制定政策，來重塑或振興既有景象時，在地居民的識覺經驗為何？在搜尋文獻資料時，我們發現四湖鄉近年來在其境內有幾項主打的建設發展，分別為四湖鄉三條崙海水浴場、四湖鄉立圖書館、四湖鄉飛沙納骨塔公墓、四湖鄉運動公園等。其中三條崙海水浴場幾年來由交通部觀光局、林務局、雲林縣政府、四湖鄉公所等合作，目前轉型成國際風箏衝浪學校、賽事場，以及休閒度假村。這樣一座看似新穎的與充滿前景的場域，當小組成員於 2025 年 12 月 24 日前往探查時，發現當地設備狀態普遍維持良好、廁所整潔開放、遍地也無明顯髒亂；但仍有一種說不上的「停滯感」，並且擺飾標語存在矛盾之感。例如，該地為海水浴場，但海水沿岸設立「自然海岸，無救生員執勤；禁止游泳戲水。」等語，在海水浴場內各地，如停車場入口和濱海步道旁等處，也有標語寫著禁止相關娛樂、游水等活動（如圖一）。到訪日期為平日下午，但停留於此三小時的時間裡，只瞧見兩組遊客、並無任何工作人員樣貌之人。此情此景不禁讓人著想，若是為了觀光，但存在許多「限制行動」之警示；若欲帶動當地發展，在拜訪當下也是渺無人煙、近乎無人到訪。



圖一 沿岸邊警示標語

（姜宥甄於 2026 年 1 月 6 日拍攝）

（二）研究問題

參閱完部分地區文獻資料與實地勘查後，我們開始思考，這些建設雖然是所謂促進當地的生活與產業的建設項目，但實際上所創造出來的事物與成果，與在地人是否有更深刻的關聯呢？見到如此零落的觀光現況，我們聯想到廢棄遊地可能與「蚊子館」一詞有所連結，而三條崙海水浴場的轉型與計畫，對於當地民眾來說有何想法、觀感或影響呢？我們預計藉由此議題來回答與探討前述之問題意識，並發展成研究計畫。

本文欲探討三條崙海水浴場（後文簡稱海水浴場）的「風華重振」計畫，是如何牽動各方行動者？同時在此次研究中，三條崙海水浴場這個場域本身，不僅僅是研究的背景，更是其中一位行動者。眾多行動者都是因為跟三條崙海水浴場產生的關係，而投入此項計畫。對此種情況，研究探討不應只是單純的將海水浴場認作獨立於關係網絡的「空間」，而是將其視作具有實質影響力的行動者。

（三）理論文獻回顧

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在 World Bank 和 OECD 等國際組織的介紹中，通常專指道路、電力等設施（World Bank 2025；OECD 2025）。兩者的介紹都將水力、電力等視為基礎設施的一環，並認為藉由基礎建設完善，才能打造良好的發展前景。完善的基礎設施，將帶給當地的人們發展的機會和希望。本文認為，此種論述將基礎建設視為獨立於人群之外的物質個體，卻又能夠左右人們的未來。Jensen 和 Morita 就提及，基礎建設在大眾的想像中，常常是各種技術的綜合體（Jensen & Morita 2015：82）但此種認識既將人群抽離出了基礎建設的討論，又忽視了人與物、空間，甚至自然的不斷互動，是如何影響「基礎建設」這個物。這些種種不同性質，但可能使關係網絡間發生變化的存在，則被稱作「行動者」（Callon et al. 1986；Akrich & Latour 1992；Latour 1999）。藉由行動者的概念，讓人類學的討論不再必須將人類視為絕對主體的存在，開始可將過去視為客體的物質，視為具有和人同等影響力，以揭露人與物質間非單向影響，而是擁有對等的影響力，可使對方發生變化（ibid.）。

在人類學的討論中，開始有許多學者重新審視基礎建設不只是單純的物質，還涵蓋了人際關係、自然環境、制度等等層面，進而產生一套屬於基礎建設的關係網。如 Larkin (2013) 在對於奈及利亞的媒體與基礎建設民族誌觀察中，提出對於電力、道路這些連結性的基礎建設，都具備著能使一個物產生行動的特質，更在行動過程中隱含著政治性象徵。該文提出一個重要的觀點，即基礎建設的概念，比起我們可見的建設本身，更重要的是一個「能使其他物進行行動的物」。我們認為 Larkin (2013) 的觀點極大程度的拓寬了有關基礎建設的理論範圍，使得基礎建設理論能突破單純的物質性，開始涉及政治、文化、人際關係等層面。

而 Simone (2004) 對於南非 Johannesburg (中譯為約翰尼斯堡) 的觀察，提出對於城市的建設，除了正式政府計劃，也需要人際關係來支撐。該研究藉由對於移民和失業者的合作和資源互換，展示了在正式的市場經濟之下，這些非正式的行動是如何填補起市場經濟的縫隙。在 Simone 的研究中，其拓展了對於基礎建設的了解，逐漸從單純物質領域擴展成多層面的關係。Simone (2004) 將人們協作之間的關係變動，同樣視為基礎建設變更中的一部份。由人們的交換、合作與互動所構築出的城市運作條件，展示「人作為基礎建設」(People as Infrastructure) 的概念。

在上述的文獻中，可以看出對於基礎建設的探討還停於城市的理解中，卻缺乏對於建設立足之地，也就是「自然環境」的討論。過往在學術範疇內，會將世界切分成自然和社會領域，將之分開討論。但此種切分忽視了人類行動和自然間的緊密牽連，二者是如何互相影響，甚至彼此

塑造（余曉嵐、林文源、許全義 1991[2012]）。在 Carse（2012）的巴拿馬運河民族誌觀察中，針對巴拿馬運河計畫，不僅單以工程計畫去進行詮釋，而是包含運河流域本身的自然環境。自然在此論述中，成功從隔絕於社會的異數，加入到基礎建設的關係網絡中，藉此打破了人類技術和自然環境的二分。藉由擴展運河計畫的關係網，也能呈現在運河流域中，基於原河流生活的人們，如何因為巴拿馬運河計畫，重新進行政治與社會互動。在自然環境開發的理論中，開始有更多研究去注意到除了技術本身，對於自然環境的理解也是開發中不可忽視的一環。論述重點在於科學與知識如何重新的闡述自然，將其視為一個可被進行開發的對象，或是將其轉化為不可開發的環境，也就是所謂的荒野（Carse 2012、2016；Ballesteros 2019；Schweitzer et al. 2017）。

綜合上述文獻，我們認為能夠重新審視人類是如何藉由一系列轉譯，建構出「自然」這個他者，然後再將其變成可或不可被治理的對象，甚至是如何運用技術去整治自然環境，使其再次成為可被治理。換句話說，基礎建設的作用不單純是物質和技術系統的結合。眾多場域中的行動者，將因「基礎建設」這場行動而開始交會、互動，並由此創造出一個新的世界（Jensen & Morita 2015：85）。

雖然在本次研究中，較少著墨於工業技術方面，但報導人經常引用科學相關論述，隱含了科學如何影響居民對於海水浴場的自然環境認識。藉由上述文獻，我們能夠將有關科學的討論進入研究討論之中，並且結合了社會學的範圍，豐富了過往對於自然開發基礎建設的理解。我們認為 Carse 等人將自然環境視為基礎建設網絡一部份的理論，

順利的將自然、計畫、發展、人群納入關係網絡，讓這些看似多種不同的層次置於同一個平面上進行討論。該理論取徑非常契合此次研究對於海水浴場的觀察。也揭露了一個建設計畫不只繫於物質技術，也涵蓋治理觀念、人際關係、自然理解、環境本身、政治、文化等。為此次研究的多位報導人對於海水浴場的不同理解，提供極佳的詮釋理論取徑。

除了前述所提之 **Carse** 的理論外，面對水域和陸地間不同性所導致的摩擦，**Krause** (2017b) 提出了水陸間的「韻律關係」(Rhythms of Wet and Dry)，強調潮汐變化所帶來的時間性影響。其季節性的變化甚於陸地環境，也因此造成依水而生的生活如何發展出和陸地生活截然不同的社會模式 (**Krause** 2017b)。**Steinberg** 和 **Peters** (2015) 則提出和陸地大相逕庭的海洋空間理論，強調海洋的空間是模糊且持續變動的，挑戰了有關以固定、邊界清晰為主的陸地本體論。二者所提的理論，能提供此次研究在基礎設施的大框架外，在面對地方居民對於水陸時間、空間理解的不同時，一個不同視角的理論視角。因此，本次研究將以 **Carse** 的理論作為理論取徑的主軸，**Krause** 等有關水陸關係的理論，則會作為三條崙在地居民對於水陸關係理解的取徑，豐富在基礎建設的縫隙中，那些較少被講述的在地居民視野。

二、異質組合體：海水浴場歷史

三條崙海水浴場位於今雲林縣四湖鄉崙北村西側，由三條崙海清宮旁道路隨指引進入。於昭和 2 年（西元 1927 年）時，由時任四湖庄長吳哄籌辦建成，與共榮會北港支會共同經營（**劉曜華** 2006：211）。在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

戰期間遭空襲轟炸、滿目瘡痍。國民政府來臺後，於 1946 年再行裝修，經營三年後至戒嚴時期第二度停止營業。直至 1968 年地方人士言道此海水浴場閒置甚是可惜，乃由時任第六七屆四湖鄉長蔡梯與各單位相互聯繫奔走後，重新興建浴場大門、圍籬浴室、辦公室等設施，最終於 1972 年第三度重新營業（吳顯童 2005：84-86）。

西元 1971 年元月一日，民聲日報報導三條崙海水浴場將組成促進委員會，主任委員由時任雲林縣縣長廖偵祥兼任，副委員為時任雲林縣議長林恆生兼任，其他成員則聘由地方人士與機關首長擔任，如王述親、胡渭玲、李啓明與蔡梯等人（民聲日報斗六訊 1971a）。其中，關於海水浴場興建的點子，根據民聲日報報導，係由王印堂議員在與促進委員會的委員們，一齊至全臺各地考察海水浴場經營情況後，於議會第七次定期大會中提出。而促進委員會於同年三月一日會議裡所提出結論有四：一、興建三條崙海安水浴場所需的三公頃保安林地，省林務局同意租用，但其保安林必須海水浴場施工後才能砍伐。二、由四湖鄉公所以公共造產形式貸款興建海水浴場並經營管理。三、縣府應在下年度預算中編列預算補助興建。四、縣府的補助額俟四湖鄉公所完成設計後，再召開會議討論（民聲日報斗六訊 1971b）。根據民聲日報斗六訊（1971c）報導，促進委員會於十月二十七日開會，預定於十一月初開始施工。在第一期工程內預計有浴場大樓、海堤、瞭望台等，其後還會有二三期工程。工程費由四湖鄉公所向省民政廳貸款五十萬，另五十萬由縣政府負責，整個三期工程總估工程費為三百萬元。在當時，報紙將對海水浴場的期望列為

「使它成為本省最好的海水浴場」(民聲日報斗六訊 1971c)與「中南部最佳避暑勝地」(民聲日報斗六訊 1972a)。

西元 1972 年 7 月 9 日，三條崙海水浴場正式對外營運。其中濱海大樓（同前段所敘之浴場大樓）新增幾項設備，如辦公室、遊客休息室、餐廳、泳具出租室、醫療室、衣物保管室、冷熱飲供應部、儲藏室與男女沖洗更衣室等。開幕當天，奉應時任行政院院長蔣經國指示、官方無舉行形式上歡慶，僅由承辦經營之海燕育樂事業公司邀請當紅影視歌星如白嘉莉、夏台鳳、余天、石松、方欣、田文仲、崔苔青、紫蘭、楊麗花、楊蘭花、鄭小芬等十餘人參加開幕典禮以及舉辦攝影比賽等，好生熱鬧。在當時，因三條崙位於之優越條件，遂有客運公司營運從斗六、嘉義等地之直達車路線（民聲日報斗六訊 1972b）。

然而，就在三條崙海水浴場開幕後三天，一位參訪遊客投書於民聲日報，直指海水浴場現有問題仍存在諸多疑慮。首先，海水浴場南邊鄰靠三條崙漁港，北邊接連麥寮大排水溝及濁水溪入海口。再加上漁港上百條漁船之捕魚作業與靠岸停港，使得施厝寮大排溝，兩條黃濁流水皆傾注入海²。接著，海水浴場同時出售冷飲、便當等臨時攤位，

² 此段關於麥寮大排水溝之報導原文：「三條崙海水浴場，位於雲林縣四湖鄉境內，南鄰三條崙漁港，北邊接連麥寮大排水溝及濁水溪入海口，所以無論三條崙漁港上百條漁船出海捕魚作業，或是滿載漁貨靠岸，加上濁水溪，施厝寮大排溝裡條黃濁濁的流水，傾注入海，都對三條崙海水浴場是（不）太有利的。」然若查閱水利空間資訊服務平台（<https://gic.wra.gov.tw/Gis/Map>），自三條崙海水浴場由南向北之排水溝，除去小型支流，分有林厝寮大排一、舊虎尾溪、馬公厝大排、有才寮大排、新虎尾溪，以及上文中提及之施厝寮大排和濁水溪等。雖未見有名為麥寮大排水溝之溪河，然據此地理位置分佈，位於臺灣西部沿岸的三條崙海水浴場，除了連接多支向西奔流之河道排水以外，也座立於三條崙漁港和台西漁港之間，更北處還有麥寮工業區專用港。

數量為眾之蒼蠅集中於飲料及食物上。在飲食安全方面出現疑慮，使得遊客有所顧忌，海水浴場四周環境衛生也產生疑慮。最後這名遊客敘述現場的設備，仍尚未完全準備就緒。例如濱海大樓裡的沖洗設備，在淡水供應上尚無完備。其他像是救生設備、三條崙街道起到浴場大門門口的柏油路面鋪設、以及其他餐飲與游泳設備等供應，這名遊客以「馬馬虎虎」來形容三條崙海水浴場的開幕營業狀況（民聲日報斗六訊 1972c）。

到了同年底十二月三十日，民聲日報第五版再度出現一篇報導。從該報導中可知，三條崙海水浴場再新增了石獸二十多尊，佈建於林間；濱海大樓二樓亦增設電動遊玩場，並且增設雅座，可於此觀浪聽濤、暢聊談心（民聲日報斗六訊 1972d）。然至隔年 1973 年 6 月 8 日，報導揭述海燕育樂事業公司經營不善等問題。篇幅多半陳述安全設備未盡理想之問題，例如浴場範圍一百公尺內之海底蛤蜊殼，可能刺傷遊客腳底。縣政府與四湖鄉公所遂於六月七日下午命令迫海燕育樂事業公司限期內改善，需以游泳人與遊客之安全為第一；相關要求措施包括入口處道路修整、加強環境衛生、刷新剝落之標示牌、於道路兩旁加設「生活須知」之標示牌以壯觀瞻、延聘醫護人員，以及規定飲食部處理辦法等（民聲日報斗六訊 1973）。

根據黃舜廷（2010：533）所記，雲林縣政府將海水浴場委外經營後，係由曾於臺視電視台任職之記者蔡重煙先生標下經營權；而日後託當地人告知，蔡重煙協同時任鄉長，實有向周邊居民徵用土地，加以經營之（取自

關於自然環境與岩岸地形之相互關係與影響，於第二章第六至八段將進一步說明。

2026/05/27 成果發表會中，吳先生與小組之交談內容)。爾後在 1972 年至 1992 年間，由其家族經營管理，並隨著蔡家結束運營之故，海水浴場再度廢置。在雲林縣文化休閒導覽手冊（劉正義總編輯 1999：94-95）裡則是這樣介紹的，三條崙海水浴場為四湖鄉公所公共造產，委託私人經營，每年來課為進香香客，可達萬人，與附近包公廟海清公園相呼應，形成一個宗教、遊憩、休閒綜合觀光園區。而根據觀光局觀光年報統計，三條崙海水浴場在 2000 年時有 16,579 人到訪，但至隔年 2001 年就減少至 10,930 人，後續便再無相關資料。由此可知三條崙海水浴場自西元 1927 年至 1992 年，總共營業了六十五年（吳顯童 2005：87）。然而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海水浴場訪客人數逐漸下降，甚至於 2000 年代以後，就未曾將三條崙海水浴場之統計資料紀錄於觀光局觀光年報上。審計部報告亦指出，因整體觀光環境變遷及硬體規劃欠佳，使用率逐步下降。四湖鄉公所為整合地方文化及觀光資源，於 2017 年 3 月研提三條崙海水浴場重振計畫，預計 2018 年 12 月底完成設施改善及轉型活化（監察院審計部 年代不詳）。

於民國 102 年，三條崙海水浴場即被行政院認定為「閒置公共設施」，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2019）所公布之閒置公共設施成因與現況及活化成效之探討，閒置公共設施成因有六點，分別為：政策因素、競選承諾、缺乏經費、環境變遷、管理不善、行政程序未完成等；依據活化報告（雲林縣政府計畫處 2023：2），三條崙海水浴場便是因大環境變遷導致人潮不再，管理不善造成環境髒亂，進而變成治安死角而被認定為閒置公共設施。而我們在 2026 年 1 月 6 日到訪海水浴場現地，我們觀察到海岸周遭有許多

石製堤防，將海岸劃分成數個區域，人們在場域之中或者駛船停泊、或者駐點垂釣。根據訪談資料與田野觀察，幾乎所有受訪者皆有提及，這片海域因受波浪不斷侵蝕海岸，沿岸地形一直受此影響。如現下的海水浴場，其早已偏離日治時期最初的海水浴場位置。同時比鄰的漁港也受到海岸環境變遷的影響，港內淤積情況逐漸嚴重。

在靠海的臺灣西岸，則不得不提及臺灣西南海岸面積最大的離岸沙洲島，同時也是流沙量極大的象徵——外傘頂洲。外傘頂洲位於雲林、嘉義外海約 10 多公里處，現存面積約 1,000 餘公頃，因形狀似傘得名，是臺灣最大的沙洲。外傘頂洲受到波浪、沿岸流及東北季風影響，平均每年往西南方向漂移 60 至 70 公尺，被稱為「移動的國土」，主要由濁水溪出海時挾帶大量的泥沙沖積而成。由於有了外傘頂洲的屏障，使得外傘頂洲與嘉義縣間的東石潟湖因此形成了平靜的廣大海域，也使得蚵仔養殖產業如此興盛（雲嘉南風景管理處 2024）。然而在過去幾十載的時間裡，外傘頂洲逐漸向南移動、並且面積不斷縮小。公共電視「我們的島」節目團隊於 2006 年採訪報導，認為外傘頂洲消失的原因，係因濁水溪上游的大量開採沙石的同時，其下游還有一座臺塑六輕廠。而六輕計畫在興建之時，曾大規模抽取海沙，興建之後，突出海岸的堤防又攔截了沙源，外加濁水溪的上游有一座集集攔河堰，層層關卡的阻隔，加速了外傘頂洲的消失（于立平、張光宗 2006）。而張淑妍在 2014 年（2014：38-80）針對主要河川與麥寮工業港對外傘頂洲地形變遷之影響特性的研究發現，雲林海埔地和離島工業區自 1973 年至 2010 年代開發，麥寮區北側海堤受到濁水溪沙源補助，實有淤積現象產生。

這樣的淤積可能影響周遭漁港與相關建設運營情況，例如蔡卓霖在 2024 年的對於雲林縣四湖鄉再生能源相關研究論文就指出，1994 年麥寮六輕廠以及其他離島式工業區動工後，改變沿海地景、外傘頂洲逐漸南移，導致周圍漁港淤積與污染（蔡卓霖 2024：64）而隨著六輕廠大規模抽沙，突出的海岸堤防攔截了沙源，形成突提效應，加速外傘頂洲南移與消失。此外，因外傘頂洲持續受侵蝕而面積縮減或南移，則使雲嘉地區海岸線直接暴露在波浪的侵蝕作用下（如圖二），影響海岸線之地形面貌（張淑妍 2014：109）。其中，淤沙對地形環境之影響，在張淑妍研究中外傘頂洲西側之海岸淺灘，係為漁民養殖之主要地區，同時係為雲嘉海岸之天然屏障，對於沿海漁民生計與安全有深厚關係（ibid.：17）。同樣在蘇穎欣於 2025 年討論茆子寮漁港的治理失能問題的研究中顯示，茆子寮漁港外圍之外傘頂洲作為漁港天然屏障，使得漁港本身成為優良漁場和船隻停泊處，但設置六輕後除了對當地生態保育物種消失與滅絕，1985 年至 1986 年間的整治工程仍無能治療漂沙問題，使得原港區內港口及航道易受沿岸漂沙影響而淤淺，船隻航行停泊不便（蘇穎欣 2025：20）。由此可見雲林沿海觀光與產業景區，皆因地貌的改變而影響至其生業發展。然而，雲林六輕廠是否與海岸淤積有直接關係，其因果關係非能一言以斷之。



圖二 組圖：三條崙海水浴場沙岸景象
（姜宥甄於 2026 年 1 月 7 日拍攝）

依據四湖鄉刊所著（蘇國瓏 2016），時任四湖鄉鄉長蘇國瓏（民國 103 年至 111 年）在任內即在推動重新活化海水浴場，於民國 105 年和時任縣長李進勇、副議長蘇俊豪會同文化處、建設處等會勘海水浴場，提出興建「忘憂森林步道」，同時將之轉型為親水公園，以盼振興觀光。於民國 106 年獲得交通部觀光局雲嘉南國家風景管理處（下文簡稱風管處）的支持，撥予經費 1,775 萬協助進行整治工作，並配合進行音樂季、社區彩繪等措施，期望形成帶狀觀光區（蘇國瓏 2018：10-11）。

三條崙親水公園的整治工作進程依序為：

第一期：拆除破堤恢復原有自然生態設施木棧道。

第二期：設置排水設施改善長期淹水、水電管線重新配置、園區主要步道鋪面重設入口處涼亭拆除、拆除兒童戲水池、重新打造開放式戶外戲沙遊憩區。

第三期：拆除重建濱海大樓、拆除老舊不堪用建物、環境清整綠美化。

第四期：完成濱海大樓重建、設置淋浴間、停車場完工（蘇國瓏 2020：10-11）。民國 110 年則在親水公園成立國

際風箏衝浪學校，期盼以此打造西岸特色活動，此國際風箏衝浪學校受有 IKO 國際認證（蘇國瓏 2021：8-12）。同年也舉辦了第一屆風箏衝浪公開賽，隔年亦於親水公園舉辦雲西海洋音樂季，成為夏季有音樂季、冬季有風箏衝浪公開賽的特色（蘇國瓏 2022：10-13）。

海洋委員會（2024）即指出，其於民國 110 年成立「海洋產業創生輔導團」，協助改善三條崙軟硬體設施及推行風箏衝浪活動，並於民國 113 年進一步發布海洋產業發展條例，訂定「海洋地方創生與產業活絡及永續經營推動方案」，邀請雲林縣政府於「海洋地方創生工作坊暨地方政府推動海洋事務民國 112 年度成果交流會」進行報告；可見三條崙親水公園的整治在海委會的眼中，是極具代表性的活化成果。然而，不論是海委會或是雲林縣政府計畫處的報告，在民國 90 年至 102 年這段時間，僅用大環境變遷、環境髒亂、人潮不再等方式描寫海水浴場既有環境問題（海委會 [海洋產業發展元年 海洋地方創生大步走] 2024；雲林縣政府計畫處 [海洋地方創生工作坊&地方政府推動海洋事務 112 年成果發表] 2023）。接著，親水公園的風箏衝浪成了重要的扶植產業，海委會（2024）表示 112 年的風箏衝浪國際公開賽已吸引超過 200 名國內外選手參與，並有業者投資新建旅館、專業教練回鄉等；同年，雲林縣政府計畫處（2023）亦將報告重點放在風箏衝浪相關的活動上。這樣的著重呈現新興項目發展的描寫方式，反之令人更加好奇三條崙海水浴場、三條崙居民以及四湖鄉公所與雲林縣政府重點培育之產業，三者間的生命史有何種的影響與關聯？

曹校章（2014）整理了臺灣海洋運動觀光的发展歷程，可以看出自 2002 年後，中央政府便在持續推動海洋觀光產

業，並引了各國的案例，認為海洋運動觀光產業極具可開發價值。由四湖鄉刊（蘇國瓏 2016-2022）的紀錄中，並未能得知為何拍定會以風箏衝浪為重點產業，但結合曹校章（2014）的文章，興許是乘上的這股風潮。究竟風箏衝浪產業是真的帶來活力，還是就如新竹科學園區（陳柳均 2000）的案例一般，是創造了一個新的區域，排擠了舊有的居民和傳統產業，值得深入當地探討。

三、行政計畫：空間的創造

在第二章的回顧中，能看到三條崙海水浴場的建設與改造，從文獻可見的名義上大多是由政府單位所執行或報告（如四湖鄉公所、海委會、雲林縣政府計畫處）。但「政府」這個存在，究竟是如何實質的執行計畫？而我們在文獻中所能看到的工程計畫，又是如何從局處案上的企畫案，一步步轉化為現實，成為我們接觸的空間？單從歷史回顧的角度來看，縣政府與鄉公所似乎在重建海水浴場的方向上是一致的。在三條崙海水浴場的整治中，不管是日治時期、解嚴後重整（吳顯童 2005），還是到現在的重振計畫（海洋委員會 2022），極少篇幅去談論該計劃是如何生成、調動資源、尋找合作夥伴，以及落實和維護。中央政府或著過往的紀錄，主要強調計畫的生成和成果，較少關注到在執行的過程中，如何將各種不同部門串聯起來，共同驅動計畫。

就如 Jensen & Morita（2015）所提，一項基礎建設計畫就如同一場實驗，會將各種參與者再次調動起來。從中央到地方、首長到基層公務人員，再到外包的民間團體，各種不同層次的人員需要為了同一項計畫進行彌合。

Ramakrishnan 等（2020）則提及，一項基礎建設實際上包含著參與者的情感因素，尤其是對於維修、腐敗、在修復的過程。就像對於道路無止盡修復的絕望感，或因此修復而激發的創意。基礎建設就像一個生命體，會反應出每個參與者的渴望，但又不盡相同，因此需要不斷嘗試維護（Ramakrishnan et al. 2020）。一項基礎建設並非是單向性的時間線，從生成直接通往原有目的。而是不斷面臨衰敗或毀損後，持續修復或使用的連續生命體（ibid.）。參與計畫的每位人員，是如何加入一項基礎建設開發。參與人員的動機與對於計畫的期望，又將如何影響將企畫案落實為現實的過程。在面對到困難時，他們要會用怎樣的方法尋求夥伴、進行動員，改變困境。在經歷過這些行動後，一個依據計畫的新的關係網絡，也因此誕生。

本章節將分別以計畫推動者（鄉長與縣議員層級）、維護者（公所行政層級）、協助者（民間業者）三方不同視角進行探討。政府和工程計畫這貌似整體性的結構，實則充滿許多空隙，需要各個不同的行動者付出努力，填補這些縫隙，才能讓一項計畫順利地執行。而在此次的田野觀察中，我們藉由實地探查、實體訪談與線上訪談等方式，有幸接觸到三條崙海水浴場重振計畫的推動者、協助者，和基層的公務人員。我們希望藉由與他們的訪談，能夠去探討在政府這一看似完整的結構下，眾多不同的行動者是如何協商與參與，使得三條崙海水浴場的風華重振計畫能夠進行。

（一）推動者：藍圖、理想與現實

初次踏入三條崙海水浴場時，其建設之良好與完整，是超乎我們想像的。在前往實地踏查之前，為了瞭解三條崙海水浴場活化後的使用情況，我們進行了資料的搜索。主要的資料來源是來自雲林縣政府計畫處於民國 111 年的海洋創生產業輔導的發表報告，和民國 102 年到 110 年的四湖鄉刊。但這些資料都更加偏向政策資訊方面，且與田野時間（民國 114 年）也隔了一段日子。因此我們先上網查詢在 Google 地圖裡的三條崙海水浴場，參閱其景點意見功能。調查去過並留下註解的民眾對於海水浴場的反應，大多的意見表達都是：「沒什麼人」。當時我（林士譽）在看到這些反饋時，心裡就想著：「這裡是不是設施不怎麼好，不然怎麼會沒人呢？」。我（林士譽）的家鄉屬於偏鄉，該處有許多老舊的公共設施。由於那裡的環境不好、很髒，很多東西都不能用，大部分的長輩都會告知不要前往，促使我（林士譽）好奇會留下這些評論的原因，是否源於海水浴場的設施維護不佳。但到了實地勘察時，海水浴場現場情況卻與我（林士譽）所想的大相逕庭。

三條崙海水浴場的入口位於海清宮旁一條小巷，沿著巷子進去就能看到由紅磚鋪成地面的停車場。面向入口的左手側則有以蚵殼和馬賽克拼貼製成的裝置藝術。停車場和海水浴場的陸上公園設施間隔了幾座鐵製拒馬，但間隔空隙不小，一個人是能輕鬆穿過的。園區內的主要步道則是用長方形石磚鋪成。區內大致能分成觀光設施和保安林地，但二者並不是嚴謹的區分開來。除了進入園區幾步後就能看到的廣場，剩餘的設施皆安插於保安林地間。這個廣場也是海水浴場內，舉辦活動的主要場地。廣場為與主

要步道區分開來，所以用六邊形石磚鋪成地面，以紅灰色相間。設施有木製的觀景台、戲沙池、媽祖廟、鐵製接駁車牌、洗腳用的水龍頭、淋浴間、廁所和濱海大樓。該棟大樓一樓也是風箏衝浪的教室。這些設施雖然有些許灰塵，但整體來說，能說得上十分整潔。尤其是像淋浴間、廁所、水龍頭這些設施，打開後的水都是很清澈的，也沒有異味。更令我（林士譽）印象深刻的，在於雖說觀光設施和保安林地未做嚴格的區分，卻是井然有序的。仔細觀察保安林地的樹，能察覺到這些樹沒有過多的枝桠遮擋視線，甚至在以人的高度來看，不存在旁枝阻擋通行。在幾株高大的樹間，還有新插的樹苗，每株樹之間都維持一定的距離。更沒有雜草叢或是灌木叢存在，給予人一種很空曠、很乾淨、很明亮的感覺（詳見圖三、四、五、六）。



圖三 海水浴場園區入口景
(姜宥甄於 2026 年 1 月 6 日拍攝)



圖四 洗滌設備
(姜宥甄於 2026 年 1 月 6 日拍攝)



圖五 中央林蔭大道
(姜宥甄於 2026 年 1 月 6 日拍攝)



圖六 濱海大樓之風箏衝浪教室
(姜宥甄於 2026 年 1 月 6 日拍攝)

在濱海大樓後方，還有一塊小廣場，用長方形石磚鋪成。左手邊則是媽祖廟（如圖七），媽祖廟的正對面有個斜坡能走上濱海步道（如圖八）。濱海步道的柵欄皆是木製的，步道靠近入口部份是用紅磚鋪成，另一部分則是木棧道，沿著木棧道就能走下沙灘。濱海步道還有特別做出一塊觀景台，站在觀景台上，就能大致看到整個沙灘的景況。與陸上設施的完整相比，沙灘上就顯得有些特別。比起沙灘，這裡更像一個「池塘」。初次到來時，我們都認為海水浴場沙灘的南北兩側各有一條水泥步道。而這兩條步道都因為海岸的作用力，破碎成一塊一塊的。上面都是青苔，還有藤壺附著。但退潮時再來，卻發現海面上還有一條水泥步道，同樣是碎成一塊又一塊（如圖九）。這三條步道便是在上一章所提及，蘇金志鄉長任內所建的「海上游泳池」的

殘骸。在經歷颱風和海岸的作用之下，已成為殘破不堪的模樣。只有在退潮時，能看到過往的存留。

而沙灘上的情況，與其說是沙，更像是泥。踩上去不是沙質那種鬆散的感覺，而是像泥巴一樣會被黏住。尤其在低潮時的海灘，因過往海上游泳池的影響，導致海沙容易灌入卻不易排出。這一情況導致低潮海灘的質地更像是泥灘地（如圖十）。



圖七 媽祖亭外觀
(姜宥甄於 2026 年 1 月 6 日拍攝)



圖八 濱海步道
(姜宥甄於 2026 年 1 月 6 日拍攝)



圖九 石製海堤
(姜宥甄於 2026 年 1 月 6 日拍攝)



圖十 海水浴場沙灘質地與遺留在灘地上的貝殼與文蛤殼
（姜宥甄於 2026 年 1 月 6 日拍攝）

初次到海水浴場的感受令人複雜，一面是整潔、完善的陸上設施，一面是舊時、陳舊的海上裝置。更為讓人感到衝突的是，在初次實地探查的上午，只有幾位叔叔阿姨來到海水浴場，其中大多是由海灘上岸的漁民。雖然有冬季強風的影響，但下午再次前來時，仍舊是僅能遇到寥寥幾位民眾。單從陸上設施來看，我（林士譽）認為可稱為優良的公園。海灘的環境卻是差強人意，雖然海灘平穩能行，但南北兩側破碎的步道仍是讓人在意。而退潮後的泥灘，就猶如舊時荒廢的海水浴場凝滯於此。就我（林士譽）來看，現在的海水浴場就像是個半成品。海陸的情況就像以海岸步道與海堤為界，翻新與陳舊就在一界之隔。同時

在一眼見底的海水浴場陸上園區，空曠的場地卻是僅有幾人，反而有種令人意外的寂靜感。好像海水浴場從翻新後的那一刻開始，就再次停滯下來。這種情況讓我（林士馨）格外在意，在荒廢後試圖重啟，企劃者們投入了多大的努力，才能建設起完善的陸上設施？又為何海上的環境看似仍差幾步，未能功成？

在正式進入田野前，我們有幸經由線人聯絡，和曾參與計畫的 C 先生進行訪談。藉由 C 先生的訪談，得知海水浴場曾經歷過沒落的時期。而在民國 106 年 3 月研提的重振計畫，主要由蘇國瓏前鄉長和蘇俊豪議員協手進行。後經由老師協助聯絡，我們成功與蘇俊豪議員、蘇國瓏前鄉長進行訪談。下文將根據二者的訪談，結合資料，回看這段復振的過程。

1. 不甘

蘇國瓏先生時任鄉長時期（現為議員，下文以蘇國瓏議員稱之），在其任內推動海水浴場的重振計畫。說起為何會將目光著重在海水浴場，蘇國瓏議員自幼於四湖鄉三條崙長大，小時候就經歷過海水浴場那段風光時期，說起那段歲月，蘇國瓏議員在訪談時總是有種自豪感：

我在這裡長大以前三條崙海水浴場，在我有印象的時候，每個假日、禮拜六禮拜天都人山人海的。……海水浴場差不多是我們附近這彰化、南投、嘉義唯一的海水浴場，玩水的人有夠多。我們中部就差不多都來這裡，這應該是差不多四五六年級，四十年次、五十年次、六十年次國民的共同的回憶，大家都知道，我想我們現任的縣長張麗善也說，她讀書的時候，都騎腳踏車（kha-tāh-tshia）來到這裡。我們前任縣長李進

勇，他也是說那是兒時回憶。李進勇，他爸爸，消防員退休以後又來海水浴場服務，來這服務。……其實那時候還沒有箔子寮漁港，只有三條崙漁港的時候，這個村莊很熱鬧的就是說，茄萣、安平（的）漁船都會來靠。他們來這裡，冬天準備要（捕）烏魚，夏天準備要（捕）蝦跟花枝，所以來停泊在三條崙漁港。沒有出海的時候，閒閒……所以那三條街很熱鬧的。撞球間、茶店，什麼八大行業都有啦。很熱鬧。差不多六十年代、五六十年代，所以連帶這三條崙海水浴場也變得很熱鬧，各行各業到假日，全家大小都會帶來海水浴場玩。（取自 2026/01/13 蘇國瓏議員訪談逐字稿）

在講述這段鼎盛時期時，蘇國瓏議員還將自己在海水浴場的童年時光鉅細靡遺地描繪出來。從在保安林內的小山坡騎自行車，到建造秘密基地、在海灘上烤番薯、加鳳梨罐頭和醬油煮小螃蟹。再到騎馬打仗、分隊玩地盤遊戲等等。蘇國瓏議員告訴了我們在文獻上從未提及過的海水浴場，一個孩子的遊樂天堂。就像 Ramakrishnan 等（2020）所述，在經歷衰敗的基礎設施如何進行再維護，經常涉及參與人的情感影響（Ramakrishnan et al. 2020）。我們認為一個人生活的點點滴滴，經由歲月積累而出的脈絡，有時反而成為了行動的契機，並由此拓展出新的關係網。在蘇國瓏議員的身上，能看出他深深愛著那個曾經的海水浴場，就算已過十餘載，也能讓人感受到那段過往的魔力。看著蘇國瓏議員繪聲繪影地描述他的童年，就能理解為何他會希望能夠讓海水浴場風華重現，甚至我（林士譽）在訪談過程中，也不由得為之著迷，希望能穿梭回到過去，親身體驗那段繁華昌盛的時光。

但繁華後隨之而來的，就是迅速凋零的衰敗。蘇國瓏和蘇俊豪議員皆指出，海水浴場沒落的原由主要是 1980 年代起，如劍湖山、六福村等大型遊樂園區的崛起。相比起刺激的遊樂園，海水浴場就相形失色，顯得有點過於平淡。再加上人口外流，當時許多村中青年都前往都市尋找出路。甚至出現「大的牽小的」的現象，在外就學或工作的長輩，會將家中晚輩帶去都市生活，一方面尋求更好的出路，另一方面也能彼此照顧。就在大帶小行為盛行之下，人口的外移更加嚴重。而海水浴場在外有強勁競爭對手、四湖本地人口遷移的情況下。又因人口外移的影響，本地行政部門開始缺乏稅收，逐漸難以維護。就這樣，曾經盛極一時的海水浴場逐漸落下帷幕。

談起為何要復振海水浴場，蘇國瓏議員和蘇俊豪議員都有種「不甘」的感受。蘇國瓏議員的表達較為強烈。這起因於他就任第 19 屆四湖鄉民代表會主席時，前往東石的漁人碼頭參觀：

我唯一的想法就是說，讓這個地方能不能再像以前那麼熱鬧啊。甚至包括，我會想要做，就是第一，就是說我的兒時記憶這裡是很熱鬧的地方。第二，最大的被刺激的時候，我在當代表會主席的時候，我那時候東石漁人碼頭正熱鬧的時候。我想說怎麼假日這麼多人都有在辦活動，我很好奇，我就去了。結果我夏天去的嘛，熱得要死了，也沒有樹能遮蔭，漁人碼頭你有去過嗎？裡面有沙灘啊！但是你沒有、沒有遮蔭，那沙中午的時候是燙的要死。你要擋又沒有說在用...我說我三條崙海水浴場是天然環境，條件比你們好那麼多，你們可以，我為什麼我不行？（取自 2026/01/13 蘇國瓏議員訪談逐字稿）

相比之下，蘇俊豪議員雖然沒有較為強烈的個人情緒，但他也不滿於四湖鄉的過往歷史被忽視，補充其他地區的人甚至認為四湖是個「沒特色的地方」。在 2014 年，時任縣長李進勇縣長在推動「山線觀光計畫」時，蘇俊豪議員就曾進行反應：

那我就是建議李縣長...好像編了四百多萬，對雲林縣沿海一個整體的規劃，觀光規劃。（取自 2026/01/09 蘇俊豪議員訪談逐字稿）

而至換張麗善任雲林縣縣長第一任期時（2018－2022 年），作為橫跨兩任縣長時期都擔任民意代表的蘇俊豪議員，在後續的規劃過程中，他和委託企劃的民間公司接觸時，意外的發現企劃案中鮮少提及四湖鄉。議員進一步詢問後才得知，委任公司和四湖鄉公所接洽後，總體評估認為四湖鄉於當時較不具備可發展景點，因此在該企劃中少有規劃。身為在四湖鄉長大的蘇俊豪議員，對於這樣的評估很不同意。於是希望雲林縣政府相關的官員前往海水浴場實地考察，讓蘇俊豪議員能夠介紹海水浴場的可能的潛力和優勢。

我說你（從 78 號快速道路前往三條崙）下來，可以加油，剛好旁邊有個三條崙漁港那邊就有一個在加油的（小型加油站），然後又有包公廟那個廁所、又有那個廟宇。然後海水浴場又可以休閒，又可以觀光，一舉數得，我說這個哪沒有亮點？（取自 2026/01/09 蘇俊豪議員訪談逐字稿）

我們和蘇俊豪議員談論有關參與海水浴場的復振時，議員仍時不時地提及整個雲林縣的觀光發展。蘇俊豪議員

一直是站在一個比較整體性的視野去看這些計畫，也有提及在大眾的印象中，「文化沙漠」、「觀光沙漠」成為雲林的標籤。他始終認為雲林這個縣市其實是充滿潛力的區域，尤其是在雲林海線這帶。為此他也進行了許多努力，像是在其就任副議長時期，就認為縣府應該多增設觀光相關人員、完善編制。蘇俊豪議員強調只有在編制良好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建設出完整的觀光計畫。

對於兩位議員來說，於民國 106 到 110 年的海水浴場風華重現的重振計畫並不是一項特別縝密、精打細算的安排。甚至兩人都有對於過往昌盛的懷念，以及現在對於家鄉受人輕視的不滿，才緩步地開啟這項計畫，隨後積極地尋找可能的合作夥伴。在這段海水浴場沒落的描述中，不論是地方鄉志、官方文章或著田野報導人分享，皆是以人們的活動為主。但在認識這些歷史時，也應意識到，雖然海水浴場的繁華和衰弱都與人群的活動有關，卻不應只以人們為絕對主體。在日治時期之前，這座沙灘就已存在，人們被其吸引而試圖將其建立成海水浴場。但其原有的特性仍在影響著海水浴場，據吳顯童的記載，因西海岸的洋流影響，現在看到的海水浴場和日治時期舊址相比，已向南發生偏移（吳顯童 2005：86）。海流的沉積和侵蝕一直在人口外移、遊樂園興起等人類因素下影響著海水浴場。蘇國瓏議員提及三條崙海岸的漲退潮幅度大，再加上民國 70 年代網路不發達的環境。僅有當地居民較能依靠經驗去判斷漲退潮，而許多外來的遊客不能像今時使用線上潮汐圖查詢，導致常在沒水的退潮期撲空，因而對海水浴場大失所望。

後續為了解決退潮造成的無法戲水問題，在蘇金志鄉長任內建設了「海上游泳池」設施，在漲潮時開閘引入海

水，退潮則關閉閘門以維持水位。但引入海水時經常將泥沙一併帶入，造成沙灘泥沙淤積；此外，封閉水域容易使貝類孳生，下水民眾常因此遭割傷，這些問題同樣使得海水浴場不再吸引人們。

在以人為主導的時代敘事下，組成海水浴場最重要的沙岸和海水，一直都有著影響，其流動性不符合人們希望能時時有水的遊樂水域期望。當經營者試圖努力打造出一個穩定的戲水環境時，卻適得其反破壞了美麗的沙灘。除社會變遷外，自然因素一同造成海水浴場的衰敗，甚至是從海水浴場成立以來，就時刻挑戰人們。同樣的，在自然因素和社會大環境的影響下，人們的情感因素也依然發揮作用。在過往的榮景和民國 90 年後的衰敗形成強烈對比之後，像蘇國瓏議員這樣和海水浴場有深厚羈絆的人，因對家鄉的熱愛而投入復振。像是「民國 60、70 年代中部唯一的海水浴場」，不僅是一種稱呼，更是象徵著海水浴場和中部地區五、六年級的人們的情感展現。在後續文中，也能看到許多人因為這段羈絆，而加入海水浴場的重振計畫。

而擺在他們面前，最為棘手的，是我（林士馨）認為一種能稱為「行政凝滯」的狀況。對於縣府或鄉公所而言，不論是偏好相對發展成熟的山線觀光，還是在初次企劃中，鄉公所認為的四湖鄉不具特色且少有規劃前景。四湖鄉，乃至海水浴場在行政發展的計劃中都未受注目。不受注目的原因，從體制內來看，涉及到人口外移、缺乏完善編制、稅收不足等環環相扣；而在體制外，則是四湖鄉，甚至擴大到雲林海線，常受到「文化沙漠」的固有印象影響，使得民間業者或是政府部門經常對於觀光發展前景抱以悲觀。當一個被停留在過往時空的空間，停滯從概念變成了現實。

當人們想要再次推動這段時光，究竟會遇到怎樣的阻力？又要如何尋找夥伴，建立新的關係，改變這已不再流動的關係網？

2. 凝滯

在海水浴場的復振過程中，蘇國瓏議員所率領的重振團隊，遇到最為棘手的問題有三：一為地目編制問題、二為整治經費來源、三為主題重設。在此小節，將專注於前兩個問題。

首先是地目編制問題，其源自於海水浴場的土地規劃。進入 21 世紀以來，國際間開始越加重視海洋休閒的發展，重新將海洋產業稱呼為「藍色經濟」（黃妍榛 2020：4-5）。臺灣也跟上海洋觀光的潮流，從民國 95 年公布國家海洋政策白皮書之後，陸續於民國 98 年頒布海洋基本法，又於 112 年通過海洋產業基本條例，以完善從事海洋產業的相關規範條例（*ibid.*：7-9）。

但實際上，除了上述法規條例外，還有許多政府機構與海域活動有關，如內政部、交通部、環保署等等，總計有 17 個部門與海域相關（蔡岳暉 2022：106-107）。各部門間容易形成多頭馬車的情況，抑或是各部門重視的部分不同，造成資源分散的情形（*ibid.*：108）。其中海洋休閒主要由海洋觀光、海洋遊憩和海洋運動構成，不僅牽涉到觀光局、體育署等部門，更在新法和舊法的適用上，造成了政令繁多、權限不清的問題（黃妍榛 2020：7-11）。不管是曹校章（2014）抑或上述學者等就有提及，臺灣海洋政策經常面臨多部門管轄重疊的問題，同時又因舊時建築缺乏建照和使用執照，導致主管機關無法對其進行拆除。

蘇國瓏議員對此情況感到十分不解。海水浴場明明在省府時期便通過預算案，建設小木屋來從事觀光產業，為何當時仍將小木屋的建設地點歸為保安林地，而不是遊憩用地？面對這種情況，蘇國瓏議員非常的不滿，他是如此述說的：

那其實裡面很多大木屋小木屋在那個樹林之間，樹林裡面，很多一、二十間喔。就是以前的人來這裡，都會住在這裡啊。大木屋小木屋後來就是沒落的，越來越沒人，再來就壞了，房子沒有人住就是會壞掉，所以土地解編以後，就把濱海大樓、大木屋、小木屋全部都拆掉，重新整理。這木屋是那時候是省府補助建來蓋的。所以我做鄉長（時），公務人員在講說你們保安林地不能建設，（但）你看的到的都是你們省府補助的呢！（如果）保安林地不能建立，（那）當初省府怎麼花這麼多錢建設？那就是以前的公務人員，就是在辦公室裡面辦公啦。你國家政策說土地重新編訂，他也沒下來看。以前人家怎麼寫，他就怎麼寫，根本就沒有照實際情況留下。（取自 2026/01/13 蘇國瓏議員訪談逐字稿）

蘇俊豪議員也有提及這件事的棘手之處，各部會之間很容易出現「互踢皮球」的狀況。通常詢問某單位，該單位就會說相關公文不在此處，應該在另一單位，詢問另一單位時，此單位又會說不在這裡。如此運行下來，只要每個單位各自延上幾天，再加上跑公文的行政流程，就很容易把一屆鄉長的任期交代過去。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兩位想要建設地方的從政者只能採取「當面對峙」的方法，將每個相關單位縣府和鄉公所人員召集起來，當面釐清相關的公文是在哪裡、要怎麼解決、還有什麼相關程序問題、

多少天能解決等等。經由一個一個抓出來當面協調的方式，才成功地將地目從保安林地，解編改成為遊憩用地。

在 2017 年成功解編之後，接下來要著手的問題就是有關整治經費的爭取。談起這件事，蘇國瓏議員總是感到無奈，又帶著些許氣憤。他提及縣府雖然口頭上一直說沒錢沒錢，但根本的原因在於縣府不會把錢投注在一個「沒希望的地方」。而蘇俊豪議員則提出一語中的的看法，他認為政府不投注經費的作法是在創造一種「惡性循環」：

我們海水浴場他是惡循環，為什麼？就是稅收少，然後那個人才也沒那麼多，所以管理就不好、再去的人就分散，客源就去這些（經營良好的遊樂場），然後他設備也不是很好，就惡性循環。你越不好，人家越不想去就，會一直循環……（取自 2026/01/09 蘇俊豪議員訪談逐字稿）

人口外移的嚴重性，在兩位議員的談論中，給予了我（林士譽）極為深刻的理解。人口在行政上，其實是極為重要的一種資源，不論是稅收、人才吸引還是前景，多少人在這塊地上活動，成為最為直白可見的指標。「一個沒希望的地方」，雖然蘇國瓏議員否定了這個想法，但他能推測得出縣府的意圖，或許也代表他知道這項計畫充滿著理想性，要實現卻是有著重重困難。在整治老舊海堤的問題上，也遇到了相同的情況。蘇俊豪議員在訪談中有提及，當時他邀請了成功大學的水利及海洋工程研究所協助評估整治新的海堤，但最終縣府仍是以經費不足的緣由，未批准新海堤建案。蘇俊豪議員也是對此不滿，他認為新海堤的建設，除了能解決海水浴場的淤沙外，也能根除旁邊三條崙漁港的淤積問題。否則單純的抽沙，只是治標不治本。

實地田野之前，我們曾與一位 C 先生進行線上訪談。C 先生曾作為一個參與重振計畫的秘書階級行政人員。他也有提及到淤沙的問題。C 先生對於抽沙這項工程感到非常無奈，感覺就像是把錢丟進去大海裡，把沙抽出來之後，過幾個月就會回來，然後要再來一次。他也知道頻繁的抽沙工程常以來居民的非議，卻仍不得不為，讓自己都覺得很無奈，好像是白做工一樣。

總結蘇國瓏議員和蘇俊豪議員遇到的最大困難，他們無法理解為何他們想要去做事，但其他單位卻經常消極面對。C 先生就透露，他覺得兩位議員和他遇過的官員很不一樣。兩位都很積極的尋求新的變化。在缺乏資源的狀況下，蘇國瓏議員帶領的海水浴場復振團隊陷入了一種「行政凝滯」的困境。不論是雲林縣政府或四湖鄉公所，都盡量選擇維持現狀。比起改變，維持既有制度至少能將風險控制在可控範圍，不會節外生枝。保持地目編制是如此，抽沙工程也是如此。³

我們深深感受到，海水浴場淤積的泥沙，就好像行政凝滯的縮影。其實情況一直在惡化，越來越多人不願前來，行政系統在缺乏資源的情況下，只能進行維持現狀的工作——抽沙。流動的沙、抽出的沙，似乎象徵著這個空間還在活動，卻是以一種重複到令人失去方向的方式進行。沒有希望，從來都不是前方沒路，而是看著一件事物緩緩流逝，卻只能以「維持現狀」的方式試圖延續。

³ 礙於田野調查時間與資料搜集之限制，在行政單位層面的全部視角未能觸及，慎以文中幾位民意代表與報導人之訪談與資料補充呈現。

3. 緣分

在這段重振計畫中，令我（林士馨）最感動的一點，在於每位計畫的參與者，不管是兩位議員、教練們、C先生或是其他協助的局處長，提到彼此時，都會說對方「很不一樣」。

為了解決經費整治的問題，蘇國瓏議員於 2014 年找上風管處合作。提及和風管處合作的經驗，蘇國瓏議員就忍不住帶有一絲笑意，直說當時的處長很不一樣，很有想法，也敢於實踐。和處長介紹完海水浴場的歷史之後，處長認為海水浴場是個很有潛力的地方，他願意協助幫忙，甚至提出一個令議員大跌眼鏡的計畫：

後來去到交通部、觀光局、雲嘉南風管處，那個一個處長。這個處長，他是一個勇於創新很衝的人，那個水晶教堂，就是高跟鞋教堂嘛，就是他做的。他那個處長任內做的，他做了很多個景點，所以很敢做的。所以我就找他，我拜託他，我邀請他來這裡看，我也是在這採訪，說歷史給他們聽聽。他環境看一看，他覺得說這裡可能有成功的機會啊。他看完回去有一天，他找我說鄉長，那在這裡做一種性愛樂園。...我跟他講說這樣好，我這是鄉下的地方，你要拚過劍湖山、麗寶，要拚過義大，那你就是要跟人家不一樣這種方式。我就想說要不要。（取自 2026/01/13 蘇國瓏議員訪談逐字稿）

為了測試能不能成功，議員和處長甚至將計畫放在 PTT（批踢踢實業坊，簡稱批踢踢、PTT，為臺灣電子佈告欄的一種）上確認人氣，結果當天就成為流量焦點，也使得蘇國瓏議員認為這是個可行的方案；現在如果至網路上

查詢，還能看見一篇相關報導。⁴結果當時縣府馬上就注意到性愛樂園的計畫，極力勸阻蘇國瓏議員不能做。甚至花了一筆經費幫議員製作一本新的企劃書，議員自己評價這本企畫書是「愛不釋手」。但一談論到執行經費的問題，縣府又是以沒錢推託，氣的蘇國瓏議員稱這場會議像在玩弄他一樣。實際上，蘇國瓏議員也在性愛樂園的主題選擇上有些卻步，但與缺乏經費又無人協助的情況相比之下，後者更為窘迫。或許說是巧合，後來這位處長就被調走，換來了一位新的處長。我（林士馨）在當下聽到這一情況時，還以為又是換處長而導致無疾而終的結局。但新任處長也同樣認同海水浴場的歷史和文化價值，願意繼續進行海水浴場的復振計畫。後續議員和新處長重新擬定整體計畫，決定先將整個濱海大樓等陸上建設進行重建，總共分為四期進行處理。

解決完陸上整治問題後，就要處理該舉辦什麼活動吸引人潮。海水浴場的活動每年度有兩大重點，一個是音樂季，另一個則是國際風箏衝浪節。音樂季主要是參考漁人碼頭的案例，所以想要打造出一個環境好，能聽音樂的地方。並於 2020 年成功開辦音樂季，至今已持續舉辦六屆之久。至於風箏衝浪的引進，兩位議員都只能說這是「緣分」。海水浴場因為其特殊的地形結構，導致這裡形成特殊的「有風無浪」的現象，極度適合風箏衝浪進行。引進風箏

⁴ 相關新聞如

<https://tw.news.yahoo.com/%E8%A7%80%E5%85%89%E5%B1%80%E6%89%93%E9%80%A0%E6%80%A7%E6%84%9B%E4%B8%BB%E9%A1%8C%E5%85%AC%E5%9C%92-%E6%BE%84%E6%B8%85-%E6%98%AF%E5%8F%B0%E7%81%A3%E7%BE%85%E6%9B%BC%E8%92%82%E5%85%8B%E5%A4%A7%E9%81%93-032523988.html>。

衝浪，主要是由當時的雲林縣政府計畫處處長牽線完成，兩人都未能想過能將風箏衝浪這一特殊活動引進海水浴場中。在蘇國瓏議員擔任鄉長的最後一年，2021 年正式啟用風箏衝浪項目。

在談到活動的成效時，蘇國瓏議員興奮地站起來，走到茶桌旁的螢幕，指著前往海水浴場的路說道：「你知道嗎？這條路已經好久好久沒堵起來了，到了那天（音樂季）整條路都是車！」能看出，對於海水浴場活動的成功，是非常讓他振奮的。但當我們談及有何遺憾時，蘇國瓏議員又流露出一絲落寞，他認為目前僅達成預想中的一半而已。因為內部並未進行招商，導致遊客只能自帶飲料零食進去，如果不夠了還要離開園區才能買，有時遊客乾脆就不回來了。當然，議員認為海水浴場園區內要招商，還是受到小時候經歷的影響，畢竟當時的海水浴場攤販林立、人聲鼎沸。議員分享童年經歷時，就補上了一句：「果然還是要招商啊！招商了才會熱鬧！」

這項重振計畫可以說是充滿了意外和挫折，尤其是在蘇國瓏議員於 2014 到 2022 年，擔任鄉長任期內，園區內活動都才開始起步。在與兩位議員談話後，我們能感受到他們對於家鄉的熱愛和敢於執行的魄力，同樣也領略到海水浴場那豐富的歷史魅力。計畫中最令人敬佩的還是蘇國瓏議員，幾乎是從零開始籌備。和每位計畫的參與者訪談時，蘇國瓏議員都是那位重要的連結點，重新將海水浴場從無法繼續的「一段歷史」變為可被改變的「一座建設」、「一項計畫」。就如 Jensen & Morita (2015) 所述，一項基礎建設計劃，會擾動原有的關係網。藉由風華重現的計劃，從

議員到基層公務人員、教練們，再到民眾，都因為這項計畫而開始重新接觸「海水浴場」。

同時，我們也要從海水浴場本身的視角出發。對於海水浴場而言，在復振的計畫開始之後，其重新成為四湖鄉公所需要治理的存在；荒廢時，受自然影響的保安林、道路、沙岸也開始受到行政規劃的影響而擾動。而在時間紀錄上，海水浴場從「荒廢中」轉化為音樂季或衝浪節等活動的時間。人們由一個固定的「荒廢」時間，開始以活動起來的時間序列來認識海水浴場的變化。藉此，海水浴場從「不可互動」的存在變成「可以互動」。

但在時間上的活動規劃和空間中的大型建設之間，仍有許多空隙需要填補。在音樂季和衝浪節之間的時間，與海水浴場相關的人又會如何與海水浴場互動？而在濱海大樓、海堤等在整治計畫中提到的建設外，如步道等設施又要怎樣塑造，才能連結整個海水浴場？這些塑造既涉及每日於海水浴場中維護的人們，其內心對於海水浴場的願景，又不可避免的受到海水浴場自身的脈絡和特性所牽引。接下來，本文將由首長的宏觀視角向下移，從海水浴場內部的當地人視角進行日常維護運作的探討。在宏觀的活動、建設完成後，海水浴場這片場域又是如何在日常中，一點一滴的塑造環境，填滿在盛大活動和建設間的空隙，讓海水浴場成為「海水浴場」。

（二）從海水浴場到親水公園：基層管理員的觀點

在整座海水浴場內部，陸上環境寬敞整潔，並有一處景點是鄭成功文物陳列館（如圖十一）。門面非常整潔美觀、紅漆亮眼。館地分為三處，右側室為物品置放，中間是文

物陳列與鄭成功祭祀壇，左側則為工作人員休息與辦公室。文物陳列並非鄭成功直接相關身後物，較多為後代或某人供奉紀念打造，有鐘、轎、銀牌等。而我們也訪遇到一位報導人，下文將稱其為管先生（化名）。



圖十一 鄭成功文物陳列館全景
（鄭采宜⁵於 2026 年 1 月 8 日拍攝）

首先我們向管先生詢問，在走訪園區時瞧見有十二位人士，從中央林蔭大道北邊走來入口處，其中一位拿著測距儀，並有一人穿著行政或公務人員常穿的行政夾克，這群人是何許人也？管先生答道這些人是四湖鄉公所為勘查每年各一次的音樂季與衝浪節而來。根據後續訪談資料中，

⁵ 此照片來源感謝文化田野實習與方法修課同學鄭采宜提供，為本文呈現鄭成功文物陳列館之正面全景。

我們可知三條崙海水浴場以前係為收費式遊樂地，而管先生則更進一步以偏向家機關的視角，為我們說明土地使用變更與園區建設史記。本研究欲了解此脈絡，不僅是為了理解海水浴場轉型方向與變遷，更旨在理解不同行政層級的互動中，是如何形塑出眼前的海水浴場。

整座園區之土地管理權分屬不同機關與單位，廣場部分土地主要由四湖鄉公所管理，林務局負責安保林地之林相照護，至於雲嘉南風管處則主管沿臺 61 線至臺南之沿岸路段。

西元 2020 年，行政院於「國家海洋政策白皮書」中提出「向海致敬」政策，以「全民親近海岸、每吋土地都乾淨」為政策目標，推動「淨海（清淨海洋）、知海（知道海洋）、近海（親近海洋）及進海（進入海洋）」等四項內涵工作，鼓勵人民親近海洋、向海學習。其政策推動之具體成果，從 2020 年底至 2021 年底，在知海方面包括完備海洋研究船隊、提升海洋科研能量，並突破性科研成果，增進民生福祉。在淨海方面，建立海岸廢棄物清理機制，「源頭減量」及「去化回收」並進。在近海、進海方面，則讓海洋管理邁向開放，並且建置「海域遊憩活動一站式服務資訊平臺」與海洋遊憩風險資訊平臺（GOOCEAN），營造友善親民海洋環境（海洋委員會 2022）。而藉由「向海致敬」政策，三條崙海水浴場作為濱海遊憩區域，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雲林縣政府及四湖鄉公所等單位，共同舉辦中部地區的「向海致敬」實際活動。由南投林區管理處、東勢林區管理處國家森林志工及保安林周邊社區居民等 250 位，於 2022 年參與三條崙保安林淨灘、淨林任務（林務局 2022）。

而在三條崙海水浴場靠近海邊的具體建設，則主要由雲嘉南風管處負責。另外像是園區內的濱海大樓（同時也作為風箏衝浪教室），管先生提及原本四湖鄉公所預計要興建到三樓，但為避免空間使用率不高、淪為蚊子館，所以先只蓋成兩樓。於是我們透過前段訪述資料得知，雲嘉南風管處之於海水浴場觀光建設具有明確權屬。而我們在走訪當地、在海岸邊看見的四湖鄉林厝寮大排旁堤岸復建工程，便是由該單位（雲嘉南風管處）出資填海造陸；訪談過程中管先生提及，府際單位預計將填海造陸的沙灘與音樂節結合，在沙灘上增設沙雕與打卡景點等。而造陸所用的沙量來源，則是曾經在茆子寮漁港淤積過多的海沙。抽沙原就是期盼能有效減緩茆子寮漁港的淤沙問題，而抽出的海沙則於民國 114 年的堤岸復建工程（如圖十二）中，則投入填海造陸，以期能做為音樂節活動用地。



圖十二 四湖鄉林厝寮大排旁堤岸復建工程

（姜宥甄於 2026 年 1 月 7 日拍攝）

在雲林海岸，因淤沙嚴重，三條崙漁港與殖產蚵業等皆受其影響。楊清閔在 2023 年針對臺灣牡蠣養殖戶的困境與問題研究中便提及，1999 年與 2000 年臺西牡蠣苗生產區的產量大幅減少，其大量淤積的泥沙可能來自鄰近新興工業區開發，以及抽沙船抽沙時造成的漂沙。泥沙沉積等問題，時而影響牡蠣產業發展（楊清閔 2023：46）。根據雲林縣一級海岸防護計畫，雲林縣臺西海埔地部分岸段、三條崙漁港南側海岸段及箔子寮海堤部分岸段之海岸侵蝕災害，並且沿岸人工構造物攔滯漂沙，近一步造成麥寮與臺西近岸沙洲變遷流失問題（經濟部水利署 2020：3）。在三條崙西北邊麥寮六輕廠的進駐對於地形變化的影響，不僅在此

與管先生訪談過程中被反覆提起，往後的與不同報導人的對談中皆談及此。而淤沙變多的同時，也導致漁港漁獲量減少。當漁業與養殖業不再能支撐起足夠的生活經濟來源，越來越少人從事捕魚、年輕人移往外地發展。這樣因產業發展停滯而導致人口外流的現象，也與林建志與王莉晴在 2025 年，針對箔子寮漁港在漁業式微與生存回應機制的討論中不謀而合（林建志、王莉晴 2025：77）。

而在觀察到對於矗立在沿岸步道旁寫有「無救生員駐站、請勿進入戲水」的告示牌，我們也十分好奇名為「海水浴場」的場域，卻對遊客下達了禁止遊水的警令。管先生隨後以海水浴場關閉為節點，向我們解釋園區性質的轉變。根據管先生說法，該地約於 2004 年時，因無法招聘到救生員，再加上沿岸的地底已積沙嚴重，產生安全性疑慮、且不符合營運的經濟效益。在我們於 2026 年 1 月份造訪三條崙海水浴場期間，實際也無觀察到有配備救生員之現象。於是三條崙海水浴場實際上轉型為「親水公園」，更進一步打造為海洋教育中心。該海洋教育中心全名為「雲林縣三條崙海洋教育中心」，從官方網站之組織架構可知，由雲林縣政府教育處主管，並由三崙國小校長擔任中心主任。瀏覽中心簡介，中心內尚有住宿寢舍、茶水間、交誼廳、簡易廚房、多人會議室與影音展覽互動等設備，也擬有場地租借辦法（雲林縣三條崙海洋教育中心 無日期）；只要符合法制規定，興許能讓其他縣市國小或團體在此住宿、露營，進行海洋教育活動。



圖十三 三條崙海洋教育中心
(姜宥甄於 2026 年 1 月 6 日拍攝)

海水浴場現已轉型成親水公園，而曾任政府編制的管先生，本身也曾做過維護環境的等行政工作。除了歸屬風管處的沿海岸外，鄉公所主要負責陸地上的綠化美化以及設置照相景點等。例如園內的樹木修整、插植新的植栽，以及雜草亂枝的清潔作業等。訪談過程中，我們對於海水浴場也有了更具根據的認識。像是考量到現地風大又靠海，樹種需選擇耐鹽抗風的品種來種植，我們從中瞧見了親水公園的自然條件是如何影響景貌呈現的。

除了原有的生態林相、以及現在主要種植的七里香以外，我們想像著或許當園區裡種植著四季內都有花期的樹種，供予民眾乘涼用，會是什麼樣的畫面。另外對於陸地

上設施的多樣性，無論是我們初訪園區時或是查看 Google 地圖裡的地標圖片，在營造空間仍有許多想像空間。在訪談時，我們與管先生相互討論著，在不破壞林相的前提下，興許能設計硬體設施例如咖啡座、涼亭等，能讓來訪遊客能結合自然保育資源與黑森林步道，從事些山林活動，抑或攀岩、看夕陽、喝咖啡、聽賞鳥鳴等。不過，上述之公共休憩的建設，鄉親曾以過往記憶告訴我們，其實在 1990 年至 1998 年、蘇金煌擔任四湖鄉長第十一、十二屆任期時就出現過，當時因對建築牌照相關規定不嚴謹，大部分由鄉公所自行委託，小木屋會出租給別人營業使用。

我們透過與管先生的訪談，感受到其對於法規的重視以及對園區發展的更多期待。管先生更進一步舉增設匹克球場與體操設施的四湖運動公園為例，當一座公共設施經過良善整治後，能為當地居民提供運動休閒去處，同時帶來聚集效益。而因為海水浴場主要管理單位為四湖鄉公所，我（姜宥甄）設想若嘗試以公部門人員角度來看，駐點之管理人員尚且能進行小幅度修補與清掃、維護環境整潔；再往上更宏大的計畫決策，則似乎不是基層工作人員所能決策之。管先生在訪談尾聲中，談及自己以當地人身份來看，無比希望三條崙能有更長遠與有益的發展。不管是風箏衝浪抑或什麼建設項目，只要有人能來、保持曝光度，即有機會回饋當地；但同時也害怕若無更有遠見的安排，悉心建設卻落得華而不實的空殼處境。

綜上所述，當前三條崙海水浴場在形式與規定上比起海水浴場，以「親水公園」來稱呼更為貼切。然而不管是三條崙當地的路邊告示牌，抑或沿臺 61 線由南至北進入口湖鄉時，也是大大的路牌寫著「三條崙海水浴場」，可見

「海水浴場」這塊招牌仍作為普遍上對此地性質的描述。在我們真實走訪當地之前，提到三條崙海水浴場時，其直覺會因命名上的字樣，而朝著可親水嬉戲的遊樂浴場性質想像。然而透過訪談與資料查詢，這座目前名為海水浴場、實為親水公園的場域，實受法條規定、社會印象、歷史淵源以及建設發展等因素交織影響，連帶改變了不同行動者，認知上對於三條崙海水浴場這塊土地之功用與性質。

根據林昱宏於 2025 年 12 月 26 日的報導，在當天上午舉行開工祈福與動土典禮中，雲林縣副縣長謝淑亞表示：「本次工程經費近 1 億 4 千萬，將結合三條崙海洋教育中心、四湖海岸植物園與三條崙濱海秘境等據點，透過海堤自行車道與步道系統，串起海清宮、社區聚落與海岸景點，兼顧海堤安全、海洋教育、生態保育與地方創生...。」同篇報導繼續紀錄，「水利處強調，『三條崙海水浴場周邊環境景觀改善工程』總經費約 1 億 3,780 萬元，工期 400 日曆天，是『三條崙海水浴場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的重要階段，後續將陸續建置綠丘植生帶、海岸地景藝術、沙灘活動設施及導覽系統，串聯沿線遊憩與生態教育據點...。」(林昱宏 2025)，水利處也希望形塑兼具親水休閒與環境教育功能的濱海廊帶。

但根據管先生說法：「請不到救生員、環衛、安全等問題都很難完全合法做到。」我（姜宥甄）嘗試設想，地方政府擬以音樂季、衝浪活動作為短期觀光活動，是否為替三條崙海水浴場在使用上更為活化的一種方向與措施？管先生有提及當地老人家確實會來此運動，但因無進一步能活動筋骨的設施，無法較完整且多元的利用，只能進行散步與健走等無器具運動。從管先生角度來看，「運動」的推

廣在四湖市區上的運動公園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那加注了縣政府、林務局、雲嘉南風管處等單位媒合推行的「風箏衝浪」活動，對三條崙海水浴場帶來了什麼樣的變化？

本研究為了更進一步了解空間活化的發想與應用，在第一節「推動者：藍圖、理想與現實」中，先透過蘇俊豪與蘇國瓏兩位議員的訪談資料，已知風箏衝浪是如何進入到地方建設藍圖中；而作為期許能引進觀光熱潮項目之一的風箏衝浪活動，是否能確實發揮其作用、並吸引人流？下一節將針對該項運動，有更多的視角與探討。

（三）風箏衝浪：合作

民國 102 年 10 月起，遭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列管為「閒置空間列管名單」的三條崙海水浴場，在經過土地申撥與水域遊憩活動等建置後，海水浴場已與過往的戲水勝地相比，有了更煥然一新的風貌。風箏衝浪作為三條崙海水浴場重振計畫中之潛力項目之一，於民國 109 年通過國際風箏衝浪組織 IKO (International Kiteboarding Organization) 認證，成國際風箏衝浪據點之一（姜宜菁 2020）。更於續年舉辦雲林縣第一屆風箏衝浪公開賽，成為雲林縣史上首場全國海上運動公開賽里程碑（葉士弘 2021）。三條崙海水浴場也得益於該賽事的舉辦，歷時七年多的時間，於民國 110 年 5 月 14 日正式解除列管。雲林縣計畫處李明岳處長表示，縣政府持續舉辦大型運動賽事，除了是以行銷逐步建構三條崙水域活動品牌以外，也創造了青年返鄉經營代客從事水域活動的據點（雲林縣政府計畫處 2024）。因此，我們認為了解風箏衝浪運動之於本研究來說更是必不可略過，也能使研究者更加了解海水浴場轉型計畫的全貌。我們透過

訪問兩位先後於三條崙當地主要執行風箏衝浪之業者，將有助於對三條崙海水浴場與風箏衝浪之關聯有更清楚的認識。

第一位受訪者 A 教練之風箏衝浪經歷始於西元 2014 年，於 2017 年左右於臺南北門的基地擔任助理教練、並在七股從事教學，後因七股當地土地保育性質與經營運用問題，便結束於臺南的營業。而因 A 教練的太太本身即為雲林人，A 教練遂曾聽聞當地長輩講起，約莫數十載前、早期中部就只有一個海水浴場，也就是三條崙。作為曾經開放給大眾遊憩的水上遊樂浴場，則應具備基本水域遊憩環境。憑此條件判斷，A 教練約於 2021 年來到三條崙實地考察後發現，三條崙當地具備水流穩定與強力東北季風的地理條件，非常適合風箏衝浪發展。當時陸地上的環境已有經過四湖鄉公所重新整理、乾淨整齊，但海域部分似乎尚未有已可視實體整建之計劃。然而西海岸遍佈著突出水面的竹竿與蚵架，任一單位若要發展風箏衝浪，則需先仰賴一定額度的經費清除，難以僅憑一人之力完成水域整治行動。於是 A 教練開始自行擬定計畫、描繪建設藍圖，並拜訪時任四湖鄉鄉長蘇國瓏與雲林縣政府計畫處處長李明岳，向兩位府際人員說明與爭取建設。

我去跟當時的蘇國瓏鄉長和縣政府做拜訪後...那個發展風箏沖浪是他們願意去做的，因為他們一直在想說把什麼東西可以帶到三條崙來做發展。（取自 2026/01/08 A 教練訪談逐字稿）

在 A 教練與兩位長官接洽後，兩人皆對於以風箏衝浪作為三條崙特色推廣表示極大支持，並有意共同推動此方向發展。在與雲林縣縣政府和 A 教練等相關人員開始共同

規劃建設後，政府提撥經費整治三條崙海上建設與風箏衝浪推動計畫。

有些漁船他們本來就停在會停到海水浴場裡面嘛，那因為我們的關係造成他們的不便，所以他們一開始對我們是有點意見的。（取自 2026/01/08 A 教練訪談逐字稿）

風箏衝浪在建設初期對於在地居民來說或有不解與陌生，但經過風箏衝浪業者們到當地店家吃飯、培養感情、邀請觀看活動等互動後與推廣後，居民逐漸減少對於風箏衝浪的不熟悉感。然而從 A 教練實際參與推動之經驗來看，風箏衝浪的推動與政府之間具有緊密的合作關係。隨著 2022 年地方首長選舉輪替，政治情勢的改變與產業推動方向的歧見產生，A 教練現已退出當地的經營行列。我（姜宥甄）下段將更具體分析風箏衝浪本身特點、三條崙當地地理條件，與風箏衝浪產業發展的要件等。

1. 風箏衝浪特色與其限制

風箏衝浪優勢在於適齡範圍廣，如 A 教練自己就接觸過 8 歲至 80 歲的客群。風箏衝浪之動態動力依靠風力與人為控制，較無環境與噪音污染問題，作為一個閒置空間的活化發展項目，風箏衝浪的新穎也許能成為對大眾來說的一個吸引點。然而，風箏衝浪同時也存在著對參與者的諸些要求。

它需要有錢，要需要要有錢有閒，因為它要花很多時間練習嘛。它需要不怕水不怕風。對，它因為要在海面上……像我的（裝備）比較頂尖一套都要一二十萬嘛，比較屬於高消費，但如果說以當地要去發展這個東西。

呃，除非有一些政府的支持。你才有辦法去把它慢慢擴大。(取自 2026/01/08 A 教練訪談逐字稿)

進行風箏衝浪必須要有一定體力，且願意親水。此外不管是參與課程體驗抑或自主進行運動，其設備費用所費不菲。「因為你講風箏衝浪沒有人知道，那時候沒人知道，基本沒人知道。(取自 2026/01/08 A 教練訪談逐字稿)」。相對其他運動，風箏衝浪受眾群更小。風箏衝浪的推廣過程中，知名度也是這段過程中最大的困難之一。「就是海面上那花、要花的錢都蠻多的啦唉，啊所以說這種東西就是要看縣政府跟地方的推動的狀態啊，不然錢多花也是白花的啊。(取自 2026/01/08 A 教練訪談逐字稿)」。

我們從上述節錄分析之，風箏衝浪是一項需要一定成本支出的運動項目，在場地上和設備上都帶有要求與條件。在硬體設備發展上，現有場域偌大，但仍有進步與改善空間，例如浪板與道具的運輸步道等。在運動本身發展潛力上，由三條崙作為據點的雲林國際風箏衝浪學校，已成為全臺唯一經國際風箏衝浪組織 IKO 認證通過之學校，但就從業者角度來看，尚須之於民眾來說更具體的知名度與對風箏衝浪的了解。從場域環境來看，風箏衝浪作為三條崙海水浴場轉型路徑主推的觀光遊憩推動項目之一，而海水浴場地上權涉及多個單位的複雜權屬，以及原有的民生殖養活動，這些都仍有待更詳細與多次的討論與規劃，方能更進一步摸索和讓三條崙海水浴場重振計畫，有更清晰與具體的合作模式與方向。

2. 當地地理條件與發展願景

而風箏衝浪作為三條崙海水浴場發展重點項目之一，也與當地的地理條件緊密相連。以地理位置來看，位於臺灣中部最西側，擁有強勁東北季風風力與廣域海面。對於水上運動玩家而言，其水面狀態相較平穩且流速穩定（如圖十四）。

現今臺灣水上活動據點，由南至北環島一圈分別有墾丁、大灣、後壁湖、楓港、大鵬灣（現為青洲濱海遊憩區）、旗津、七仔灣。再到往北至臺南黃金海岸、漁光島、將軍南堤、馬沙溝、北門、雙村、好美里、三條崙海水浴場、大安海水浴場，繼續向北則有竹南、白沙灣、面向龜山島之宜蘭頭屯，以及九棚沙漠等。縱望臺灣水上活動據點分布，三條崙座落於臺灣西半部中介點。



圖十四 三條崙海水浴場海岸景

（姜宥甄於 2026 年 1 月 8 日拍攝）

訪談中 A 教練之發展願景，偏向結合水域安全教育、風箏衝浪運動推廣等，提升臺灣民眾對海的認知與教育。

因為我覺得水安全教育的話其實臺灣很缺這個東西呀，因為大家都對海太陌生了...他也沒有一個很專業的專門專精在這方面的長期性去舉辦這些活動的場所跟人員。（取自 2026/01/08 A 教練訪談逐字稿）

尚在三條崙經營產業時，A 教練同時也積極與相關單位合作與辦理，自 2020 年暑假開始，A 教練協助將海域安全教育與海上運動體驗導入當地校園課程。同時舉辦教師研習營、海洋教育者培訓以及跨縣市交流實施計畫等，希望能讓三條崙海水浴場成為臺灣中西部具指標性的示範場域。最後在 2021 年與雲林縣政府一起舉辦了第一屆風箏衝浪公開賽。在實際教學中，A 教練與學員的人力配比相較高，也有成功引導不怕水人士接觸水，以及辦理相關推廣活動反

響良好等經驗。A教練本身對於三條崙海水浴場的海洋教育前景非常看好，也大力稱讚本身的地理環境，甚至坦言若是同樣在其他地區推動風箏衝浪的話，則不見得有持續推動計畫的動力。

我本來是想說聯合大學來推動那邊的水域安全教育跟水上一些活動的考證照考試了。大家現在你考個潛水教練證啊，什麼證啊，都要跑到臺中日月潭哪，墾丁那邊去考證照嘛。那你如果那個在那邊弄起來是在那邊就可以考證照了。我是以這方面，透過考證照可以增召集一些大學生來做志工，參與這個活動。（取自 2026/01/08 A 教練訪談逐字稿）

此外，教練認為還可以持續引進國際風箏衝浪好手與賽事、提升臺灣在這一塊的能見度以及帶動區域發展，甚至曾聯絡過世界頂級水準玩家，期望他們來訪臺灣。並建構風箏衝浪執照考證制度，與國際風箏衝浪組織規範同軌並行，將能有效推廣風箏衝浪行業在臺灣。同時使三條崙成為中部著名水域遊憩場所，推動考證、增加學生工作機會等。

在由內政部國家公園署主辦、中華民國綠野生態保育協會執行之，推動海岸使用者參與及向海路徑制度規劃總結報告書中，其歷年海岸補助計畫成果與示範意義中便可見，在民國 113 年時雲林縣政府計畫處便提過「走進三條崙」計畫。其中成果便包含成立推動環境教育工作小組、辦理環境教育成果展等，期望能以縣府作為資源整合平台，整合各部會、大學 USR 及洄游青年創生資源，以環境教育帶動偏鄉窳陋社區之產業活化（中華民國綠野生態保育協會 2025：附錄 5-11）。

在整體訪談中，A 教練明確表示希望能透過風箏衝浪運動的教學課程推廣，以消弭臺灣人對海的陌生，進而提升水域安全教育常識。而在教學過程中遇到各式各樣的人事物與變化，也給予 A 教練從事教學的動力與樂趣。風箏衝浪學校的成立，不僅是 A 教練的理念和夢想，也源於對風箏衝浪本身最原始的熱愛。而雲林縣在經營三條崙海水浴場活化轉型的路徑上，也持續協助興辦像是國際風箏衝浪學校、或是風箏衝浪公開賽等。教練 A 認為在綜合水域安全教育或觀光資源的發展前景等因素考量，若政府想維持與繼續推動風箏衝浪，那風箏衝浪發展路程上仍需經費或其他資源的持續挹注。執行端也須與各方人士共同制定建設方向，方能吻合雲林縣政府欲將三條崙打造成為全臺風箏衝浪的推動基地之願景。

第二位 B 教練則向我們具體描述更多當地人與海水浴場的連結。B 教練本身接觸風箏衝浪至今約十幾年，回到三條崙經營風箏衝浪的契機便是受 A 教練之邀請。而 B 教練也向我們分享，以前自己若過節訪回三條崙時，也會到海水浴場遊憩。

我們透過和 B 教練訪談與研究，發現海水浴場的發展始末與當代社會風氣與科技發展密不可分。在 1960、1970 年代臺灣邁向工業化後、經濟快速成長，國民所得也大幅提升。隨著收入的增加，民眾也開始逐漸重視休閒娛樂的重要性（黑皮 2024）。臺灣約於 1980 至 1990 年代時，許多大型公私營遊樂園遍地開花，1990 年代初時，當時政府提出了國家建設六年計畫，加強公共建設以及修訂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等，也將建造大型遊樂園納入施政方向之一（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2004：3）。也因此民眾參與戶外

活動與休閒娛樂的意願高漲，像是救國團常舉辦山訓與海訓等夏令營隊。進入千禧世代，隨著個人電腦的量產與普及，科技日新月異影響了人們閒暇時選擇從事的活動類型。休閒習慣的改變使得這些遊樂場數量與訪客人流相比供過於求，導致許多場館倒閉或結束營業。⁶

此外，一座公營的海水浴場，身受著官僚運作與科層組織的雙重枷鎖。B 教練指出，在海水浴場漸次沒落的同時，可能導致政府不再特別專注於場地經營、關注度下降。在無人經營管理的前提下，當地環境則逐漸髒亂與混亂，管制的危險可能使政府難以承擔輿論壓力與責任。此外對於場地管理與限制相關法條，在應用上無法一應俱全涵括到現實中會出現的所有情況。當條例的制定與規定的執行分屬不同單位負責時，身為執行層面的公部門可能傾向於最保守的做法，從而限制民眾進出戶外遊憩場域。

政府會變成一個比較消極的作法，不是小心，是消極的做法。所以在那一段時間，各個不管杉林溪、海邊全部都插一個牌子，危險水域禁止下水。那個不是規勸，那個是避責。（取自 2026/01/08 B 教練訪談逐字稿）

對於場域的管理與限制，訪談中我們與報導人嘗以從管理單位角度來看，戶外場地一方面難以完全杜絕因人員擅闖而發生安全問題，同時公務人員在管理戶外場域時，可能傾向採取「保守」、「管控」或「防禦性」的態度，這主要源於法規責任、安全風險規避及行政責任的考量。從戶外運動者的角度而言，當法令與規章制度等未能及時隨

⁶ 此段之敘述時境係由與 B 教練訪談中描述所得，並搜尋當代社會規劃方向與目標等相關資料後，從中檢視公共建設、戶外活動與時代發展之間的關係。

著時代變化而更新和適應時，則將限制了場所更多的發展可能。

隨著訪談進行，我們也辨認出戶外場地與社會變遷的關聯性。以 B 教練作為戶外運動從事者的角度來看，數十載過後的二十一世紀，當代社會對於健康與閒逸活動的關注上升，風氣逐漸轉為注重健康、休閒、戶外活動。因此，不管是民眾抑或政府機關，對於閒置設施的活化再造也新增了別樣的想法與關注度。

而 B 教練也很強調產業上的合作發展。以風箏衝浪教學形式來看，一名教練一次所教學的學員不宜超過五位，且因體力消耗與設備使用的限制關係，多以接待少人數小團體為主，且其學習成效不是短期就能看見、需一定時間訓練。這也成為風箏衝浪發展的限制因素，教練等人力培養成本高，且因客流量短期內尚未穩定，無法常態駐點。在風險高、人力成本高、安全性需求高等交織影響之下，多方資源的挹注更成為風箏衝浪是否能作為重點發展項目的關鍵因素之一。

像是完全開發的墾丁，就是幾十年來都持續以旅遊和觀光（為目標）升級，已經是完全開發的，地方的配套都非常的完善。你像國外旅客都都會慕名而來去做一些休閒活動。（取自 2026/01/08 B 教練訪談逐字稿）

教練以墾丁作為著名地方觀光景點為例，墾丁相較完善的觀光規劃與硬體配套，三條崙仍缺乏能使觀光客延長駐足的完整流程。除了海水浴場本身之外，還需要拓展其他的開發，例如進行完水上活動的食宿安排等。如此一來才能為三條崙帶來更穩定且長期的觀光客流量，更具體地回饋當地、重現生機。

綜上所述，兩位從事風箏衝浪的主要經營者，皆具體指出三條崙海水浴場尚待更詳盡且完備的規劃，否則枉費三條崙這塊具備良好地理條件與環境優勢的寶地。此外，基於風箏衝浪本身成本高昂與在運動項目中尚屬較冷門之性質，經營業者期望公部門能持續與風箏衝浪合作，並繼續支持產業發展，包括相關的周邊產業經營與推動。業者們皆期望能藉由與政府的合作，再提升風箏衝浪之能見度。

來訪者若到此，能馬上瞧見新穎且顯著的風箏衝浪教學教室，外牆上銜掛著寫有「雲林國際風箏衝浪學校」的標緻招牌（如圖十五）。在場域裡偶能碰見寫有與風、浪、海有關的俏皮標語，在在顯示三條崙海水浴場轉型的方向與願想。然而對於在海水浴場進行風箏衝浪的人們而言，海水浴場仍有許多改善空間。例如設備的搬運，B 教練有講在拒馬架起來後，搬運大型器材有所不便，但也能諒解鄉公所要架設拒馬，畢竟園區內的道路鋪設得很美麗，車子若駛進則容易壓壞路磚。



圖十五 寫著有趣口號的俏皮標語

（姜宥甄於 2026 年 1 月 15 日拍攝）

在本章中能看見三條崙海水浴場轉型計畫的進程與規劃，然而這塊場域上的行動者可不只這些群體。生活於三條崙的居民們是最直接使用與接觸海水浴場的集體，海水浴場除了存在於他們的童年記憶裡，也是實實在在與日常生活產生互動的。在下一章中，將從另一個視角出發，對於行政體系而言，海水浴場可能是尚未開發完成、可能是持續發展的希望；但對於在三條崙的居民而言，卻成了一個特殊的場所。何謂特殊？這些變化或停滯，又將如何影響各個行動者，對他們的生活造成怎樣的影響？

四、地方的理解

（一）「什麼都沒有」

除了行政者如何執行、推動海水浴場的重振計畫外，本研究在田野期間，還專注於尋找另一種聲音——居民們如何理解海水浴場。就如第二章所呈現，海水浴場的歷史和介紹，基本上都集中在如何建立、由誰發起。但具體居民如何在這裡進行活動、怎樣了解海水浴場則少有述及。為了補全這方面的理解，本研究於田野調查期間，經常在早上或下午時在海水浴場進行觀察。希望能藉由隨機訪問前來於此的民眾，來接觸到第一手在地居民的看法。

在初次到達海水浴場，海灘上最令人在意的，除了破碎的「海上游泳池」，便是沙灘上放置的些許漁具和幾艘臨時停靠的漁船（如圖十六、圖十七）。當下看到時，我（林士譽）就認為相當有意思。對於當下海水浴場的介紹，很少有提及到一旁的三條崙漁港。但具體空間分布上，二者卻是緊鄰於一塊。我（林士譽）就曾好奇：「這兩個地方離的這麼近，會不會有點關係？」而實際看到漁具和漁船之後，或許就說明著漁港和海水浴場間可能有著一定的關聯性，但這個關聯性具體來講究竟為何？



圖十六 停泊在海面上的竹筏船
(姜宥甄於 2026 年 1 月 7 日拍攝)



圖十七 堤防上捕蟹用具
(姜宥甄於 2026 年 1 月 7 日拍攝)

幸運的是，在來到海水浴場的第二天，我們就遇到最重要的報導人吳阿姨（化名）。吳阿姨在我們來到海水浴場的第一天就有遇到。當時吳阿姨正和從沙灘到岸上的兩位伯伯聊天，而我們在海水浴場的媽祖亭附近進行觀察。當第二日我們早上再出現時，吳阿姨主動詢問我們為何會來到這裡，我們由此成功和吳阿姨有了聯絡。其實依據我的（林士譽）的預期，能和當地居民這麼快的連上線，是有點驚喜的。或許也是因為在冬日的嚴寒和強風中，有兩個突然出現的年輕人太過顯眼，也太過奇怪。吳阿姨才會忍不住前來詢問我們。但第一次的交談並未能深入，因吳阿姨有事要離開，她只是例行的前來帶狗狗啊嗚散步，馬上就要走了。此次僅知曉了吳阿姨也是位漁民，因那幾天海況不佳，所以沒辦法出海。她跟我們說每天都會來運動，可能明後天有時間的話能再聊聊。不過後續兩天於早上七點到九點間，都未遇到吳阿姨，我們僅能進行其他行程。這段時間無疑是令人焦慮的，好不容易有機會接觸到那些較少被聽到的聲音，卻好像馬上就斷開了聯繫。幸好自第五天之後，我們成功和吳阿姨再次相遇，並且和其丈夫一起進行了幾次半結構式的談話。

和吳阿姨與其丈夫（下文稱為吳叔叔）的談話中，最令我們印象深刻的，是他們說：「這裡什麼都沒有」。當再次談及為何前來海水浴場時，我們說是為了進行研究時，吳叔叔和吳阿姨都有著相同的反應：「為什麼要來這裡？這裡什麼都沒有！」。「這裡什麼都沒有？但海水浴場明明有著良好的設施、名聞遐邇的活動，還有仍在發展的風箏衝浪產業，怎麼會是什麼都沒有？」我（林士譽）在聽到時，心中不免這樣想。見我們遲疑了一會，吳叔叔接著補充，

說我們應該要去下崙或是往北一點，那裡才有人養蚵，才有研究的意義。吳阿姨也提及或是去下崙的魚市場，那邊很熱鬧、有人會賣現抓的魚，去那裡才有意思。這段對談讓我們更加疑惑：「為什麼要聚焦在養蚵或漁業？為什麼這些才是有研究價值的？而海水浴場和在上面活動的大家，卻成了「什麼都沒有」的一環？但你們還在這啊？難道你們在做的事情，真的不能作為研究的題材？沒有探討的意義嗎？」

和吳叔叔、吳阿姨幾次談話後，我們才得知兩位皆是曾經的蚵農。當談及養蚵時，他們都會提到那一望無際的蚵田，就在海水浴場外面的沙洲上（如圖十八），放眼所及皆是。但隨後就是沙洲的變遷和消逝，少了沙洲的屏障，海水容易沖走蚵棚，自然無法在進行養蚵事業。「這（指養蚵業）就是看天吃飯的」，吳叔叔對我們說道。吳叔叔進一步補充，曾經依靠外傘頂洲的蚵棚在失去沙洲屏蔽之後，都被海流沖走。而過往在沙洲內海的蚵棚，也在少了沙洲隔絕海流帶來的沙後，皆被海沙掩埋。吳叔叔用手對著近海，比著說到：「（內海的蚵棚）都被沙蓋過去了。」當過往的養蚵事業，因外傘頂洲消失無法進行後，吳阿姨和吳叔叔會來到海水浴場，就是進行一些運動、遛狗，或是在風浪過大時，將船臨時停靠在海水浴場外圍的沙灘。這裡獨特的有風無浪特性，再加上漲退潮水位差距明顯，讓海水浴場成為絕佳的臨停處。「這些船（指著遠處沙灘的兩艘船）都是在風浪太大時進來躲一下，這裡很方便。」，吳阿姨和我們解釋道。

在接觸過更多報導人後，每每談及海水浴場，在地年長的居民都會提及三條崙漁港的風光。就如蘇俊豪議員所

說的，三條崙漁港和海水浴場之間是相互輝映。而蘇國瓏議員述及更詳細的情節，海水浴場和三條崙漁港相扣而成的商圈，既吸引了漁民前來、於閒暇時進行娛樂，也帶動了周邊商圈發展。這裡需要特別提及的是，養蚵和捕魚報導人不會特別區分，有時會用漁業來概括二者。但在三條崙漁港淤積、工業興起後，人口開始外遷去尋找更好的就業機會。不僅是漁港、海水浴場，整個三條崙地區似乎都逐漸沉寂了下來。

「什麼都沒有」，或許所指的不一定是海水浴場，而是更大的指涉整個三條崙區域。對於吳叔叔這些從小就經歷過三條崙鼎盛時期的居民而言，「有」指的是那段漁港繁華的日子，海水浴場成為漁民閒暇時娛樂的場所，有名的烏倉寮也是在海水浴場的保安林中搭建。而在觸目可及的地方，則曾有著密密麻麻的蚵棚，隔著內海與海水浴場相望。這對於漁業為生活重心的三條崙來說，是最光輝的時代。我們有幸訪談一位老蚵農，他是位樸實的人，談話的重點多半聚焦在如何過日子。當談及養蚵時，他還是會忍不住自豪的表示：「這裡（指三條崙）的蚵是全臺灣最好的。」但沙洲變遷的情形，老蚵農還是被迫要前往金湖、口湖這些地方進行養蚵。「海水浴場？現在因為工作不會去了。」當我們（姜宥甄）問及現在是否會去海水浴場時，老蚵農如此回答。

海水浴場過往的輝煌，從眾多報導人訪談中梳理。能發現三條崙漁港、捕魚、養蚵的興盛緊密相連。對於那段日子，許多人都以此自豪。曾有報導人在和我們介紹海水浴場的歷史時，多次驕傲的說：「當時的海水浴場收入（指公共設施之營業收入）可是省排名第二欸！」將海水浴場

和漁港直接分成兩個單位來談論，會讓這段以漁業生活為核心的關係網絡變得隱晦。就如第三章第三節中，B 教練所提及的，海水浴場當下的整體設備還不算成熟，對於想要發展觀光業的視角來討論，「怎麼留住人」仍是一個問題。要有與之相對的周邊商業，形成一整個配套行程，才能稱之為完善。



圖十八 海面上矗立之蚵架
(姜宥甄於 2026 年 1 月 7 日拍攝)

踏入四湖鄉，整個漁村氛圍是十分明顯的。串蚵殼、漁港、捕魚業、漁市、船長...在三條崙也是如此。每次吳阿姨和吳叔叔出海前，都會特地前來海水浴場媽祖亭拜拜，這種依海而生的信仰，也側面反應了三條崙濃厚的漁村生活特色。海水浴場和三條崙漁港的繁榮是彼此相依的，雖

然一者是娛樂場所，另一則是工作的場域。不過兩者在眾多報導人的回憶中，卻共構成三條崙過往最令人懷念的光景，在「回憶」中，海水浴場和漁港不應只以行政系統中的分類來認識。在民國六、七十年代，海水浴場在鄉公所、省議會的改造與建設下，沙灘作為娛樂場所，和以碼頭、船塢為主的漁港呈現截然不同的形象。就「三條崙」這個關係網而言，沙洲、漁港、漁業、潮汐、海水浴場、漁夫緊密的聯繫在一起。當海洋環境變遷帶走沙洲後，海水逐漸把沙子帶入漁港和海水浴場，淤積的發生將整個關係網改變。

葉守禮（2021）提及在現代經濟學的視角中，經常將傳統農業視為不具前景的產業，不符合經濟產效，因此國家政策更希望去「改造」農業。而依我們的觀點，在行政劃分中同樣劃分為一級產業的傳統漁業，也同樣不受政府待見。不論是蘇國瓏議員曾找不到合作夥伴推動計畫，或是蘇俊豪議員對於海堤更新的提議未被縣府採納「因為 CP 值不夠」（取自 2026/01/09 蘇俊豪議員訪談逐字稿），能見到雲林縣政府曾對於將大筆經費投入三條崙沿海或漁港建設與更新，以求改善漁業環境，是有所遲疑的。在民國 106 年之後，雲嘉南風管處和行政院願意投入經費協助改善海水浴場，主要原因在於全球對海洋觀光態度的改變。自從 2010 年以來，各國對於海洋觀光的重視逐漸增加，世界觀光組織（UNWTO）認為海洋休閒產業將是未來重要的發展方向。（KORSHIP 2019）。同時，在 2014 年 UNWTO 主辦的第五屆生態旅遊大會中（5th WORLD ECOTOURISM CONFERENCE）也提及，海洋和沿海生態旅遊不僅不會過度開發海洋資源，還能夠為許多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小島嶼

國家，提供絕佳的出口機會（**export opportunities**）（UNWTO 2014）。為了因應此潮流，臺灣自 2017 年起，就陸續推動許多推廣海洋觀光的計畫（黃妍榛 2020：2）。海水浴場在此潮流下，終於有機會再次吸引到中央政府的目光。時代經常在研究中以背景的方式呈現，但就如同海水浴場一樣，時代應該也要視作一種具有影響力的角色。海洋觀光的興起使得已然沒落的海水浴場再次發生改變，整個與海水浴場有關的關係網，也隨之再次發生變化。海水浴場因此迎來「重生」，卻也是「新生」。

自日治時代以降，直到民國 70 年代，主管權雖然都由地方鄉公所掌握，但經營權時常交予民間公司處理。而此次的重振計畫，將由鄉公所進行主導。復振的團隊既要使海水浴場足夠吸引觀光客，又要嘗試擺脫海水浴場沒落帶來的影響。而對於久居於此的居民而言，又是如何看待新生的海水浴場與在此舉辦的各種活動？除了活動之外，那些非特殊時日的日常生活，又將如何讓居民們重新定位這塊新生之地，與海水浴場再次建構新的關係？



圖十九 三條崙村落沿路旁的蚵堆，可見海業與民生緊密之關聯。

（姜宥甄於 2026 年 1 月 7 日拍攝）

（二）活動與日常的交織

海水浴場自民國 106 年啟動的重振計畫，在上下半年各有一項重大的活動。上半年為音樂季、下半年國際風箏衝浪賽。這兩項也是海水浴場最為引人注目的時刻，網路上有關海水浴場的新聞也大多集中於報導這兩大活動。但對於三條崙的居民來說，這些活動究竟是意味著什麼？在我們接觸的幾位報導人中，居民對於音樂季和衝浪賽的回覆較少。老蚵農因為要到金湖、口湖巡視蚵棚，基本不會參與。而另一位對於海水浴場過往非常驕傲的吳伯伯，在提到衝浪賽的時候，他也只是簡單的帶過：「對衝浪沒這麼熟」，吳伯伯如是回答我們。當問及是否會經常去海水浴場遊樂一下時，吳伯伯也是回答「基本上不會，只會在有外地親朋好友來時，帶他們去那裡走走」。吳叔叔同樣只是說著音樂季的時候很熱鬧，車子來了很多；但自己基本不會來參加，只是來看一下而已。反應較為熱烈的是吳阿姨，

她去年有來參與音樂季，啊嗚甚至在活動上大受其他遊客的喜愛，成為整個村最出名的狗狗（如圖二十）。不過對於衝浪賽，吳阿姨也是沒什麼反應。

這呈現一種有趣的情況，雲西海洋音樂季對於雲林縣政府而言，是近年在雲林海線的極力推廣、運營的重要活動。依據蘇國瓏議員分享，這幾年雲林縣政府在音樂季投入的資金非常的多，包含目前進沙灘上進行的整治工作。由此可見，縣府對於音樂季的前景十分看好。但對於我們所接觸的報導人來說，大家對於音樂季的反應比較少，大多人都說不習慣像音樂季這樣的活動。我們認為，雖然音樂季和衝浪賽的口碑都很好，但這些活動和整個三條崙的脈絡並不相連。由於 B 教練所述的海水浴場的設備環境仍不成熟，從另一個視角來看，對於三條崙與居住於此的居民來講，漁業所建構出的時間和社會網絡已然十分紮實。縱使因為諸多變故，導致現下不管捕魚或是養蚵業，都有點艱難，卻不能抹除漁業生活所打造的種種關係，這些關係仍然具有張力，在影響著三條崙的居民。就臺灣的海洋發展而言，海洋觀光和傳統漁業間有著一定的衝突，主要討論的問題集中在漁業權區域劃分的問題上（許文聖 2005）。然而，依據在田野中報導人與我們的分享，衝突除了使用權的問題外，更為重要的是觀光和漁業在活動辦理時程，以及在出海路線上的摩擦。

首先，三條崙漁港和海水浴場緊緊相鄰，當要進行海上活動時，漁船和遊艇等設施在出海路線上必然有所衝突。其次，對於漁民們而言，出海的時機是需要依照潮水來決定。吳阿姨就和我們分享過，他們除了看氣象局的潮汐報表外，也需要依照農曆來自己算漲退潮的時間，有時凌晨

就要準備，有時則是到下午才能出海。但從觀光或公共活動辦理角度來看，是需要一環接著一環的；海上休閒活動舉辦需要將時間安排好，並盡量減少意外。當出海時間和海上活動時間相撞時，兩者就可能發生摩擦。再者，對於魚群而言，他們會盡量避開人潮，這就會影響到近海捕魚的情況。能看到對於觀光來說，是希望能維持一個平靜、可控的安全環境，因此海面的情況需要盡可能地被控制。對於漁民而言，卻是需要依照海水活動來調整，是非常多變、不可捉摸的。

事實上，雖然不管是誰提及海水浴場都會講到過去的繁華，但講到現下的情況時，就截然不同。像蘇國瓏議員這些推動計畫的人，在講完過往的歷史後，就覺得海水浴場不該繼續沉寂。過去的風華既是他們推動計畫的原因，同時也是尋找夥伴的理由，既然過往都能如此繁華，為何現在就做不到？對於久居於此的居民們來說，與過往對比，卻是三條崙人口外移、漁港淤積的現狀。大家或多或少對於政府有些意見，尤其過往常來海水浴場的漁民們，經常提及政府對於漁民的漠視、無法解決漁港淤積的問題。對不少居民而言，三條崙的繁華應該是建立在漁業興盛之上，海水浴場藉此一起發達。而今政府耗費鉅資在他們不熟悉的音樂季上，卻對漁港淤積束手無策，大家的心中難免感到不平衡。

那在這些不時舉辦的活動外，日常時居民都會在海水浴場做什麼？在述及居民的行動前，本文需要再簡單提及第三章第二節所提到，有關管先生等基層公務人員如何塑造海水浴場的整體環境。對於管先生而言，一個「乾淨、整潔、明亮」的環境能帶給到來的人一種舒適的感覺。同

時，管先生也認為「親水公園」是一個更適合現代的經營模式，不具備特定目的、能全天候開放。C先生也講到，蘇國瓏議員的團隊在當初決定海水浴場重振後功能的方向時，他們就希望海水浴場能成為多功能的場所，而不只是只能前來玩水的海水浴場。

單從環境整潔而言，從在當地十幾天所收集到的分享來看，乾淨與整齊幾乎是從議員到教練，再到居民都稱讚的點。但接下來事情就有點複雜。在此要先提及本文的侷限之處，因在冬季時進行田野，受到強勁海風和酷寒的影響，較不適合前來活動。在田野期間，我們也受行程的影響，在下午天氣較暖和時無法前往。因此無法完整地構築出海水浴場長期的居民活動樣貌，只能依靠報導人的口述經驗的分享。對於吳阿姨和吳叔叔來講，他們每天都會來這裡散步，卻沒說為什麼專門選這裡。不過吳阿姨有分享她為什麼會帶啊嗚來。吳阿姨說海水浴場過去小木屋很多，很陰森，她其實也不太敢來。但復振拆除這些小木屋後，整體又打掃的乾淨明亮。吳阿姨覺得這樣的環境很安全，沒其他野生動物，所以才帶啊嗚前來。另一個點就是因為海水浴場「沒人」，因此能讓啊嗚自己在附近小跑一會再叫牠回來。我們曾隨機訪問到一位外地來的先生，他是從雲林縣莿桐鄉來的，同樣也是來遛狗。這位先生就有提到特意來海水浴場，一是因為順路，能從交流道直接下來。另一個原因則是因為這裡「沒什麼人」。他的狗狗不喜歡牽繩，去一般的開放性公園會有其他狗狗、可能增生安全問題，但這裡基本沒有，所以他能放心的進行無牽繩遛狗（如圖二十一）。



圖二十 明星柴犬啊嗚

（姜宥甄於 2026 年 1 月 15 日拍攝）



圖二十一 從荊桐鄉來海水浴場散步的柯基犬

（姜宥甄於 2026 年 1 月 10 日拍攝）

在《四湖鄉志》、《四湖揚帆》等紀錄中，當提及海水浴場的塑造時，鄉公所之類的行政機構都會成為主角。但在基礎建設的研究中，除了掌握行政權力的政府部門外，

海水、沙灘、植物和居民都能成為塑造者之一。我們在田野期間，曾遇到一位海釣的大哥，他和我們說，雖然在民國 80 年代後海水浴場就逐漸沒落，到了 90 年代甚至有點荒廢，卻成了絕佳的海釣場所。因為淤積和海堤的緣故，海水浴場反而有點像小型的海灣，在漲潮時魚群進來淺水區，就十分好捕撈，再加上沒有太多下水的遊客，不容易驚擾到魚群。在我們的認知中，荒廢就等於沒人使用，但海釣大哥的話提醒了我們，荒廢只是一種視角、一種關係網絡的一部份。對於釣客來說，觀光客眼中的荒廢地反而成為了寶地。在名為荒廢的時間和空間中，海水浴場仍然持續行動著，海水將河沙持續帶來，造成了淤積，卻也形成良好的潮間帶，提供釣客良好的海釣環境，也給漁民一個不錯的避風港。

在陸地上，防風林缺乏整理，開始恣意生長，小木屋開始腐敗，對於遊客和管理單位而言，園區變的陰暗又危險。對於需要遷徙的候鳥而言，卻是一個良好的休息環境，這也吸引了賞鳥協會前來。海水浴場裡面的每位行動者，不管是否被記錄下來，都在實質影響著何為海水浴場。同樣的，海水浴場也會影響這些行動者，但海水浴場在鄉公所和風管處的角色，從荒廢變為需要治理時，植物們的生長受到抑制、淤積要被清理，這影響了釣客和賞鳥的人。乾淨、明亮、整潔的環境更面向來運動、旅遊、觀光的民眾，不過由於荒廢印象以及周邊環境的影響，仍然較少的民眾前來。但如此乾淨、開闊又少人的環境，卻吸引了喜歡遛狗的民眾前來。

每一次的基礎建設計畫，甚至是不作為，都是重新調配整個關係網絡，在這過程中，每個參與的行動者都有著

影響力（Jensen & Morita 2015）。無論是風箏衝浪或是音樂季，二者皆是引人注目的大活動，但缺少這些更貼近日常的連結，我們就無法得知一段關係網如何連結而成。繁華雖然總是令人懷念，但荒廢未必就是死寂，仍然有著無數行動者煥發生機。海水浴場的關係網，在時代、人群、動物、土地、風、海水的參與下不斷變化著。而今的重振計畫，也再次的開啟一場實驗，試圖去創造一個新的世界。

（三）重新開始

沙崙湖文史關懷協會的吳雙喜理事長和我們談論過往的三條崙時，他同樣是稱讚三條崙的繁華。對於那段歲月，他甚至豎起大拇指直稱漁港的昌盛。又是如何帶動周邊的商店街，海水浴場同樣受惠。當提及現在的海水浴場，他則是略感遺憾的表示，雖然有著良好的建設，卻「看不出原來的樣子」。那些專屬於三條崙的過往，撿木麻黃葉、烏倉寮、養蚵等等的過往，現在都看不到。回顧蘇國瓏議員為何要重振海水浴場，甚至不惜和縣府爭論、費心費力尋找夥伴，其童年的回憶無疑是最為重要的。但在翻新的海水浴場內，卻無法看到為何海水浴場會受到三條崙，乃至整個中部地區，五六年級生的難忘回憶。縱使因為時代的翻攪、海水的沖刷，海水浴場已然距離那段最鼎盛的時間十分遙遠。但這段歷史和背後一則又一則的故事，難道就要像是那被掩埋在沙洲下的蚵棚一般沉默，最終隨海流逐漸消逝嗎？

在 2026 年 5 月 27 日文化田野實習與方法的成果發表會上，與會的鄉親有和我們再分享有關海水浴場過去的故事。對於他們來說，海水浴場確實是一個重要的地方，承載了

許多回憶。當討論到為什麼海水浴場縱使復振了，有了良好的人類行動環境，但仍然人煙稀少時，鄉親提到了，雖然現在已經重新開始整理，但過去荒廢的影響太大了，比較年輕的居民可能小時候只知道海水浴場已然荒廢。而參與過輝煌歷史的民眾，也因十幾年的荒廢，逐漸不願前往。

我們認為對於基礎建設計劃而言，經常忽略了在地民眾的情感因素。大家雖然期望海水浴場重新復振，但由於荒廢的影響，鄉親們仍需要持續觀望，不敢投入太多情感。雖然上一章提及，荒廢並不同於死寂，仍然有許多行動者在「荒廢」中行動。不過從地方誌的記錄上來說，記載經常在沒落前就戛然而止，甚至如第二章提到的，觀光局自 2000 年開始，就停止對海水浴場來客人數的統計。對於許多因故無法在前來的民眾而言，海水浴場就真的成為了一處空白之地，靜靜地與歷史沉埋在歲月的沙塵之下。

「什麼都沒有」這句話在我（林士馨）寫作當下，回想起來反而是痛心的，這句話不僅是在說海水浴場，也是在概述三條崙。在產業發展的敘述中，經常描述農漁產業是不具備生產力的（葉守禮 2021）。對於三條崙的居民來說，卻是段實打實的美好時代。然而故鄉在時代變遷中，竟逐漸成為不具前景、不值得投資的存在。就像蘇俊豪議員所述，很多時候，或許「老」的事物有時候只是缺乏一個機會。這項重振計畫對於海水浴場而言，既是重生，也是重新開始。一方面，需要把海水浴場從荒廢的沉寂中挖起，使其再次成為在地居民願意經常前往的地方；另一方面，也需要將其改造成符合觀光發展的場域。

在過往的記憶和未來的展望間，如何將荒廢的空白填補起來，仍有賴行政者需要持續去探索。藉由上述的內容，

也能看到民眾們從來都不僅僅是被動的選擇，而是具備著與行政力一樣的塑造力，能夠決定海水浴場該如何使用，又如是何塑造海水浴場的印象。最後，也不能忽略那些一直存在，卻也不斷變化的行動者們，海水、風、植物等等，他們阻撓的變因，也是天賜的機緣。潮水的漲退倒了觀光客的興致，卻也沖刷出美麗的沙灘。強勁的海風，使得傳統的莊稼難以生長，卻也帶來了風箏衝浪這充滿發展潛力與代表新興娛樂的運動。這場重振計畫使得海水浴場再次出現在人們的視野，縱使沒落帶來了創傷。但重新開始，從來也不嫌太晚。相信在未來海水浴場會有更多的行動者加入其中，繼續書寫這段故事，就如寫下這篇田野研究的我們一般。

五、綜合討論與總結

藉由此次田野觀察，我們接觸到海水浴場的多重面向。從行政的參與者來看，對於蘇國瓏議員而言，這是充滿童年回憶的地方。議員不希望在環境的變遷下海水浴場持續閒置。所以在擔任鄉長時啟動海水浴場的復振計畫，積極的尋找各方的幫助和支援。而蘇俊豪議員除了同樣有著故鄉情懷外，更希望能將海水浴場納入雲林海線觀光的一環。經由海線觀光景點的串聯，能帶動整個雲林縣海線的經濟發展。而從公園營運管理的角度來看，將場地維護的乾淨、明亮又舒適，也能更體現出觀光景點的願景，讓海水浴場成為一個整年度都適合前來拜訪的場域。而對於教練們而言，海水浴場是一個不可多得的珍貴地點，非常適合進行風箏衝浪。但教練們也能看出，三條崙舊有的產業結構，和水上運動產業不太適合，仍需要相關人員和產業的培養。

對於在地居民而言，海水浴場則成為一個比較特殊的存在。因為產業環境的變遷，許多從事捕魚或養蚵的居民較難抽空前往。不過海水浴場的乾淨環境，還是受到居民的一致好評。就田野觀察時期總結來看，海水浴場寬敞又較少人的特性，反而能夠吸引到一些愛好者前往，就比如第四章第二節所述的遛狗、賞鳥與垂釣等。從在地居民的感受來看，也能看出和各行政層級希望有所出入。居民們都認可活動舉辦的很熱鬧，但因為對風箏衝浪的不熟悉，所以較少參與。又因為工作因素的影響，很多漁民需要前往箔子寮漁港，或是更南的金湖、口湖。平日經常要往返兩地，較少有閒暇時間前往。這種情況又和基層公務員所期待的，希望能成為全天都有人的地方相反。

海水浴場和各種不同位置的人之間，有著許多不同面向的互動和認知，卻都指向同一個個體。海水浴場的多重性，源自於它和各個行動者的交織而成的豐富生命史。不論是興起或沒落，都呈現海水浴場和人、時空、環境的相互影響，造就了一段不斷纏繞的生命史。而自 2017 年開始啟動的復振計劃，再次讓原有的關係網產生變動。行政者對海水浴場充滿著各種期待，並持續付出努力來達成理念。而在地居民還需要持續摸索在新的海水浴場中適合怎樣的活動。同樣的，因為音樂季、風箏衝浪等活動而前來的民眾，也將和海水浴場產生新的互動。在這段興起到沒落到復振的過程，海水浴場都因與每個人不同的生命經歷，產生不同的故事。而在復振之後，新的故事還在加入。海水浴場豐富的生命脈絡，將繼續鋪寫下去。

六、參考文獻

中文書籍、期刊論文與網路資料等。

于立平、張光宗

- 2006 〈漂流之島 | 外傘頂洲的變遷〉。「我們的島」，
<https://ourisland.pts.org.tw/content/1214>，2006 年 1
月 2 日上線。

中華民國綠野生態保育協會

- 2025 《112 年度在地連結實作計畫－推動海岸使用者參與及向海致敬制度規劃總結報告書》。檔案編號
112A-058。「內政部國家公園署」，
[https://www.nps.gov.tw/uploads/files/06752f8812180
b1a4bd33d4597dc02f23df4c0015b1e83b79b1163d1b
c5fb27e.pdf](https://www.nps.gov.tw/uploads/files/06752f8812180b1a4bd33d4597dc02f23df4c0015b1e83b79b1163d1bc5fb27e.pdf)，2025 年 1 月上線。

民聲日報斗六訊

- 1971a 〈三條崙海水浴場 將成立促進會〉。《民聲日報》
1971 年 1 月 1 日：第五版。
- 1971b 〈三條崙海水浴場 四湖鄉貸款興建 縣府撥款補助今夏完成〉。《民聲日報》1971 年 3 月 2 日：第五版。
- 1971c 〈三條崙海水浴場 民廳准予貸款 預定下月動工 明年夏天可開放〉。《民聲日報》1971 年 10 月 27 日：第五版。
- 1972a 〈三條崙海水浴場 勘查合格 九日開放〉。《民聲日報》1972 年 7 月 7 日：第五版。
- 1972b 〈三條崙海水浴場 今正式開放 不舉行任何儀式〉。《民聲日報》1972 年 7 月 9 日：第五版。

1972c 無有標題。《民聲日報》1972年7月11日：第五版。

1972d 〈三條崙濱海樂園 定元旦起開放 歡迎各界觀光〉。《民聲日報》1972年12月30日：第五版。

1973 〈三條崙海水浴場 勉強准其開放〉。《民聲日報》1973年6月8日：第五版。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2019 〈閒置公共設施成因研析與推動活化策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https://www.pcc.gov.tw/downloadFile?fpath=VXBsb2FkLzI5Ny9yZWxmaWxlLzc2OTMvNDY1MC83MTkwMWUxZiIiMWZjLTQ2ZjQtYmNiNi00YzZlMDZhNGFlZGlucGRm&sname=%E9%96%92%E7%BD%AE%E5%85%AC%E5%85%B1%E8%A8%AD%E6%96%BD%E6%88%90%E5%9B%A0%E7%A0%94%E6%9E%90%E5%8F%8A%E6%8E%A8%E5%8B%95%E6%B4%BB%E5%8C%96%E7%AD%96%E7%95%A5.pdf>。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2004 《台灣經濟發展新藍圖》：3。編號：(93)047.106。
「國家發展委員會」，
<https://ws.nd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hZG1pbmlzdHJhdG9yLzEwL3JlbGZpbGUvNjE0MC8xMjgwNi8wMDA4NzcyLnBkZg%3D%3D&n=5Y%2Bw54Gj57aT5r%2Bf55m85bGV5paw6JeN5ZyWLnBkZg%3D%3D&icon=.pdf>。

吳顯童

2005 《四湖揚帆》。雲林：雲林縣文化局。

林建志、王莉晴

- 2025 〈潮起潮落之際：箔子寮漁港的停滯與韌性〉。刊於《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113 學年度文化田野實習與方法成果專輯》。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編：75-102。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林昱宏

- 2025 〈雲林四湖三條崙海水浴場啟動景觀改善〉。「鄉親新聞網」，<https://shiangchin.com/article/21/1843>，2025 年 12 月 26 日上線。

林務局

- 2022 〈向海致敬中部大會師-三條崙保安林守護任務〉。「中央社 CNA」，<https://www.cna.com.tw/postwrite/chi/324241>，2022 年 9 月 19 日上線。

姜宜菁

- 2020 〈國際 IKO 認證 雲林三條崙國際風箏衝浪新景點〉。「中央通訊社」，<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2012240235.aspx>，2020 年 12 月 24 日上線。

海洋委員會

- 2022 〈「向海致敬」2 年有成〉。「行政院」，<https://www.ey.gov.tw/Page/5A8A0CB5B41DA11E/59c44b20-6232-4e5b-8290-32d3a4e9ed4e>，2022 年 6 月 16 日上線。
- 2024 〈海洋產業發展元年 海洋地方創生大步走〉。「行政院」，<https://www.oac.gov.tw/ch/home.jsp?id=661&parentp>

ath=0,660&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2403280002，2024 年 3 月 28 日上線。

張淑妍

- 2014 《主要河川與麥寮工業港對外傘頂洲地形變遷之影響特性研究》。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曹校章

- 2014 〈臺灣海洋運動觀光發展現況與展望〉。《運動管理》23：18-36。

許文聖

- 2005 〈我國海洋觀光遊憩發展現況與展望〉。《研考雙月刊》29(4)：56-64。

陳柳均

- 2000 《高科技的想像：新竹科學園區與地方發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雲林縣三條崙海洋教育中心

- 無日期 〈認識中心〉。「雲林縣三條崙海洋教育中心 YunLin SanTiaoLun Marine Education Center」，
<https://yunlinxiansantiaolunhaiyangjiaoyuzhongxin.webnode.page/%e7%b5%84%e7%b9%94%e6%9e%b6%e6%a7%8b/>。

雲林縣政府計畫處

- 2023 〈海洋地方創生工作坊 & 地方政府推動海洋事務 112 年成果發表〉。「雲林縣政府計畫處」，
<https://www.oac.gov.tw/filedownload?file=searesource/202503271744370.pdf&filedisplay=%E9%9B%B2%E6%9E%97%E7%B8%A3%E6%94%BF%E5%BA>

%9C_%E9%A2%A8%E7%AE%8F%E6%B0%B4%E8%B5%B7%EF%BC%8C%E8%A1%9D%E4%B8%8D%E4%B8%80%E6%A8%A3%E7%9A%84%E9%9B%B2%E6%9E%97-%E4%B8%89%E6%A2%9D%E5%B4%99%E6%B5%B7%E6%B0%B4%E6%B5%B4%E5%A0%B4%E9%A2%A8%E8%8F%AF%E5%86%8D%E7%8F%B
E.pdf&flag=doc，2024 年 3 月 28 日上線。

- 2024 〈向海找機會！無痕海洋創生三條崙 雲林風箏衝浪賽事衝出一座謬思女神「金獎」〉。「雲林縣政府縣府新聞」，
https://www.yunlin.gov.tw/News_Content.aspx?n=1244&s=450314，2024 年 4 月 15 日上線。

雲林縣新聞處－公共關係科

- 2025 〈從農業大縣到智慧城鄉 張麗善縣長分享雲林數位轉型與永續治理成果〉。「雲林縣政府縣府新聞」，
https://www.yunlin.gov.tw/News_Content.aspx?n=1244&sms=9662&s=570056，2025 年 11 月 5 日上線。

雲嘉南風景管理處

- 2024 〈外傘頂洲沙灘〉。「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https://www.swcoast-nsa.gov.tw/zh-tw/attraction/details/309>。

黃妍榛

- 2020 〈從海洋休閒旅遊發展的角度探討台灣的海洋政策與法規〉。《屏東科大體育學刊》12：1-13。

黃舜廷

- 2010 〈雲林縣四湖鄉三條崙海水浴場〉。刊於《海市蜃樓 II：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姚瑞中、Lost Society Document 編著，頁 533-541。臺北：田園城市文化。

黑皮

- 2024 〈臺灣迪士尼的「緣起緣滅」：一則流傳已久的都市傳說，反映 90 年代眾人的夢想與限制〉。「故事」，<https://storystudio.tw/article/gushi/Disney-in-Taiwan>，2024 年 11 月 25 日上線。

楊清閔

- 2023 〈臺灣牡蠣主要產區養殖戶面臨之困境與問題點研究〉。《水產研究》31(2)：45-62。

經濟部水利署

- 2020 《雲林縣一級海岸防護計畫（核定本）》。內政部海岸管理審議會 2019 年 12 月 27 日第 30 次會議審議通過，行政院 2020 年 5 月 25 日院臺建字第 1090087145 號函核定。「中華民國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https://www.nlma.gov.tw/uploads/files/9f600b1d273d6c48cc431786a5d6e3df.pdf>。

葉士弘

- 2021 〈《體壇》破天荒！第一屆雲林縣風箏衝浪公開賽雲林登場〉。「WOWSight」，
<https://wowsight.tw/2021/11/20/%E3%80%8A%E9%AB%94%E5%A3%87%E3%80%8B%E7%A0%B4%E5%A4%A9%E8%8D%92%E7%AC%AC%E4%B8%80%E5%B1%86%E9%9B%B2%E6%9E%97%E7%B8%A3%E9%A2%A8%>

E7%AE%8F%E8%A1%9D%E6%B5%AA%E5%85
%AC%E9%96%8B%E8%B3%BD%E9%9B%B2/，
2021 年 11 月 20 日上線。

葉守禮

2021 〈台灣小農經濟的現代變遷（1960–2015）：一個
關於東勢水果經濟的個案研究〉。《人間思想》：
26，171-210。

監察院審計部

無日期 〈雲林縣四湖鄉三條崙海水浴場活化進度落後，
審計機關促請改善〉。「審計部全球資訊網」，
<https://www.audit.gov.tw/app/index.php?Action=downloadfile&file=WVhSMFIXTm9Mekl2Y0hSaFh6UXlPVE15WHpRMU56VTRPRGxmTIRZeE9UZ3VjR1Jt&fname=DGGGROTSSS4041HHLOLKWWXTZSPKWTRLPKJCXSICCCIDXW40A0TSSTUWLO1050OKNOTSZXZXDG0454TXFCOKTSHGECB035NKLPJDXWA0YS20VSRKUSSSWXFC20XWA5K KDGA0NOZWRKB4352050B0ZWWSVXQLQP21POECEGLL34A445USIC44UXYX441050GD1430MOLK20ROMKXSUTUX04B0UWYWLKLL20PO01QKSSLKLP00WW043024DCTWZTIGWSJCWWXSA1GDPOTSFCB4PP54OOOKUSTSRKTSIDLPDG2405XTST14OK00USFGRLHG>，檢視資料於 2025
年 11 月 22 日。

劉正義總編輯

1999 《雲林縣文化休閒導覽手冊》。雲林：雲林縣文化
中心。

劉曜華主編

2006 《四湖鄉志》。雲林：雲林縣四湖鄉公所。

蔡岳暉

2022 〈從專案管理論我國海洋運動政策〉。《興大體育學刊》(21)：97-111。

蔡卓霖

2024 〈原野的呼聲——四湖鄉再生能源地景的論述與想像〉。刊於《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112 學年度文化田野實習與方法成果專輯》。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編：47-112。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蘇國瓏

2016 《四湖鄉情》。四湖鄉刊 3。雲林：雲林縣四湖鄉公所。

2017 《四湖鄉情》。四湖鄉刊 4。雲林：雲林縣四湖鄉公所。

2018 《四湖鄉情》。四湖鄉刊 5。雲林：雲林縣四湖鄉公所。

2019 《四湖鄉情》。四湖鄉刊 6。雲林：雲林縣四湖鄉公所。

2020 《四湖鄉情》。四湖鄉刊 7。雲林：雲林縣四湖鄉公所。

2021 《四湖鄉情》。四湖鄉刊 8。雲林：雲林縣四湖鄉公所。

2022 《四湖鄉情》。四湖鄉刊 9。雲林：雲林縣四湖鄉公所。

蘇穎欣

- 2025 〈紙上漁港：箔子寮漁港未竟的發展藍圖〉。刊於《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113 學年度文化田野實習與方法成果專輯》。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編：15-74。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英文書籍、期刊論文與網路資料等。

Akrich, M., & Latour, B.

- 1992 A Summary of a Convenient Vocabulary for the Semiotic of Human and Nonhuman Assemblies. In W. E. Bijker & J. Law (Eds.), *Shaping Technology / Building Society: Studies in Sociotechnical Change*. Pp. 259-264.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Ballestero, Andrea

- 2019 The Underground as Infrastructure? Water, Figure/Ground Reversals, and Dissolution in Sardinal. In *Infrastructure, Environment and Life in the Anthropocene*. K. Hetherington, ed. Pp. 17-44.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Callon, Michel

- 2011 Actor Network Theory. Activity Theory: Psychological. Pp. 62-66. 10.1016/B0-08-043076-7/03168-5.

Carse, Ashley

- 2012 Nature as Infrastructure: Making and Managing the Panama Canal Watershed.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42(4):539-563.
- 2016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What Can 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 Learn from

Infrastructure Studies (and Vice Versa)? In A E
Engagement Blog, Vol. 2020.

Jensen, Casper Bruun, and Atsuro Morita

- 2015 Infrastructures as Ontological Experiments. *Engaging Science* 1:81-87.

KORSHIP

- 2019 MARINE TOURISM AND LEISURE INDUSTRY:
DOMESTIC AND OVERSEAS CASE STUDY.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s://www.korship.co.kr/bbs/board.php?bo_table=magazine_new&wr_id=185&page=311, accessed
March 29.

Krause, Franz

- 2017a Is a River “Infrastructure”? Thinking about Timber
Transport on the Kemi River in Finnish Lapland. In
Voic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F. Krause, ed, Vol. 3.
Cologne Global South Studies Center.
- 2017b Rhythms of wet and dry: Temporalising the land-
water nexus. *Geoforum*:1-8.
- 2017c Towards an Amphibious Anthropology of Delta Life.
Human Ecology 45(3):403-408.
- 2018a Delta Methods: Reflections on Searching
Hydrosocial Lifeworlds. Volume 7. Cologn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nd Social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Cologne.
- 2018b Trapping Trappers, and Other Challenges of
Ethnographic Fieldwork in the Mackenzie Delta. In

Delta methods: Reflections on searching hydrosocial lifeworlds. F. Krause, ed. Kölner Arbeitspapiere zur Ethnologie. Cologn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nd Social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Cologne.

Krause, Franz, Tijo Salverda, Sinah Kloß, Nina Schneider, and Oliver Tappe

2017 Social Water. In *Voic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Vol. 2017/3. Cologne: Global South Studies Center.

Larkin, Brian

2013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Infrastructur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2(1): 327-343

Latour, Bruno

1991[2012] 余曉嵐、林文源、許全義譯。《我們從未現代過》(*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臺灣：群學出版社。

1992 Where Are the Missing Masses? The Sociology of a Few Mundane Artifacts. In W. E. Bijker & J. Law (Eds.), *Shaping Technology/Building Society: Studies in Sociotechnical Change*. Pp. 225-258.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Morita, Atsuro

2017 Multispecies Infrastructure: Infrastructural Inversion and Involutionary Entanglements in the Chao Phraya Delta, Thailand. *Ethnos: Includes the Theme Issue: Infrastructures* 82(4):738-757.

OECD

2025 OECD Infrastructure Topic Page. Electronic document, Infrastructure | OECD.

Ramakrishnan, Kavita, Kathleen O'Reilly, and Jessica Budds

2020 Between decay and repair: Embodied experiences of infrastructure's materialit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E Nature and Space* 4(3): 1-5.

Schweitzer, Peter, Olga Povoroznyuk, and Sigrid Schiesser

2017 Beyond Wilderness: 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Infrastructure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in the Russian North. *The Polar Journal* 7(1):58-85.

Simone, AbdouMalik

2004 People as Infrastructure: Intersecting Fragments in Johannesburg. *Public Culture* 16(3):407-429.

Steinberg, Philip, and Kimberley Peters

2015 Wet Ontologies, Fluid Spaces: Giving Depth to Volume through Oceanic Thinking.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33(2):247-264.

Thomas Botterill-James 、 Luke A. Yates 、 Jessie C. Buettel 、 Barry W. Brook

2016 Natural Infrastructures: Sediment, Science, and the Future of Southeast Louisiana. In *A E Engagement Blog*, Vol. 2020.

UNWTO

2014 5th WORLD ECOTOURISM CONFERENCE
Marine and Coastal Ecotourism: Oceans of
Uncertainties, Waves of Opportunities.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s://www.wec2013philippines.com/>,
accessed March 29.

van der Veen, Marijke

- 2014 The Materiality of Plants: Plant-people
Entanglements. *World Archaeology: Debates in World
Archaeology* 46(5):799-812.

World Bank

- 2025 World Bank Infrastructure Topic Page.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s://data.worldbank.org/topic/infrastructure>.

Zeiderman, Austin

- 2019 Low Tide: Submerged Humanism in a Colombian
Port. In *Infrastructure, Environment and Life in the
Anthropocene*. K. Hetherington, ed. Pp. 171-192.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生成式 AI 輔助寫作揭露聲明**

聲明日期：2026 年 6 月 20 日。

本文作者們於撰寫本作業之過程中，使用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輔助部分寫作程序，特依本課程「生成式 AI 使用規範」之要求，如實揭露如下：「本篇研究未使用過 AI 協作工具。」

本聲明由作者自行填寫並確認，所載資訊均屬實。

主題四：日常政治與數位連結



作為家人：看見雲林高齡村落女性村長實務中的性別處境

王昱婷 臺灣大學人類學系三年級¹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灣鄉村的女性村長執行村務的日常狀況與性別處境。在臺灣，過往關於女性參政的研究多聚焦高層、都市女性政治人物，而鮮少討論基層、鄉村女性的參政情形，本研究期望填補此女性參政研究之缺漏。本研究的田野圍繞三位雲林縣四湖鄉的女性村長進行，首先探討女性村長如何進入基層政治，再分析女性村長日常的性別化勞動，包括村民服務、老人關懷、村莊維護與公共服務。研究發現，三位女性村長透過與前任男性村長的人際連帶，得到進入政治場域的機會。在選上村長後，女性村長自身的性別想像交織著村民對村長的期待，結合田野地高齡化、人口外流的脈絡，使得女性村長在村務執行與村民服務中，皆融入了大量情緒勞動與私領域勞動。本研究基於過往的研究缺口，呈現了女性村長的處境，並進一步以性別期待結合情緒勞動、照護勞動等理論概念，分析

¹ 本文為 2026 臺灣大學人類系文化田野實習課程之課程成果報告。特別感謝黃郁茜老師一年以來的悉心指導與帶領，感謝佳秀、穎欣助教總是耐心並給予我許多鼓勵與建議。誠摯感謝三位報導人接受我的叨擾、也謝謝所有田野期間招待我們、給予我們協助的鄉親。謝謝這學期所有陪我寫作的好朋友們，讓我能夠繼續掙扎著寫下去。也感謝組員在田野期間的合作與協助。最後要感謝淦峻清前輩的評論意見，以及所有撥空閱讀並給予建議的好心人們！

女性村長「像是家人」的村民服務中，性別如何影響其勞動實踐。

關鍵詞：女性村長、性別化勞動、私領域勞動、基層女性參政

一、前言

都市人每天都躲在家裡，但阮遮逐工巡著巡著、規庄攞會巡透透。(田野錄音，藍鵲村長〔化名〕，2026/01/06)²

都市的里長也不會去檢查路燈，會自動有人去報啦。只有我們鄉下村長就要去巡視。(田野錄音，石虎村長〔化名〕，2026/01/09)

當我向村長們分享在都市生活中，相對更冷漠、居民與里長往往素不相識時，他們笑著點出了村長與里長在不同地區脈絡下的不同。身為從小在都市長大的青年，筆者對里長是誰、他們的工作有哪些可以說是一無所知。在進入田野之前，雖然知道《地方制度法》中有規範村里長的法定職務，卻不清楚在鄉村中的村長實務工作樣貌。

村長應該是比里長還難做啦，因為村務有時候會比較廣、我們鄉下這邊芝麻小事、疑難雜症都要會處理啦！(田野錄音，鮭魚村長〔化名〕，2026/01/12)

鮭魚村長的說法帶出本研究的發現，鄉村女性村長在日常村務中承擔大量不同種類的勞動，有許多是筆者在都市里長服務中從來沒看過的。

進入田野前在尋找可以訪談的報導人時，發現四湖的 21 位村長中，僅有 6 位女性。鮭魚村長曾提到他是接續父親投入選舉，這也讓筆者進一步好奇，在四湖的女性村長是如何能夠成功選上，他們是不是也需要解決村民的疑難雜症、又需要處理什麼樣的芝麻小事？

² 本文的地名、村莊名稱、宮廟名稱與受訪者姓名均化名處理。

進一步查詢相關研究發現，現有學術文獻針對「鄉村女性村長」的研究相對匱乏。Hao Yaguang（2023）雖提到村長的工作角色，卻缺乏性別視角的分析；而黃心彤（2023）對臺北市女性里長的觀察，或吳官展（2022）關於女性里長培訓的研究，雖然有引入性別觀點，但其研究背景多侷限於都市，仍缺乏對鄉村基層女性村長處境的細緻描繪。因此對於鄉村女性村長的實務處境研究依然有所不足。本研究想透過探討女性村長的日常工作內容、對村民的服務與互動如何？並進一步以性別視角與概念分析女性村長實務中的性別處境為和？

二、文獻回顧

（一）女性參政與區域現況

本文首先透過統計數據呈現臺灣女性參政之現況。2026 年立法委員女性比例為 41.6%（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2026），而在地方民意代表部分，直轄市議員女性比例為 39.8%，縣市議員為 36.0%，鄉鎮市民代表則為 26.2%（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2023）。值得注意的是，不分區立法委員與地方民代皆有設置婦女保障名額。由於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女性村長，其選舉制度為單一選區、無婦女保障名額，以下列出與村長相同選舉制度之統計。直轄市長女性比例為 16.7%，縣市長女性比例為 56.3%，鄉鎮市長女性比例為 21.2%，而村里長則為 19.2%。從統計數據可以發現，只有縣市長的女性比例過半，直轄市長、鄉鎮市長與村里長僅約兩成，村里長的女性比例則是不到 20%，顯示臺灣目前參政性別比依然失衡。

進一步檢視本研究田野地所在之雲林縣與四湖鄉的性別比例。雲林縣政府主計處 113 年的統計發現，雲林縣人口男性略多於女性，為 51.4：48.6，而勞動人口（年滿 15 歲民間人口）的男女比則是 58：42，勞動參與率為男性 67.7%，女性 50.1%，可見雲林縣男性勞動人口與有在工作的人口（勞動參與率）都相對女性更高（雲林縣政府主計處 2025）。

同樣是 113 年雲林縣針對參政人口的統計如下：縣議員中男女比為 30：13，女性約僅三成；鄉鎮市長男女比為 14：6，女性占三成，而在 111 年選舉時鄉鎮市長參選人男女比為 43：11，女性佔 20%（雲林縣政府主計處 2025）。繼續檢視基層參政性別狀況，雲林縣的村長當選人男女比為 333：57，女性佔 15%，比全國平均 19.2% 更少。而選舉時的村長參選人男女比則為 621：104，女性僅占 14%（雲林縣政府主計處 2025），可以發現雲林縣當選與參選的女性村長比例都比全國更低。

將視角縮小至田野地所在的四湖鄉，根據四湖鄉公所 113 年公布的統計數據，四湖鄉的男女比為 120.65：100，呈現明顯男多女少的人口結構（四湖鄉公所 2024）。而人口結構也反映在四湖鄉的政治參與上，在 111 年鄉長選舉中 5 名候選人皆為男性；而在鄉民代表候選人中，男性 17 人，女性僅 2 人。而在四湖鄉的 21 村中，村長男女比為 15：6（內政部全球資訊網 2025），女性占近三成，略多於全國 19.2% 的女性村里長與雲林縣 14% 的女性村長。

綜觀雲林縣到四湖鄉，都面臨人口外流與人口結構老化嚴重的現況。雲林縣統計發現，雲林縣總人口從 1970 年代末開始減少，直到 21 世紀初的 40 年間總人口減少了 11 萬（林倖妃 2020）。2025 年四湖鄉高齡人口比例高至

25.79%，已達到超高齡社會門檻，人口自然成長率則為負 6.808‰（雲林縣麥寮戶政事務所 2025）。自 104 年至 113 年十年間，老化指數（每 100 個幼年人口相對老年人口的比例）從 237.06% 增加到 384.89%，顯示該鄉結構性老化明顯（四湖鄉公所 2025）。又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2024）統計發現，2023 年雲林縣青年人口淨遷徙人數負成長，遷出率又以四湖鄉 41.30‰ 為最高。從這些統計數據可以發現，四湖面臨十分嚴重的人口外流與人口老化現象，也是造成女性村長村務中包含許多老人關懷的重要脈絡。

（二）女性參政研究

本段落將爬梳臺灣對女性參政狀況與困境的相關研究。女性參政困境主要來自傳統價值對女性的期待與政治場域中的陽剛環境。以下文獻討論會聚焦在本研究關注之鄉村女性村長可能面臨的狀況，包括政治場域中的陽剛特性、酒局與性騷擾，並進一步看到女性參政的能動性與其政治遺產的繼承。最後，本章將呈現村長職務與村民高度連結的特性，如何與「女性特質」產生關連，進而列出鄉村基層女性村長研究上的缺漏現況，作為本研究切入的基礎。

政治場域中的陽剛環境更加劇女性參政的困境。政治場域以權力作為核心、講求相互競爭，並涉及領導者特質與整體國家的資源分配，因此傾向吹捧、獎勵傳統陽剛特質，再加上現況下男性依然在政治場域中佔高比例，故形成了政治場域中陽剛特質主導的規範性主宰（曾聖惠 2022：141）。如同楊婉瑩在《這是愛女也是厭女》一書中，針對性別政治章節提出的女性參政的「雙重困境」，指的是選民會希望女性符合政治人物的陽剛果決特質，同時又希望女

性應該要有溫柔的陰柔特質，缺一都可能會被認為是不合格的政治人物而遭到輿論攻擊等（楊婉瑩 2019：172）。也因此，在四湖女性村長參政過程中，可能面臨在選民對「自身女性特質的期待」與對「陽剛政治人物期待」兩者中相互矛盾。

政治場域的陽剛環境不只限制女性政治人物的行為表現，更透過性騷擾與酒局應酬等實際的行動，製造對女性的敵意環境。曾聖惠訪談中央與地方的女性政治人物、幕僚與黨工後發現，許多女性從政人員都經歷過男性前輩以玩笑包裝的言語性騷擾、隨意對女性政治人物的外貌排名、將女性外貌作為吸引選民眼光的資本等。此外，應酬社交的酒局是政治工作中重要的一環，女性政治人物可能被有意排除而失去社交機會，即便能夠參與也常要被當作陪侍、性騷擾的對象，可見當今的政治場域對女性政治人物依然充滿敵意（曾聖惠 2022：138-150）。雖然該研究對象並未囊括到基層參政女性，不過在村長的分享中也有發現類似的現象。

接續討論女性參與政治的過程與動機。姜貞吟在重新爬梳女性參政圖像後發現，過去的研究會將女性參政簡化成依親、代親出征的依附者角色，但事實並非如此，許多女性政治人物參政有其能動性（agency）。女性參政者透過「併同形式」有意識的在親屬參政時參與並累積自身政治資本（姜貞吟 2009：281）。在黃心彤針對臺北市女性里長參選研究中提到，在他的個人經驗中有些里長是代親參選而投入政治，不過在受訪的女性里長中並沒有類似的狀況（黃心彤 2023：109）。本研究則是發現三位女性村長都在承接男性親友的政治基礎後當選。他們也在男性親友擔任

村長時大程度的投入村長的服務，因此在分析三位村長的參政過程中，應該更仔細檢視他們在過程中的能動性。

Hao 在對臺灣「草根政治」的研究中列出了村里長（village chief）法定與實際上的工作項目，他將其歸納為法令倡導者、民意反映者、溝通聯繫者、紛爭協調者、選舉動員者五大類。並透過在南投埔里的田野發現其具體工作內容，包括但不限於執行上級單位命令、做為聯絡橋樑反應民意、處理鄰里糾紛、協助政治工作、村莊基礎維護等等。也因為村里長的工作內容「包山包海」、與民眾生活深度連結，因此被 Hao 稱為全天候保姆（Hao 2023：176）。黃心彤（2023）訪談臺北市女性里長則發現，女性里長在執行里務時會展現更多「柔和、親近、細心、關懷」等傳統上視為女性氣質的陰性特質，並成為贏得民心的原因之一。筆者認為，Hao 提出村里長的「全天候保姆」工作性質，能夠與傳統女性被期待的照顧責任有所連結。筆者確實在田野訪談的過程中，看到村長執行村民服務時，曾有協助辦喪事等進入村民家中或私領域的服務，顯示村長職務角色與傳統女性特質在田野地中的可能連結。

雖然上文列出許多臺灣女性參政相關研究，不過針對女性村長的參政處境仍有所缺漏。首先，大部分針對女性參政狀況的研究對象是針對高層女性政治人物，例如曾聖惠（2022）訪談女性民代、候選人或黨工的性騷擾經驗；林宜瑾（2012）所做基層女性參政困境也只分析了議員層級的女性；姜貞吟（2009）討論女性參政動機的研究對象僅有女性立委。可見現有女性參政研究並沒有囊括到村里長等更基層的女性。其次，即便有少數針對臺灣村里長的研究，也不一定有針對女性的研究，如 Hao（2023）僅有提

及村長的角色卻沒有針對性別分析；又或是在黃心彤（2023）的臺北市女性里長研究、吳官展（2022）的女里長培訓相關研究中，雖有具性別觀點的女性里長研究，但仍然缺乏對鄉村女性村長處境的描繪，較難以將其研究結果與田野地相互對應。目前仍缺乏對最為基層的鄉村女性政治人物處境的相關研究，這也正是本研究期望補充現有缺口之處。

（三）分析概念

在分析田野中的研究發現時，需要透過性別化的視角分析女性村長的處境與其行動。性別規範（gender norms）作為不同性別行為在社會生活中的指引，人們被期待做出符合自己性別的行為（West & Zimmerman 1987：127）。而性別分工則源於此，基於對家務或勞動的規範性期待，認為男性與女性應該做特定的工作。例如邱俊凱、游美惠於澎湖七美研究已婚婦女的日常生活發現，因為村民對性別的價值觀是女性應該照顧家庭、男性應該外出賺錢，而該想像即實踐在當地「男人做海、女人做山」的性別分工上（邱俊凱、游美惠 2003：153）。本研究也發現女性村長與其男性親友在村務執行中有分工的狀況，故後續將以此概念進行分析。

情緒勞動與照顧勞動可以作為分析女性村長村務的重要概念。Hochschild 提出並定義的「情緒勞動」（Emotional labor），意指為符合社會規範，對個人感受進行的管理與展現（Hochschild 1979：551）。West & Zimmerman 則舉女性空服員為例，指出他們的情緒勞動正是展現傳統期待中「女性氣質」的行動（West & Zimmerman 1987：144）。藍

佩嘉在女性跨國的照護勞動研究中指出，家務與照顧勞動被視為女性的天性，因此由女性提供照護勞動總是被視為理所當然，且其價值會受到貶低（藍佩嘉 2008：27）。此外，姜貞吟在討論國家照顧政策的研究中，更說明了照護勞動與情緒勞動間的關係。他指出照顧是一份愛的勞動（a labor for love），同時具備勞動與情感兩者，更透過性別規範中對女性情感性任務的期待而將兩者與女性身分綁定（姜貞吟 2010：6-9）。上述性別規範與實際發生的性別分工、性別化勞動環環相扣，從三位女性村長的經驗中的確能看到他們與男性親友的性別分工。此外，參考 Hao 提出村里長「全天候保姆」角色的歸納，對應田野地中觀察女性村長如何回應村民的期待，進而理解三位村長實務上在執行村務時，對高齡村民的高度投入的情緒與照顧勞動。

另一方面，在女性村長進入村民的私領域提供服務後，自述自己像是家人的角色。在人類學親屬研究中，同樣有討論非血緣性親屬關係的相關概念作為分析。Schneider 在針對人類學親屬研究的批判中指出，過去人類學認為「親屬關係」是建立在血緣（生物性）連結之上，也因此人類學家發現無生物性關聯、卻有親屬社會功能的關係時，將其命名為「擬親屬」。擬親屬是模擬「真實親屬」並提供社會功能的關係，但該名稱的出現背後依然保有親屬必須有生物性關係的預設（Schneider 1984：163）。Schneider 進一步透過在雅浦島（Yap）的研究案例說明，當地人將彼此的付出視作維持親屬關係的關鍵，故親屬關係的核心在於「作為」（doing）而非生物性的存在（being）（Schneider 1984：33）。Carsten（2000）則提出「關聯性」（relatedness）的概念，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連結是來自日常不斷地互動與

實作。在馬來西亞蘭卡威（Langkawi）將共做共食的實踐視為透過食物共享同樣的血，進而「創造」出真實的親屬連結（Carsten 2000：18-19）。可見在人類學的發展過程中，親屬關係不再僅是由血緣所凝聚的社會關係，也可以是透過實踐創造出的親屬連結，該概念能夠與女性村長投入村民的私領域勞動相互對照。

三、村莊概況與女性村長介紹

本研究田野地位於雲林四湖鄉的三個村落，分別是鮭魚村、藍鵲村與石虎村，而在地理分區上，鮭魚村與藍鵲村共同屬於魚鵲厝的範圍，石虎村則是在魚鵲厝北邊的大貓厝聚落。

目前大約剩 300 個居民常住在藍鵲村，大多都是沒有工作的老人，在更年長的村民中女性比例較高，大多喪偶（田野筆記，藍鵲村長，2026/01/06）。鮭魚村則是不到 250 人，鮭魚村長更詳細的說明各年齡層的人數：「65 歲以上的 100 多個，80 以上的 30 多個，裡面女的比較多啦，三個老人裡面兩個是女的。我辦活動帶的婆婆媽媽 10 個裡面有 9 個是喪偶。」（田野錄音，鮭魚村長，2026/01/12）

石虎村則大約有 250 人，村民性別結構跟藍鵲村類似，都是女性更多：「我們這裡的女的大都喪偶，非常多都獨居，因為男人勞務工作比較多，也走得比較早。男女比用五分來算女生三男生二啦。」接著詢問村裡老人平時的活動：「他們有些會請工人種田、種蒜頭，行動力還好的就賴賴趖（luā-luā-sô），有的加減撿回收，或是聚在一起泡茶。」（田野錄音，石虎村長，2026/01/08）

簡單介紹村莊的狀況後，接著分別介紹三位村長。

（一）藍鵲村長

藍鵲村長是筆者去到田野後第一個訪談的對象，藍鵲村長一開始並沒有預料到訪綱洋洋灑灑列了一整面 A4 紙，不過還是一邊有耐心地回答問題，一邊熱情地不斷倒茶、問筆者要不要吃東西，親切的表現與臺灣人對阿媽（a-má）的想像十分吻合。

村長是嘉義人，約莫七旬，在結婚後才隨著丈夫來到藍鵲村生活，「我以前是在隔壁村木材行當會計，做了 20 幾年，做到我先生要選村長我才辭職，後來他當選我就做文書的事，他就負責割草、整理村內環境。我現在是第一屆啦，以前我老公做過兩屆。」（田野錄音，藍鵲村長，2026/01/06）

於是筆者好奇，在丈夫做村長時藍鵲村長會幫忙做什麼事。「我先生當選的頭幾年，農曆正月迎新春，想說年輕人都回來了就辦活動，但辦活動麻煩啦，要寫企劃書、拍照、蓋章、還要寫成果報告去要經費，沒要到就要自己出。」除了幫忙丈夫辦活動、處理行政之外，協助村民跑公所代辦文書「也都是我在處理的啦。」藍鵲村長語氣自然的說。此外，藍鵲村長在丈夫任期內也會一起服務村民，並在過程中開始與村民認識。村長提到疫情期間他也有幫忙接送老人去打疫苗：「他做村長但是我去載」。後來村長也補充，在接送打疫苗後跟村裡的阿桑（a-sáng）變比較熟。（田野錄音，藍鵲村長，2026/01/06）

藍鵲村長在先生當村長時，就開始投入村民服務中，也開始透過「勤走動」、文書處理、老人接送等服務建立與村民的情感連結與信任。相較起丈夫負責割草、衛生照護等體力活，藍鵲村長的服務項目屬於傳統歸類的女性勞動。

不僅是與丈夫的性別分工，更進一步來說，筆者認為藍鵲村長也透過「女性化勞動」加深與村民的感情。

進一步詢問藍鵲村長參選的契機，「他（丈夫）就說他年紀有了，81 了，所以叫我出來選看看哈哈。」、「就想說退休後閒閒（îng-îng）沒事做來服務村民。」（田野錄音，藍鵲村長，2026/01/06）在問到下屆要不要選時，村長說選上服務村民也開心、沒選上到處去旅遊也不錯。

藍鵲村長根據這屆選上的經驗告訴筆者，選舉重要的是服務：「有在服務都 ok 啦，.....，像我們去遠一點的地方都會跟村民說，怕他們找不到人」、「若是他們覺得我們服務好，就投給我們讓我們繼續做啊。」（田野錄音，藍鵲村長，2026/01/06）

雖然在筆者與一位村民聊天時，他認為村民們其實將藍鵲村長與丈夫視為「同一組」，選誰都一樣（田野筆記，村民，2026/01/11）。不過結合藍鵲村長所述「服務基礎」對選舉的重要性，筆者認為藍鵲村長身為女性卻能夠在沿海村落當選的關鍵，還是在於丈夫擔任村長八年期間的付出，他才有機會透過村長妻子的身分協助村民服務，進而奠定與村民的信任基礎並在這屆當選。

（二）鮭魚村長

鮭魚村長在過去兩屆的文化田野實習就對人類系的同學很照顧，也在不同主題上接受了同學們的很多訪談。因此在筆者與組員第一次跟老師去村長的檳榔攤拜訪時，他也是十分熱情的招呼我們。也因為有過去訪談的經驗，村長在受訪時，更是知無不言、詳盡的回答所有問題。

鮭魚村長是土生土長的魚鵲厝人，曾經因為結婚跟丈夫搬到嘉義，不過在懷孕後因為幫忙家裡的生意而回到魚鵲厝。在當上村長後，也依然經營家裡的生意與檳榔攤作為副業。

後來我爸爸出來競選村長後，因為他不識字我就幫他處理一些村務、資料文書之類的，他做 13 年我就幫他 13 年了

像以前我爸爸當村長的時候，中秋節、端午節的時候會辦大型的活動，都是我一手操辦的嘛。(田野錄音，鮭魚村長，2026/01/12)

可見鮭魚村長在還沒當村長時就對村務很熟悉，特別是文書與行政方面的工作也都是他幫父親處理。

鮭魚村長的父親第四次當選後不久因身體不好去世，但任期未過三分之二要重新補選，而鮭魚村長決定參選。

做久了就比較有感情，但登記的時候是我爸爸還在喪事，就會有一些話是認為，嫁出去的女兒不能回來選舉，我就說我為什麼不能選？我戶籍沒有遷出去我也有資格，我認為就是要改變這個狀況。

在訪談的中後段時，鮭魚村長也補充當初參選的動機。

我本來只是想說幫他做完，但就很多因為政治出來的閒言閒語，但他們講的也是事實阿，我本來就是嫁出去的女兒，但你要改變，讓那些老人家改觀，就不管你是什麼身份來選這個村長，回來做村長也做得很好。(田野錄音，鮭魚村長，2026/01/12)

鮭魚村長參選的動機並不僅僅是對村莊的熱忱與感情，也想要打破村莊傳統的性別觀念。

不過，村長也強調，服務基礎對於能否選上十分重要，

我爸爸是跟前任村長拚第三次才當選的，前面是做了八年的白工

我爸爸怎麼當選的，我都常常都會想說做這件事情不知道值不值得，老人家生病我們就載去看醫生、拿藥我們也會幫，疑難雜症、芝麻小事，只要他敢講，我們就幫他做。

上禮拜帶村民去拿藥，他說你們在做我們有在看，所以我們才會支持你。村長要走進村民的心他們才會投你。(田野錄音，鮭魚村長，2026/01/12)

過去將近 20 年鮭魚村長與其父親對村莊與村民的付出，可以說是打破部分村民對女性參政疑慮的關鍵，但鮭魚村長作為「嫁出去的女兒」得以開始村民服務，仍然仰賴父親作為村內人在村莊中的人際連結。父親在擔任村長時服務周全、與村民們關係緊密，也延續到鮭魚村長當選後。鮭魚村長開玩笑的告訴筆者：「我會說村民都被我爸爸寵壞了，我現在想改、他們要求我不想做的時候，他們就會說我爸爸以前就這樣，為什麼換你的時候就不做？」(田野錄音，鮭魚村長，2026/01/12)。這使得鮭魚村長在村民服務時，依然要維持先前父親包山包海的村民服務模式。

鮭魚村長在提到下一屆選舉時說，他想繼續服務村民是覺得，服務村民會被感謝，而有被需要的感覺，也覺得村民服務只有自己可以做到而產生成就感。當筆者分享觀察到村長的工作內容像是「處理家人的私事」時，鮭魚村長也表示贊同。

同時村長也對工作中的不愉快看得很開：「你做很多，但嫌棄的人也會有阿。我當作職場的工作不順利而已，也不會很當真，你就是自己要看得開，因為挺你的人關心你的也很多啦。」（田野錄音，鮭魚村長，2026/01/12）

（三）石虎村長

石虎村的石虎村長和我們約在早上訪談，進入村辦時石虎村長一邊招呼我們，一邊向我們介紹在村辦公室和村長聊天的村民阿姨和村民阿媽。石虎村長很熱情的招待我們，在訪談的過程中也總是笑笑的，讓人感覺很好親近。村長在大貓厝出生，不過五歲時全家就搬到東部直到他高職畢業。畢業後到北部求職並結婚生子，後來離婚、換工作，並在親戚的介紹下帶著孩子回到雲林合夥創業，不過並沒有維持很久。後來到一家養殖場求職，因緣際會下他的老闆去競選村長。「他選上之後除了去開會，其他服務的業務 100%都是我做的」石虎村長自豪地說，一旁的村民阿姨也補充：「雖然是當一屆，但是等於有兩屆的資歷，我們村長就是很熱情，又很好幫忙」。現在石虎村長一邊服務村民，也在村辦後有一塊空地養鵝當作副業。

就有熱心、想服務老人家阿，想說我們也認識幾個字，鄉下老人有需要幫忙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精神啦，我自己也有年紀大的爸媽在外地。從疫情的時候開始，我還沒當村長，但就想說他們去快打站，這邊都是獨居多啦，小孩子都在外地，我又怕他們去打完疫苗會有不適的症狀，所以我就帶他們去帶他們回來，就很多人認識我。後來也會做一些小服務，有時候出去幫他們看一些信、或者他們有一些問題就去，幫他們

拍照傳給他們的小孩什麼的。我覺得那是舉手之勞，也沒什麼。(田野錄音，石虎村長，2026/01/08)

村長輕鬆地說，更接著補充自己決定出來選的過程「那時候要登記的時候，我就跟他（前村長）說，我已經幫他跑四年了，我也很喜歡、很熱衷這個工作，我也比較會寫一些文件什麼的，村長讓我下去選」，村長也提到認為可以選上的原因：「那次是同額競選，但在他當村長的那四年我有奠定一個服務的基礎，村民有認同有被肯定」(田野錄音，石虎村長，2026/01/08)。

石虎村長認為先前服務建立的信任是選上的關鍵，不過在石虎村長的經歷中，男性親友僅是提供石虎村長服務村民的契機，較沒有提供石虎村長融入或認識村民的協助，筆者認為石虎村長能夠當選更多是靠自己的努力與付出。

村長在訪談的過程中多次提到當村長服務村民很開心，也告訴筆者是因為自己感情比較豐富，看到村民老了會不忍心、難過，所以看到有需要的人就會想幫忙。認為自己對於村民來說就像是家人：「因為我就像他們的女兒啊。我不會嫌老人家，年紀大還是囉嗦什麼，但他們做了讓我覺得不高興的事也是會教訓一下，老人家也要教育啊」(田野錄音，石虎村長，2026/01/08)。

對村民照顧卻也不會一味順著他們的意，而是會考慮對村民好的方式，更能看出村長與村民之間的深厚感情。

在最後一次拜訪石虎村長時，隔壁村的村長也剛好在村辦。在聊到女性村長參政的話題時，隔壁村村長說四湖比較「大男人主義」，想選的女生比較少，6個女性村長中只有一位村長是自己獨立參選，是長期在社區做服務、建立人脈與信任才選上。其他大部分是爸爸、丈夫先出來當

村長後才能夠選上（田野筆記，石虎村長，2026/01/14）。這也側面印證女性要在四湖選上村長並非易事，從三位村長的經歷能發現，女性在男性親友參政後才有機會漸漸參與村民服務，並得到村民的認同與選票。

（四）小結

前三個段落介紹完三位村長的基本資料與經歷，本章節的最後想呈現村長對自己性別身分的理解，並對女性村長的經歷做小結。

在被問到「身為女性村長有什麼優勢或劣勢」時，三位女性村長同樣都提到「女性比較細心」，不論是在對老人的關懷、與村民建立情感，或是作為「垃圾桶」傾聽村民的心事。

而三位村長也有分別提到性別差異的不同面向。藍鵲村長認為鄉內女性村長較少的原因「可能因為女生有家裡的事要忙、時間比較不能配合」（田野筆記，藍鵲村長，2026/01/14）。藍鵲村長有「女性會負責更多家務」的性別預設或許與村長負責所有家務的性別分工有關。

鮭魚村長則是補充女性的細心特質除了在關係建立上有利之外，「女生比較細心，在政治上會比男的想更多」。不過村長也講到性別在參政上的限制「我就不會跟他們一起喝酒，閒言閒語太嚴重了，人家會講說那個女的村長來跟我們喝酒這樣成何體統」（田野筆記，鮭魚村長，2026/01/12），進而會錯過一些爭取資源的機會。雖然鮭魚村長即使試圖跳脫「已婚女兒」的身分框架，但還是受到其他層面的性別規範束縛。

石虎村長則是對女性特質抱相對正面的看法，他認為女性除了細心之外，也更體貼、更有同理心，在對老人的關懷上更有利。另外，石虎村長也提到女性在人際交流上比較吃香，不過是基於「社會較同情弱者」、「會對女性比較包容」，在實際互動上相較「男性比較剛」女性更可以「姿態軟、身段軟」，故女性更不會被為難（田野筆記，石虎村長，2026/01/14）。

三位村長對性別特質的預設展現在他們實際的人際互動上，能夠貼合 Hochschild 提出情緒管理與掌控的情緒勞動概念（Hochschild 1979：551）。村長認為「女性更細心、貼心、身段軟」等柔性特質，可以視作社會對女性性別表現的規範，基於這些規範，村長們在與村民互動交流的過程中，不斷透過管理自己情緒（放軟身段）與展現情緒（安慰村民、關懷），實現社會的性別期待。

除了人際互動之外，在女性村長的參政過程也遭遇性別預設與偏見。首先是三位村長共同面臨的參與困境，村莊中「大男人主義」的風氣讓女性要透過男性親友才有進入公共服務的機會。甚至有兩位村長在進入公共服務後依然遵循著性別分工，負責處理想像上更柔性的文書、行政工作；女性負責的家務勞動將女性大多數的時間綁在私領域，不利於女性的公共參與；將「結婚的女性」視為外人也排除女性進入家鄉的公領域；在某些公共討論的場合，佔多數的男性透過「酒局」排除女性的加入。總結來說，從三位村長成為村長前的經歷，及他們對性別特質的看法，就可以略知四湖當地的性別規範，往下將繼續從村長執行村務的狀況分析其性別處境。

四、女性村長的人際互動

在了解女性村長進入政治場域的歷程後，本章節將呈現村長在日常村務的實踐中和「與村民互動」相關的部分。就如同 Hao 在南投埔里對村長的研究發現，村長的工作內容不但「包山包海」，更與民眾生活深度連結，被 Hao 稱為全天候保姆（Hao 2023：183）。從訪談的材料中也確實發現與 Hao 所提到的相同狀況：在村長的實際工作項目中，含有大量與村民互動或交流的內容、其服務內容更是涵蓋生活的方方面面。

本章將其分成四個段落，其一是村長工作中較固定的「村民服務」，包括行政庶務與文書代辦等等法定職務。其次是村長工作中十分重要的「老人關懷」，在雲林高齡村落的背景下，村民有高比例是需要投入關懷與照顧實作的獨居老人。第三是村長載老人關懷與行政服務之外與村民的「日常互動」，著重討論村長在固定的服務之外，如何與村民建立情感連結與互動。最後「公共服務」則是敘述村長在一般村務之外的事務與互動。石虎村長相較另外兩位村長多一些工作項目，包括在大貓宮的擔任公關組長的職務，以及額外協助其他機關、大學接洽舉辦活動。

在開始討論女性村長與村民的互動前，先釐清本章節的分析概念。「情緒勞動」指的是在社會規範之下對個人感受與行為的管理與掌控（Hochschild 1979：551）。故本文女性村長所受到的社會規範除了村民對村長職務的期待，更包含對「女性氣質」的規範。不論是村長們提到的女性會更細心、更貼心，或是社會將家務與照護勞動視為女性天職並貶低（藍佩嘉 2009：27）；姜貞吟更指出照顧作為「愛的勞動」更強化情緒勞動與照顧勞動的綁定。筆者認為村

長投入的情緒勞動與照顧勞動，其成因融合了女性村長內化的性別規範，以及村民對村長角色的期待。「女性期待」與「村長身分」兩種社會規範，深度交織並作用於村長執行村務時所付出的勞動之中。

（一）村民服務

村長的村民服務有些是村長的法定職責，有些是村長身分固定要有的人情往來，三位村長也有各自發展出不同的服務項目。首先，三位村長都共同提到的是村長的行政文書工作，包括簽蓋章文件、協助申請轉作金、保險證明、清寒證明、醫療補助等社會福利相關的申請作業，不過三位村長在執行的細節有所不同。「有些人不知道要準備什麼就會拜託村長代辦」（田野錄音，藍鵲村長，2026/01/06），藍鵲村長也提到自己從丈夫當村長時就在幫忙做了，不只簽蓋章更會接送、陪同村民去到公所申請（田野筆記，藍鵲村長，2026/01/14）。

石虎村長則是在訪談過程中，不斷撥接電話聯絡公所的課長、協助村民詢問轉作申請中土地所有權的問題，或是協助村民申請函補助的相關事項等等。筆者觀察到石虎村長總是十分迅速的處理所有事情，在收到村民問題的當下就會立即聯絡公所或是能提供協助的人（田野筆記，石虎村長，2026/01/08）。

除了行政文書工作之外，第二個共同提到的工作是基於村長身分衍伸出的人情往來。通常是在村內較大型的活動或婚喪喜慶，舉凡村內大小宮廟慶祝、儀式、學校運動會、消防局尾牙、村民的婚喪喜慶等等。村長作為村中最

基層的政治人物，不僅需要出席，也需要透過紅包、送禮、贊助酒水罐頭飲料等方式實質表示心意。

而石虎村長與鮭魚村長也有各自的村民服務。石虎村長在訪談中提到自己有建立村民的 LINE 群組「石虎資訊站」：

我們有一個 LINE 的群組，裡面有 100 多個人，不識字老人我們會叫小孩子加，看到可以跟爸爸媽媽講一下，這也算親子的互動啦。因為我們這邊風大，廣播可能聽不清楚會漏掉，就當作補強。我就會在上面 po 像是公所發有機肥、哪裡在清水溝、長青食堂什麼時候暫停這樣。用 LINE 是想說大家都有，連剛剛來那個阿媽 83 歲了，也會看你的頭像接聽跟撥打電話，所以頭像都不能換啦。(田野錄音，石虎村長，2026/01/08)

在訪談之中石虎村長兩三次說：「村長工作就連絡一些事情而已啦」(田野錄音，石虎村長，2026/01/08)。筆者確實觀察到石虎村長電話打不停，科技的進步讓交流變得更方便快捷、村長處理事情時可以更有效率，不過筆者認為這也是讓村民可以更容易向村長尋求協助，讓村長需要投入更多心力。

鮭魚村長也有村民的聯絡方式，雖然鮭魚村並沒有村民的大群組，不過鮭魚村長對村民的服務也沒有少。不論是「芝麻小事」或「疑難雜症」只要做得到就會「盡量滿足，但是不要做無理的要求」，可以看出鮭魚村長努力在服務村民的同時劃出自己的底線。不過鮭魚村長還是做了許多額外的村民服務，「我每年都會辦旅遊阿，使用者付費啦，我就規劃適合他們老人家的行程，就盡量減少走路。比較年輕的團有去過花東三日，老人家比較多就一天，他們住

不習慣。」鮭魚村長甚至會幫忙村民辦喪事：「他只要來拜託我，我就要從頭到尾」、「我處理過的喪事很多啦，我接手的、從頭到尾超過 5 個有」（田野錄音，鮭魚村長，2026/01/12）。

另外，鄰長在制度上是協助村長進行村民服務的角色。在初次拜訪石虎村長時，同樣在村辦公室作客的兩位女性是村民也是鄰長。石虎村長告訴筆者，石虎村的鄰長女性居多，「因為我們交情比較好、叫得動」（田野筆記，石虎村長，2026/01/11）。具體會請鄰長幫忙的事包含協助廣播、每年向村民收做平安（當地民間信仰的歲時祭儀之一）與神明遶境的錢，以及過年幫忙發放春聯。而在藍鵲村與鮭魚村的鄰長，則是協助發放公所的通知或選舉文件，「我們這裡的鄰長超輕鬆的，他們認為說村長都會做啊他們不需要做」鮭魚村長補充（田野錄音，鮭魚村長，2026/01/12）。比起鮭魚村與藍鵲村，石虎村的鄰長也更多是女性，石虎村長與鄰長間的交情更好、交辦更多事情給底下的鄰長，這也能夠與下一段落「村民互動」中，女性村長與女性村民關係更緊密的現象相互對照。

從三位村長的村民服務內容中，確實能夠看見大量性別化的情緒勞動。首先，行政文書工作內，村長協助村民申請文件、接送村民，要與村民交代該攜帶的證明、也需要噓寒問暖。從藍鵲村的村民服務內，也能看出村長與丈夫在村務中的性別分工。此外，村長們也有提到在協助申請補助時，有時會因為資格符合與否感到壓力與為難。最後，村長們需要出席各式活動，當然不可能丟下紅白包或禮物就轉頭走人，總是需要寒暄周旋一番，而如何在不同場合展現出合宜的模樣，也是村長們情緒勞動的實踐。

不僅如此，在與村民確認狀況、聯絡公所課長詢問轉作申請條件的一通通電話中，石虎村長要時刻管理自己的情緒、耐心回應村民並有禮地與課長交談。雖然石虎村長沒有提到建立群組後增加多少工作量，但可以從他的手機不斷響起的 LINE 通知與來電響鈴看出，在增加與村民的聯絡方式後，村長要處理的人際互動與村民透過訊息的要求變得更多、更頻繁。而鮭魚村長在接續父親的村長職後，也需要承擔父親對村民「照顧得太好」的結果。包括村長主動舉辦村民的旅遊行程，以及村長為了劃下底線而拒絕村民要求。村長擔任導遊時要時刻注意村民的狀況、需要思考如何委婉拒絕又不得罪人，更可能需要承擔村民對行程的抱怨等等，同樣是額外需付出的情緒管理與展演。

（二）老人關懷

本段聚焦討論村長有關村內「高齡者」關懷與照護的行為，而村長們在互動過程中不僅要投入情緒勞動、更摻入許多被認為是「家務事」的私領域照護勞動。如同前面村莊介紹所提及，在本研究的三個村落中，「80、90%是老人了啦」（田野錄音，石虎村長，2026/01/08）、「年輕人很少」，因此對高齡村民的服務也佔了村長工作的很大一部分。

三位村長都提到，村長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在村莊內走走逛逛、關心村民。「我平常就逛逛、看看老人，跟他們講一些話，看看他們的身體狀況這樣，我也有在幫老人送餐啦。」（田野錄音，藍鵲村長，2026/01/06）

我都是去泡茶啦，我知道老人家有在泡茶我就會去坐一坐，聊天，路上遇到老人家也會問一下他最近怎麼

樣這樣子，看一下獨居老人最重要啦，……，所以我們都要跑攤啦。（田野錄音，鮭魚村長，2026/01/12）

鮭魚村長開玩笑地說。更分享之前遇到從麥寮走失到魚鵲厝的老人：「我想說他怎麼坐在路邊，一問才知道他是從麥寮騎腳踏車來我們魚鵲厝，我就趕快把我媽媽載到診所交代給護士，再趕快回去把他帶到派出所，我們沒辦法說看到這些事情不管。」由此能看出鮭魚村長發自內心對老人家的關懷（田野錄音，鮭魚村長，2026/01/12）。

在問到村長的日常工作時，石虎村長這樣說：「剛剛打給我那個阿媽他也是獨居、小孩子在外地，有事情他就會跟我講，我也會 LINE 他兒子，都是做這些關懷老人的事情比較多啦。其他像燈亮路平水溝通，最基本的一定要的維護之外，其他投入比較多的，真的就是對老人家的照顧」（田野錄音，石虎村長，2026/01/08）。在和石虎村長去拜訪大貓宮的路上，遇到一位年老的村民在馬路的另一頭逆向騎車經過，石虎村長熱情地和他打招呼，結果村民阿伯直接把車停在路邊，並招呼石虎村長過去、拿出手機詢問他使用的問題，石虎村長也親切並駕輕就熟地幫阿伯處理。從一次平常的偶遇中就可以看出，融入石虎村長生活中瑣碎但不間斷的服務與情緒勞動（田野筆記，2026/01/14）。

除了日常關心村莊內的老人之外，三位村長配合政府的長照送餐政策，也有不同的做法。原先政府的規定是要在村莊設立據點讓村民集中去打飯菜，餐食則是從公所的中央廚房載送過去，政府也要求要有志工在據點幫忙打菜。

藍鵲村長皺著眉笑說：「這些老人行動不方便，連走到門口都有問題了。要去中央廚房拿菜我們不就還要去載菜

回來？阿打菜的志工要哪裡找？」於是藍鵲村長和隔壁的大貓宮配合。

大貓宮有在和政府配合啦，就包便當，我就每天去拿回來，挨家挨戶送給村民，還好啦 31 個而已，我這樣高興做，隔壁男村長是放在廟口，但我想一想每個人走路都比較不好，我乾脆都送一送。便當送去，我也都會看一看有沒有正常啊、跟他們聊兩句。

（田野錄音，藍鵲村長，2026/01/06）

訪談的隔天剛好有時間，於是問村長能不能跟他去送餐，藍鵲村長挨家挨戶和村民噓寒問暖，也順便向村民介紹筆者與組員。筆者也發現出來拿便當的村民是女性居多，村長說送餐對象確實大多是獨居喪偶的女性。

石虎村長同樣是從大貓宮拿便當，「因為我們這邊分布的比較散，老人不可能去據點吃飯嘛，也都不方便，我們就請一個司機送到七八個據點，請一個長輩幫忙顧，有人沒出來拿再告訴我，我要追蹤他去哪裡、看他確實安全。」石虎村長提到因為村莊範圍較大，自己沒辦法每天都巡，也會仰賴村民互相照應來減輕負擔（田野錄音，石虎村長，2026/01/08）。

而鮭魚村長在父親擔任村長時，也曾經辦過三年多據點式的長青食堂。

早年我們是有辦長青食堂啦，就想說他們自己煮一餐不方便，所以我們盛多一點，讓他們晚上帶回去再吃一餐。因為我還有其他的工作，我就想說給老人家吃好一點、多花一點沒關係。做到後面就有人覺得我賺太多錢，再加上我爸爸生病就收起來了。

後來我就改變我的作法，幫他們去跟日照中心或紅十字會申請居家服務可以幫你煮飯，中午煮多一點晚上也可以吃到新鮮的。.....。我就會去聯絡他們的子女、取得同意，我現在做了好幾十個人的申請人啊。(田野錄音，鮭魚村長，2026/01/12)

鮭魚村長不辦長青食堂後，認為到府煮餐食的方式對村民來說更好，因此選擇協助村民申請居家服務。不僅如此，村中有一對年輕村民夫妻也在經營自己長者關懷據點，因為鮭魚村長有相關經驗「他就找到我，我說好年輕人想做的話，我有空的話我會去幫你稍微煮一下」，但並不像鮭魚村長所說的只是「稍微煮一下」，「最主要大部分是我買菜啦，煮飯就我跟（鄉民）代表夫人一起」(田野錄音，鮭魚村長，2026/01/12)。雖然現在的關懷據點中只有幾個鮭魚村的村民，不過村長仍然願意投入性別化的煮飯工作，可見他對村民服務的熱心。

長青食堂、居家服務與送餐等服務，因為有政府或外部資源（大貓宮）的挹注，還是具有公領域的性質，但在女性村長對老人關懷的實作中，更多是以村長的身分直接進入村民的家務事中。這樣的現象不僅是高齡村落的脈絡下村長職務擴張，與村長的性別身分也息息相關。結合前述村長們所說女性「較細心、更能同理、關懷村民」、又或是「像家人、像女兒」，使得女性村長的身分轉變為類似「女性親屬」的角色，因此會更需要承擔高齡村民們私領域的勞動。三位村長都有提到，在前幾年新冠疫情期間，會協助接送村裡的老人去接種疫苗，帶村裡的老人就醫、拿藥也是鮭魚村長與石虎村長會做的事。

鮭魚村長也分享他和石虎村長做法的改變，「以前我們會自己載老人去醫院，但後來還是會怕在車上出事，就變成跟著救護車去醫院，若是小孩子在外地我們也是要幫忙簽一些文件。」（田野錄音，鮭魚村長，2026/01/12）可以看出女性村長代替了一部分身在外地家屬的照護勞動。

在石虎村長談到村莊老人照護時，提到自己提供服務還是有界線。村長說，自己以前常常幫忙那個村民，幫他跑腿、買東西，但後來村長認為該村民的言行踩到自己的底線，「我也不是一定要照單全收啊。像那一種個案只有一個，我就選擇放棄他，其他生病的啦、老的有需要幫忙，我都會義不容辭啊」（田野錄音，石虎村長，2026/01/08）。

在筆者問到有沒有比較印象深刻的事情時，石虎村長分享了這個故事。

之前有一個老人家生病，剛剛那個村民阿媽就打給我說他身體不舒服，我就過去看看。過去他就說他肚子痛，但不想叫救護車覺得會驚動大家，可是他這樣動不了要怎麼叫計程車？我就說，那我叫救護車不要鳴笛過來好不好？他就說好。上救護車之後，因為他是獨居老人，我就幫他把臉盆啊牙膏、牙刷、毛巾、衛生紙啊鋼杯、保溫杯、拖鞋那些，住院要用到的東西，基本的都幫他準備好。

村長不僅協助獨居村民收拾就醫用品，更協助保管證件與現金並轉交給素未謀面的家屬。村長接著告訴筆者，因為村民是獨居長者、身體也不好，平常比較不方便整理家中環境，在村民送醫過後，更親自打掃家中環境。

他去醫院之後，我去拿了好幾個大垃圾袋去幫他把不要的東西收一收、廚餘啊什麼分類啊把它裝一裝。我

就幫他把那兩三間整理好，他的衣服我幫他稍微摺起來、髒的跟乾淨的分開摺好，棉被摺好、棉被上面的那個髒髒的就幫他掃一掃。反正就都整個都幫他整理，地板也都拖過，就整個就是煥然一新了啦！我想說他出院回來，可以有一個舒服的居住環境，但後來他就沒回來了，他就去世了。(田野錄音，石虎村長，2026/01/09)

從原先對自己整理成果的成就感，到最後一句時，石虎村長語氣逐漸變得低落，更停頓了一下。「但就是我當村長」石虎村長輕笑了一聲，不過更像是為了要掩飾他的難過，但還是忍不住哽咽「看這些老人一天天老就覺得捨不得，就是把他們當成家人了。沒關係一下就好了」村長眼眶泛淚但卻還是不忘安撫慌張的筆者，勉強地笑了一下說「我們這裡就是老齡化了嘛，幾乎都是老人」(田野錄音，石虎村長，2026/01/09)。

從石虎村長講故事中流露的不捨，能看出石虎村長真的將村民視為自己的長輩。不論是實際上整理村民家的性別化家務勞動，更不能忽略的是在勞動中投入的情緒，包括對村民的失望、又或是面對村民離開與老化的難過。

在另外兩位村長的老人關懷實作中，也可以看到他們對村民不斷地投入關懷與龐大情緒勞動，更摻入了私領域中的照護勞動。而這些作為在傳統上是期待女性在私領域應承擔的勞動，也能扣回女性村長對「家人／女兒」角色的說法，看出女性村長對於自己進入村民的私領域勞動是有所覺察的。女性村長從原先應該在「公領域」的村長身分，因為結合了其女性性別身分的期待，因此在村民照顧上加入許多原屬私領域的情緒勞動與照護勞動。

（三）村民互動

本段落將呈現女性村長在上述兩章節提及的行政服務與老人關懷之外，在公領域以外如何與村民日常聯絡感情。換言之，本章節在說明女性村長在正式村長職務以外與村民的互動。進一步筆者將本章節的互動歸納為，女性村長基於性別期待與職務身分交織下自主投入的額外服務，其中包含了大量公領域以外的情緒勞動。此外，本章節與村民的聊天互動和上一段的老人關懷常常是同時進行，不過本章節更強調互動時，在交談與回應過程中女性村長投入的高度情緒勞動。

三位村長都有在訪談中提到身為女性會更細心，也能夠做為村民的情緒垃圾桶、聽村民講心事，不過在互動上也會因為性別身分而有所差異。

我覺得女性從政有一點是比較細心啦，村民比較會跟你講一些心裡的話，有時候村長很像垃圾桶。如果你村長是男的話，村民怎麼會來跟你講這些話？所以我說我這邊是「八卦站」，跟我親近比較好的人，他們家幾乎大小事我都知道，他們都會跟我抱怨跟我講。

不只是婆婆媽媽會講，男的（村民）也會，通常是我帶他去拿藥，或是我去他們家泡茶。（田野錄音，鮭魚村長，2026/01/12）

不過鮭魚村長接著補充到因為自身性別而產生的限制：「我會去他們家泡茶通常年齡就會比較大，八九十歲可以當我阿公的這一種，我才會進去他們家。如果你現在五十幾歲，我只會在外面打個招呼、閒聊幾句而已，畢竟男女有別，會有閒言閒語，就只會出來（外面）問一下最近怎

麼樣」(田野錄音，鮭魚村長，2026/01/12)。可見鮭魚村長明確知道自己女性身分的限制。

「大家以前就會常常來檳榔攤聊天」鮭魚村長除了會去到村民家串門子之外，村民們也常會到他經營的檳榔攤聊天，訪談同樣是在檳榔攤進行，訪談過程中有許多村民自在的來來去去，有空的村民就會坐在一旁聽我們講、偶爾一起聊上幾句(田野錄音，鮭魚村長，2026/01/12)。

石虎村長也有提到他認為女性更會聊天，也與鮭魚村長有類似的互動方式：「因為我單身嘛，我也會避免有閒言閒語，通常是夫妻檔或一群人來村辦才會邀約男性，其實男生也不太好意思要來(村辦)，他們也有自己的工作要做啦。會來(村辦)的都是固定比較好的幾個女的啦」(田野錄音，石虎村長，2026/01/09)。在後續幾次去村辦拜訪石虎村長時，遇到的村民或村長的客人確實大多是女性，也驗證了石虎村長的說法。

藍鵲村長則是分享他跟丈夫都會去找村民家聊天、串門子，「但是我老公不會在村民家坐太久了，坐一下聊兩句他就跑了，那也沒有意思。他都會罵我長舌婦，我說我也去也沒有說話，人家在說話我都安靜聽。」藍鵲村長接著補充：「待久比較有感情啦。你如果兩三天沒有去，他還會問說你怎麼那麼久都沒有來」(田野錄音，藍鵲村長，2026/01/06)。後續村長也有補充說明，村民也會到村辦聊天、而通常是女性村民居多。從藍鵲村長與丈夫和村民互動頻率的不同，以及丈夫提到「長舌婦」的性別化負面評價，能看出女性與男性村長與村民互動上如何受到性別影響。

女性村長除了互動地點與對象會因為性別受限外，與村民的面對面互動的形式也會有所不同。鮭魚村長提到：

跟這些阿桑都很好啦，以前做長青食堂都有在一起，他們就會說要幹嘛幹嘛叫我帶他們去。去年帶他們去嘉義拿年菜，那間在山上，我也不知道路，想說幹嘛不叫宅急便就好，運費我出，他們說不行，因為要去吃雞肉飯，還要叫我請。.....他們會想說我比較知道哪裡有在賣東西，他們說他們想買東西我就會帶他們去，有一次我真的覺得這才是無理的要求！（田野錄音，鮭魚村長，2026/01/12）

鮭魚村長好氣又好笑地繼續說：「他們叫我帶去買內衣！一次載四個歐巴桑去買內衣還當場試穿，我的臉整個很尷尬，我說你們買我先迴避一下，這才是真的尷尬」（田野錄音，鮭魚村長，2026/01/12）。

從鮭魚村長的分享可以看到性別身分讓他與村民有更多專屬於女性間的互動，但在過程中鮭魚村長需要付出更多的身體勞動（接送、逛街）與情緒勞動（聊天交流）。雖然若他不是村長，可能也會以朋友的身分這麼做，不過村長身分讓村民更有理由要求他，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鮭魚村長的工作量。此外，年長村民需要要求村長帶他們去購物，能看出當地交通或許不甚方便，也能扣合當地年輕人大量外流、照顧人力缺口的問題，導致女性村長工作內容的擴張。

前段女性村長與女性村民的互動也讓筆者進一步好奇，男性村民會對女性村長有什麼要求。「他們只會說路燈壞了，不然就是公所有什麼事情要做、拿藥，或者是說他們接到公文不會看就叫我看，或者是說他們要寫什麼東西，不會

寫，叫我幫他們寫這樣子的，其實還好」(田野錄音，鮭魚村長，2026/01/12)。對比之下可以發現，鮭魚村長確實會因為村民性別有不同的互動。

最後，三位村長皆提到相同的村民互動策略，以及避免社交而產生的問題。石虎村長說的最直白：

我偶爾會去泡茶啦，但我怕泡茶泡太多了會出問題，鄉下就喜歡東家長西家短，我都不能偏袒誰，不要聽太多才是上策！就跟他們就是聊一下、打打招呼。我也會避免說，有些人逮到機會就要跟你告狀那個某某怎麼樣，這個某某怎樣，然後我就會說喔喔喔(敷衍過去)，但是你也別每次都這樣，就是避免避免太接近，也不要太疏離這樣。但是他有需要我幫助的時候，我一定就是不會缺席，平常的那種喝茶、大家攪和在一起的時間比較少，我會避免。(田野錄音，石虎村長，2026/01/09)

鮭魚村長則提到自己的檳榔攤從以前就是村民的八卦站，不過自己在當上村長後講話要很小心，不會主動傳八卦、避免得罪人，這樣就不用擔心有誤會，而需要花更多時間解釋(田野筆記，鮭魚村長，2026/01/13)。藍鵲村長也說他雖然常常去和村民泡茶走動，但是「我去也沒有說話，人家在說話我都安靜聽」(田野錄音，藍鵲村長，2026/01/06)。

由此可知，女性村長雖然需要時不時和村民走動聊天維繫感情，卻也要在互動過程中謹慎管理自己的言行，在面對村民的抱怨或告狀時，不能夠選邊站，也不能夠一直敷衍。結合上述村長們對自身女性特質「細心、好聊天」的認知，發現女性村長往往需要在與村民的互動過程中投

入大量的情緒勞動，以展演出村民期待的「女性村長」形象。

（四）公共服務

村長們除了上述職務範圍內的工作及對村民的服務、互動之外，還有一些因為村長身分衍伸出與其他單位或組織的互動。以下將說明村長與村莊主要廟宇的互動，還有石虎村長另外協辦活動的狀況。

鮭魚村與藍鵲村同屬於魚鵲厝的範圍，而魚鵲厝主要的廟為魚鵲宮，性質上較類似聚落內共同的信仰中心。藍鵲村長提到魚鵲宮內有廣播，若是村長有事情需要通知村民會向廟方借廣播，公所有打疫苗也會在廟口進行。不過平常村長與廟方的互動大多僅止於有活動時會送禮或贊助，雖然村長是魚鵲宮的當然委員，但也僅僅是掛名（田野筆記，藍鵲村長，2026/01/14）。

鮭魚村長也有類似的看法，他告訴筆者，因為廟委會內部既有的人際關係與網絡，不論是鮭魚村長或他的父親、藍鵲村長與他的丈夫在做村長時，也都是擔任較無實質影響力的廟監事，廟方不會希望村長對廟務插手太多。此外，鮭魚村長提到，因為魚鵲宮委員的性別與互動方式使他覺得自己身為女性難以進入，因此鮭魚村長與魚鵲宮就維持「關係平平」（田野錄音，鮭魚村長，2026/01/12）。

而石虎村所處的大貓厝地區中心大廟是大貓宮，大貓宮屬於全臺性的廟宇，規模更大、信眾來自四面八方，會需要更多人手投入廟務。前文提到，鮭魚村、石虎村及附近其他村落的送餐便當是由大貓宮主辦，能看出大貓宮的資源與人手之多。故除了大貓厝地區的村長要參與廟務之

外，鮭魚村、藍鵲村等周邊的村長也會參與廟的活動。在田野期間適逢大貓宮休閒大樓剪綵，藍鵲村長提到有受邀參與。不過相較起其他村長是參與廟宇活動，石虎村長作為大貓厝地區的村長，則是有參與廟務並擔任要職。

我也有職務啊，公關組長。我們假日都要去服務接待，就是迎賓、去幫忙工作，接洽客人啊。你就要跟來這邊進香的宮廟團體 social 一下，這樣子。六日都要去，過年香客會變很多就要輪值班這樣。

（田野錄音，石虎村長，2026/01/08）

石虎村長分享他投入大貓宮廟務的緣由：「我當村長之前都不太拜拜、不太懂，但因為現在人口老化年輕人很少，村長也要去協助這樣。大貓宮以前是有一個專門的招待組長，但我們當選那年他過世，所以我跟隔壁村村長就要去接他的位置。以前的村長不用，只要說有活動或是祭典參與一下而已。」村長更提到大貓宮的廟委會組成，在約 20 人的委員中多數是男性，女性負責的工作大多是接待香客。雖然與魚鵲宮的規模不同，廟委會組成中同樣是男性主導居多（田野錄音，石虎村長，2026/01/08）。

村長接著補充公關組長的工作，包括協助招待香客、用餐應酬。村長委婉地告訴筆者自己對應酬場合與酒局的看法。筆者認為，女性村長在喝酒應酬的場合中為難與尷尬的狀況，能夠呼應文獻回顧中提到，政治場域的陽剛敵意環境對女性政治人物的排除現象（曾聖惠 2022：138-150）。

在訪談的過程中石虎村長常常提到大貓宮，也對於大貓宮的歷史與大型活動的時程侃侃而談，村長不僅對大貓宮的事務瞭若指掌，也能在村長的話語間，聽出他對大貓

宮的驕傲。村長提到大貓宮為當地提供許多社會福利做為回饋，包括提供附近的學生獎學金、籌辦老人送餐，請石虎村長協辦的銀髮健身活動也是其一。石虎村長《在訪談過後，親切的帶筆者去參觀並介紹全新剛落成的休閒大樓，更邀請筆者一起去參與幾天後的銀髮健身活動。參觀完休閒大樓供香客入住的客房後，村長被大貓宮主委找去幫忙寫文件，筆者觀察到石虎村長與主委的互動十分自然、熟悉（田野筆記，2026/01/11）。

銀髮健身活動在大貓宮旁大樓的教室，石虎村長熟悉地和教室裡的阿桑、老師點頭招呼。活動原先是公所委託大貓宮舉辦，但適逢農曆年底公家機關關帳，所以最近的教練費用都是由大貓宮負擔。不久，石虎村長被主委找去休閒大樓的接待室，一路上石虎村長都熱情地和遇到的人打招呼。村長把筆者與組員也一起帶進接待室，不過主委並不在接待室。接待室內有身兼廟務的中年男性村幹事，以及更顯資深的女性社會課課長。村幹事、課長與村長在討論銀髮健身的形式。筆者觀察到，石虎村長在談話中表達的是主委的立場，與公所的意見有所不同，在談話中石虎村長擔任協調不同意見的角色。談話結束後在接待室外遇到主委夫人，石虎村長與主委夫人及主委互動時，互相有挽手、拍肩等互動，與筆者過去和長輩互動的場景類似，能感受到石虎村長對主委夫婦親暱中帶著尊敬的態度（田野筆記，2026/01/14）。

石虎村長在大貓宮不僅有接待香客、協助舉辦銀髮健身等廟務，也承接休閒大樓一樓禮品店的經營。在看完休閒大樓後，石虎村長也邀請筆者去看他正在布置的禮品店，一邊幫忙布置村長一邊分享會承租下這間店的原因。起初

是受到主委的請託，同時村長也想為地方與廟盡一份心，希望周遭熱鬧一點並吸引更多人願意在地方停留，故即使店內租金與進貨、裝潢等等的成本都需要石虎村長自己負擔，他還是決定承租並經營禮品店（田野筆記，2026/01/11）。

筆者在大貓宮連續兩日的觀察中，發現主委會直接指派任務給石虎村長、也能夠得知主委對事情處理的想法並代表協助溝通，村長與主委夫人及廟方人員之間也互動十分熱絡。不僅能看出主委對石虎村長有一定程度的信任，也能察覺村長平時在與廟方人員的關係維繫上，投入許多的心力與情感，這也是村長在自己的村務之外額外要投入情緒勞動之所在。此外，從石虎村長對大貓宮歷史、社會福利等介紹，能看出村長對大貓宮的認同，也從石虎村長在廟務及禮品店的實際行動看出他對大貓宮的付出。

三位村長除了與宮廟的互動之外，有時候也需要協助舉辦活動，這類的工作石虎村長的接洽經驗相對豐富。包括海洋大學、林務局等單位會在附近舉辦淨灘、淨林或固砂等活動，會需要村長協助舉辦、找人參與等等。在石虎村村辦公室時，石虎村長也自豪地介紹掛在牆上的海洋大學聘書，除了會幫忙大學協辦活動之外，石虎村長也是合作的講師。

在舉辦活動或是辦講座時，三位村長都提到會幫忙主辦單位找村民參與。石虎村長更笑著說：「他們（辦活動）需要人都找我就對了，我覺得我比較會叫人」，這不僅是靠主辦單位提供餐盒或禮物等作為村民參與的誘因，石虎村長更補充：「撿垃圾（淨灘淨林）就是拜託啦，這個就是人際關係、靠交情啊。你可能跟五個（村民）通知，五個就

會叫另外的十個，就放射性的叫人這樣」石虎村長也提到，會找村民參與活動除了是協助主辦單位，另一方面是希望年長的村民有機會可以出門活動、與人交流。石虎村長對村民的照顧也體現在與風力發電公司的交涉，因為大貓厝地區的補償與回饋金不多，石虎村長曾經在中秋節時向風力發電公司爭取為村民舉辦餐會的經費（田野錄音，石虎村長，2026/01/08）。

在村長與宮廟的交流中，能發現根據廟的性質不同，會影響村長進入廟務的可能性，而石虎村長在大貓宮中不僅與主委及其他廟方人員熟絡，更負責許多廟務。石虎村長擔任公關組長的主要任務是協助接待香客，必須頻繁地與人「social」，更需要在招待、應酬中花費心力委婉地避免喝酒。石虎村長作為廟務體系中少數的女性，更需要負擔高強度的情緒勞動。另外，村長們在協助外部單位舉辦活動時，需要和外部單位溝通，更需要透過交情說服村民參與活動，過程中也涉及相當多的情緒勞動。

五、村莊維護

「村長的工作就...燈亮路平水溝通，基本的」在問到村長的日常工作時，石虎村長輕描淡寫的說（田野錄音，石虎村長，2026/01/08）。

村長的工作除了許多面向村民的人際交流之外，另一個重要且日常的部分，是村莊的基礎建設與維護。舉凡路燈、電線、路面日常維護與水溝疏濬，以及路樹、雜草的清除，又或是在颱風天時被風吹倒擋住路面的樹、下大雨後協助村民家中抽水，都是村長們都有提到的日常村務維護項目。

在第一天訪談石虎村長時，他撥了幾通電話向對方確認清溝車的進度，並轉頭向筆者解釋：「如果我們常做（清溝），就不用一次做這麼久」（田野錄音，石虎村長，2026/01/08）。鮭魚村長也這樣說：「我做事是喜歡先預防……颱風天七八月，我就會在六月先把高的樹除掉、先請公所的清運車來清水溝」（田野錄音，鮭魚村長，2026/01/12），皆顯示村長們對日常村莊維護的重視。

甚至有些在基礎建設維護之外的疑難雜症也會被村民要求。「有些事情村民可以自己，但還是會想叫村長做，像是路上貓狗死掉我也要處理……有一個村民家裡跑老鼠進去也叫我去抓，我也只能幫你買黏鼠板，我要怎麼去幫你抓啦！」鮭魚村長無奈笑道，接著補充「你要體諒他年紀大、子女又不在身邊，所以你會覺得說，啊……反正算了，能做多少就多少啊」（田野錄音，鮭魚村長，2026/01/12），高齡村落的村長在與年紀大的村民溝通時，需要額外付出心力與情緒勞動。

此外，四湖一帶特殊地理環境，使得村莊更需要頻繁維護。因為處在沿海，含鹽與沙的海風不斷吹拂，沒有遮蔽物阻擋颱風肆虐，再加上地層下陷等因素，使得路燈與電線常會面臨吹落或生鏽的問題。水溝容易淤沙讓颱風天的風雨造成更嚴重的災情。更重要的是，四湖一帶和都市習慣的修繕申請不同，石虎村長因為在都市生活過故發現相異之處：「我們修路燈是照輪，一個月大概兩三次，不像市內只要掃QR CODE就好……里長不用自己巡會有人去報，我們村長前一天要自己去巡、檢查，壞掉的路燈就綁上紅繩子，隔天再帶工程車去」（田野錄音，石虎村長，2026/01/09）。

不只是修路燈需要排隊，村長們在村莊的維護修繕也無法都仰賴鄉公所。「你要申請、往上呈報也是慢，而且整個四湖有 21 村，大家要均分的話經費有限啦.....這個都自己花錢的，我們沒有那麼多經費，就村長從事務費裡面拿出來花的。」石虎村長繼續分享到：「路樹雜草之類的，我都是請人或自己來.....你要等到鄉公所做就太慢了，真的不行才會拜託鄉長或科長處理」（田野錄音，石虎村長，2026/01/09）。

在鮭魚村也是如此，往往需要村長自掏腰包進行村莊維護。不過鮭魚村長也會透過維護村務的勞動協助經濟弱勢的村民：「我會請村莊經濟比較不好的村民幫忙、給他們一些工錢、加減幫」（田野錄音，鮭魚村長，2026/01/12）。

藍鵲村長通常會和丈夫分工合作：「要準備三餐給他吃啦，他就負責看路燈啦」、「割草的話也是我老公在用」（田野錄音，藍鵲村長，2026/01/06）。能發現村長與丈夫習慣的性別分工。不過藍鵲村長在被問到女性村長的辛苦之處時表示：「像噴藥割草這種體力活男生做會比較輕鬆，但我自己做累了貼痠痛貼布就好了啦！」（田野筆記，藍鵲村長，2026/01/12）

鮭魚村長也有提到：「女生做這種勞力會比較辛苦啦」（田野筆記，鮭魚村長，2026/01/13）。雖然兩位村長都有表示覺得勞力活女性做起來比較不容易，但實務上他們還是可以獨立完成與村莊維護相關的體力勞動。

在日常的路燈電線修繕之外，建設經費也需要村長主動爭取，而三位村長爭取的對象有所不同。「如果要做水溝做路，你沒有親自去拜託鄉長的話，等到路爛掉他也不會來用」藍鵲村長接著說：「以前我老公也會跟議員、立委或

縣政府請經費，旁邊的大水溝就是我去討的」(田野錄音，藍鵲村長，2026/01/06)。鮭魚村長則是會向鄉長爭取修繕的資源與經費。

雖然「燈亮路平水溝通」看似是單純的村莊建設維護，但其中仍有女性村長與男性親友基於體力的性別分工。在爭取建設資源時，女性村長仍需頻繁與人溝通、建立關係並執行情緒勞動。

六、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的田野地雲林四湖的三個村莊中，人口嚴重老化、多數村民是高齡且獨居，在高齡人口中女性略多於男性。從三位村長對女性特質或分工的說法能發現，村長們對女性特質的看法接近傳統觀念，包括較細心、更關懷、身段軟，及體力相對男性較弱等等，這些同時也是女性村長會在他們的實作中遵守的性別規範。訪談中幾次提到形容村莊與廟的「大男人主義」說法、「出嫁女兒不能選」則是點出當地一部分的性別觀。

在四湖鄉本屆的村長當選人中，僅有一位女性村長是獨立參選後成功當選，其他五位村長都是接續男性親友參與政治，本研究的三位女性村長也是如此。藍鵲村長代替丈夫參選、鮭魚村長是在父親後參選。而石虎村長則是和前任男性村長交情好，故後來接續參選。之所以筆者認為石虎村長的參政並非獨立參選，是因為石虎村長能夠在當選前先投入村民服務，並得到村民信任的關鍵，在於石虎村長與前任男性村長固有的人際連帶；而四湖獨立參選的那位女性村長，並沒有透過前任男性村長累積自身的政治資本。

三位女性村長參選狀況呼應了姜貞吟提到的併同型式，女性政治人物在參政過程中，往往會有意識地累積自身政治資本，而非全然被動的依親（姜貞吟 2009：281）。根據鮭魚村長與藍鵲村長的訪談，他們是出於協助男性親友的動機而參與服務，不過難以從訪談材料中得知女性村長是否「有意識」地在累積自身的政治資本。但村長有提到服務是得到選票的關鍵，因此不論女性村長是否有意識累積服務與信任，其結果都是透過協助男性親友服務村民，奠定未來選上村長的政治基礎。特別的是，鮭魚村長認為過去父親把村民照顧得太無微不至，他不僅僅是繼承村民對父親的信任與聲望，還有村民過去對父親的期待，導致他在當村長後需要承擔更多村民的要求。

在過去尚未擔任村長時，女性村長在當選前協助男性親友處理村務的過程，其意義不僅是奠定往後的服務基礎，從服務項目也能看出性別分工的狀況。藍鵲村長與鮭魚村長在協助男性親友共同執行村務時，男性親友負責較多傳統認為男性主外的事物，包括村務中的修繕、體力勞動等等；女性村長則負擔傳統上認為女性主內該負擔的文書行政及村民服務。能看出女性村長在未當選時，就已負責需要高度情緒勞動的村民服務。另外，在藍鵲村長擔任村長的任期內，依然與丈夫維持大致類似的性別分工，不過他還是會基於村長身分，在日常村務多負擔一些傳統上被劃分給男性的體力勞動。

過去對女性參政的研究提到政治場域由陽剛特質主導（曾聖惠 2022：141）。女性政治人物同時受到對政治人物的陽剛期待、與對女性特質的陰柔期待下的雙重束縛（楊婉瑩 2019：172）。村長們實際在執行村務與村民互動時，

的確有看到政治場域與女性村長性別身分的衝突。在陽剛的酒局中，女性村長受其性別身分中的陰柔期待影響，參與機會及在酒局中的人際互動相對受限。筆者認為這能夠類比在陽剛場域中女性陰柔形象的衝突，也使得女性村長需要花更多的心力在陽剛場域中保持合宜的女性形象；又或是試著解決被陽剛場域排除的影響。

女性村長在與村民互動時也是性別化的。三位村長共同提到他們在與村民聊天互動時，聊天的內容與互動方式會受彼此性別的影響。女性村長對自己更會聊天、更善解人意的性別規範認知，以及女性村長在面對村民的傾訴時，自認為是「情緒垃圾桶」，展現他們管理、展現合宜的情緒感受並給予村民期待的回應，符合 Hochschild 提出的情緒勞動概念（Hochschild 1979：551）。進一步來說，女性村長也會透過「安靜聽、不亂傳」的策略，避免參與村民聊天建立感情的過程中，可能產生的人際糾紛。

訪談中可以發現女性村長在日常執行村務中，不論服務村民、與村民廟方與外部單位互動，又或是爭取村莊維護資源時，都需要大量的與人交流。在「女性」與「村長」的身分交織之下，必須要展現出熱心服務、親切、善解人意的形象，導致女性村長在與人交流時，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調整情緒、細心注意對方需求、檢視自己的回應是否得宜，更需要適時透過「放低姿態」以順利溝通。

雖然在溝通中不論對方的性別，女性村長都要付出許多心力交流，不過在實際的互動上則能看出明顯的性別區隔。石虎村長與鮭魚村長皆提及，自己在與男性村民互動時會謹守男女的分界，不會單獨進入年齡相仿的男性村民家中、也不會有男性村民單獨去村辦拜訪。男性村民通常

會拜託鮭魚村長的事大多與村務有關，例如路燈或水溝需要修繕，不過女性村民與鮭魚村長的互動則私領域性質更高，包括會要求村長陪他們去買年菜、買貼身衣物等較私密的活動。能看出在實際互動的內容高度與性別相關。

不僅如此，女性村長也投入許多更涉及「私領域」的服務與勞動，也能扣合他們自述身分「像是家人／女兒」。三位村長都有提到在疫情期間會接送年長村民去打疫苗；鮭魚村長會協助村民家中喪事的操辦、藍鵲村長挨家挨戶送便當噓寒問暖，石虎村長會協助村民管錢，甚至曾經進入生病的村民家中協助打掃等。藍佩嘉指出，家務與照顧勞動被視為女性的天性（藍佩嘉 2009：27）；姜貞吟則認為照護勞動同時具備勞動與情感兩者（姜貞吟 2010：6-9）。這些村民服務與老人關懷的作為，透過女性村長的性別身分作為媒介，從公領域的村長職務轉換到私領域中形同家人的照護勞動，女性村長對村民的照顧勞動性質更接近私領域的家務事，背後是村長被期待扮演全天候保姆角色，又交織著將女性身分與私領域綁定的性別框架。

女性村長進入私領域的服務不僅能夠從其性別化的勞動來說明，也能夠以人類學對「做親屬」的概念分析。在女性村長進入村民的私領域提供服務後，自述自己像是家人的角色，而在人類學親屬研究中也有類似的研究。Schneider（1984）認為透過人際間特定的勞動與作為，能夠形成非生物性的親屬關係（Schneider 1984：33）；Carsten（2000）則是發現日常共食共作的實踐可以「創造」出真實的親屬關係。回扣到女性村長在村民私領域的服務與互動：三位女性村長都有進入村民的私領域，同時也認為自

己的角色就「像是家人」，包括陪同看病、打針，送餐、打掃家務，協助管理財務，甚至是協助舉辦喪事等等。

單看女性村長與村民的互動，或許與臺灣社會中家人所做的事情類似，不過在高齡村落的脈絡下，村長與許多村民都有類似家人的互動，且私領域的性別化勞動互動模式是來源於「村長身分」與「性別身分」的交織，若三位女性村長沒有上述雙重身分，不太可能投入如此高度的服務。在人類學的親屬研究中，強調需要大量的互動與實踐形成親屬關係、也鮮少同時與許多人建立類似親屬的親密關係。因此筆者認為，在現有的材料下，難以透過人類學「親屬」的概念詮釋女性村長的私領域服務，只能夠從女性村長身分與地區脈絡的特殊性解釋他們的作為。

在上述的討論中提到女性村長對自身性別特質的描述，是在筆者問到「女性村長的優勢」的回答，故雖然在分析中，著重描述女性村長在其性別角色下可能的限制，然而，這些結合性別特質的行動恰好展現女性村長的優勢所在。女性村長對村民日常的「細心、關懷」與進入村民私領域的作為，蘊含高度情緒勞動、照護勞動，更與性別高度相關。都讓女性村長能夠提供更貼近村民需求的服務，也更容易「走進村民的心」並進一步轉化成村長的政治資本。因此筆者認為將村務納入「女性特質」實際上讓村長執行村務時更順利。

不過，在本研究中，由於田野的時間較短、對三位女性村長的訪談內容材料有限，現有的材料無法完全呼應文獻。不論是在女性村長政治能動性、女性村長對村務實務中的性別化勞動之主觀評價，又或是女性村長對「家人／親屬身分」的看法等等面向，本研究都難以透過有限的材

料下定論。此外，本研究也無蒐集相似社會脈絡下的男性村長實踐，因此無法直接比較不同性別村長的實踐。故本研究即便有對女性村長的部分處境以性別視角分析，也有對村長們訪談內容的詮釋，但總體而言，本研究無意評價村長的性別身分對於其職務影響是利是弊。

本研究僅嘗試透過探討高齡村落女性村長的實務經驗，為現有研究的基層女性參政之研究缺口補上一些內容。而本研究也確實從三位女性村長的經驗中，發現許多與其性別身分高度相關的實作，期待本研究能夠描寫出三位女性村長的韌性，並脈絡化地記錄下女性村長在高齡村落中的辛勤付出。

七、參考文獻

Carsten, Janet.

2000 *Cultures of Relatedness: New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Kinship*.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o, Yaguang

2023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Taiwan*. 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Singapore Pte Ltd.

Hochschild, Arlie Russell

1979 *Emotion Work, Feeling Rules,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5 (3) : 551-575

Schneider, David M

1984 *A Critique of the Study of Kinship*.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West, Candace, and Don H. Zimmerman

1987 *Doing Gender*. *Gender and Society* 1(2): 125-151.

內政部全球資訊網

2026 〈地方公職人員資訊專區〉。「內政部全球資訊網」。<https://www.moi.gov.tw/cl.aspx?n=12>。2026年5月2日取用。

吳官展

2022 〈2018年女里長人才培訓班的初步檢討〉。《性別平等教育季刊》97：58-62。台北：教育部。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2023 〈2026年性別圖像〉。臺北：行政院。

2026 〈2026 年性別圖像〉。臺北：行政院。

行政院主計總處

2024 〈雲林縣統計通報第 113-04 號雲林縣青年人口遷徙情形〉。雲林：雲林縣政府主計處。

林宜瑾

2012 《台灣基層女性參政困境之分析——以縣市議員為例》。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倖妃

2020 〈「生」不如「死」的時代 七成人口住六都，地方快沒人怎麼辦？〉。「天下雜誌」，
<https://www.cw.com.tw/article/5102029>，2020 年 9 月 22 號上線。

邱俊凱、游美惠

2003 〈澎湖縣七美鄉已婚婦女的照顧責任與生活處境：一個女性主義民族誌的研究〉。《社區發展季刊》101：148-162。

姜貞吟

2009 〈女性作為政治行動者：台灣女性參政圖像的反思〉。《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6：277-316。
2010 〈國家與性別：臺灣照顧政策性別化探析〉。《人口學刊》41：1-34。

曾聖惠

2022 《參政之後：臺灣女性政治工作者的性騷擾受害經歷》。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

黃心彤

2023 《影響臺北市女性里長參選因素之探討》。臺北市立大學碩士論文。

楊婉瑩

2019 〈沒有選擇的選擇：女性從政者的雙重束縛〉。載於王曉丹編，《這是愛女也是厭女：如何看穿這世界拉攏與懲戒女人的兩手策略》，頁 171-192。台北：大家出版。

雲林縣政府主計處

2025 〈雲林縣性別圖像〉，雲林縣政府主計處。

2025 〈雲林縣性別統計指標〉，雲林縣政府主計處。

雲林縣四湖鄉公所

2024 〈113 年度統計年報〉。《雲林縣四湖鄉公所》。

2026 〈村辦公處〉。「雲林縣四湖鄉公所」，
<https://zuhu.yunlin.gov.tw/cp.aspx?n=5351>，2026 年 4 月 24 日取用。

雲林縣麥寮戶政事務所

2025 〈四湖鄉地區統計〉。「性別年齡人口數」，
<https://mailiao.household.yunlin.gov.tw/popul01/Statistics.aspx?Parser=99,5,42,,,,,,,,,,,,,1,,,,18>，
2025 年 6 月 13 日上線（2026 年 5 月 2 日取用）。

藍佩嘉

2008 《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台北：行人文化。

生成式 AI 輔助寫作揭露聲明

聲明日期：2026 年 6 月 19 日

本文作者於撰寫本作業之過程中，使用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輔助部分寫作程序，特依本課程「生成式 AI 使用規範」之要求，如實揭露如下。

一、使用之模型與版本 Notebook LM

二、使用方式

1. 逐字稿整理或初步清稿（已使用本地工具或匿名化版本）
2. 協助初步 coding（概念分類與標籤建議，最終詮釋由研究者自行判斷）
3. 協助釐清民族誌概念或理論（查詢意義、比較不同學者用法）
4. 翻譯或製作摘要
5. 參考潤飾意見並修改（文字最終由本人決定）

本聲明由作者自行填寫並確認，所載資訊均屬實。

從代理到自主：雲林四湖女性村長如何憑藉性別及經濟因素重塑村里治理

吳俊達（臺灣大學會計學系五年級）

摘要

本文以村里作為尺度切入，聚焦於雲林四湖三位女性村長的從政脈絡，旨在揭示當地傳統政治慣習與性別框架，並探問三位女性村長如何在上述的結構性限制下，透過治理實踐展現能動性。本文指出，在「彈性化時間結構」作為當代社會及村務治理之時間框構的現實下，三位女性村長憑藉自身的「經濟資本」與「時間管理」技巧，將傳統私領域的「密集母職」照護機制轉化為公領域的「密集照護治理」，化解了陽剛性在治理實踐上的必然，並成功將性別限制轉化為政治場域中的「象徵資本」。質言之，三位女性村長憑藉各類因素所編織出的治理策略，實現其由代理男性到自主治理的轉向。

關鍵詞：女性參政、密集母職、布迪厄思想、三元時間

一、導論

筆者自幼生長於都市，對於鄉村生活的想像，僅止於偕同母親造訪南部老家，與旅程中短暫的停留片段。由於身處於機能便利、產業發展相對健全的都市中，對於雲林海線的村長，如何在資源相對匱乏、高齡化等趨勢下實踐村務治理，甚或在高齡村民的子女外出打拼的脈絡下，在場補位、將自身編織進村民的生命中，誠然無法為筆者所想像。

再者，著眼於政治場域高度男性化之想像，筆者欲聚焦於雲林四湖三位女性村長（墨墨村品蓉村長、蓋亞村佳臻村長、米米村小賢村長）的經歷，透過半結構式訪談及參與觀察等方式，爬梳基層女性政治人物的從政脈絡及治理實踐。筆者身為生理男性，期望能結合自身的生命經驗與民族誌的研究取徑，為女性參政議題提出另類、具反身性之思考框架。

另外，筆者進一步意識到，在我國性別角色分化認知仍盛之脈絡下，「公私分工」、「性別刻板印象」等性別框架仍普遍影響國人的性別觀（楊婉瑩、林珮婷 2011），進一步派生為政治場域的陽剛、父權規訓（林宣佑 2024）。是故，筆者欲探究埋藏於雲林四湖的性別觀念（包括生活層面的、政治層面的），是否／如何制約三位村長，抑或被其動用或轉化，以形塑其治理實踐。

本文引入「密集母職」、「布迪厄思想」與「三元時間」，作為與田野材料對話之理論骨幹與分析架構：

首先，奠基於前述之性別框架，本文引入「密集母職」（intensive mothering）的概念。「密集母職」乃一種針對母

親之規訓，要求其以孩子為中心，在教養過程中投入大量時間、金錢與情感（Lui and Cheung 2024）。

筆者發現，三位村長皆為人母，惟已脫離針對其子女實踐「密集母職」的階段。然而，作為「風險化社會」、「高齡化社會」（廖南貴 2014：3）之典型，筆者認識到，就治理作為而言，四湖各村村長勢必要如照顧家人一般，對高齡村民展現相當的關切及資源投入（如實踐高密度的情緒勞動、身體勞動）。是故，本文欲從「密集母職」這種照護樣態出發，並考察田野地潛藏的性別角色期待，探究相關慣習與觀念架構是否／如何轉化為村務治理實踐上的一種可能策略。

再者，身為外務龐雜、有打工經驗的學生，筆者深知「經濟因素」與「時間管理」對於當代社會生活的攸關性，故引入「布迪厄思想」與「三元時間」之概念，將村長的治理實踐抽離狹義的村務範疇，以釐清村長之身分如何與其社會生活的其他構面（如家庭、工作等）共融，並確立「時間」、「經濟」作為必然之分析範疇，深化對於三位村長治理實踐的討論。

筆者引入「布迪厄思想」，主要回顧其所框構之四種存在於社會空間的「資本」（「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與「象徵資本」）。筆者著眼於四湖村落，欲進一步探問，三位村長在進行村務治理的過程中，上述的資本如何相互轉化，又如何與布迪厄所提及之「慣習」、「場域」因素交融，形塑其治理實踐。

承上，筆者進一步認為，布迪厄思想兼容主體與客體的論述，有助本文考察並還原三位村長從政脈絡及治理實踐之潛藏邏輯。布迪厄雖承認個人的行動很大程度地取決

於社會現實結構，卻也肯認主體能動性的存在。筆者主張，三位村長在村務治理手段上的揀選與實踐過程中，並非全然受制於社會中既存的固化框架，蘊含布迪厄筆下「發展策略」(strategising)之能動傾向。

筆者引入「三元時間」，主係意識到「可用時間」對於事務龐雜的村長而言，乃一種攸關、必要時可對其進行管理之資源。如同鄭作彧(2010)所主張之，當代社會的時間結構已由「標準時間結構」日益轉變為「彈性化時間結構」，「非薪資勞動事務」這類蘊含時間管理的行動舉措，為行動者在傳統上二分的「工作時間」與「自由時間」中取得平衡。村長在各項村務治理、安排村務及其他事務的過程中，顯然必須展現一定的時間管理技巧，方能在不耽誤村務執行面需求的同時，鞏固自身的生活品質，進而確保村務治理實踐的可持續性。

是故，鑑於「時間」在性質上的多元、特殊性，筆者除將探問三位村長在村務實踐過程中，如何透過妥善的時間管理，構築自身的「工作時間」與「自由時間」外，更將討論作為「資源」的時間，在本文的分析上是否能與布迪厄的「資本」概念對話。

綜上，本文將結合雲林四湖高齡現勢、性別框架、密集母職、布迪厄思想、三元時間等現實脈絡與理論內涵，框構三位女性村長高度性別化、時間密集之治理實踐，並試圖爬梳如此的實踐何以為地方政治帶來全新的可能。

二、研究方法與倫理

本文材料係 2026 年 1 月 5 日至 1 月 15 日間，筆者於雲林縣四湖鄉墨墨村、蓋亞村、米米村等村進行之半結構式

訪談及參與觀察所得。就記錄媒介的選用上，為避免研究成果失真，筆者除書寫田野筆記外，另針對長時間的訪談以手機錄音、轉錄逐字稿，以此作為後續整理之用。

與三名主要報導人之首次訪談開始前，筆者已提供本研究之初擬之研究大綱、訪綱暨問題集予報導人並供其審閱；針對田野筆記及錄音，業已說明所用媒介、使用範疇及用途。筆者在確信上述內容獲得三名報導人口頭上之知情同意後方開始進行訪談。

然而，筆者在進行田野材料的後續整理時，意識到部分材料之高度敏感及隱私性，是故，除「雲林縣」及（其轄下之）「四湖鄉」外，本文將所有可辨識之人名及（各種形式之）地名化名處理，另統一以「他」作為行文時第三人稱之措辭，以維護報導人之權益、最大化消解倫理疑慮。

三、文獻回顧

（一）理論文獻回顧

本章將理論文獻劃分為三大軸線：首先，由「性別框架與政治場域的陽剛規訓」出發，爬梳女性參政所面臨的結構阻力；其次，轉向「基層地方政治實踐與密集照護的公共化」，探討三位村長如何在村里尺度下，將私領域的照護慣習轉化為風險化、高齡化社區的一種治理實踐；最後，建立「實踐、資本與時間的分析構框」，引入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傅柯（Michel Foucault）與時間社會學理論，以此確立村長政治實踐的「治理性」（governmentality），並作為釐清結構與能動性辯證關係、討論各類資本如何在政治場域中被動用的分析骨幹。

1. 性別框架與政治場域的陽剛規訓

（1）性別角色分化

隨著時代變遷，我國社會的傳統性別觀念似乎已逐漸淡化。然而，楊婉瑩、林珮婷（2011）在考察性別角色認知與政治效能感的關係時，將性別角色分化的認知分為「職業區隔」、「公私分工」和「性別刻板印象」三個構面，並主張後兩類認知模式仍普遍影響著國人的性別觀。此外，楊婉瑩、林珮婷進一步主張，社會上種種對「男女有別（差異）」的倡議及認知並非中立，而潛藏支配的效果，體現於所派生之「性別分工」及男女「差別對待的合理化」（楊婉瑩、林珮婷 2011：122）。政治上，上述的支配效果則進一步剝奪女性的政治效能感、增益男性的政治效能感（楊婉瑩、林珮婷 2011）。本文將考察上述的性別框架以何種樣態交織於雲林四湖的社會環境中，也將爬梳這樣的框架如何影響三位村長村務實作的展演。

（2）女性參政

針對女性參政方面，姜貞吟提到，過往研究經常將女性參政者劃歸為「依夫型」與「政治受難家屬」兩大類（姜貞吟 2009：280）。然而，就「依夫型」這個被劃歸之象徵符號而言，作者觀察到，實務上許多女性參政者的參選行為採「夫妻併同形式」，即女性除藉婚姻關係所獲授，亦透過主動參與政治，累積自身政治資本之模式，故上述的劃歸實矮化了女性參政者之主體性（ibid：280）。女性參政者絕非僅是其男性親屬的從屬或影子，其於政治場域「在場」（present）（ibid：289-290）之事實，即蘊含主體能動性之存在（ibid：285）。

姜貞吟（2011）也以第二屆到第七屆女性立法委員作為分析對象，試圖釐清台灣女性參政比例無法顯著增加之結構性因素。姜貞吟發現，政治場域中，（內圈）男性（而非女性）仍位處「參選人才庫」優位，是為政治參選之「性別階序格局」（姜貞吟 2011：221）。姜貞吟進一步主張，政治人物的出場深受政治家庭和地方勢力所影響（ibid：193-210），前者極具父系色彩（ibid：199），後者則多由男性主導與掌控（ibid：207）。是故，女性政治人物的出場經常蘊含在地「男性無法在場」、「男性不願在場」、「男性不准在場」之狀況（姜貞吟 2011）。印證了政治場域仍受制於父權結構下的高度男性化運作邏輯。

（3）陽剛場域

針對女性身處陽剛場域下的處境，彭滄雯、林依依、葉靜宜（2009）從樣板理論（theory of tokenism）的視角出發，以海巡與消防單位女性工作者的經驗為基礎，並將女性視為樣板，論證上述工作場域存在「刻板角色的分工與再製」、「男性中心的工作環境與文化」及「對（女性）樣板的放大檢視」等問題，並印證了 Rosabeth Kanter 提出的三種樣板效應（角色誘捕、界線鞏固、放大檢視）（彭滄雯、林依依、葉靜宜 2009，轉引自 Kanter 1977），呈現女性進入陽剛職場（masculine occupational fields）的困境。然而，作者也發現，女性可藉由工作上的實作，挑戰過去這些工作所定義的核心能力（彭滄雯、林依依、葉靜宜 2009）。例如，對於消防工作，在協助女性病患時，若由女性救護員來協助女性病患，病人「會比較能接受」；對於海巡工作，受訪者舉「漁船電池爆炸致輪機長受傷，女性海巡展現細心、額外照顧舉動」一例，論述傳統陽剛組織所訴求的某

些（可能是性別化的）適任條件有待商榷。鑑於此類案例，彭滄雯、林依依、葉靜宜認為，有些女性工作者在某種層面上，將傳統被視作陽剛的工作去男性化；然而，作者也意識到，這樣的論述某種程度上也「再度複製了傳統的性別分工」（ibid：136-157）。綜上，女性身處陽剛組織的文化中，雖可能服膺傳統性別預設，仍具備改寫陽剛職場工作內涵與模式的能動性（彭滄雯、林依依、葉靜宜 2009）。

另外，莊玲如、成令方擴充 Candace West 與 Don H. Zimmerman「做性別」（doing gender）的觀點（莊玲如、成令方 2012，轉引自 West and Zimmerman 2002），考察女檢察官如何在身處在父權文化的女性劣勢，及在陽剛組織中的性別弱勢的雙重劣勢下「管理性別」（managing gender）（莊玲如、成令方 2012）。作者指出，上述的策略包括「控制懷孕（高度性屬化的）身體」、「維持『專業』且較陽剛的外在形象」等（莊玲如、成令方 2012：170-176），以降低性別因素的能見度，並在與男性警察的互動過程中，為女性檢察官帶來充權的效果（ibid：176）。

最後，回到政治場域，時任立法委員黃淑英提到，女性參政者大多需要克服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刻板印象，更常需兼顧「家庭照顧者」的角色，且要防備「性別歧視」的攻擊（黃淑英 2011：4）。彭滄雯亦主張女性參政存在結構性阻力（彭滄雯 1998：3），並發現若選戰出現性別議題，經常伴隨「打壓女性」的成分（ibid：1）。以上的發現，促使筆者進一步探究雲林四湖是否存在女性從政之不利因素，如有，又以何種樣態呈現？

2. 基層地方政治實踐與密集照護的公共化

(1) 女里長的性別機會與挑戰

聚焦於村里尺度的政治場域，《性別平等教育季刊》第 97 期的多位作者，在訪談與村長同層級的女性里長及相關倡議者時，發現女性參政實蘊含前述楊婉瑩、林珮婷（2011）綜整出的三類性別角色分化議題（職業區隔、公私分工、性別刻板印象），呈現了女性參政可能遭遇之困境。然而，也有作者認為女性特質有利於某些村里事務治理，是為女性參選村里長之可能優勢；女性里長的實作更可能突破傳統政黨色彩濃厚、高度陽剛的政治治理邏輯，為政治帶來更多可能。對此，筆者臚列如下：

針對公私分工議題，時任臺北市信義區五全里里長吳秀好認為，即使身為里長，仍需平衡家庭與生活，如自己擔任里長的 20 年來「幾乎每天煮飯給家人吃」（林芷筠 2022：68）；此外，里長也提到女性里長「比較不會應酬」，偶爾可能因此得罪他人（ibid：68）。

針對性別歧視議題，時任新北市三重區永安里里長黃麗仔，則提到自己在握手拜票的過程中曾有被男性吃豆腐的經驗，也被質疑過「小女生會喬事情嗎？」（黃麗仔 2022：70）。

藍美雅則就女性在社區工作（包括村里長）中所展現出的特質進行分析，發現女性社區工作者常展現重視「合作」、「資源共享」的領導風格（藍美雅 2022：78），其「細膩」、「善感」、「體貼」、「溫和」的「女性特質」，更常能在社區工作中發揮功能（藍美雅 2022：79），並經常以「耐性」、「韌性」、「委婉的態度」等策略解決問題，並達成相對好的效果（ibid：78）。然而，藍美雅同樣認為這些

女性容易因自己的生理性別被他人質疑，也難以避免「家人反對」、「子女教養」等家庭問題（ibid：78）。

時任臺南市北區長榮里里長潘美純則談到，初次參選里長時，首當其衝的是父親「女孩子當什麼村長？」的不諒解，而是經過數年來的辛勤服務後，潘美純才得來父親的諒解與肯定（潘美純 2022：72-73）。此外，潘美純在村里高齡男性急遽凋零、女性（獨居）里民照護問題顯現的背景下積極辦理老人照護工作，深化社區永續經營（ibid：73）。回顧里長生涯，潘美純常分享：「昔日參選里長便是把自己定位為『社工』，對於一個社區的社工可以做的事情很多，而且是『很適合女性來做』。」（ibid：75）

婦運老將陳秀惠積極推動社區女性參政，他指出，自己在投入女里長培力活動的過程中，看見許多女里長「超越了『傳統里長伯』的政黨樁腳或頭人角色」（高婕、彭滄雯 2022：56），也認為目前的基層村里長選舉，很難僅靠政見或形象勝選，而要透過實際服務（如擔任學校志工等）累積基礎（ibid：57）。例如，前述的吳秀好里長即透過 14 年的導護志工經歷，奠定在社區的服務基礎（林芷筠 2022：64）。

長期投入都會社區營造工作的施佩吟則提出，里長需在利害關係中穿針引線，從中媒合不同資源（施佩吟 2022：84）。他根據里長的個性、行事邏輯，及在政治上的資源，將里長歸類為「資源權威型」與「包容共善型」（ibid：84）。又前者可因與里長掛勾的政治資源類型（如黨派、宗教體系的支持）細分為「黨派樁腳型」、「宗教包袱型」、「自我信念型」及「議題導向型」四個子類（ibid：84）。施佩吟進一步主張，在較老舊或傳統的地區，人情網

絡較綿密、在地議題各有殊異，且地區發展往往涉及資源爭取，故里長與黨派政治通常展現較高的關聯性，里內日常事務的打理，會偏向「資源權威型」的治理邏輯（ibid：84）。另外，施佩吟亦提到女性里長較能同理與包容，並擅於培養、維繫多元社群網絡；男性里長的作風大多展現「大方向」、「大願景」的風格，並較常展現施展「權威」的策略行為，社群網絡較為單一（ibid：84）。

吳官展在女里長人才培訓班的觀察及訪談中，發現有部分女性學員不認為性別為對自身參選造成影響之因素；然而，他仍從受訪者的論述中，發現參選里長存在「性別優勢／劣勢」（吳官展 2022：58）。例如，雖多位受訪者提及「選舉過程里民不在意你是男是女，只要能你能解決問題或是滿足里民想要的措施，里長能發揮作用就好了」（ibid：62），也有受訪者提到「因為里內的孩童、長輩里民習慣於與女性照顧者互動，因此讓自己較容易能走入里民的內心」（ibid：62）。是故，吳官展主張女性在參與村里長選舉時可能面臨的挑戰，及其可發揮的優勢，仍是高度「性別化」的（ibid：62）。

綜上，由上述女性里長及相關者的經驗可知，女性投入基層政治時，尚面臨一定的性別困境，惟女性里長仍可透過柔性、包容與社工化等高度性別化舉措所帶來的治理優勢，打破傳統政治框架。對此，筆者亦預設，三位村長的性別因素，勢必為其從政過程帶來限制，惟上述的因素也應影響甚或創造筆者欲進一步爬梳的，治理實踐之可用（性別化等）策略。

（2）風險社會與高齡化社區治理

此外，當談及村里治理時，廖南貴認識到「風險化社會」、「高齡化社會」已然成為台灣社會的趨勢，而「風險偵測與預防」可能成為村里長可重新定位的利基（廖南貴 2014：3）。截至 2025 年 12 月底，雲林縣四湖鄉之高齡人口比例已高達 25.92%（雲林縣麥寮戶政事務所 2026），高齡者照護已然成為三位女性村長之共同議題。本文期望進一步探究女性村長對於高齡者村民而言，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三位村長在涉及需高度關切、可能展現情緒勞動、身體勞動的高齡者照護實作時，又分別以怎麼樣的策略因應？

（3）密集母職

Lui 和 Cheung（2024）主張，雖然現代女性在教育、職場等領域的權益上取得了巨大進展，但許多社會的性別革命卻被認為處於停滯甚至未完成的狀態，而「密集母職」（Intensive Mothering）的意識形態正是造成此停滯的關鍵原因。作者提到，當代職場要求員工展現時間上、精神上的高度密集投入（Lui and Cheung 2024：2408）；然「密集母職」同時要求母親必須以孩子為中心，投入大量的時間、金錢與情感（ibid：2413-2414）來進行密集式的教養。因此，在職場與家庭的雙重要求下，職業母親往往陷入嚴重的角色衝突（ibid：2408）。

作者認為，「密集母職」的核心內涵主要包含以下三個維度：

首先，密集母職要求母親必須以孩子為中心（child-centered），將孩子的需求與渴望置於自身的利益之上（Lui

and Cheung 2024：2408），並展現出極致的無私與奉獻精神（黃宗儀、胡俊佳 2022：9）。

再者，密集母職結合「性別本質主義」（gender essentialism）（Lui and Cheung 2024：2411），將母職視為一種自然的女性特質，以此強調母親是孩子無可替代的主要照顧者（ibid：2408），故其照顧行為無法輕易交由他人代勞。

最後，密集母職訴諸「密集」的教養方法，要求母親必須對孩子隨時待命（Lui and Cheung 2024：2408），並為孩子投入龐大的時間、精力與金錢（黃宗儀、胡俊佳 2022：9），可能體現於教養方式的高互動性、知識豐富性，與對孩童各項發展與成就的高度關注（Lui and Cheung 2024：2408）。例如，身處資訊社會，母親可能從事如「花費大量時間在網路上搜尋教養資訊」、「篩選視聽學習教材」、「比較各種線上教育服務」，與「以電子郵件與學校老師保持密切聯繫」等「數位教養」（digital parenting）之舉措（ibid：2408）。

在「密集母職」的構框下，面對職場與家庭的雙重要求及衝突，作者綜整了職業母親四類因應策略，分別為「減少工作（或退出職場）」、「化身超級媽媽」、「延伸母職／代理密集母職」及「整合母職」（Lui and Cheung 2024：2408-2409）。其中「化身超級媽媽」（Supermomming）係指透過極限壓縮自己的作息，來兼顧工作與母職（ibid：2408）；「延伸母職／代理密集母職」則指母親將照顧孩子外包給保母或外籍看護，但母親依然以「管理者」的姿態，高度掌控對於孩子的照護與教養細節（ibid：2408）；「整合母職」則指母親將有薪工作與專業成就整合進他們對好母

親的定義之中，同時，其在將育兒責任委託給家人或非家人時，不會感到內疚（ibid：2409）。

作者提到，「延伸母職／代理密集母職」與「整合母職」的重點差異在於：前類的母親未抵抗密集母職的要求，而是透過剝削上述照顧協助者的時間、精力與情感資源來擴充母職的實踐，在實質上並未改變家內的性別分工與陽剛的職場文化（Lui and Cheung 2024：2413-2414）；後類的母親則拒絕密集母職中，「母親是唯一最佳照顧者」及「家庭必須是女性生活唯一重心」的本質主義觀念（ibid：2414）。因此，他們不再將工作與母職視為互斥，也更敢於在家庭中積極要求伴侶平分育兒責任，或在職場上對抗不合理的全天候待命要求，為自己爭取更合理的生存空間（ibid：2414-2415）。

本文預設，在四湖各村邁向超高齡社會的脈絡下，各村村長在付諸治理實踐時，勢必要對（高齡）村民投入一定的時間、情感等資源，盡力化解人口老化、青壯年人口逐漸外移所衍生之照護問題。是故，本文企圖探問，「密集母職」這樣高密度、蘊含親屬關係的照護模式，與三位村長力行的村民關懷實作，是否有可以對話的理路。

3. 實踐、資本與時間的分析構框

（1）治理

本文借用傅柯（Michel Foucault）提出的「治理性」（governmentality）的部分概念，以深化對於三位村長政治實踐的理解。

「治理性」廣義上係指「引導人類行為的技術與程序」。在其論述中，傅柯顛覆了傳統上將國家視為權力的起源、

推動者、受益者或終點的觀點（Rose et al. 2006：4-5），這種分析將國家的地位「去中心化」，強調治理並非由單一實體（如國家機器）負責管理公民的行為，而主張各種權威在不同場域中，會基於不同的目標進行治理（ibid：3），其權力運作高度依賴非官方行動者（如慈善家、宗教組織）與社會關係網絡（ibid：12-13）。

在探討十八世紀的流行病政治時，傅柯主張，被治理的對象經歷了從「服從主權法律的司法主體」到「人口」的轉向。在此轉變下，人民不再是被孤立對待、單純被形塑或懲戒的個體，而是存在於人與人、人與物、人與事件之間高度密集的「關係領域」（a dense field of relations）之中。因此，治理者必須針對這些社會關係網絡深入了解，並進行相應的經營與管理（Rose et al. 2006：6-7）。

著眼於村里之政治場域，鑒於村長作為無給職（僅領取鄉鎮市區公所編列之事務補助費），且作為我國地方制度中最基層的民選公職人員，往往位處在地居民與政治人物接觸的最前線，本文預設三位村長在建構政治實踐的過程中，常須借助外部資源，並透過經營、結盟並動員非正式的社會與關係網絡，與各方利害關係人（在地居民與組織、上級機關等）協商、共作政治實務，是故，本文以「治理」（governance）架構三位村長的政治實踐作為。

（2）布迪厄思想

前述女性工作者與政治人物在相應場域之在場及行動，為其作為個體之社會生活之一部分。這些女性固然受到各類結構（如性別框架）之限制，我們依然可見其發展出抵抗或協商之實作策略。筆者將從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思想出發，結構化拆解社會生活之大小因素，並期望從微觀到宏觀的角度，與三位村長從政的經驗對話。

布迪厄的思想試圖兼容主體與客體（沈游振 2003：98-99；Bourdieu 1990[1980]）。布迪厄主張，個人與社會的塑造奠基於社會結構與主體能動性的交互作用（王玉佩、林之丞 2014：89）：社會生活雖靠眾多個人的經驗與行動所構成，但這些經驗與行動已「被象徵性的事物（語言、風俗、宗教、藝術、文化等）所中介（吸收、內化）」，以此論證個人的行動很大程度地取決於社會事實（沈游振 2003：98-99）。

布迪厄提出「實踐」（practice）、「慣習」（或習性，habitus）及「場域」（field）三大思想工具（沈游振 2003：99-103；王玉佩、林之丞 2014：87）。布迪厄認為，社會由多種具不同邏輯與思維之場域所構成，而場域內的個體與群體依照場域內所培養出的慣習進行實踐（王玉佩、林之丞 2014：89）。

「實踐」出現在空間中，也出現於時間中，是一種行動者在面臨境況時，作為因應的活動或行動，由慣習與社會提供的機會與束縛等因素交織而成。布迪厄認為，社會生活的落實沒有決定性的規律、模式可供遵守，故實踐的邏輯亦變遷不定，如「即席表演」（improvisation）作為一種即興的、臨機應變的，「對時間的空檔、對休息的判斷、對猶豫不決的善加利用」。儘管如此，布迪厄提到，個人對於社會實踐仍可能「發展策略」（strategising），係指行動者有特定目標與特定利益，故懂得在其生活中，安排其行動（沈游振 2003：99-103；Bourdieu 1990[1980]：107-109）。

「慣習」是一種「『社會』的感受」，是「經過『培養』的性向與處事的方式」（沈游振 2003：100），中介了個人的主觀世界與其身處的文化世界，讓行動者在社會生活中產生各式各樣的實踐（ibid：100-101），為其「社會行為、生存方式、生活風尚、行為規則、策略等實際表現及其精神方面的總根源」（ibid：101）。

「場域」是「行為者在社會的活動空間」，可被視為行動者「動用資源、爭取利益、展開鬥爭」之所在（沈游振 2003：101），由「多面向的社會關係網絡」所構成（ibid：102）。另外，由於每個場域內容之不同，如各有不同的，由不同慣習行動者與生產品所構成的運作邏輯與關鍵結構，是故，每個場域與特定的慣習攸關（ibid：102）。

此外，布迪厄意識到有「資本」才会有階級存在，故主張在探討階級時，應從資本下手（沈游振 2003：103）。布迪厄將社會空間的資本劃分為四大類，分別為「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與「象徵資本」（ibid：103-105），並主張不同形式之資本能相互轉換（ibid：105）。

經濟資本，係由「生產的不同要素」（如土地、工廠、勞動、貨幣等）、「經濟財產」、「各種收入」及「各種經濟利益」所組成（沈游振 2003：104），可被轉換為金錢（money）（Bourdieu 2018[1986]：16）；文化資本可被概略理解為「總體的知識能力」（王玉佩、林之丞 2014：89），可能樣態如「（轉化為個人慣習的）被內在化的秉性及才能」、「具有一定文化價值的油畫」、「由合法化的制度所確認之各種學銜、學位」，被布迪厄分別歸結為「被歸併化的（embodied）形式」、「客觀化的（objectified）形式」和「制度化的（institutionalized）形式」三種類屬（沈游振

2003：104；Bourdieu 2018[1986]：17)。社會資本係「個人或團體擁有的社會關係」(王玉佩、林之丞 2014：89)，進一步可被理解為「藉助於所佔據的持續社會關係網而把握之資源」(沈游振 2003：104；Bourdieu 2018[1986]：21)；象徵資本則係「由上述三種資本帶來之『聲譽』或『威信』」(沈游振 2003：105；Bourdieu 2018[1986]：18-19)。

根據布迪厄的「實踐」、「慣習」、「場域」及「資本」概念，王玉佩、林之丞以下列的算式總結四者的關係(王玉佩、林之丞 2014：89)：

$$\text{實踐} = [\text{慣習} * \text{資本}] + \text{場域}$$

質言之，在布迪厄的筆下，「實踐」的現實樣態深受「慣習」、「場域」及「資本」三項因素影響。雖然在布迪厄的論述中，個人的實踐(審美判斷、飲食偏好、休閒活動等)，似乎被其擁有的資本與階級慣習牢牢釘死(Bourdieu 2019[1984]：6)，布迪厄仍認為，「慣習」乃係客觀的社會結構與主觀的個體「實踐」間之中介因素，又三者相互影響，具有「辯證式的互動關係」(王玉佩、林之丞 2014：89)，以此調和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是故，布迪厄強調行動者即便受制於社會與歷史條件所形塑的「持久且可轉換的稟賦系統」(systems of durable, transposable dispositions，即慣習)，仍具備主體性與歷史創造力，不會讓人一味遵循機械式、決定性的路徑(Bourdieu 1990[1980]：41-55)。

綜上，基於村里尺度的政治現實與在地觀念框架(政治、性別等構面)，筆者將利用前述布迪厄思想的分析工具，探討「結構」與「行動」在三位村長政治實踐下的互動與

抗衡，並梳理三位村長在政治場域中，如何主動運用或被動轉化各類資本，形塑其治理實踐。

（3）三元時間

鄭作彧（2010）在探討當代社會的時間結構與時間政治議題時，主張當代社會的時間結構已由「標準時間結構」日益轉變為「彈性化時間結構」。他更指出，在上述「彈性化時間結構」中，由「薪資勞動工作時間」、「非薪資勞動事務時間」及「復原與文化時間」所構成的「三元時間」，較「『工作時間』與『自由時間』二分」能更好地刻劃當代社會情境（鄭作彧 2010）。

他指出，「資本主義生產型態的改變」與「法律的相應制定」使得傳統的「標準時間結構」，即一種對於時間「外在客觀的參照性約束力」（如對於人們「幾點該上班、幾點該下班、幾點該起床、幾點該吃飯」的規訓），有崩解的趨勢（鄭作彧 2010：249-250）。意即 Manuel Castells 所提到的：「時間不再像過往那樣有個既定的標準，它不指示生活如何運作，也因此不會告訴人們，其他人在什麼時候正在做什麼事」（ibid：250）。相反地，「彈性化時間結構」應運而生（ibid：251），讓人們「主動與他人進行協調，並且為了與他人的協調而自我規畫、組織生活，自己構築自己的時間結構」（ibid：250）。針對「工作時間」與「自由時間」的二元範疇，作者總結道：有許多不存在於上述二範疇之事務出現，而正是人們對於這些事物的處理能力，影響了「工作時間」與「自由時間」，讓兩者不再是彼此消長的互補關係（ibid：251）。

對此，作者引述 Jürgen P. Rinderspacher 所提出的「三元時間」概念（鄭作彧 2010：251）。「三元時間」分為取代

「工作時間」的「薪資勞動工作時間」、「非薪資勞動事務時間」以及取代「自由時間」的「復原與文化時間」。「非薪資勞動事務」之可能樣態如「個人工作」（如專業培訓課程之參與）、「照顧與養育」、「公事參與」（如工會會議之參與）及「政治參與」（如民意代表選舉之投票）（ibid：251）。

作者認為，「非薪資勞動事務」可能是由「薪資工作」延伸出的要求事務（如工作和公事參與），也可能是朝向「復原與文化時間」的準備事務（如照顧和養育）。換句話說，「非薪資勞動事務」是構築「工作時間」、「自由時間」之「構築時間結構的時間」（鄭作或 2010：251）。對於上述時間概念的肯認，蘊含著過去「『工作時間』與『自由時間』二分且對立」的邏輯有消解之可能（ibid：252），也暗含在當代社會的「彈性化時間結構中」，「縮短工作時間」與「延長自由時間」不應是首要考量（ibid：252）；反之，人們應活化並善用「非薪資勞動事務時間」，亦即在時間結構下，對各類事務進行更好的時間管理，以達成「時間富裕」，即一種「時間質的提升」（而非量的提升），依照自己的步調運作生活（ibid：252）。

最後，作者引述 Rinderspacher 的觀點，認為（良好的）時間管理與「足夠的時間自主性」高度攸關（鄭作或 2010：252）。另外，鑑於人類生活由互動交織而成，上述的「自主性」非指「任意地在任何時間做任何事」，而更大一部分取決於「人與人之間關於時間的『協調』」；換句話說，人們的時間安排決策仰賴其與他者的協商（ibid：252-253）。

綜上，有鑑於村長事務之多元性，且需面對多重利害關係人。筆者欲以「三元時間」概念深化討論，著重爬梳

三位村長在面臨各項村務，及非屬村務之私事等瑣事時，如何（有效地）安排時間，進而使其在多重場域所扮演之角色間取得平衡。此外，筆者將結合布迪厄思想，考察對於三位村長而言，「時間」是否蘊含其他可討論之面向，並探問「三元時間」概念是否有擴充之可能。

（二）區域文獻回顧

憑藉系上過往的田野基礎，筆者根據雲林縣四湖鄉墨墨村¹現任村長邱品蓉之從政脈絡，初步釐清四湖地方政治現況，並規劃針對主要受訪者之訪談內容。

品蓉村長生於中崙，隨丈夫至西濱生活。其父親當選墨墨村村長後，村長為幫助父親處理公務而回到中崙（蔡耀陞和何昀瑄 2024：154），並應邀投入社區營造活動，擔任中崙城鄉發展協會理事長（陳冠儒 2025：112；張瑜真、方宇祥、周哲瑋 2025：166；華叡民、蔡嘉軒、江冠螢 2024：379）。近年參與村長補選並當選（蔡耀陞、何昀瑄 2024：154），而擔任墨墨村村長至今。除政治工作外，村長亦兼營在地水產加工與零售業（陳冠儒 2025：115）。

首先，我們可從品蓉村長之經驗，類推討論三位女性村長之從政動機，及其如何以女性身分順利參選並當選村長。此外，對於村長一職，品蓉村長乃其父的繼任，其又在村長作為無給職的背景下，擁有水產加工與零售業等副

¹ 針對本文之地名體系，筆者就較攸關之化名說明如下：墨墨村、蓋亞村、米米村、羊村、格紋村、蘆葦濱為雲林縣四湖鄉轄下之村；中崙、風蔴澳雲林縣四湖鄉中之聚落舊名（傳統地域名稱）。

業。以上因素皆作為筆者探究三位村長從政脈絡（是否繼承男性親屬之政治遺產等）、經濟條件之重要基礎。

另外，過去研究亦提及品蓉村長「因照顧家人分身乏術，難以全心投入社區事務」（陳冠儒 2025：142）、「其女兒偶爾會回家參與社區營造活動」（華叡民、蔡嘉軒、江冠螢 2024：380）等，提供線索供筆者探問品蓉村長及其他兩位村長如何在家庭和政治工作的投入上取得平衡（妥善運用時間），其家庭成員又在村長的從政過程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綜上，根據過往之研究，筆者意識到村長在從政過程中勢必橫跳於多重場域、身兼多重角色，並面對各方之利害關係人。此外，筆者意識到除性別因素外，家庭（包括家人授予之政治遺產）、經濟對於爬梳三位女性村長之從政脈絡及治理實踐而言，同為本文之重要分析標的。

四、男性的影子？三位村長的政治旅程起點

三位村長的政治旅程，皆可追溯至其男性親友擔任村長時：

因為我爸爸²第一他不識字、第二因為村務有時候會比較廣，因為在都市裡的那一種（指村里長工作性質），我就不知道，但是在我們鄉下這邊，反正你芝麻小事就是疑難雜症都是要會要處理啦。有時候就是有一些資料啊、文書之類的就是我會幫他做這樣子，所以就是在一旁協助他，因為他做十三年，我就幫他十三年。
（田野筆記，墨墨村品蓉村長，2026/1/12）

² 全文所引用田野筆記內容之粗體字皆為筆者所加。

我以前是在木材行當會計，也是在在那邊，隔壁村做二十多年，做到我先生要選村長的那年，我辭職，他剛好當選，我在做文書的事，他就是用割草，整理整理村內的環境衛生。（田野筆記，米米村小賢村長，2026/1/6）

蓋亞村佳臻村長亦提及，其男性友人擔任村長時，「除了開會以外的 100%」都是自己在做。蓋亞村村民阿姨在談論佳臻村長的政治歷練時，也提到其「雖然是當一屆，但是等於有兩屆做的資歷」（田野筆記，蓋亞村佳臻村長，2026/1/8）。上述訪談結果顯示，三位村長不僅在其男性親屬當選後即現身於政治場域，更展現長期或／及高強度的村務投入。

綜整訪談所見，筆者發現雲林四湖女性參選村長高度仰賴男性至親在政治場域上的初露面。現任四湖鄉羊村浩文村長（化名）即提到，現任四湖鄉格紋村村長顧全（化名）為現任四湖村長中，唯一「（無男性至親擔任同樣職位之基礎）獨立參選」之女性（田野筆記，浩文村長，2026/1/14）。上述的實然，或可反映雲林四湖女性之參政仍受結構性限制，也讓筆者認識到過往學者何以多以「依夫型」，一種依附男性親屬的邏輯，來理解女性政治人物的從政脈絡。

五、村長如何與男性至親共作？

筆者意識到，三位村長與其男性至親不僅存在政治職位的先後繼承關係，更同時存在、互相交織於政治和家庭兩個實踐場域中。

承前節所述，品蓉村長和小賢村長敘述自己就任村長前與前村長的村務分工時，皆提及了「文書」這一項職務（田野筆記，米米村小賢村長、墨墨村品蓉村長，2026/1/6, 2026/1/12），促使筆者進一步考察三位村長及其前村長的村務和家務分工是否有性別化跡象。

筆者發現，即便當選村長後有村務在身，又縱然配偶已無外出工作的需求或負擔，仍能從這些女性村長的分工實踐中，看到「性別角色分化」從中作用。例如，當被問到與丈夫的分工狀況，或平常會一起做什麼事情時，小賢村長回答：「分工，有啦，路燈都是他在巡視的，我要去看，他說他要去看啦，我要去看，你就去看，阿他在巡視那個割草，也都在他在割」（田野筆記，米米村小賢村長，2026/1/6）。再細問小賢村長夫妻倆現在是否還開伙，與家務分工狀況，得到的回應是：「我自己煮啊！……反正他就三餐，你要準備三餐給他吃啦，然後他就負責，負責看路燈啦，割草啦，這樣啦」（田野筆記，米米村小賢村長，2026/1/6）。

小賢村長與其丈夫的分工實踐，頗能呼應威丞鄉民代表對於「雲林海線村長多為男性」（田野筆記，威丞代表，2026/1/9）現象的詮釋。代表認為，該地男性多擔負持家之責，因而多需出外工作，為勞力型勞動主要的提供者，女性則多操持家務（田野筆記，威丞代表，2026/1/9），與社會普遍潛藏之「男主外、女主內」的「公私分工」邏輯一致。

此外，雖然小賢村長幾乎每天中午都有送餐任務在身，如果家中臨時有事，村長仍時常要親力親為。面臨其所衍生出之「怕去太久回來，送餐來不及」的時間壓力，村長

則經常得選擇在下午處理家務（田野筆記，米米村小賢村長，2026/1/6）。呼應前述多位女里長在從政過程中，常因其社會角色常需平衡政治事務與家庭事務的挑戰，筆者亦看到小賢村長在與丈夫互動、分工中所浮現之「性別角色分化」色彩。然而，筆者同樣關注到，小賢村長雖需在政治場域與家庭場域間反覆橫跳，看似無暇他顧，甚或可能被兩個場域的規訓壓得喘不過氣，卻能透過善加配置其可用時間，使其不耽誤兩個場域所交付之任務，維繫多方社會關係網絡。

六、村長如何因應參選時的性別挑戰

佳臻村長提到，雲林縣四湖鄉二十一村中，僅有六個村的村長為女性（田野筆記，蓋亞村佳臻村長，2026/1/8-2026/1/14）。小賢村長亦表示，本屆米米村村長選舉中，除了自己以外，「其他三個（候選人）都是男生」（田野筆記，米米村小賢村長，2026/1/6）。承前節所述，筆者認為「公私分工」等性別態度，為該地村長出選、競選時，男性仍佔優勢的可能原因之一。

此外，筆者透過品蓉村長競選時的經驗，觀察到其身為女性在參選村長階段時，所遭遇的直接挑戰：

他會認為說嫁出去的女兒、不能回來這邊地方選舉啊。我就說我為什麼不能選？因為我戶籍沒有遷出去啊。我也是有這個資格為什麼嫁出去的女兒不能選，他們就會想說這裡是沒有人才，為什麼要一個嫁出去的女兒回來這邊當村長這樣子的啊。（田野筆記，墨墨村品蓉村長，2026/1/12）

上述的案例，實體現了女性參與當地地方選舉所面臨之多重身分困境。筆者認為，上述「嫁出去的女兒不應參選」的命題，蘊含一種高度父權化的宰制結構，又可拆分為兩個層次，二層次又互為表裡、相互成全：第一，對於「女兒」的強調是高度家父長中心的，在此，女性的主體性彷彿被一個更崇高的家父長霸權所掩蓋；第二，對於「嫁出去」的強調，更象徵女性在婚姻關係的建構後，成了丈夫（甚至是夫家整體）的附屬，更進一步拒斥了女性長久以來作為當地人的身分。

品蓉村長的至親，同樣也意識到村長作為女性，決定參選後可能遭遇的性別壓力：

因為我當初我要選的時候，我哥哥就有跟我講說你要承受住那種壓力，因為你那種壓力，不是說因為他會、他們會以你說你已經嫁出去的這個點來攻擊你啊。（田野筆記，墨墨村品蓉村長，2026/1/12）

儘管如此，面對前述的考驗，如同在訪談中展現的果決與堅毅一般，村長作出了不畏結構的參選決定：

我是可以承受，因為我知道會有這種情形啦、就是早就預料到了啦、但是我會認為說你就是要改變這個狀況，就誰說嫁出去的女兒不能回來在地方服務這樣子啦。（田野筆記，墨墨村品蓉村長，2026/1/12）

綜上，品蓉村長的參選歷程，深刻呼應了姜貞吟（2011）所指出的，「我國政治深受父系色彩主導」之格局。然而，這套客觀結構，並未將行動者完全封鎖於機械式的決定論宿命之中；正如布迪厄（Bourdieu 1990[1980]）對主客體辯證關係的肯認，品蓉村長透過動用長年累積的治

理實踐及行政慣習的內化，建立其主動投入墨墨村村長補選的底氣，最終順利當選，在既存的父權結構縫隙中展現了主體能動性。接著，筆者欲將視角切換至三位村長正式投入村務治理的階段，試圖探究三位村長當選後所遭遇的性別化挑戰及其脈絡。

七、村長如何抗拒傳統陽剛治理邏輯？

就我國地方政治場域盛行的喝酒文化而言，品蓉村長意識到，「喝酒搏感情」顯然是一種男性（兄弟）間的感情及社會關係維繫方式；在政治場域中，喝酒的場域無形之中開創了一種磋商的平台，讓行動者針對其所謀求的政治利益（可能包括其治理區域的建設案等）進行協調與議合。

然而，身為女性的一員，品蓉村長也認識到，由於本身的「不會」，與「不想要」巴結別人的考量，導致其（甚至其他大多數女性）「沒有辦法」融入該場域的男性，甚或喝酒文化本身（田野筆記，墨墨村品蓉村長，2026/1/12）。

此外，佳臻村長亦表示，為了「自持」與維護「尊嚴」，儘管在村務與廟務的經營過程中，常有喝酒應酬的場合與需求，自己也「堅持」不喝酒（田野筆記，蓋亞村佳臻村長，2026/1/8-2026/1/14）。質言之，喝酒文化在政治場域中具備陽剛性；然而，筆者看到兩位村長在深思熟慮後，將自己排除在喝酒文化圈圈的安排與硬氣。

誠然，如同林宣佑所述，為因應性別化社會對女性的潛在規訓（如社會對於女性服儀之傳統期待等），女性採取（包括身體相關）之論述策略大多具備跳脫與妥協既定框架的雙面性（林宣佑 2024：85）。例如，林宣佑發現，即便某些研究對象不採納傳統女性政治人物的形象管理策略，

仍需盡力符合父權為政治場域設立大原則，即「不能太醜也不能太美」，而這些女性政治人物受到（並意識到）自己的外表持續被社會的放大鏡下被公開檢視，進而形塑兼具抵抗與協商的形象管理實作策略（林宣佑 2024：85）：儘管某些女性政治人物穿著並表現中性，試圖淡化性別差異、破除性別二元的邏輯，仍能見其實然層面上的男裝化傾向，可能反過頭來強化政治場域的陽剛霸權（林宣佑 2024：76）。

承接林宣佑的討論框架，筆者認為兩位村長抵拒喝酒文化之策略，同樣展現了跳脫與妥協的雙面性：兩位村長在拒絕喝酒這一傳統陽剛政治實作時，也默默肯認了女性之於喝酒文化，實有涉入的不利因素（如可能有損其尊嚴等），其於喝酒場合中的不在場，某種層面上再生產了在政治場域中，「喝酒為男性專屬」的預設框架，再製了傳統政治的陽剛運作邏輯。

儘管如此，兩位村長的經驗促使筆者進一步探問：尚存在哪些因素，讓兩位村長具備堅決拒絕喝酒文化的資本？在政治場域中，這些因素又可能如何賦予三位村長能動性、扭轉政治實踐的傳統樣態？

八、「經濟資本」賦予女性村長硬氣？

本章節，筆者將試圖論證，「經濟資本」為三位村長在面臨性別化限制等挑戰時，所能抵禦自身、展現能動性的可能資源。

根據地方制度法，村長係無給職，惟支領事務補助費（立法院 2025），用於「推動各項村公務、服務居民（包括社政、兵役、警政、營建、消防、衛生、環保、農漁業、

選舉等領域)所需費用」(立法院 2024)。而根據最新法規，每村每月之村長事務補助費為新臺幣五萬元(立法院 2024)。

當問及事務費及其運用狀況時，佳臻村長表示：

村長是無給職的，就是那個每個月的錢叫事務費，就是花在這些各方面，就是，譬如說剛剛不是有一個行程消防隊嗎？那我們去參加，我們也要包一個紅包贊助啊。然後我們地方所有的廟、神明，我們自己蓋亞村的廟、神明生日啊。村民會邀請你去啊，他們一個部落一個部落都有他們的部落的廟啊，他們的信仰中心啊。然後我們去參加的時候，我們也要包紅包啊。

(田野筆記，蓋亞村佳臻村長，2026/1/9)

顯示村務治理脈絡下，存在許多可能需動用事務費的場合。

有鑑於此，筆者進一步詢問是否有事務費不足以支應、需要村長「倒貼」的情況。雖佳臻村長沒有直接談及自身經驗，卻也回覆：「有的會、有的會喔，所以村長是那個、那個慈善事業。」(田野筆記，蓋亞村佳臻村長，2026/1/9)反映有些村長在村務實踐中不僅無經濟之利可圖，更可能需將自身在其他場域所累積之資本，挹注所治理之村落。

又如前述，涉入「喝酒文化」這種政治、經濟型磋商手段，實為政治人物面臨有限資源，所可能發展出的策略之一，「村長為無給職」與兩位村長「拒絕喝酒文化」促使筆者進一步考察，三位村長擁有哪些「經濟資本」？在村務治理的脈絡下，「經濟資本」又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別人我是不知道，我是都倒貼啦。」(田野筆記，墨墨村品蓉村長，2026/1/12)

承接前節所述，品蓉村長是三位村長中，唯一一位目前沒有舉辦（任何形式之）長青食堂，或參與南屯宮便當計畫的村長。然而，2025 年年末，品蓉村長應金邊快炒蔡老闆之邀，協辦中崙的關懷據點，除了開辦相關課程供村落長者參加外，更提供餐食（田野筆記，墨墨村品蓉村長，2026/1/12）。

關懷據點落地前夕，在與金邊快炒蔡老闆討論餐食問題應如何解決時，品蓉村長當時表示：「有空的話，我會去幫你幫你（金邊快炒蔡老闆）稍微煮一下。」（田野筆記，墨墨村品蓉村長，2026/1/12）應老闆之邀協助籌備。此外，承接前段所述，延續先前舉辦長青食堂的經驗，以及村長個人的堅持，對於關懷據點的餐食，品蓉村長表示：

我通常辦都是吃到最好。我不會想說委屈他們，也不會委屈我自己啦。因為我通常就是說辦就是要辦得好，不要讓人家覺得說你根本就沒有誠意在辦這個活動。即使以後辦不成啦，你至少也不會讓人家講說你辦得不好或者是吃得不好。我不會這樣想。所以……（如果有時候我覺得東西不夠豐富），我就會另外再加一些比較好的東西進去。（田野筆記，墨墨村品蓉村長，2026/1/12）

然而，儘管仍有縣府的補助款支應，關懷據點實為私人發起之活動，非屬正式的村務治理範疇，且參加者橫跨墨墨村和米米村兩個村落。因此，當被問及據點的財務狀況，與村長的事務費是否得以動支時，品蓉村長表示：

你是說關懷據點嗎？事務費我沒有用在那個地方，那就是我私人出的。……因為關懷據點他的補助款只是（餐費）。我今天想要讓他們加菜吃好一點，我可能私

底下自己買、自己贊助的。所以那個（事務費）跟那個沒有關係。（田野筆記，墨墨村品蓉村長，2026/1/12）

上述的訪談內容，可見品蓉村長因個人選擇，在村務治理上自掏腰包的鮮明例證，更可見其透過公私合力的方式，將治理的觸角延伸到正式村務以外的照護及關懷服務上，深化村里的經營。承接前段之探問，基於這樣的「倒貼」現實，筆者將以三位村長的生命經驗出發，探討是怎麼樣的經濟基礎，得以支撐其經常可能需「倒貼」的治理實作。

九、「金錢」與「時間」共同作為「經濟資本」

對於品蓉村長，筆者根據系上過往的田野基礎得知，品蓉村長家中有水產加工與零售業。因適逢產季，筆者初抵中崙時，品蓉村長因忙於水產加工事業，無暇在第一時間接受訪談。上述的發現，除印證村長當前仍身兼多重角色外，更提供線索供筆者探問，村長憑藉這些產業所累積的經濟基礎是否為支撐其「倒貼」治理實踐的「經濟資本」。

除了家中的產業基礎之外，當進一步談到品蓉村長的參選動機時，村長引述其與丈夫的溝通內容，映證家中的產業基礎（及丈夫的經濟狀況）帶給其相當大金錢上的經濟自由；亦說明其可能有一定的時間自由，能相對彈性地安排其可用時間：

我老公說……你（在父親那任）已經做習慣了。反正也沒事做啊，反正你就選一下。有選中就做這樣子。沒選中……（就）打零工隨便做一些事這樣子。（田野筆記，墨墨村品蓉村長，2026/1/12）

此外，對於水產加工事業，村長透露該產業的經營能為其帶來一定的經濟利益，惟自己（尤在產業旺季時）仍須付出一定的時間成本及勞務投入。

對於品蓉村長的家庭狀況，系上過往的田野提到村長育有兩個小孩。本次田野，筆者未對村長小孩的狀況進行深入的了解，惟可藉由過往田野結果及本次田野觀察推測老大應已大學畢業、老二正就讀高中。雖兩個小孩可能尚未經濟自主，但如老師詢問村長「如此投入村務，小孩子會不會抗議」時品蓉村長的回覆：「也不會啦我小孩子大了，還好啦」（田野筆記，墨墨村品蓉村長，2026/1/12），更如筆者訪談（尤其詢問家庭相關問題）及觀察時，村長鮮少提及兩個小孩可間接得知，兩個小孩應已脫離村長需投入密集注意力的階段。

另外，在了解佳臻村長的生命經驗時，筆者更能看到佳臻村長憑藉其過往的工作與創業經驗，累積深厚的財務基礎。村長提到，自己年幼便離開四湖，完成學業後則赴富士就業，在 80 年代工業蓬勃發展的背景下，出社會不久有足夠積蓄，並「在富士買房子」、獨立扶養小孩。隨著我國與中國大陸在產業上的競爭日漸加劇，村長離開了原本的產業，利用自己所累積的經濟資本，先後投入多項餐飲等事業，並赴稻豐展業。了結生意之後，村長輾轉回到故鄉風蕨澳，認識了從事畜牧業，並在日後投入村長選舉的事業夥伴（田野筆記，蓋亞村佳臻村長，2026/1/8）。

之後，村長憑藉過往的經驗基礎，建立了其專屬的畜牧事業，並親自投入村長選舉。此外，在風蕨澳的南屯宮休閒大樓落成之際，村長亦主動進駐休閒大樓的攤位，銷售南屯宮相關文創商品（田野筆記，2026/1/11）。就村長長

期投入的畜牧事業而言，根據筆者的觀察及村長所述，每期的收成雖會受天氣、飼養狀況等有些微波動，但只要針對幼仔提供一定的密集照護（如定期補水、換草、照燈、控制活動範圍等）（田野筆記，蓋亞村佳臻村長，2026/1/14），收成時收益尚可（田野筆記，蓋亞村佳臻村長，2026/1/14）。

另外，村長提到，自己的小孩皆已經濟獨立，毋須擔心其經濟狀況（田野筆記，蓋亞村佳臻村長，2026/1/8）。

綜上，筆者欲憑藉品蓉村長與佳臻村長的經驗，擴充布迪厄「資本」的內涵，並與「時間」的概念相連繫。筆者根據品蓉村長投入時間於水產加工事業，與佳臻村長投入時間於畜牧事業，以累積經濟（金錢上的）資源，主張「可用時間」本身即具備經濟性，若非布迪厄筆下的「經濟資本」（「生產要素」的其中一個範疇，與土地、工廠、勞動、貨幣等價），即為行動者在「勞務」活動（前述「生產要素」中的「勞動」）中，產出「經濟資本」（如經濟財產、各種收入、各種經濟利益等）的必要媒介，在經濟活動的價值創造過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為求討論精簡，本文逕將「可用時間」視為一種「經濟資本」。

十、「經濟資本」轉化為「密集照護治理」實踐

承接前述對於「密集母職」之討論，筆者在前述的訪談結果中，得知品蓉村長與佳臻村長已毋須密切關注其子女；此外，筆者亦得知小賢村長雖育有三名小孩，但皆已成家並赴臺中打拼，更有四名孫子女（田野筆記，米米村小賢村長，2026/1/6）。筆者主張，上述的實況說明，三位村長在私領域已不受強大的「密集母職」論述規訓，而能

將「時間」由狹義母職的實作抽離出來，投入在工作、創業、追求自我實現等構面上。

結合「密集母職」與村務治理，筆者提出「密集照護治理」之概念。筆者主張，「密集照護治理」非一種強力、關於治理的社會規訓，而是三位村長共同展現出的一種治理樣態，係指村長將村民視同家人（長輩、平輩、晚輩等），並如同實踐「密集母職」一般，投入龐大的時間、精力以及金錢於村民的照護過程之實作，以確保村民各項發展的健全。

筆者將由以下田野材料論證，基於四湖的人口、性別結構等既定因素，及當地對於性別角色的期待，三位女性村長的「經濟資本」與村務實踐共融，交織出一種高度性別化的「密集照護治理」治理樣態。

承接前述小賢村長發揮時間管理能力、在家務和村務間取得平衡，筆者初訪小賢村長時，方得知南屯宮於 2025 年 4 月開辦「便當計畫」，提供有需求的村民每人每日一個便當（例假日除外），且米米村參與其中（田野筆記，米米村小賢村長，2026/1/6）。筆者以下將展示，小賢村長如何憑藉高密度的「時間（一種經濟資本）投入」，實踐「密集照護治理」。

據佳臻村長所述，南屯宮便當政策的本意，為回饋風蕨澳過去曾大力協助廟務，然現已年邁的當地居民：

（筆者詢問南屯宮推動便當計畫的緣由）我們主委是昨天也有提到這個啦，他說這些人從年輕都是在廟裡面幫忙啦、或者是會初一十五來拜拜啦。他們這麼多年了，他們現在老了，我們照顧他們一下也是應該的，我們主委也是前兩天有提到，剛好有提到這個，他的

想法，就是廟對地方的一個回饋、給他們方便，他們我們這邊真的年紀大了，體力不好……。(田野筆記，蓋亞村佳臻村長，2026/1/9)

此外，南屯宮也將計畫的範疇拓展到羊村、蘆葦濱、中崙等村落，讓村中的高齡者和經濟困難者，得藉由支付低廉的費用（低收入戶甚至免除）獲得新鮮、營養的餐食。筆者認為，該計畫顯然補位了我國長照 2.0 政策下的長青食堂措施，讓各村村長與南屯宮共同協作，以相對有效率的方式解決村中高齡者的飲食問題。

對於「便當計畫」的配套，小賢村長提到，自己有「在幫老人送餐」(田野筆記，米米村小賢村長，2026/1/6)。田野期間，我們有幸能騎乘摩托車，偕同小賢村長逐戶送餐，見識到村長的送餐舉措展現了高度的身體勞動、情緒勞動與時間投入。筆者認為，縱然送餐對象之年紀大多與小賢村長相仿，村長的作為，樹立了中崙居民眼中，悉心照護村民的「家人」形象。

雖便當計畫提供的餐食為午餐，參與送餐當天，筆者仍在一大早便前往村長辦公室報到。村長先是與我們前往蘆葦濱，領取南屯宮送來、供應蘆葦濱與米米村的便當。村長爾後以熟練的動作，將三十一個便當裝載到摩托車上，開啟了平日例行的送餐之旅（田野筆記，2026/1/7）。

品蓉村長於訪談中提到，米米村的村落較墨墨村零散。跟隨送餐途中，我們眼看村長每日花費一至二小時，騎經海岸線旁偌大的風機，也深入較為內陸、錯綜複雜的巷弄，只為將一個個熱騰騰的便當，親自交予村民的手中。過程中，村長大多在打招呼後進入村民家中，若家中無人招呼，村長大多將便當放置在村民視野可及的固定位置；若家中

有人招呼，村長總會視情況與村民寒暄幾句，同時向村民介紹筆者（田野筆記，2026/1/7）。

此外，根據筆者發現與村長所述，送餐對象有很大一部分為喪偶之婦人，與品蓉村長及佳臻村長所提及，各自村落中「喪偶之高齡婦人多」的敘述不謀而合，反映三個村落應有相似的高齡人口結構。筆者更發現，相比於男性送餐對象，村長明顯與女性送餐對象更有話聊，更常在過程中駐足於幾位女性村民家中。譬如，當為某位女性村民送餐時，村民正在大門旁的小桌用膳，村長將便當拿入村民家中，給予村民後，順道詢問其煮了什麼東西，並提醒他為了保暖應多穿一點³（田野筆記，2026/1/7）。

另外，村長在送餐過程中，也提到了村中青年的就業狀況，並對不願意就業的青年村民表示高度關切（田野筆記，2026/1/7）。綜上，筆者透過上述的材料，主張小賢村長在送餐過程中，透過長途騎行的身體勞動、寒暄關懷、視村民如家人的情緒勞動，與在過程中投入的「可用時間」，促使其在場於送餐村民每日時間中的片刻。筆者認為，猶如為家人送餐並對其加以叮囑一般，村長的舉措顯然已使送餐，及其自身的在場，成為村民生活中難以割裂的一部分，模糊了公私領域的藩籬。

除了每週協助準備「關懷據點」的餐食外，在「帶村民買貼身衣物」、「載村民拿年菜」等案例中，筆者看見了品蓉村長實踐「密集照護治理」的展演，更察覺到某些實踐透出的濃烈性別色彩。當談及中崙村民的生活時，品蓉村長憶起過往被村民要求陪伴買內衣的經驗：

³ 本段內容已經過必要之去識別化處理。

啊有時候他們做無理的要求，無理的要求就是叫我開車，帶他們帶他們去買內衣啊。這是無理的要求，叫我帶他們去買什麼買什麼，這樣子.....有時候去大同啊去哪裡去太湖啊哪裡哪裡.....他們有時候會問我說我有沒有要出門啊。娶媳婦啦、要買新衣服啊，什麼的都嘛叫我帶他去.....（村長提到陪同女性村民購買貼身衣物之細節）。（田野筆記，墨墨村品蓉村長，2026/1/12）

筆者認為，「買貼身衣物」在社會既定觀念下為相對私密的活動，故「陪女性村民買貼身衣物」乃一高度性別化的舉措。鑑於該活動的私密性、社會既存的性別框架，與傳統上村民（被治理者）與村長（治理者）間存在的權力不平等關係，「陪女性村民買貼身衣物」的行為在當今時空環境下實難以為生理男性村長所實踐，品蓉村長的經驗顯示，村長的性別屬性，實確立了某些（性別化）治理實踐為其可為或不可為之性質。

接著，由於上述的案例僅展現村長與女性村民的互動，筆者欲進一步追問男性村民是否會提出得以類比的要求。村長回覆：

其實沒有，他們只是說ㄟ路燈壞了，來跟我講說他們的路燈壞了，不然就是說公所有什麼事情要做，或是拿藥之類的，他們會來問我，或者是說他們接到公文不會看就叫我，或者是說他們要寫什麼東西，不會寫，叫我幫他們寫這樣子的，其實還好。（田野筆記，墨墨村品蓉村長，2026/1/12）

對比男／女性村民所提出的日常需求，並對照村長實際展現的陪伴舉措（如「陪女性村民買貼身衣物」等）或

可反映村長及村民在價值觀及行動上，仍服膺某種性別角色期待。

佳臻村長的「密集照護治理」實踐，則可見於其針對罹患重症的村民，所施展的高強度關懷行動中。村長提到：

就比如說，之前有一個（村民），他生病了嘛，然後剛剛那個……（另外一位村民）就打電話說啊，那個（村民）在難過，說那個（村民）身體不舒服……我就過去看……。

救護車來了之後，他們就用擔架，把他抬上……然後……我就幫他把臉盆啊、牙膏、牙刷、毛巾、衛生紙啊，鋼杯、保溫杯嘛，那些拖鞋，要住院要用到的東西，毛巾什麼基本的都幫他準備好，要拿給他，然後他就……他很痛，然後我跟他（家人）聯絡……。

……救護車的人就說要健保卡，我就幫他把皮包拿出來……然後我跟他說你現在行動不方便，我先幫你放（一些錢），在皮包裡面應急就好，剩的（另一部分錢）我幫你交給你（家人）這樣好不好？我跟他（家人）從來沒有見過面，也沒有聯絡過，就在那個時候跟人家要的電話，然後他就說好、好，他就送去醫院了。

然後他那個房子（村長談論該村民之居住環境等細節）……他去醫院之後，我就去拿了好幾個大垃圾袋去幫他，把不要的東西收一收，像廚餘啊什麼分類啊把它裝一裝。

（問：你自己嗎？）

對，然後把他的衣服，他就兩間，一間房間一間就是類似廚房嘛，我就幫他把那兩三間整理好，就他的衣服，我都幫他稍微摺起來，就是髒的跟乾淨的分開摺

好，棉被摺好棉被上面的那個髒髒的就幫他掃一掃，反正就都整個都幫他整理，到地板都拖過，就整個就是煥然一新了啦。我想說他出院回來，可以有一個舒服的居住環境，而且後來他就沒回來了，他就去世了。

但是就是我當村長（哽咽）……就是會覺得說這些老人，就看他們一天天老就覺得捨不得，對、對啊。就是把他們當成家人了。（田野筆記，蓋亞村佳臻村長，2026/1/9）

在上述的案例中，我們可由「幫忙準備住院用品」、「代為保管現金並轉交家屬」、「協助清掃居住環境」等例證中，看到佳臻村長實踐一種親屬式的「密集照護治理」展演。由村長和該村民的兒子素未謀面，但村民仍願意將錢包裡的現金交給村長，並由其代為轉交予兒子，可知村長憑藉與村民的長期互動，打破傳統政治人物與人民間之疏離感，而與其建立蘊含深刻信任之關係。村長在急難發生時的即時到場，更補位了不在當地的家屬，以親屬的姿態協助管理財務、處理突發事宜；而由「幫忙準備住院用品」、「協助清掃居住環境」的事例，則可見村長走出辦公室，跳脫官僚框架與村務的既定範疇，以實際且跨足村民家內的照護舉措，用心、務實地解決村民的（家庭等）生活大小事。

綜上，筆者主張，小賢村長每日花費數小時分送村民的便當、品蓉村長載村民前往鄰近鄉鎮採購，與佳臻村長動用高度情緒勞動與身體勞動，安置罹癌村民相關事宜，皆在在體現「密集照護治理」實踐所要求的高度「（經濟上的）時間」投入。品蓉村長與佳臻村長在財務上的「經濟基礎」，也說明其何以能將可釋出的經濟資源（包括時間、

金錢等）投入該項實踐，並透過性別化勞動，建立親屬形象，最終累積村民的信賴、成為村民家門以外的依靠，建立了一種布迪厄筆下的「象徵資本」。

十一、村長的「整合治理」策略

「密集母職」主張，對於孩子的照顧應當親力親為，無法輕易交由他人代勞。然而，除了實踐「密集照護治理」，筆者在當今社會及村務治理所蘊含「彈性化時間結構」的構框下，看到三位村長將「整合母職」的內涵埋藏進其治理邏輯中：三位村長透過適當發包、平衡村務與個人生活等舉措，編織出蘊含「時間管理」的一種「整合治理」村務治理策略，使其在有限的時間下，透過己身外的可用資源，務實、高效地解決村民的問題。

除前述小賢村長經常透過自律的「時間管理」，在短暫的白天時間挨家挨戶送便當，並載丈夫看醫生外，對於村務，分別負有畜牧、水產加工與零售業相關事務的佳臻村長和品蓉村長，則將有限的時間錨定在真正需要他們的事務上，不僅鞏固了他們對於產業的時間投入，以及其進一步轉化之，作為「密集照護治理」實踐基礎的「經濟資本」，更讓其不受村務所累，能利用剩餘時間，追求其他構面的自我實現。

面對過往長青食堂政策及南屯宮「便當計畫」的餐食分送問題，佳臻村長的策略，除細膩地關注到蓋亞村地理條件，對於高齡者取餐所帶來的可能限制，亦解放了個人的時間，更活化了村中的人力：

那個是長照 2.0，裡面有、他有一個比例，就是有多少多少長輩配幾個廚工這樣子，然後就因為我們這邊算

是比較每.....我們分布的太散，所以我們你說老人家風這麼大，你要叫他去據點吃飯，不可能嘛。下雨天、大熱天，他們他們也是都不良於行、交通都不方便了，是，所以我們就是比較人性化，就是我們會請一個司機送便當的方法，就是可能說欸這一撮、那一撮人就在這裡拿便當，所以我們的拿便當的地方大概有七八個，將近十個喔，就是請老人到分別據點的去拿便當，有一個人在顧便當這樣。(田野筆記，蓋亞村佳臻村長，2026/1/9)

我們現在就是我們不是會有便當到每個據點嘛？那我就每個據點會交代一位長輩，說誰沒出來拿便當，你要跟我講一下，我要追蹤他去哪裡，我也不可能每天都去巡邏，如果有人沒有出來拿便當，我就會去看他是在家裡，還是小孩子載出去了？然後他們的小孩我都有建立電話，都會跟他們保持有 Line 的聯絡電話，通聯的那個方式，如果找不到老人的時候我就會問他們小孩，說你有帶你媽媽出門嗎？如果沒有我們就會開始找人，如果有的話，我們就 ok 啊。掌握他安全、確實安全這樣子。(田野筆記，蓋亞村佳臻村長，2026/1/9)

受限於村落地理條件、居民住宅分布、與己身時間的多重限制，小賢村長的逐戶送餐策略，對於佳臻村長顯然不可行；另外，村長觀察到交通上的不便，導致高齡者難以前往據點領餐。因此，村長透過請人協助送餐、顧餐的舉措，解決了餐食分發的問題，更使其將可用時間投入其他更為迫切的事務中（如在訪談時，村長經常須透過零碎時間撥接電話，解決突發狀況）。然而，村長將送餐委外的舉動，絕非規避其身為村長的責任，反倒透過村落長輩的

轉達，在幕後密切追蹤村民的動態，並建立完善的配套機制，讓村長在必要時刻能聯絡上相關的家屬。

綜上，如同佳臻村長所述：

其實就是老人跟老人也會互相關照啊。以後我們這個社會到你們這一個年齡層、年紀大的時候，因為現在小孩子更少了，就更會有這樣的需要互相的照顧。(田野筆記，蓋亞村佳臻村長，2026/1/9)

佳臻村長的舉措，實將村里中微不足道的分發餐食舉措，轉化為一種遠端關懷的治理樣態，更善用村中高齡者相互關照的習慣，編織出一張結合村長與村民的安全防護網。

品蓉村長的「整合治理」邏輯，也可見於其對村民餐食的想像及實作的樣態中。承前所述，當談到為何不參與南屯宮「便當計畫」時，品蓉村長根據過去開辦長青食堂的經驗表示：

一個便當只（能）吃一餐，那你晚餐怎麼辦對不對？你晚餐、你晚餐他不是還要再重煮嗎？但是如果你是（有人）自己煮的話，你中午煮多一點，你可以晚上的時候你可以再（拿）出來川燙一下，就可以再吃對不對？你送一個便當、你中午吃一個便當雖然很方便，但是你晚餐怎麼辦？有些老人家只好就只有吃一半、吃一半之後吃，另外一半就留給晚上吃這樣子。(田野筆記，墨墨村品蓉村長，2026/1/12)

後來做到送餐的時候，我當村長的時候，那個鄉長就問我說為什麼我不做，你知道嗎？為什麼因為他們現在有中央廚房嘛為什麼我不做，還有送餐，我說我要

怎麼做，有一餐沒一餐的，我要怎麼做？（田野筆記，墨墨村品蓉村長，2026/1/12）

綜上，品蓉村長表達出對村民餐食的擔憂。然而，村長發揮其過去投入社區營造的資源媒合經驗，主動且負責任地為村民穿針引線，最終尋得一個保障村民餐食，更進而保全「時間自主」的共好解方：

所以後來我後來想一想.....我應該換個方式，因為最早我當村長的時候，我就會去針對說老人家特別需要說，因為譬如你有殘障手冊嘛？我們現在政府補助80%，如果你有你是低收入戶的話就是全額補助嘛。你的送餐服務還有你來居家照顧、煮餐食，其實那個都是不用錢的，你倒不如為什麼不請紅十字會，或者是這些日照中心出來幫你煮餐食。（田野筆記，墨墨村品蓉村長，2026/1/12）

不然就是他幫你送餐，他送餐有早上、有中午跟晚上，後來我當村長的時候，我就幫十幾戶的老人家，我就去做申請，我就問他說問他們子女需不需要，如果你需要居家服務來幫你煮飯，我就去幫你申請，你只要年齡到、有那個資格符合，其實一個月才一千多塊而已，一千多塊很便宜啊。你至少不用自己煮嘛，你菜你準備給他煮、你準備多一點是不是可以吃兩餐新鮮的.....我就會跟他的子女聯絡有送餐的服務這樣，因為子女這些，其實這些資訊子女都知道，他們也都會打電話給我說，啊村長你就幫我，所以我就說嘛。我常常在講說我幫很多人當申請人，如果有一天我村長不幹了，你那些資料全部都要改，是因為我一旦不做了，不可能你聯絡還要聯絡我，不可能嘛！（田野筆記，墨墨村品蓉村長，2026/1/12）

透過盤點現有資源後的周全考慮，品蓉村長認為，真正能高效解決村民三餐問題的方案，乃委託紅十字會等組織協助村民準備餐食，能提供較多元、彈性的餐食方案。最後，根據前述，村民的子女實知道相關的方案，也願意讓自己的父母參加，端賴長輩的意願決定是否參與。在這個案例中，如同佳臻村長「教育」村民一般，筆者看到品蓉村長憑藉熟練的情緒勞動技巧，從中斡旋、補位說服，進而促使村民加入相關餐食方案，在妥善解決問題上展現高度的積極度。

綜上，在上述的案例中，對於村民所遭遇的大小問題，佳臻村長實時追蹤村民動向，與品蓉村長「幫很多人當送餐計畫的申請人」一般，實在確保問題解決的前提下，樹立己身的當責。如同實踐「整合母職」的母親一般，兩位村長藉由爬梳問題內涵、分類事件的輕重緩急，並展現相應的「時間管理」技巧，在多元龐雜的村務與個人生活的交織下，善盡身為村長之責。

十二、「密集照護治理」造就村長的家人形象

奠基於三位村長的「密集照護治理」實踐，筆者將透過更多田野材料，再次論證三位村長成功突破公私領域界線，成為村民實質意義上的家人。

佳臻村長在敘述自己何以能獲得村民的肯定時，提到：

因為我就像他們的女兒啊。就是對啊我都把那些長輩，我不會嫌老人家，年紀大還是囉嗦，什麼就會跟他們當成，好像平輩一樣的朋友，不高興，也會他們做了，讓我覺得不高興的事，我也會教訓一下，老人家也是要教育啊。比如說太固執了，不配合子女的那個……

譬如說身體不舒服了，小孩子要叫他這樣那樣，他也不要，然後要請居家也不要，然後就會產生矛盾，那我們也會跟他教訓一下，說你不要這樣啦（村民阿姨：居中協調）。小孩子在外面，人家就是牽掛你，其實老人家其實不要說服他很難，就只能說順著他，找盡量可以的（方法）……找看看，可以比較讓小孩子也不會那麼煩惱啊。他也不會太……老人家也不會太遷就的那種方法吧。（田野筆記，蓋亞村佳臻村長，2026/1/8）

筆者認為，如同佳臻村長針對罹患攝護腺癌村民所施展的高強度關懷行動，「將村民視作家人」早已內化在村長的治理邏輯中。此外，這樣家人式的治理邏輯不代表村長必須不遑抗地滿足村民的大小需求。在上述的案例中，對於高齡村民及其在外子女意見上的不一致，若高齡村民的意見或行為可能有損其長遠利益，或可能加深其在外子女（作為主要照顧者）的擔憂，身為其「在風巖澳的家人」之一的佳臻村長，經常需扮演居中協調的角色。同時，雖然村長的年紀可能較某些高齡村民為輕，仍以一種理智、不屈從的姿態，教育高齡村民較為正確的觀念，保障其長遠利益，也讓其在外打拼的子女無後顧之憂。

接續「帶村民買內衣」的經驗，品蓉村長亦提及自己「協助辦理村民喪事」的過程：

我們要做的是更接近村民。你懂我的意思嗎？他生病了，我們去看他，他沒有辦法去看醫生，我們開車載他去，他們家辦喪事，我們也要去幫忙，就是大大小小的事都要參與啊。後來……就是換我接村長的時候，這件事情我一定要接下去，你看我當村長，喪事從頭到尾我都要包到尾，如果只要我有去看、他拜託我的

話，買棺材買那個甕、做師工，反正我就是要管就對了啦。因為他只要來拜託我說，這些喪事讓村長處理，我就要從頭到包到尾，就是兩天、有時候沒去他家，或是常常晚上都要去跟他商討說，你後面的喪事要怎麼樣、儀式要怎麼樣，你要怎麼樣拜怎樣怎樣，反正到最後的那個拜的啊、村長都是要幫他處理，因為我的觀念就是說，你敢要求我就會幫你做，但是如果你不要求的話，你沒有來拜託我，我是不知道你的需求是什麼，但是你有這個需求、你只要在我的能力範圍內，再說不要說危害什麼，我就會幫你做這樣子。所以我做的事情，你知道哪個村長會去做喪事做得……我去幫他守靈。(田野筆記，墨墨村品蓉村長，2026/1/12)

上述村民舉辦喪事時，自己經常要「從頭包到尾」，協助安排相關器物與儀式，甚至以「在地村長」的身分幫故人「守靈」的事實，在在展現品蓉村長對於村民而言，絕非傳統上理性、有一定距離感的政治人物，而是交織在村民生命的非血緣家庭成員。

十三、「真實服務」可消解參政的性別限制

那時候我村裡沒有認識多少啦，就是他當村長，我們來去服務這樣子，知道那些、一些名字、什麼名字、誰家裡有什麼人這樣子，才慢慢了解。(田野筆記，米米村小賢村長，2026/1/6)

當被問及中崙的政治生態時，品蓉村長坦言當地的政黨色彩仍濃厚；然而，當談到村長何以獲得村民支持時，品蓉村長透過換位思考，引述村民的觀點，強調「服務」的攸關性：

我說就說村長跟其他選舉是不一樣，他跟代表議員選舉不一樣，村長你要走進去你的心，你懂我的意思嗎？你要走進去他的心，他們才會不管你是什麼黨，他們才會投你，因為他看到你有在做，所以他才會投給你，才會支持你這樣子（田野筆記，墨墨村品蓉村長，2026/1/12）

他在車上就跟我講，說做得好，我們一樣會支持你，但是你做不好的話，我們一樣會背叛你，你沒在做我們也不會投給你啊，但是你們在做我們就是有在看，所以我們才會支持你，所以我就說我做十三年，不是白幹的。（田野筆記，墨墨村品蓉村長，2026/1/12）

另外，筆者進一步詢問，女性在四湖參選村長或村民代表，是否會遭遇性別劣勢時，小賢村長更直截了當地回答：「你如果有長期住在村子裡，有在服務都 ok 啦。你如果沒有住在這裡，你要大家去跟人家拼啦。」（田野筆記，米米村小賢村長，2026/1/6）

在談及村長一職時，金邊快炒蔡老闆以「親自接送（家人）上下班」（田野筆記，蔡老闆，2026/1/9）為比喻，「真實服務」（田野筆記，蔡老闆，2026/1/9）是村長得以「走入村民的心」（田野筆記，蔡老闆，2026/1/9），獲得民意支持的關鍵。誠然，三位村長在政治場域的各個向度中，仍面臨多元性別框架之規訓；然而，由上述村長的經驗可見，在四湖的脈絡中，性別本身並不構成排拒女性進入村長之「參選人才庫」與「合格人才庫」的決定性因素；反之，盡力做好每件事的「真實服務」，不但構築村長的治理實踐，更開創了女性在陽剛政治場域，與各方利害關係人共作更美好村里的可能性。

十四、綜合討論

（一）四湖女性作為「具主體性的治理者」

如楊婉瑩、林珮婷（2011）所主張，「公私分工」的性別角色分化認知不僅普遍影響國人的性別觀，更交織於雲林四湖的社會環境中。回顧四湖二十一村中僅有六村村長為女性之現勢，威丞代表所提及之「男主外、女主內」的在地性別邏輯，可能致使當地女性接觸政治之機會較男性為低，進而導致男女不均等之村長參選意願與機會。

訪談中，雖筆者未深入探問三位村長如何與其男性親屬（丈夫等）協商公私分工，仍可由小賢村長與其丈夫之分工實況，得知其家中的「家務」仍由小賢村長主理，且其丈夫似乎對於兩人的分工安排，握有相對大的決定權。

此外，在當地女性村長較為稀少的脈絡下，如姜貞吟（2011）所發現，該地的政治場域仍是高度男性中心的。作為四湖唯一一名未握有男性親屬過往參政基礎，但仍順利當選的現任女性村長，格紋村村長顧全之例，反映了女性政治人物的出場經常蘊含在地「男性無法在場」、「男性不願在場」、「男性不准在場」（姜貞吟 2011）之現況。本研究的三位村長分別作為父親、丈夫、男性友人的繼任，更體現了姜貞吟（2009）所述，「依夫型」（一種依附男性親屬的邏輯）常被人們借用，以理解女性政治人物從政現實的認知脈絡，在在展現女性作為政治人物的主體性，往往被化約為男性親屬之影子的實然。

然而，筆者綜整田野材料，認識到三位村長「真實服務」的實踐基礎乃其獲得村民認同，進而當選村長之必要條件；另外，三位村長憑藉多元因素，消解傳統上重視

「喝酒」的治理文化，而轉向一種高度性別化的「密集照護治理」實踐。筆者欲深化姜貞吟（2009）所述，除由「女性於政治場域的在場（present）」討論女性政治人物的主體能動性，更可由布迪厄思想切入，探問客觀的社會結構如何與女性（主觀）的個體「實踐（practice）」協同作用，使這些女性獲得「發展（如上述的）策略」（strategising）之可能，進而在政治場域中，醞釀出彰顯其能動性的（異質的）治理樣態。

（二）「經濟資本」在政治場域的轉化

筆者由佳臻村長與品蓉村長，分別投入高度的「時間」於畜牧、水產加工與零售業的經營實作，以換取金錢收入，論證「可用時間」本身即具備經濟性，而筆者在本文的討論中，將其視為一種布迪厄筆下的「經濟資本」。

接著，鑑於村長為無給職，又事務費的數額實不充裕，經常需要村長「倒貼」。筆者由品蓉村長與佳臻村長「拒絕喝酒」（一種獲取政治、經濟利益之磋商手段）的心路歷程，看到村長本人的「經濟資本」，顯然為兩位村長堅決拒絕喝酒的攸關因素。筆者主張，不論來源，村務的推行乃高度奠基於時間與金錢等資源，是故，面臨「喝酒文化」等可儲備「（可能為由其他資本轉化而成的）經濟資本」等資源，但可能蘊含性別宰制等可能陷女性於不利境地之可選渠道，個人的「經濟資本」在政治場域中得以被調動，為行動者賦權，進而促成行動者毋須服膺於喝酒等傳統政治慣習之展現。

（三）「密集照護」公共化為「密集照護治理」

承上所述，筆者發現，在四湖三位女性村長的治理實務中，如 Lui 和 Cheung（2024）所主張，時間與金錢共同作為「經濟資本」，除在狹義的家庭場域中被轉化為女性家庭成員「密集母職」的實踐要素外，在村務的推行（尤其體現於與村民的日常互動與關懷行動）上，奠基於地方仍普遍的「公私分工」等性別角色與氣質期待，上述資源亦相似地被轉化為一種可被實踐、大致服膺社會期待的「密集照護治理」策略，並體現於處在子女邁向獨立，母職規訓逐漸被鬆綁的「後母職時期」之中。此外，身兼公私領域的多重角色，並受「時間」等資源的限制，三位村長在村務治理（乃至廣義的生活）上皆展現了可被辨認的「時間管理」技巧，以此安排狹義的村務與其他事務，在確保上述事務被順利完成的前提之上，努力謀求鄭作彧（2010）筆下的一種「時間『質』的提升」。

在實踐「密集照護治理」的框架下，上述的「時間管理」技巧，尤體現於村長邀請他人共同協作，或主動向外尋求相關資源等舉措上，不僅鞏固身為村長之當責，更能透過較具效率並兼具效果的策略，避免自身在村務龐雜的現勢下，面對時間、情緒耗竭的瓶頸。如同 Lui 和 Cheung（2024）所綜整，「整合母職」作為母親在母職實踐中，一種透過適度委託，為自己爭取到更合理的生存空間的策略，筆者主張，其蘊含邏輯也顯現於實踐「密集照護治理」之三位村長的經驗中，形成一種「整合治理」的實作樣態。

筆者主張，透過「整合治理」這種將常態照護，適度「委託」予外部資源與網絡之策略，村長得以在付諸對於村民的照護實踐、維持個人生計的「薪資勞動工作時間」

（如佳臻村長、品蓉村長對於畜牧、水產加工事業的投入），以及個體所需的「復原與文化時間」三者之間，開創平衡的可能，以鞏固村長在村務實踐上（經濟、情緒資源等層面）的可持續性。

（四）「密集照護治理」化解公私領域藩籬、消解政治場域的「陽剛」必然

承上所述，「密集照護治理」作為一種村長進行村務實踐的樣態及策略，其蘊含的「密集母職」照護邏輯，即一種針對照顧對象投入大量時間、金錢與情感的要求，讓實踐「密集照護治理」的村長得以透過（性別化等）勞動等實務舉措，深化與村民在「日常起居」等構面上的連結與關係，進而樹立其家人一般的形象。

筆者主張，村長在制度上作為一官方、現身於公領域的政治職位，透過「密集照護治理」實踐，村長得與村民建立連結村長辦公室與村民家中的非正式關係，模糊了公私領域的界線。另外，如同施佩吟（2022）提及之男性里長的作風大多展現「大方向」、「大願景」的風格，並較常展現施展「權威」的策略行為；女性里長則較擅於培養、維繫多元社群網絡，筆者欲透過田野材料主張，「密集照護治理」的實踐，同時作為女性村長（或里長）之所以能在村務治理上，對比於男性村長（或里長），展現較多「關係性」取向的可能解釋與體現。此外，在政治場域中，比起展現「領導」風範或較具正式性的「權威」，三位村長藉由筆者所主張之「密集照護治理」實踐，建立了私領域色彩濃厚、超越傳統政治人物與人民之深刻關係，並反過來強

化其在政治場域中的「象徵資本」，深化其作為女性，在男性相對主導之政治場域中的能見度與認可度。

質言之，以莊玲如、成令方（2012）所提及之「做性別」（doing gender）的觀點觀之，傳統上，政治人物似乎被期望展演陽剛，見於其樹立權威的傾向，與實踐喝酒、應酬等高度男性化、用於協調政治利益、開展政治網絡之政治慣習。透過三位村長的案例，筆者主張，以村里的尺度切入，面臨與村民間關係的綿密性，綜合一切考量（如獲取民意支持等），「展演陽剛」絕非政治人物進行治理實踐的唯一可用、有效策略：三位村長實踐「密集照護治理」，將性別框架、限制轉化為治理上的機會，更透過「整合治理」等策略，優雅地解決村民的疑難雜症，進一步深化與其之關係，並構建家人之形象，在在體現與村民為伍、不必然蘊含陽剛性的「真實服務」，是為村長得以深植村民內心，並與其共榮之可選策略。

十五、結論

本文以雲林縣四湖鄉墨墨村、米米村與蓋亞村三位現任女性村長的生命經驗與治理實踐為核心，透過田野研究取徑，試圖解構基層政治場域中既存的父權結構、陽剛治理慣習，與行動者個體能動性之間的辯證關係。

綜上所述，本文第一個核心發現，在於三位女性村長由男性影子邁向自主治理者的轉向軌跡。在四湖鄉二十一村僅有六位女性村長的實然下，地方政治的人才庫與出場機制顯然仍受制於極具父系色彩的性別階序格局。然而，三位村長雖皆因男性親屬的初露面或政治遺產步入政治舞台，但其就任前長達數年的共作歷程，使其面臨如「嫁出

去的女兒不能選」等高度父權化的打壓時，得以憑藉長期的服務基礎，打破過往學界將女性參政化約為「依夫型」或派系從屬的單一構框，展現出由代理男性轉向自主治理的政治主體性。

其次，本研究論證了「經濟資本」與「時間富裕」如何共同作為女性村長抵抗陽剛規訓、重塑治理實踐的基礎。村長在制度上作為無給職、支領有限事務費的公職屬性，使個人經濟基礎成為決定治理風格的隱形門檻。佳臻村長與品蓉村長憑藉過往的創業積蓄以及既存產業基礎，帶給其金錢上的經濟自由，這不僅支撐了他們在村務及關懷據點實踐上「辦就是要辦得好」的自掏腰包與倒貼實作，更賦予了他們在面對地方政治中具備拒斥性、排他性的陽剛「喝酒文化」時，擁有一種不必依附於資源交換體系的退出權。

筆者結合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資本理論與鄭作彥（2010）的「三元時間」概念，進一步主張「可用時間」本身即具備「經濟資本」的屬性。三位女性村長皆處於子女成年獨立的後母職時期，這使他們得以將時間由狹義家庭的照顧規訓中抽離。在「彈性化時間結構」的架構下，他們透過精準的時間管理技巧與資源的適度委託，發展出「密集照護治理」與「整合治理」兼具的雙軌策略。小賢村長高密度的逐戶送餐實踐，展現了身體與情緒勞動的極致投入；而佳臻村長與品蓉村長則巧妙地將照護邏輯專業化，透過「請人送餐、遠端關懷追蹤」或「跨界媒合紅十字會與日照資源」等整合手段，在鞏固自身產業經濟基礎的同時，活化了村落的人力與互助網絡，達成了經濟與情緒資本的可持續性。

最後，「密集照護治理」作為一種新興的治理樣態，在重構了基層政治中公與私的邊界。透過「陪女性村民買內衣」這種高度性別化且生理男性村長絕難踐行的私密實踐，或是「幫忙罹癌獨居老人清掃居所、準備住院用品並代管財產」，甚至是「從頭到尾包辦村民喪事並親自守靈」，三位村長成功地將傳統私領域的照護慣習，公共化為公領域的治理實踐。這種「把村民當家人、村民亦視其為女兒（等）」的非血緣擬親屬關係建立，將傳統政治講求權威、血氣、大方向的陽剛邏輯，轉化為細心、韌性、關係取向的治理框架。這種「真實服務」不僅補位了高齡化、風險社會下沿海偏鄉家庭功能的缺位，更將性別限制翻轉為地方政治中的「象徵資本」。

質言之，本文在雲林四湖風頭水尾處，觀察到一場關於基層治理內涵的性別革命。三位女性村長固然在日常生活中仍需部分服膺傳統的公私分工限制，但他們絕非全盤接受社會加諸的規訓。相反地，他們巧妙地轉化了原先用以束縛女性的性別框架，結合後母職時期的資本優勢，在既存的父權縫隙中，撐開了一張充滿人性溫度、以「照護」為核心的在地社會安全網。這種實踐反證了在村里的微觀尺度中，「展演陽剛」絕非獲取民意認可的唯一必然，而這群女性村長正以其堅毅與從容的步伐，為地方基層政治開創另一種更具包容、共善色彩的可能範式。

參考資料

王玉佩、林之丞

- 2014 〈「風險社會」的再思考－以布迪厄思想為進路〉。《危機管理學刊》11(1)：87-98。

立法院

- 2024 〈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20039>，2026年5月20日上線。
- 2025 〈地方制度法〉。「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A0040003>，2026年5月20日上線。

沈游振

- 2003 〈論布迪厄的傑出階級與反思社會學〉。《哲學與文化》30(11)：93-120。

吳官展

- 2022 〈2018年女里長人才培訓班的初步檢討〉。《性別平等教育季刊》97：58-62。

林宣佑

- 2024 《青年女性參政者抵抗父權的身體論述策略》。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芷筠

- 2022 〈柔韌與剛強共存的領導者－專訪吳秀好里長〉。《性別平等教育季刊》97：63-68。

施佩吟

- 2022 〈與里長交往一日常政治下的社區（群）微觀察〉。《性別平等教育季刊》97：81-85。

姜貞吟

- 2009 〈女性作為政治行動者：台灣女性參政圖像的反思〉。《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6：277-316。
- 2011 〈男性不在場：台灣女性參政的性別階序格局〉。《台灣社會研究季刊》83：179-240。

高婕、彭淦雯

- 2022 〈以集體力量推動社區女性參政－專訪陳秀惠女士〉。《性別平等教育季刊》97：53-57。

莊玲如、成令方

- 2012 〈管理性別：陽剛職場中的女檢察官〉。《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30：137-186。

張瑜真、方宇祥、周哲璋

- 2025 〈回來的人：四湖沿海的地方發展軌跡〉。刊於《風頭水尾·續——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113學年度文化田野與實習方法成果專輯》。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編，頁153-186。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陳冠儒

- 2025 〈彩繪的浪潮——箔子寮藝術社造的社區想像重構〉。刊於《風頭水尾·續——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113學年度文化田野與實習方法成果專輯》。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編，頁103-152。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彭淦雯

1998 〈縣市長選戰中的性別政治〉。《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45：1-3。

彭滄雯、林依依、葉靜宜

2009 〈女性在陽剛職場內的樣板處境：以海巡與消防單位為例〉。《東吳政治學報》27(4)：115-170。

華叡民、蔡嘉軒、江冠螢

2024 〈何以擺脫無未來？海洋教育與社區發展的能與不能——以箔子寮和三條崙為例〉。刊於《風頭水尾——臺灣大學人類學系112學年度文化田野實習與方法成果專輯》。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編，頁361-394。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黃宗儀、胡俊佳

2022 〈「硬著頭皮」為母則強：在韓台灣女性婚姻移民之母職實踐〉。《地理學報》103：3-35。

黃淑英

2011 〈政治的性別霸凌〉。《新社會政策》16：4-5。

黃麗仔

2022 〈勇敢追夢—回到故鄉選里長〉。《性別平等教育季刊》97：69-71。

楊婉瑩、林珮婷

2011 〈當「男女有別」變成「男女不平等」—性別角色認知與政治效能感〉。《女學學誌》29：121-172。

廖南貴

2014 〈村里治理的理論與實務：以花蓮縣村里長之認知為例〉。《競爭力評論》17：1-18。

鄭作彥

- 2010 〈時間結構的改變與當代時間政治的問題：一個時間社會學的分析〉。《臺灣社會學刊》44：231-275。

潘美純

- 2022 〈化作春泥更護花－回顧我的 16 年里長生涯〉。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97：72-75。

蔡耀陞、何昀瑄

- 2024 〈「也要神，也要人」：神人的地域關係與民間信仰變遷後宮廟再中心化的神人想像——以箔子寮普天宮祭祀圈為例〉。刊於《風頭水尾——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112 學年度文化田野實習與方法成果專輯》。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編，頁 113-164。
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藍美雅

- 2022 〈再論女性社區工作者與領導〉。《性別平等教育季刊》97：76-80。

雲林縣麥寮戶政事務所

- 2026 〈四湖鄉性別年齡人口數〉。「雲林縣麥寮戶政事務所」，
https://mailiaohousehold.yunlin.gov.tw/Demographics/Report_New_Region.aspx?n=21684&sms=22102&y=114&m=12&r=0，2026 年 5 月 20 日上線。

Bourdieu, Pierre

- 1990[1980] *The Logic of Practice*. Richard Nice, tra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2018[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 3rd edition. Mark Granovetter and

Richard Swedberg, eds. Pp. 15-29. New York:
Routledge.

2019[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Class, Race, and
Gender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2nd edition.
David B. Grusky, ed. Pp. 1-7. New York: Routledge.

Lui, Lake, and Adam K. Cheung

2024 Finishing 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College-
Educated Mothers' Resistance to Intensive Mothering.
Gender, Work & Organization 31(6): 2405-2422.

Rose, Nikolas, Pat O'Malley, and Mariana Valverde

2006 Governmentality. *Annual Review of Law and Social
Science* 2(1): 1-32.

生成式 AI 輔助寫作揭露聲明

聲明日期：2026 年 8 月 17 日

本文作者於撰寫本作業之過程中，使用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輔助部分寫作程序，特依本課程「生成式 AI 使用規範」之要求，如實揭露如下。

一、使用之模型與版本

未使用

二、使用方式

未使用

三、使用紀錄

未使用

四、補充說明

未使用

本聲明由作者自行填寫並確認，所載資訊均屬實。

螢幕間的想像與想望：雲林縣四湖鄉長輩的手機使用、生命經驗與地方連結

王皓正（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四年級）

游聿堂（臺灣大學人類學系三年級）

盧嘉宏（臺灣大學人類學系五年級）

摘要

本文以雲林縣四湖鄉長輩的智慧型手機使用為切入點，探討數位科技如何被納入生命經驗、地方知識、身體感與社群關係之中。研究以 2026 年 1 月於四湖鄉進行的十一日田野調查為基礎，結合參與觀察、訪談、手機使用情境觀察，以及 Facebook 地方社團與 Line 群組等線上社群材料，分析四位長輩在退休、返鄉、勞動轉型與地方參與中的媒介實作。本文主張，手機在四湖鄉長輩的日常生活中並非單純的通訊工具，而是一種由生命史、地方社會與技術物共同生成的媒介實踐。研究發現，手機可作為公共發聲、地方書寫、潮汐判讀、農產行銷、「自由工」接案、影音創作、社群維繫與身體節奏調整的介面；其意義高度取決於使用者過往的生命經驗與技術接觸。透過混雜空間、拼裝科技、身體感與慣習等概念，本文指出偏鄉長輩並非被動地接受數位平臺，而是在既有生活條件中重新組織科技功能，將手機轉化為感知地方、延續生計、維繫社群與安頓自我的日常資源。本文進一步指出，高齡者數位科技研究應從近用差距與工具功能的分析，轉向生命史、身體經驗

與地方實作的民族誌理解，方能看見長輩在數位時代中的媒介能動性、生活韌性與地方創造力。

關鍵詞：資訊與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智慧型手機、拼裝（assemblage）、生命經驗、媒介使用

一、緒論¹

透過港，人們得以想像越過浪抵達遠方島嶼後的溫暖氣候與高聳山脈；透過橋，人們有勇氣穿越洶湧急流，不再畏懼與彼岸所珍視之人天各一方。然而，能連結世界的，卻也總能使其分離。港使一雙雙凝視彼此的眼只能於萬里外望著北極星思念、苦苦地等著，盼著從岸上出發，再回到岸上時，一切仍舊從未改變。港是如此、橋是如此、緣分是如此，數位資訊技術也是如此嗎？²

想望的天空比無垠的星河更遼闊，卻總在他方才能見到；想望的眼如山間流出的溪水般清澈，卻總在注視著他人。想像映入眼底的濃濃黑煙成為層層山巒綿延到世界的盡頭，時間與世間不再令人想逃；想像曾經並肩行走的身影，在反芻的第一萬次後有了不再令人痛徹心扉的結局；想像少年時與同伴無憂無慮奔跑的原野沒有被插滿高樓大廈，你我仍在被夕陽拉長的夢中與彼此訴說著憧憬的明日……。手機畫面不停閃爍著，裡面有無數人們遺憾的、寄望的、幻想的、懷念的、逃避的光景，在螢幕裡每一個人想望什麼人生、想像什麼未來、想念怎樣的過去、又想見怎樣的人、想起了什麼可能？

¹ 特別感謝郁茜老師與助教佳秀、穎欣的悉心指導，並感謝雲林縣四湖鄉當地居民與報導人在田野期間的協助，以及評論人與同學提供的修改建議。

² 本文於寫作過程中有使用人工智慧（Gemini / ChatGPT）工具進行輔助寫作，主要使用內容包括製作訪談逐字稿、整理田野筆記、格式調整、潤飾文章、查詢文獻。

四湖鄉南部沿海³的長輩⁴們，他們經歷了什麼？在頭髮仍舊茂密的少年時憧憬著如何的將來？在為了生計與家庭付出打拼時，如何思索社會與自身的關係？在季節更替時，反覆看著太陽從海面的風機旁落下時所領悟的道理是什麼？當媒介技術發生變化，出現如橋與港一般，既能連結、又能分隔彼此，卻又似乎更滲透日常、無所不在的新科技——手機時，他們是如何看待與使用這項技術的？不同生命經驗的長輩又呈現如何獨特的樣貌？

2026 年一月，我們三人初次抵達雲林四湖鄉，準備展開關於地方長輩手機使用的田野研究，而問題也是經過了不斷修正。對我們而言，個性與工作節奏截然不同的我們在田野初期花了不少時間磨合，這也呈現在我們第一次拜訪吳老師的途中。在拜訪吳老師時，我們三人迷路在田野間。速度快的人負責帶路卻衝過頭而消失在眾人眼前，速度慢的人看著 Google Map 落後在一個錯誤的地址。於是，我們撥電話向吳老師求助。電話中，老師不疾不徐而仔細地為我們指路。等我們終於抵達時，他已精神健朗地站在一棟雅緻的房屋前：「年輕人，看著手機還會迷路？」老師手指向西邊：「我跟你們說，在我們這裡迷路的時候，你們

³ 本文四位主要報導人分別來自四湖鄉的箔子寮與三條崙，主要田野範圍則涵蓋箔子寮、三條崙及四湖聚落。由於「四湖鄉」是能夠完整涵蓋上述田野地點的最小行政地理單位，因此本文以四湖鄉統稱整體田野區域。

⁴ 在田野過程中，我們發現在地居民對「高齡者」的理解有所差異；多數人傾向將行動能力開始減退者視為高齡者。因此，為尊重在地觀點，本文以「長輩」來取代年長者、高齡者等表述。此外，本文沿用田野過程中對報導人的稱呼方式，故部分報導人未以全名呈現。

看那邊的離岸風力發電機，向海就是西邊。記得自己的位置，就不會迷路。」

我們逐漸體會到，田野裡的歷程皆與研究有所關聯。舉例而言，手機地圖提供的定位，不必然等同於我們的地方感；數位導航所標示的路徑，也不必然能取代在地居民對風向、海岸、地標與身體方位的熟悉。吳老師的一句話，將我們從螢幕上的座標拉回四湖鄉三條崙。這也預示了手機並非單獨運作的科技物，而是在地方知識、身體經驗之中，被重新理解與使用的媒介。

〈雲林家鄉〉

日出大尖二尖阿里山
夕照麥台四口海岸線
海豐島外汕頂已流失
三條崙箔子寮船滿載
紅蝦烏魚白腹童記憶
臭香薯簽三餐豆豉醬
西瓜土豆亦無啥人種
漂浪本性辛辣海口蒜
風機光電布滿非偶然
先知先走關聖眾神明
祖公屯居瀉湖海口地
爾今算來亦有數百年

（吳老師，2026 年 1 月 7 日）

搭配師母泡的熱茶與剛炸好的地瓜，吳老師一手拿著智慧型手機，一手將眼鏡輕輕從臉上移起，朗讀這一首歌詠家鄉的詩作〈雲林家鄉〉，內容充分表達吳老師對於家鄉的情感。吳老師表示自己在夜晚靈感湧現時寫詩，以前得拿紙筆，如今在手機上完成詩作後，便能直接發表在社群與親朋好友分享。吳老師自高中教職退休之後，持續發揮在地方的影響力，他亦擔任新雲林之聲廣播電臺的董事長。抬頭一望，老師家客廳牆上的匾額寫著「新雲林之聲」，而另一面牆則掛著雲林縣地圖。為地方發聲是老師的使命，這個「聲音」的意象尤其深刻。吳老師起身指著雲林縣四湖鄉地圖和我們介紹雲林縣的地方文史。在雲林縣四湖鄉，吳老師如何持續為地方發聲？在經歷數位化之後，線上社群是一個必要的連結方式，連結地方的彼此，更連結著雲林縣與外界的喧囂世界。換言之，手機在此的意義有許多可能，從單純的通訊工具，轉變為一種包含延續公共關懷、維繫社群關係，並確認自身與地方及外界連結的重要媒介。

Chen 與 Schulz (2016) 指出資訊與通訊科技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雖可能協助高齡者降低社會孤立、擴展社會連結，但其效果並非普遍適用於所有長者，而需回到具體的生活處境、使用能力與社會關係中理解。高齡者的網路與手機使用，也並非單一模式，而是受到近用條件、數位技能、使用目的與社會不平等影響 (Busch et al. 2021; Hunsaker and Hargittai 2018)。另一方面，工作在現代生活中不僅提供收入，也提供時間結構、社會接觸、集體目的與身份認同 (Paul and Batinic 2010)。因此，當一個人從正式職場退休後，如何重新組織

日常節奏、維持社群關係，並持續為其關心的地方與公共事務出力，便成為理解退休生活的重要問題。

在過往高齡研究中，媒介技術多被置於協助、補足或改善既有不利條件的工具位置，大多聚焦於數位學習困境、介入方案與政策建議，並預設科技使用本身具有正向價值（Chen and Schulz 2016; Friemel 2016; Hunsaker and Hargittai 2018）。然而，這一類取徑往往隱含線性的技術發展史觀，將科技理解為自上而下滲透生活世界的外在力量，較難檢視在具體情境中，使用者如何於結構限制下重新形塑科技的意義與功能，近年的批判性高齡科技研究已開始提醒，科技不宜僅被視為補足高齡不利條件的外在工具，而應進一步考察其如何與老化經驗、地方生活、照護關係、社會不平等與日常實作共同構成（Gallistl et al. 2023; Peine and Neven 2021）。數位人類學研究指出，科技並非單向賦權的中性媒介，而是一個充滿權力不對稱、摩擦與關係性劣勢的場域（Horst and Miller 2012）。Burrell（2012）亦提出邊緣性（marginality）論點，提醒我們即使進入網路系統，群體仍可能因既有社會、經濟與文化結構而持續處於不利位置。從上述文獻中，可理解我們在探討數位實作，應同時思考群體的日常生活，在我們的研究中，便得要思考地理環境移動、城鄉差距與年齡老化所構成的邊緣性處境。

本研究的核心問題為：在高度媒介化的社會條件下，雲林四湖鄉長輩如何於日常生活中實作並轉化數位科技，使其成為對抗孤寂、重構地方感、維繫社群認同與情感連結的策略。從上述已知，若僅從媒介普及率、學習成效或工具功能來理解科技使用，將難以掌握地方居民身體經驗與媒介物質性如何在實作中交織，亦可能遮蔽長輩在數位

使用中所展現的行動能動性與社會韌性。本研究以此為缺口，嘗試將數位科技理解為一種嵌入日常情感、身體操作與地方關係之中的實踐過程，而非單純的技術工具，藉此反思在當代媒介化社會的想像之中，四湖鄉居民如何在社群媒體、通訊軟體等社群媒介使用之下，連結自我與地方情感。換言之，當我們日常生活已難以脫離螢幕與數位媒介使用情形之下，我們相當好奇雲林四湖鄉的長輩如何藉由個人生命經驗，發展與工作、興趣、社群及地方連結相關的手機使用，與我們的使用方式又有何差異？

近來，學界重新討論混雜空間（*hybrid space*）的意義，指出混雜空間並非單純指線上與線下的重疊，而是由行動性、連結性與社會性共同構成的情境（*de Souza e Silva et al. 2025*）。*de Souza e Silva*（2025）將混雜空間定義為行動者（媒介使用者）共同生產出的整合空間，破除實體空間與數位空間的二元性。舉例來說，行動裝置使人們在物理空間中同時連接數位資訊與社交關係，因此實體空間與數位空間的界線被重新組織（*de Souza e Silva et al. 2025*）。過去習慣將網路虛擬空間指稱為線上脈絡（*online context*），事實上，線上脈絡可能正是由行動者的媒介使用習慣所建構；另一方面，在螢幕與數位之外的線下脈絡（*offline context*）更可能影響線上空間的建構（*Taylor-Smith and Smith 2019*）。換言之，混雜空間是一個由線上脈絡與線下脈絡匯集而形塑出的另一空間。若以此觀點觀看雲林四湖鄉，線上與線下的交織並不發生在都市商圈、大眾運輸，而是發生在廟口、魚塢、田地與 *Line* 群組、*Facebook* 社團與手機螢幕之間。本文因而追問混雜空間如何在地方高齡生活中被具體實作？

本文以策略性詮釋（*tactical interpretation*, Xu 2024）來描述長輩的手機使用方式。策略性詮釋的定義可以是指行動者進行抵抗的手段，同時也可以是指他們在既有結構限制下所採用的策略（Xu 2024），在本文中便是參與觀察雲林四湖鄉長輩如何使用手機並且將其轉化為可用的生活資源以連結自我與外界社會。而我們觀察到四湖鄉長輩針對媒介使用所採取的策略性詮釋相當多元，至少展現在以下四個層面：（1）將手機作為地方公共發聲的工具；（2）將手機作為工作與生計延續的工具；（3）將手機作為調整退休生活韻律的工具；（4）將手機作為線上社群與線下地方關係互相轉譯的工具。

二、文獻回顧

（一）雲林縣四湖鄉

雲林縣四湖鄉位於臺灣西南沿海，與麥寮、臺西、口湖等鄉鎮共同座落於臺 61 線西濱快速道路一帶，因鄰近臺灣海峽，地理環境在土壤含鹽量高及長期抽取地下水導致地層下陷與海水倒灌風險的背景之下，地方農業發展條件受限。另一方面，四湖沿海居民從事漁業和養蚵，漁業與養殖業遂成為主要生計基礎，箔子寮漁港更一度成為雲林縣重要的貿易港口與商船聚集地。然而，在港道淤沙、基礎設施老化之後，加上實作困境（*bureaucratic predicament*）等因素所造成的治理失能，地方產業發展藍圖經常難以有效落實（蘇穎欣 2025）。

在這樣的地理與產業發展背景下，四湖鄉面臨人口外流與高齡化的壓力。自六輕工業區設立後，沿海地區土地

利用與社會經濟結構劇烈變動，具有工業區的麥寮鄉相對吸引人口與資源，而缺乏工業投資的口湖鄉、四湖鄉等地，則持續承受人口外移與產業單一化的壓力，地方也逐漸形成勞動人口高齡化的環境（林建志與王莉晴 2025；蘇穎欣 2025）。地方社群的發展則仰賴社區組織、宮廟以及少數青年返鄉者等人所編織的網絡（陳冠儒 2025；陳思捷等 2025；張瑜真等 2025；蔡耀陞與何昀瑄 2024）。依循社會永續性的觀點，成員對於社區的信任及凝聚力更影響著社區推動永續發展（洪浥青與胡善翔 2025）。其中，社群媒介便在偏鄉人口與外在連結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此外，在地方長輩的日常生活中，梁宸維與王安珩（2024）重新檢視偏鄉高齡者的健康觀，指出主流醫療體系將健康視為沒有疾病、透過診斷數值化的疾病中心想像，往往將身體狀態與日常生活切割。相較之下，四湖鄉箔子寮長輩的健康觀則更多圍繞在日常行動能力與關係網絡的互動上，意即健康並非單一指標，健康是在勞動、走動與人際互動中被不斷生成的價值。由此可知，社群關係是影響在地居民理解日常生活的重要方式之一。另一方面，洪浥青與胡善翔（2025）在探討社會永續時，強調地方社群如何依賴信任關係、社會凝聚力與在地實踐來面對人口流失與資源不足等長期結構性挑戰。我們在文獻回顧的過程中，觀察到既有文獻目前尚未討論當地居民的數位裝置使用。我們的研究可以從此缺口進行，探討四湖鄉長輩如何使用手機？本文遂以此缺口將四湖鄉長輩的生活樣貌刻畫得更立體。由此切入，本文將探討在四湖鄉這樣同時面臨高齡化與人口外移的環境中，長輩們如何在日常生活的具

體脈絡裡實作、理解並轉化數位科技，使其成為維繫地方感、支撐社群互動與延續日常的情感連結。

（二）拼裝科技

「拼裝」（*assemblage*）的概念自二十世紀初便在文學、藝術、建築學等人文學科中發展，於世紀末經 Deleuze 與 Guattari 等後結構主義哲學家的討論而深化，並被延伸至社會科學以理解複雜的動態關係，強調異質（*heterogeneous*）元素的連結、去中心化的發展、以及不斷變動與萌生（*emergent*）的過程（李梅君 2022）。「拼裝科技」的概念核心在於打破技術作為「完成品」迷思，在當代科技社會研究（STS）與數位人類學的視角中，重視使用者如何從被動的「技術消費者」轉變為能動的主體，在標準化工業邏輯與邊緣地方需求之間，建立起具備高度韌性且切合在地脈絡的實作。

林崇熙（2001）針對嘉南平原農村拼裝車的深入觀察發現，戰後物資缺乏的年代，臺灣民間憑藉鐵工師傅的巧思，將報廢的軍車零件、舊吉普車引擎，甚至進口廢五金重新組合製造拼裝車。相較於規格單一、無法兼顧個別需求的正規工業產品（如原廠汽車），拼裝科技最大優勢在於能依照使用者的特殊需求進行「量身訂作」，擁有高度的人性化與設計彈性。其發展策略是不與正規工業產品競爭速度、舒適度、冷氣或音響，而是專注於切合特定環境的區位優勢，例如為了適應田間、山區、河床、泥濘等惡劣地形，拼裝車常被設計為四輪甚至十輪傳動，搭配特殊輪胎以增強抓地力，同時有著經濟實惠的價格，完美契合了農村與工程搬運的實際需求。拼裝科技雖常被貼上「不專業」、

「不安全」或「沒有保障」的汙名化標籤，但實際上卻是在官方管制與現代化工業體制的夾縫中，民間力量以技術方式創造出來的一條生路。反映使用者（如農民）在現實生活中的困境與需求，以其實用性、經濟性與高度的環境契合度，成為臺灣基層社會中不可或缺的沈默力量。

李梅君（2022）將「拼裝」概念應用於分析 g0v 零時政府社群中的數位行動主義，打破過去將網路與科技單純視為「傳播工具」的盲點。在「開放政治獻金」行動中，資料在這個行動中扮演了如同「地心引力」的角色，吸引不同的人與非人事物形成一個社群與行動網絡，包含工程師編寫爬蟲程式、鄉民的肉眼與雙手負責判讀機器無法精準閱讀的資訊、光學文字辨識（OCR）、演算法等。在數位行動中，人與非人無法獨立於彼此而行動，它們的能動性只有在拼裝中才得以發揮。這種人與科技的結合如同 Deleuze 所形容的「無器官的身體」（body without organs），它沒有如傳統社會運動那般系統性的組織結構，而是生成的、流動的、隨時可以消解的「過程」。開放資料的重要性在於它如何被「拼裝」成一個可以被大眾介入、分析與使用，讓原本被鎖在行政官僚體系內的「死資料」，在數位異質網絡中重新獲得「生命」（Deleuze and Guattari 1987: 150；轉引自李梅君 2022: 156）。

在理解與分析地方技術使用者的行動時，拼裝的概念能使研究者避開「中心—邊陲」的單向傳遞過程偏見，著重在整體的異質網絡，與不同行動者間的互動、持續生成過程。在當地長輩的數位使用中，這個網絡涵蓋平臺的演算法系統、智慧型手機本身的硬體設計、親戚與朋友關係、周邊的通訊行、鄰居、店鋪等，他們彼此緊密連結並形塑

出當地獨特的使用樣貌。正如拼裝車源於農民在當地長年生活發展的深刻理解，長者的數位使用亦與其生命經驗、對地方的理解息息相關。本研究採取的拼裝視角，並非單向地討論科技如何改變生活，亦非僅視科技為生命經驗的載體，而是一個雙向互構的過程。一方面，長者深厚的在地生命經驗，賦予了數位工具獨特的實踐邏輯（如將導航拼裝進地方地標知識中）；另一方面，數位網絡的介入，也為長輩的生命經驗提供了新的延伸空間。透過這種「人、技術、經驗」的互動過程，我們得以看見四湖鄉長輩如何在變動的技術發展中，拼湊出具備主體性的獨特生活樣態。

（三）創新傳布理論

創新傳布理論（diffusion of innovation theory）原先關注新觀念、新技術或新實踐如何在特定社會系統中被知覺、評估、採用與擴散。最早，創新傳布理論應用在農業。Ryan 與 Gross（1943）對美國 Iowa 兩個社區農民採用混種玉米（hybrid seed corn）的研究，常被視為創新傳布研究的早期經典案例；該研究顯示，創新的擴散並非單純來自技術本身的優越性，而是與地方社會網絡、同儕觀察、意見領袖及採用時間序列密切相關。此後，Katz et al.（1963）將創新傳布整理為跨越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與傳播研究的問題傳統，使「創新如何在社會關係中獲得可接受性」成為理論核心。Rogers（1983）則將創新傳布明確界定為創新透過特定傳播管道、在時間中、於社會系統成員之間被傳播的過程，並提出相對優勢、相容性、複雜性、可試用性與可觀察性等影響採用速度的重要屬性。由此觀之，創新傳布並非單純的資訊傳遞模式，而是一種涉及技術屬性、

傳播管道、社會網絡、採用者判斷與制度環境的複合性社會過程。

然而，當創新傳布理論被運用至科技媒介研究時，其關懷便從「創新如何擴散」進一步轉向「使用者如何理解、接受、拒絕或重新安排科技」。近年，傳播與媒介研究對創新傳布理論的重要修正，在於不再僅以「採用／未採用」作為分析終點，而是進一步追問科技採用之後所形成的使用差異與社會不平等。van Deursen 與 van Dijk（2014）指出，當網路近用逐漸普及後，數位落差會從第一層次的「是否能上網」，轉向第二層次的「如何使用網路」以及第三層次的「是否能從網路使用中獲得實質利益」。此一觀點對創新傳布研究構成重要提醒：創新即使完成擴散，也不代表其效益會平等分配於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科技媒介的普及可能同時帶來新的不平等，因為教育程度、收入、年齡、居住地、身體狀況與社會支持網絡，都可能影響個體能否將科技近用轉化為資訊取得、社會參與、健康照護或生活自主性的提升。換言之，生命經驗將深刻影響著個體對於新事物的接受程度。

此一問題在長者研究中尤其明顯。Friemel（2016）以瑞士 65 歲以上長者為對象，提出「灰色數位落差」（grey divide）的概念，指出即使網路已高度普及，長者內部仍存在明顯差異，尤其 70 歲以上長者更容易被排除於日常網路使用之外。Hunsaker 與 Hargittai（2018）對長者網路使用研究的回顧也指出，長者不能被視為一個「同質群體」，而應關照其內部的異質性；尤其，研究者應分別考察其近用、技能、使用類型與社會不平等，而非僅以年齡作為單一解釋變項。Leukel et al.（2023）則進一步指出，即便越來越

多長者已開始使用網路，不同長者在網路活動的廣度上仍存在差異；這意味著長者的數位不平等已不只是「是否接觸科技」，而是「能否多元、有效且自主地使用科技」（Friemel 2016; Hunsaker and Hargittai 2018; Leukel et al. 2023）。因此，在討論長者科技媒介採用時，研究焦點應從單純的技術推廣，轉向長者如何在身體能力、生活經驗、家庭支持、教育資本與制度環境之中，協商科技進入日常生活的可能性。

偏鄉長者面對科技媒介時，往往不只是個人意願或技能不足，而是同時受到基礎建設、交通距離、教育資源、地方服務密度、家庭照顧安排與社區支持系統等複雜原因的影響（Choi et al. 2022; Yu et al. 2016）。Choi et al.（2022）使用 2016 年美國健康與退休研究（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 HRS）全國代表性資料，樣本包含 17,372 名 50 歲以上美國人，研究發現居住於郊區與鄉村地區的長者使用網路的機率較低，且居住地與族群差異會交互影響網路使用機會；這說明偏鄉數位落差並非單一地理問題，而是與階級、族群、教育與社會支持結構相互交織。Yu et al.（2016）研究美國 50 歲以上長者的社群網站使用，使用 2012 年 HRS 全國代表性資料，發現社群媒介可能與高齡者的社會連結與福祉相關，但其效果仍取決於長者能否實際近用並有能力使用相關平臺。由此可見，研究長者的科技媒介實踐與消費時，應進一步追問科技是透過誰、在哪些日常場景、依靠何種支持網絡，才可被長者實際理解、接受與使用。

整體而言，創新傳布理論提供理解科技媒介如何進入社會系統的基礎框架；然而，若研究對象為臺灣偏鄉長者，則有必要進一步結合媒介日常化、多元消費慣習等觀點加

以描述。如此一來，理論分析方可避免將長者簡化為被動、落後或抗拒科技的群體，而能將其理解為在具體生活條件中，持續選擇、協商、依賴，甚至拒絕科技的行動者。對偏鄉長者而言，科技媒介的意義並不僅止於創新產品的採用，更涉及自我察覺、社會連結、地方生活韌性，以及高齡主體性的重組等。不過，本研究的田野觀察亦顯示，偏鄉長者與科技媒介之間的關係並非單一線性的採用過程，而呈現出更為複雜且多層次的實踐樣貌。

三、四湖鄉長輩的手機螢幕與日常

（一）阿源

來到四湖鄉之前，郁茜老師便協助我們尋找適合的報導人，阿源大哥也是我們第一位聯繫的長輩。電話那頭的他聲音宏亮飽滿，卻又十分親切友善；透過手機，我們從臺北與田野現場建立起第一道連結。他熱情地詢問我們何時抵達、該如何碰面，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只說：「到了再來找我就好。」我們甚至沒有約定明確的時間。抵達四湖鄉後，我們很快便見到了阿源大哥。他是先前帶領我們導覽四湖鄉茆子寮的茂昌大哥的兄弟，同時也是臺大的學長。阿源大哥興趣廣泛，和我們聊攝影、談樂器，也分享自己表演與創作的經驗。他不僅擁有豐富的藝術天分，還考取了街頭藝人證照。

當聽見我們的研究主題後，多才多藝的阿源大哥向我們講述他親身經歷的「媒介發展史」。原來，他年輕時曾在美國外商公司工作，在個人電腦尚未普及的年代，他就已經接觸並使用電腦。他一邊說著，一邊雙手在胸前比劃出

一個巨大的空間，笑著告訴我們：「以前的電腦大概有這麼大。」那個動作生動，也讓我們瞬間感受到科技發展在不同世代中的跨度與變遷。

阿源大哥約莫七十五歲，成長於雲林沿海，年輕時先後就讀園藝與機械，之後進入某美國航運公司工作，長年有接觸通訊與數位技術的經驗。五十多歲後，他又再度返回校園進修園藝，並經營園藝公司，直到十年前才回到四湖鄉箔子寮定居。這段跨越農業、工業與科技產業的生命歷程，使他成為地方長者中對數位媒介高度熟悉的人物。

在日常生活中，他大量使用手機與數位平臺。他習慣透過 YouTube 聽音樂、觀看新聞與故事，也會使用潮汐監測 App 安排到海邊攝影的時間，並以手機 App 剪輯照片，更會配上自己吹奏的音樂與字幕，製作成個人影片。對他而言，手機是一種延伸興趣、記錄生活與連結地方的媒介。

然而，比起個人的科技使用經驗，他更常從「社區」的角度談論手機。他認為長者應該人人都有手機，才能在緊急時刻即時聯繫；也觀察到外籍移工能透過翻譯功能跨越語言隔閡。早年智慧型手機剛進入社區時，許多老人並不願意接觸，他便主動以娛樂、照片分享等方式吸引長輩學習，甚至曾在廟口教老人使用 Line 與手機功能。從談天的過程中發現，他不只關心自己的使用經驗，也思考手機如何協助社區連結、推廣地方特產，甚至期待透過自身人脈與數位媒介讓更多人看見地方。對他而言，手機是一種能夠真正進入地方生活、改變人際關係與社區互動的日常實踐。

（二）阿同

阿同大哥現年 72 歲，生肖屬蛇，目前居住於四湖鄉茆子寮。他在 16 歲（國一）輟學，離開家鄉到外地工作，幾經輾轉後長期住在臺北，並曾在板橋購置房屋。離鄉期間，他從事過許多不同類型的工作，包括賣「切仔麵」、經營「牛鍋」、做苦工，以及修理機臺等。約二十年前，他返回故鄉茆子寮，回鄉後曾在抽水站工作，直到六十五歲退休。

退休後，阿同大哥仍持續接案工作，自稱做的是「自由工」，也就是自行與各戶接洽。他主要從事割草、噴藥與整理墓園等工作。例如，替田地或「園頭」除草、噴藥，每次收費約三百至三百五十元；整理墓園則包含除草、鋸除遮蔽墓地的樹木，以及調整墓園造型等，收費依工作內容而定。若僅割草約收一千元，若包含鋸樹與整理造型則可達三千元。每年清明節前後十五天是工作最繁忙的時期，收入可達七萬多元。除了工作收入之外，他也有勞保與漁保的收入來源。近兩年，他逐漸減少工作量，只將工作安排在上午時段。

在社交生活上，阿同大哥與善水咖啡店老闆的父親熟識，也認識阿源大哥。回鄉後的前三年，他曾熱衷參與地方廟宇事務。如今，他經常騎著機車四處「迤迤」(tshit-thô)，每天從住家往返廣溝厝十餘趟。透過這樣的移動與停留，他熟知地方上的各種「八卦」。過去他熱愛釣魚，現在則時常與因釣魚結識的朋友互相拜訪、泡茶聊天。

阿同大哥住臺北時便開始接觸行動通訊工具，其使用歷程橫跨 BB Call、黑金剛、老人機到智慧型手機。他有定期更換手機的習慣，目前使用的手機是兩年半前購買的。根據手機後臺紀錄，訪談前四日的螢幕使用時間分別為七

小時、十小時二十五分鐘、九小時四十五分鐘與十小時三十八分鐘。他推測自己一天大約會使用手機十二小時。他通常清晨六點起床後便開始看手機，晚上十點睡前也持續使用，甚至經常出現手機仍播放著內容、人卻已經打瞌睡的情況，他戲稱為「被手機看」。

在手機使用內容方面，依據後臺數據，阿同大哥最常使用的應用程式為 YouTube 與 TikTok。他自述目前經常也使用 Facebook 與 Line，過去則常玩 Candy Crush。使用 YouTube 時，他主要用來「追劇」，但不喜歡劇情衝突太強烈的內容，認為自己會「擋袂牢」(tòng bē tiâu)。TikTok 則主要觀看短影音；Facebook 用來追蹤朋友動態，但不加入社團；Line 則是與朋友、客戶聯繫的重要工具。他習慣以講電話與傳送語音訊息的方式溝通，工作完成後，也會拍照傳給客戶確認，有時需要家人協助操作，客戶再將款項匯入其帳戶。與我們交換聯絡方式時，他也主動要求以掃描 QR Code 的方式加入 Line 好友。不過，在智慧型手機的實際操作上，阿同大哥仍保有較為直線式的使用習慣。他經常以「返回主頁→尋找 App→點擊開啟→再返回主頁」的方式操作手機，對於多工切換、滑動操作與快速點擊等功能並未完全熟練。

（三）吳老師

吳老師現年 68 歲，目前往返居住於四湖鄉三條崙與虎尾鎮。自九歲起，他便對政治產生濃厚興趣，兒時志向是政治和法律，後來考入臺灣師範大學。畢業後，吳老師先於彰化二林國中任教約七年，其後返回雲林虎尾高中，擔任公民與三民主義教師三十年。在教學理念上，他主張

「天文地理都包含在課程裡」，並長期兼任校內總務工作。退休前，吳老師曾短期借調至雲林縣政府擔任機要秘書。

除了教職工作之外，吳老師亦長期投入媒體經營。民國 83 年，他與友人共同成立地下電臺「新雲林之聲」，收聽範圍北至苗栗、南至臺南。吳老師在電臺中主要負責公民教育與政治評論的節目內容，至今仍持續經營電臺。

在長年的教學生涯中，吳老師養成每日寫作的習慣，並累積大量尚未出版的言論集初稿，內容多與地方文史及時事評論相關。退休前，他主要以電腦書寫；退休後則改以手機進行寫作。寫作時間通常落在早上九點左右或半夜時段，他認為深夜較容易湧現靈感。有時，吳老師也會將寫作內容分享給他人。

在手機使用方面，吳老師自述每日使用時間約四至五小時。根據手機後臺紀錄，他最常使用的應用程式為 YouTube、Facebook 與 Line，後兩者的使用頻率則會互相變動。吳老師使用 YouTube 時，多半以「聽」的方式接收內容；Line 除了聯繫用途之外，也被當作寫作工具使用，他經常利用「Keep 筆記」撰寫文章，再將內容分享到群組中。Facebook 方面，雖然訪談中未特別說明具體用途，但其個人檔案標示為「數位創作者」，也會在 Line 群組分享自己在 Facebook 上與他人筆戰的截圖。除此之外，吳老師也會使用氣象與潮汐觀測 App 管理魚塢，利用文書 App 查看「新雲林之聲」的電臺業務資料與會議紀錄，並透過理財 App 進行股票下單，以及使用健康管理相關應用程式。

吳老師對數位科技抱持較強的反思意識。他明確將手機定位為「接收訊息與聯繫的工具」，認為人不應反過來被工具制約。例如，在整理花園時，他會刻意不攜帶手機；

在家中時，也常將手機放置在其他房間。過去吳老師曾習慣聽影片入睡，但察覺這種依賴後，便主動戒除這個習慣。此外，由於 Line 訊息繁多，他也刻意只開啟必要通知，以避免受到訊息干擾。對於網路資訊，吳老師則特別強調「認知戰」的風險。他認為 YouTube、小紅書等平臺上的資訊往往帶有商業或政治目的，例如他認為「小『紅』書」即帶有共產黨的「紅色思想」。因此，他主張面對網路資訊時，必須依靠個人的先天智慧與後天學習，同時強調「反省教育」的重要性，也就是透過不斷自我反省與檢討改進，避免受到資訊操控與影響。

（四）阿奇

阿奇現年 65 歲，住在雲林四湖鄉三條崙。我們在吳老師的介紹下與他進行兩個小時左右的訪談，只要聽他開口五分鐘，就能立刻發現眼前這個人和一般人對「農民」的想像相差甚遠。他年輕時讀機械，退伍後和人合夥申請過農業自動化的專利，理由很直白：沒錢的人申請專利，是為了不被大財團吞掉。這也是他一貫的生存智慧，始終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找縫隙、想辦法，比別人早走幾步。在民國七十幾年，他便接觸到車載行動電話。2000 年加入阿里巴巴時，臺灣很多人連電子郵件都不太會用。他在廣州做了二十一年的生意，開過手機殼工廠，熟悉大陸電商生態和物流系統。後來因為生病和孩子的轉學問題才回到臺灣，本來打算投靠在臺北的兄弟，結果兩個媳婦冷言冷語，他乾脆留在老家鄉下繼續做網路生意，說得雲淡風輕：「做網路在哪裡都可以做。」

他在四湖鄉推廣兩個核心理念：「農業五分法」和「產品二次精加工」。五分法就是一甲地不種同一種作物，分成五塊種不同的東西，臺北的朋友可以每樣買十斤，既分散風險也增加銷量。他解釋得很具體：一甲地全種蒜頭大家吃不完，種五種就能讓親戚好友這個買十斤那個買十斤，全部賣光。二次精加工則是把原料變成加工品，農閒時拿蒜頭去做糖醋蒜、蒜蓉辣醬，不會做就查 YouTube，看十支教學影片，自己再做兩三次實驗。他第一次做糖醋蒜，二十幾斤太鹹全倒掉，現在成功率九成多。他從不把失敗當羞事，反而把實驗過程全都公開分享，因為農業週期一年才一次，一個人實驗太慢，要讓更多人一起試才能加快累積。

在網路上耕耘超過十年，阿奇的臉書粉絲有一萬一千多，並創了四個社團，其中一個有三十六萬人。他加入一百多個外部社團銷售，審核太久的直接退出。他對社群操作的掌握非常細緻、有策略：知道留言數比按讚重要，因為演算法只偵測留言；廣告要插在影片最後面，插在前面觀眾就跑了；要先吸睛才能賣貨。他把一塊烏魚子放在泡麵旁邊拍照就吸了幾千個讚，那塊烏魚子洗一洗他自己分兩次吃掉。他清楚「穿少、敢講、敢跳」是短影音的銷售邏輯，雖然自己沒這樣做，也自嘲自己若是如此，可能也沒人要看，但懂得社群行銷的遊戲規則，也知道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

他和我們說自己的臉書帳號被惡意檢舉封過，儘管他知道是誰做的，但也知道背後的地方政治複雜關係。他沒有選擇正面對抗，而是把老婆設為社團管理員，若自己帳號被封、無法使用，還能從老婆那邊被拉回社團。另外，

他也補充有次路口反光鏡破了，他不去求鄉長修，而是拍照 PO 上社群，讓政治人物自己估算選票壓力，不用多久就有人來修。對他來說，只要懂得用網路和法律，可以成為市井小民的力量。

阿奇還拿蒜頭遮光讓它長成黃色的「蒜黃」，到臉書上拍拔絲地瓜、拔絲烏魚子的影片吸引眼球，在結尾插入自己的產品廣告。他說影片不用自己剪，抖音上就可以處理。他在 FB 搜尋自己的名字，說不可能重複，叫人家不要按讚要留言，不要加他 LINE，LINE 只用來傳地址和電話。每一個細節都是他自己摸索出來、反覆實驗過的心得。他常說偏鄉創業要先立於不敗之地，所有投資都要先考慮減少風險。這句話放在他整個人生來看，更像是一種活法——在資訊最不流通的地方，他偏偏是最早接觸新事物的那個人；在最容易被忽視的角落，他用網路把自己的東西賣到全臺灣。他不等人來幫，也不等條件變好，而是把現有的工具用到極致，一邊做一邊調整，一邊失敗一邊記錄下來讓別人也能學。

（五）線上社群

在我們實際前往雲林進行田野調查之前，我們便嘗試先透過 Facebook 社團與 Line 通訊群組，初步掌握地方社群在線上空間中的互動樣貌。我們希望藉由地方居民日常使用的線上社群，初步理解地方資訊如何被發布、轉傳、回應與組織，並進一步觀察地方認同、社交關係與日常生活經驗如何在線上空間被呈現。換言之，Facebook 社團「我們都是箔子寮人」與 Line 群組「雲林 500 會」是我們

理解雲林四湖鄉的起點。有趣的是，兩者的運作方式相當不同。

「我們都是茆子寮人」是 Facebook 的公開社團。截至 2026 年 4 月 26 日，社團成員共有 4,658 人。從社團內容觀察，其發文類型相當多元，涵蓋商品推銷、政治人物宣傳、學校活動資訊、公益團體募資，以及地方日常生活紀錄等。不同使用者可在其中發布與地方生活、個人經驗、公共活動或商業需求相關的內容。

報導人阿奇與阿源大哥皆曾於該社團發文，顯示此一平臺亦是地方居民進行日常自我呈現與地方感表述的重要媒介。例如，阿源大哥於 2026 年 3 月在社團中發文三次，內容皆為分享茆子寮的夕陽影像；阿奇則於同月發文一次，分享自己種出「獨頭蒜」的經驗。這些貼文展現地方居民如何透過社群媒體持續書寫、展示與感知地方生活。換言之，「我們都是茆子寮人」可被理解為一個以地名為凝聚基礎的線上地方社群，其意義不僅在於資訊流通，也在於居民透過影像、物產、日常經驗與地方記憶，持續生成一種數位化的地方連結。

另一方面，相較於「我們都是茆子寮人」Facebook 社團的開放性，Line 群組「雲林 500 會」則呈現出更明確的成員網絡與組織性。該團體同時具有線上與線下活動形式。線下方面，成員每三個月舉辦一次餐會，並不定期安排其他活動；線上方面，成員則透過 Line 群組維繫日常聯繫與訊息交換。根據新聞報導，該團體曾於 2023 年以廣告車為賴清德先生助選（陳仁華 2023）。我們經由報導人吳老師引介，自 2025 年 11 月 27 日起加入「雲林 500 會」Line 群組。該群組名稱為「雲林 500 會（正文群組，盡量不要發無關的

文或問候)」，截至 2026 年 4 月 27 日，共有 444 位成員。從群組名稱即可看出，該群組對訊息發布具有一定程度的規範期待，並試圖區分「正文」與「無關內容」。換言之，這並非閒聊式的通訊群組，而是一個具有特定溝通秩序與議題邊界的線上互動場域，其中也展現出地方行動的力量。

就內容而言，「雲林 500 會」Line 群組主要以國內政治與國際關係相關訊息為主。在國內政治立場上，群組討論傾向民主進步黨；在國際關係議題上，則呈現出反中情緒與政治判斷。此一群組因而可被視為地方社交網絡、政治認同與即時通訊技術交會的混雜空間。換言之，其成員並非僅在線上交換訊息，也透過定期聚餐與不定期活動維持實體關係；同時，線上群組亦延伸日常的地方政治與社交連帶。因此，「雲林 500 會」可被理解為一種混雜空間的參與社群：它結合餐會、出遊、政治動員與 Line 群組訊息交換，使地方社群的公共參與不再侷限於傳統實體聚會，而是在日常通訊、政治資訊轉傳與線下互動之間持續生成。

四、身體感的全新面貌：科學技術與社會觀點

（一）數位科技的日常經驗與身體感

「身體感」(bodily sense) 的研究取向主張身體為感知世界的根本，這種感官經驗深受特定社會與物質環境的形塑，是長期生活實作中不停習得的體系（余舜德 2006）。相較於以工具使用視角將手機視為外在、被動的操作客體，身體感視角引導我們觀察技術物如何主動參與並重構個人的感知經驗。在四湖鄉的田野脈絡中，長輩的入睡、勞動

或環境觀測等日常實踐，已與手機產生的聲響、畫面與資料共同交織、形塑地方獨特的數位使用樣貌。

阿奇的生命經驗展示了數位技術如何深度介入生理節奏。阿奇經營電商超過十年，長期的市場競爭與「腦袋不停運轉」的職業生活習慣，使他隨時處於警覺、高速運轉的狀態。不停思考著肥料價格、網路上與客戶的互動、最新的商業計畫以及物流動向，訪談中他坦承有時這種狀態會導致失眠。有趣的是，阿奇對抗失眠的方式並非透過冥想、運動等方式，而是發展一套「手機催眠」，他經常伴隨著手機影片聲入睡。他會點開 YouTube，選擇特定的懸疑故事或說書影片「魔音穿腦」。阿奇特別強調「是用聽的，不是用看的」，手機發出的低沉、連續的敘事聲，取代了腦中的雜音與焦慮情緒。他甚至感性地描述道：「這就像是有一個人在陪我聊天」。

我們認為非常有趣，因為同樣的現象也出現在其他報導人的日常經驗中，吳老師曾表示許多時候他會靈光一閃於晚間寫作，但有時也習慣伴隨著影片的聲響入睡。從身體感的視角分析，阿奇與吳老師體現了技術物如何培養出新的「身體慣習」(body habitus)。余舜德(2006)指出，全球化與新技術會顯著培養出關於舒適感的新標準。在傳統的生活經驗中，入睡更依賴環境的靜謐，但阿奇與吳老師的身體已經適應了由技術中介製造的全新生活節奏。

身體感不僅關乎內在生理調節，更涉及個人如何感知並連結所處的自然環境。對於居住在雲林沿海的長輩而言，生命節律與潮汐息息相關。以熱愛攝影的阿源大哥為例，他下載潮汐時刻 App 作為環境感知的延伸，精準掌握潮汐漲退不僅是為了捕捉完美的攝影瞬間，更提到能確保自身

安全、避開危險。手機螢幕上的潮汐表 App 成了他觀察大海的第二雙眼睛，透過螢幕中的動態時刻表，他將抽象的數位資料轉化為具體的行動計畫。

同樣的數位實務也體現在吳老師對魚塭的管理上。當被問及最常用的手機應用程式時，吳老師直覺地回答是「潮汐表」。潮汐表的數位中介功能打破了物理距離的限制，使吳老師即便身處室內，感官也能透過螢幕上的資料，延伸至魚塭現場的水位變化與魚群狀態中。在這些案例中，數位工具並未截斷人與自然的聯繫，反而以更精確、具預測性的方式，將長輩的感官與地方環境的節律重新編織在一起。這種將數位資料內化為環境管理與生活節奏的過程，形塑了一種在地化的數位身體經驗。

余舜德（2006）指出，身體感知是在特定物質環境與實踐中習得的體系。對沿海長輩來說，潮汐表已從外在的客觀資訊，轉化為感知地方環境節律、安排勞動與審美行動的感官延伸。在探討物與身體感的歷史時也提到，新物件會參與建構個人對空間的掌握能力。當抽象的水位數據與長輩長年的在地經驗結合，便產生了具體的身體感官預判。這種「人—機—自然」的交織關係，顯示偏鄉數位化實為一種雙向的互動。長輩運用內化的環境知識，將數位工具打造為連結土地與生理節奏的橋樑，展現出具備韌性、全新的數位身體經驗。

（二）數位拼裝與在地創新：四湖鄉的異質網絡

過去技術史研究往往過度關注創新（innovation），卻忽略了「使用中的技術」（technology-in-use, Edgerton 1999）。在茆子寮，數位工具的使用透過異質的行動者網絡進行轉

譯與重組，本節分析長輩們如何打破原廠設定的技術框架，將手機與地方美學、農產加工及個人記憶重新組織。

阿源大哥在訪談中提到他在地方場域扮演的角色：「我有時候去老人會，或是廟那邊，看到他們（其他長輩）在摸手機摸半天，我就會過去幫一下。他們最常問的就是怎麼傳定位，或是怎麼把照片傳給孫子。我跟他們說，這不是壞掉，這是要你點這個（介面）。其實他們很有興趣學，只要有人肯一步步教。當有一個人學會怎麼發定位，那種成就感會在群組裡面傳開。」（阿源大哥，田野筆記，2026/01/13）。此外，外籍移工的出現也意外成為技術學習的推動力。阿源大哥分享了他的經驗：「現在農村缺工很嚴重，找移工來幫忙，他們有時候找不到田的位置。後來移工跟我說，老師你發定位給我，我『嘟嘟』（移工的機車聲）就來了。我為了讓他們能精準地到我的魚塢或田裡，我必須學會怎麼操作 Google Map。這不是我想學，是現實環境逼著我要學會這套定位系統。」（阿源大哥，田野筆記，2026/01/14）

由於善水咖啡廳老闆經營地方長者服務，我們也曾向他請教。他以自身父親為例，說明有時地方長輩遇到數位技術相關使用問題時，也會向其請教。這些地點除了提供人們交談、放鬆的空間外，也成為技術擴散的重要關鍵。在這些空間中，手機成為了「共同實作的物件」，透過阿源大哥這類「技術中介者」的輔導，技術的操作被嵌入進傳統的鄰里社交（如分享孫子照片）中。此外，外籍移工與 GPS 定位的互動，則揭示了技術學習的「功能性拼裝」：為了維持生產關係的運作，長輩必須徵募定位技術來管理流動的勞動力。這種學習網絡的組裝，證明了偏鄉數位化並

非依賴政策補助，而是透過異質行動者的相互勾連，在裂縫中生長出的韌性網絡。

林崇熙（2001）指出，技術在進入特定社會場域時，會經歷「去脈絡化」再到「再脈絡化」的過程，使用者會根據在地的物質條件與社會需求，將異質的組件重新拼裝。在雲林偏鄉，長輩們不再是被動的消費者，而是轉化為技術的「拼裝者」，將數位軟體與在地風景、農產勞動及集體記憶進行有機的縫合。

阿源大哥的影音創作，是典型的感官與技術之組裝。他並不滿足於單純的錄影，而是將「小影」剪輯軟體、數位攝影、以及他個人吹奏薩克斯風的音軌進行深度疊加。在這裡，數位技術被他用來解決「版權問題」與「在地表達」的雙重困境。他堅持不使用內建或下載的罐頭音樂，而是將自己吹奏的音聲作為背景。若依循李梅君（2022: 126-128）對拼裝的討論，阿源大哥的媒介實作可被視為一種技術的在地再造。他將原本由平臺預先設定的軟體功能，與個人的藝術實踐及地方夕陽景致重新連結，使手機、環境與創作者共同構成的異質拼裝，由此產出的短影音承載阿源大哥對地方環境的感知。透過 Line 群組與 Facebook 的傳播，偏鄉風景進一步被轉化為可記錄、分享與流通的地方影像。

若說阿源大哥的拼裝是美學式的，那阿奇的拼裝則是高度策略與生計導向的。阿奇將數位技術定位為解決偏鄉農業困境的手段，提出「產品二次精加工」的在地化策略。他利用 YouTube 與抖音作為知識源頭，將全球化的食品加工技術（如糖醋蒜、蒜蓉醬）轉化為自己可操作的勞動模式。

阿奇提出「數位農業五分法」計畫：利用數位資訊進行多元化種植以規避風險，並透過「實驗精神」將原物料轉化為高毛利的加工品。這種拼裝過程打破了「農民僅是生產者」的傳統角色，透過 YouTube 上的技藝共享與他個人的市場直覺，阿奇在偏鄉組裝出一套整合了「種植、加工、銷售」的微型數位產業鏈。技術在此不再是冰冷的工具，而是長輩對抗中盤商剝削、試圖在邊緣場域中奪回定價權的防禦性武器。

在行銷策略上，阿奇更展現了對網路社會學的深刻洞察。他透過「P 圖公社」與網友互動、製作小時候記憶中的吸睛圖像，將原本平淡的鄉村產物轉化為具備病毒式傳播力的內容。這種拼裝不僅是像素的疊加，更是將「偏鄉的物質性」與「都市網路使用者的注意力經濟」進行對接。阿奇利用數位平臺的「同溫層」機制，組裝出一個擁有 36 萬人的社團網絡，使自己得以在網路空間中扮演一個能夠引導輿論的數位行動者。

茆子寮的案例展示了偏鄉長者如何成為技術的「拼裝者」。他們在非正式的學習網絡中結盟，打破軟體原始設定，將數位工具與地方美學、農業轉型及集體記憶重新組裝。這種「拼裝科技」的實踐，不僅賦予了高齡長者在資源邊緣場域中的創造力，更證明了偏鄉數位化的核心力量，實源於長者深厚且具備創造力的生命經驗。

五、個人生命經驗與媒介使用風格

法國社會學家 Pierre Bourdieu 提出「慣習」(habitus) 概念，指個人在長期社會生活與職業經驗中，所內化的一套持久且穩定的「行為傾向」與「思考方式」(Bourdieu,

1972[1977])，如同一套鑲嵌在身體內的導航系統，即便面對全新的數位環境，行動者也會不自覺地運用過去累積的技能、邏輯、品味等一系列實作方式來學習和使用技術。採用此分析概念能幫助我們理解為何即便在相同的地理區域、相似的年齡區間中，人們仍會發展出截然不同的媒介使用樣貌。

我們經常能見到吳老師在「雲林 500 會」發表針對政治、時事的評論，也常讀到老師所撰寫的詩作。訪談過程中，吳老師分享他經營「新雲林之聲」電臺的經驗外，亦熱情地展示他在 Line 功能「Keep 筆記」中維持每日寫作的習慣，隨時靈光一閃便將想法記錄在 Keep 筆記中，有時在清晨起床後、有時也在半夜輾轉難眠時。他很希望能有健全、良好的社群能夠讓大家彼此討論公共事務與發表評論，這也是他持續經營 Line 群組的動機之一。他主要將書寫作品發表於 Line 群組中，有時也會投稿至其他平臺，在發表的每一篇文章中，他除了於最上方題名寫上作者與日期之外，也對每個字、標點都非常仔細用心，甚至會「暗藏密碼」於其中，與讀者互動，觀察文章有沒有被認真仔細閱讀。對於社群網站、演算法等技術，吳老師亦展現出高度的反思與自省能力，包括他對數位平臺背後的運作邏輯持有高度警戒，認為 YouTube 或 Facebook 上的訊息並非絕對中立，平臺透過演算法篩選資訊，需要小心「認知戰」與廣告的影響，當發現自己過度使用手機時甚至會刻意與它保持距離。

對於議題的縝密表達能力，及對寫作流暢、正確性的嚴謹要求，以及在公共事務的參與責任感，已然為吳老師內化的慣習，也深深形塑其理解新技術的角度。這樣的獨

特使用樣貌並非憑空出現，早在學生時期，吳老師即展現高度的公共參與熱忱與批判性思考，在畢業後投身中學教育後養成持續書寫、反思社會議題的能力，尤其在擔任行政工作的十餘年間，因為有較多個人時間，更是寫作的高峰期。在吳老師身上，我們可以看見「慣習」(habitus)的強大延續性，長年教育與行政資歷累積而成的「實作邏輯」(Bourdieu, 1972[1977])，使其在面對全新的技術變化時，並非被動受其支配，而是展現出知識分子的主體性，將手機「馴化」為延續社會參與、發聲與持續學習的管道。

手機作為一種創新科技，其採用並非只取決於技術本身，而與使用者如何評估其相對優勢、相容性、複雜性、可試用性與可觀察性有關。其中，生命經驗、媒介使用與學習情形更為重要。吳老師年少時即對政治有興趣，後來長期在虎尾高中任教三民主義與公民至退休，也曾參與地下電臺與新雲林之聲。對他而言，手機與 Line 群組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延續了其長期形成的公共發聲習慣。換言之，他不是因為手機新奇而使用手機，而是因為手機能接續其既有的寫作、評論、教育與地方參與。由上可知，手機使用在此與使用者的生命經驗相互扣合，因此被吸納為一種延續言說、寫作之外的「發聲工具」。阿源大哥的生命經驗則較偏向早年技術接觸與退休後興趣實踐。他曾在外商公司工作，較早接觸通訊與技術系統，他甚至與我們分享大型電腦的使用經驗。換言之，在過去工作經驗中，他就有主動學習科技使用的經驗，因此使用手機並非難事；返鄉後，他把手機用於攝影、影片剪輯、潮汐查詢、音樂學習、Google 翻譯等。他的手機使用展現出較高的主動探索性。有趣的是，阿源大哥不只自己使用，也會教其他長

者使用 Line 或手機功能。手機對他而言不只是工具，而是退休後重新安排生活興趣與地方參與的媒介。

另一方面，阿同大哥則提供另一種樣態。他國一離開家鄉，到外地大城市從事勞力工作，他長期以自由工形式生活，後來回到茆子寮從事割草、抽水等工作。對他而言，手機的主要功能是聯絡工作與娛樂。雖然他的使用時間很長，但他不一定以抽象語言談論手機意義，也不特別將手機視為地方連結工具。這並不代表他的手機使用不重要，而是表示手機已經成為日常生活的背景性基礎：他目前仍使用手機作為工作接案的工具，在當地偶爾協助割草等工作，他表示這樣的接案型態與早年在臺北打拼的經驗類似；而在興趣方面，他平時也觀看短影音，但這一種消費型態不一定被他表述為「創新」或「能力」

阿奇則是創新傳布分析中最值得討論的案例之一。他早年接觸 BB Call、車上行動電話，後來在中國廣州經營手機殼工廠，也曾使用阿里巴巴進行網路行銷。返鄉後，他將這些經驗轉化至在地 Facebook 社團行銷。阿奇的案例顯示，外地經驗不是削弱地方連結，反而可能成為返鄉後重新發展地方經濟的資源。其中，「商業上的利益交換」是阿奇早年在中國廣州工作時體會到的商業技巧之一。他更將因為從商所體悟到的經驗轉化在社群經營。以網路使用為例，他利用 Facebook 上的 P 圖公社尋找會使用修圖軟體的網友為自己烏魚子品牌製作社群文案的圖片（參見圖一）。他認為這甚至不需要他主動學習，而是可以尋求社群資源來換取。此外，他更使用 AI 工具再現幼時在家鄉看過的畫面，他認為這可以促使大家回顧往日情懷，勾起地方居民的昔日記憶，進而吸引目光。



圖一、阿奇與 P 圖公社合作之照片（阿奇提供）

因此，四湖鄉長輩對手機的接受程度，或許不宜單純由年齡、教育程度或都市／偏鄉二分來解釋，而應理解為生命經驗、工作型態、返鄉歷程與地方關係的綜合因素。其中，我們發現外地工作經驗尤其重要，因為它使部分報導人較早接觸行動通訊、商業行銷與技術變遷等；返鄉後，這些經驗又被重新安置於四湖鄉的地方生活中。

若以創新傳布理論的分類來看，吳老師、阿源大哥與阿奇似乎可被理解為早期採用者。首先，吳老師不是因為追求科技新穎而採用手機，而是因為手機符合其公共發聲需求。他對小紅書、抖音等平臺持保留態度，也會刻意避免被手機制約。其次，阿源大哥雖具有高技術接受度，但他的重要性不只是採用較早，而是能在地方社群中扮演技術轉譯者，把手機、Line、翻譯 App 與影音剪輯等工具轉化為他人可理解、可使用的地方資源；阿奇雖可被視為創新者，但他的創新使用在於市場與地方農業的結合。他將社群平臺、政治同溫層、吸睛內容、物流與小規模農產生產

整合起來，形成一種偏鄉小資本經營模式；阿同大哥雖未展現出強烈的創新敘事，卻是高度使用者。在創新傳布的分類看來，經常將使用者判斷為早期或是晚期大眾，不過在此我們似乎難以使用早期或是晚期來定義他；這提醒我們，創新傳布理論常強調採用與擴散的速度，卻較少處理「高度使用但低度表述」的日常媒介實作。換言之，手機是否被採用，不只是科技從社會系統中擴散的速度與其結果，而是行動者將科技放入自身生命史的過程。這個過程包括過去是否接觸過類似技術、是否具有跨地工作經驗、是否有社會網絡需要維繫，或是否有經濟或興趣動機等。如此一來，創新傳布理論仍有十足的參考價值，然而在田野的實際觀察走訪中，我們深刻發現觀看使用者的媒介使用行為必須回顧使用者的個人生命敘事，並從中加以思考。

六、結論：從手機使用回到生命經驗與地方社會

本文以雲林縣四湖鄉長輩的手機使用為核心，試圖重新理解長者與數位科技之間的關係。本文主張手機在四湖鄉長輩的日常生活中是生命經驗、地方知識、身體感、工作型態與社群關係之間被持續轉化的媒介實作。若僅以「會不會使用手機」或「是否成功採用科技」作為分析起點，將難以理解長輩如何在具體生活脈絡中，將手機重新安排為公共發聲、生計延續、休閒陪伴、環境感知與地方連結的日常介面。

首先指出，四湖鄉長輩的手機使用必須放回線上與線下交織的地方生活中理解。Facebook 社團「我們都是箔子寮人」與 Line 群組「雲林 500 會」顯示，地方社群的數位實作並未脫離實體地方關係，而是與廟口、聚餐、田地、

魚塭、咖啡廳、政治動員與親友網絡相互連動。這些線上社群既是資訊交換的管道，也是地方認同、政治立場、日常記憶與社交關係被持續書寫的場域。由此觀之，四湖鄉的數位生活可被理解為一種混雜空間：手機螢幕、Line 群組與 Facebook 貼文將地方關係延伸、重組並日常化，使線上互動與線下關係共同構成地方社會的參與形式。

其次，手機已深度介入長輩對身體、時間與環境的感知方式。阿奇以 YouTube 說書影片作為助眠聲響，吳老師在深夜靈感出現時以手機書寫詩作，阿源大哥與吳老師則透過潮汐表 App 掌握海岸、魚塭與攝影時機。這些案例顯示，手機並非外在於身體的工具，而是參與形塑新的感官秩序與生活節奏。聲音、畫面、定位、潮汐數據與即時訊息，逐漸被納入長輩的身體慣習與地方感知之中。對四湖鄉長輩而言，數位科技不只是觀看世界的螢幕，也成為感知地方、調整作息、預判環境與安頓自身的感官延伸。

另外，我們選擇以「拼裝科技」說明偏鄉長輩如何在標準化科技產品與在地生活需求之間進行創造性重組。阿源大哥將手機攝影、影音剪輯、自行吹奏的薩克斯風音樂與茆子寮夕陽結合，形成具有地方感的數位影像實作；阿奇則將 YouTube、抖音、Facebook 社團、AI 影像、農產加工與社群行銷拼裝為一套偏鄉小資本經營模式。這些案例顯示，長輩並非被動接受數位平臺功能，而是依據自身工作經驗、興趣、地方知識，將手機轉化為可操作的生活資源。此一轉化過程奠基於地方居民的具體需求與生命歷程，並在日常實作中持續被拼裝與調整。

最後，我們認為個人生命經驗是理解手機使用風格的關鍵。吳老師長年的教育、行政與公共參與經驗，使手機

成為延續寫作、評論與地方發聲的媒介；阿源大哥過往接觸科技與通訊系統的工作背景，使其在退休後能以手機發展攝影、音樂、翻譯與技術協助；阿同大哥則將手機融入「自由工」接案、日常娛樂與人際聯繫之中；阿奇早年跨地經商與網路行銷經驗，則使其能將社群平臺、農產銷售與地方記憶結合為新的生計策略。這些差異說明，同樣身處四湖鄉、同樣被我們認為是「長輩」的行動者，事實上並不一定具有同質的數位經驗。手機的意義取決於使用者曾如何工作、移動、返鄉、學習、經營關係，並在何種地方結構中重新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

綜合而言，本文發現四湖鄉長輩的手機使用是由其生命經驗與地方社會共同生成的媒介實作過程，而手機更是使用者在生活中創造混雜空間實踐的主要媒介工具之一。手機在客廳中成為詩作、政治評論與地方記憶的書寫媒介；在田地與魚塢中成為生產管理、潮汐判讀與農產行銷的媒介；在廟口、老人會與咖啡廳中成為技術互助與社群維繫的共同物件；在個人生活中則成為助眠、觀看、娛樂與聯絡的日常陪伴。由此可見，長輩的數位生活是他們在退休、返鄉、勞動轉型與地方變遷之中，持續重組自我、社群與地方關係的方式。本文因此主張，研究高齡者與數位科技時，應從工具功能與近用差距進一步轉向個人生命史、身體感與地方實作；唯有如此，才能看見高齡者在數位時代中所展現的媒介能動性、生活韌性與地方創造力。

七、參考資料

李梅君

- 2022 〈拼裝公民科技：黑客、鄉民、與資料行動主義〉。《科技、醫療與社會》35：115-166。

余舜德

- 2006 〈物與身體感的歷史：一個研究取向之探索〉。
《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44(1)：5-47。

林建志、王莉晴

- 2025 〈潮起潮落之際：箔子寮漁港的停滯與韌性〉。刊於《風頭水尾·續——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113 學年度文化田野與實習方法成果專輯》。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編，75-99。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林崇熙

- 2001 〈沈默的技術—嘉南平原上的拼裝車〉。《科技、醫療與社會》1：1-42。

洪浥青、胡善翔

- 2025 〈風中扎根：箔子寮的社會永續路徑與挑戰〉。刊於《風頭水尾·續——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113 學年度文化田野與實習方法成果專輯》。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編，217-252。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梁宸維、王安珩

- 2024 〈何謂「健康」？如何「照護」？雲林箔子寮高齡者的照護實踐〉。刊於《風頭水尾——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112 學年度文化田野實習與方法成果專

輯》。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編，215-237。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張瑜真、方宇祥、周哲瑋

2025 〈回來的人：四湖沿海的地方發展軌跡〉。刊於《風頭水尾·續——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113 學年度文化田野與實習方法成果專輯》。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編，153-186。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陳仁華

2023 〈雲林 500 會挺賴清德 廣告車號召加入雲林信賴之友會〉。中央通訊社，
www.cna.com.tw/news/aip/202304030114.aspx，
2023/4/3 上線。

陳思捷、鄭靜蓉、溫顯宜

2025 〈回家生活：茆子寮善水咖啡與雲林海線返鄉青年創生實踐〉。刊於《風頭水尾·續——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113 學年度文化田野與實習方法成果專輯》。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編，187-216。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陳冠儒

2025 〈彩繪的浪潮——茆子寮藝術社造的社區想像重構〉。刊於《風頭水尾·續——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113 學年度文化田野與實習方法成果專輯》。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編，103-151。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蔡耀陞、何昀瑄

- 2024 〈「也要神，也要人」：神人的地域關係與民間信仰變遷後宮廟再中心化的神人想像——以箔子寮普天宮祭祀圈為例〉。刊於《風頭水尾·續——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112 學年度文化田野與實習方法成果專輯》。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編，113-163。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蘇穎欣

- 2025 〈紙上漁港：箔子寮漁港的治理失能與未竟的發展藍圖〉。刊於《風頭水尾·續——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113 學年度文化田野與實習方法成果專輯》。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編，15-73。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Bourdieu, Pierre

- 1977[1972]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Richard Nice, tr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usch, Peter André, Geir Inge Hausvik, Odd Karsten Ropstad and Daniel Pettersen

- 2021 Smartphone Usage among Older Adult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121: 106783.

Burrell, Jenna

- 2012 Invisible Users: Youth in the Internet Cafés of Urban Ghana. London: The MIT Press.

Chen, Yi-Ru Regina and Peter J. Schulz

- 2016 The Effect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terventions on Reducing Social Isolation in the Elderly: A Systematic Review.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18(1): e18.

Choi, Eun Young, Shaheen Kanthawala, Young Sun Kim and Hee Yun Lee

- 2022 Urban/Rural Digital Divide Exists in Older Adults: Does It Vary by Racial/Ethnic Groups? *Journal of Applied Gerontology* 41(5): 1348-1356.

de Souza e Silva, Adriana, Scott W. Campbell and Rich Ling

- 2025 Hybrid Space Revisited: From Concept toward Theory. *Communication Theory* 35(1): 14-24.

Edgerton, David

- 1999 From Innovation to Use: Ten Eclectic Theses 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Technology. *History and Technology* 16(2): 111-136.

Friemel, Thomas N.

- 2016 The Digital Divide Has Grown Old: Determinants of a Digital Divide among Seniors. *New Media & Society* 18(2): 313-331.

Gallistl, Vera, Stephen Katz, Franz Kolland and Alexander Peine

- 2023 Socio-gerontechnology—New Perspectives 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Later Life. *Frontiers in Sociology* 8: 1183572.

Horst, Heather A. and Daniel Miller

- 2012 *Digital Anthropology*. London: Berg.

Hunsaker, Amanda and Eszter Hargittai

- 2018 A Review of Internet Use among Older Adults. *New Media & Society* 20(10): 3937-3954.

Katz, Elihu, Martin L. Levin and Herbert Hamilton

- 1963 Traditions of Research on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8(2): 237-256.
- Leukel, Joerg, Barbara Schehl and Vijayan Sugumaran
- 2023 Digital Inequality among Older Adults: Explaining
Differences in the Breadth of Internet Us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6(1): 139-
154.
- Paul, Karsten I. and Bernad Batinic
- 2010 The Need for Work: Jahoda's Latent Functions of
Employment in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the
German Population.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31(1): 45-64.
- Peine, Alexander and Louis Neven
- 2021 The Co-constitution of Ageing and Technology: A
Model and Agenda. Ageing & Society 41(12): 2845-
2866.
- Rogers, Everett M.
- 1983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 Ryan, Bryce and Neal Gross
- 1943 The Diffusion of Hybrid Seed Corn in Two Iowa
Communities. Rural Sociology 8: 15-24.
- Taylor-Smith, Ella and Colin F. Smith
- 2019 Investigating the Online and Offline Contexts of Day-
to-Day Democracy as Participation Space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2(13): 1853-
1870.
- van Deursen, Alexander J. A. M. and Jan A. G. M. van Dijk

2014 The Digital Divide Shifts to Differences in Usage.
New Media & Society 16(3): 507-526.

Xu, Meng

2024 The Making of Everyday Space of Publicness:
Insights from a Mall in Beiji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53(6): 796-821.

Yu, Rebecca P., Ryan J. McCammon, Nicole B. Ellison and
Kenneth M. Langa

2016 The Relationships That Matter: Social Network Site
Use and Social Wellbeing among Older Adult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geing & Society 36(9):
1826-1852.

生成式 AI 輔助寫作揭露聲明

聲明日期：2026 年 6 月 20 日

本文作者於撰寫本作業之過程中，使用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輔助部分寫作程序，特依本課程「生成式 AI 使用規範」之要求，如實揭露如下。

一、使用之模型與版本

Gemini 3.5 Flash, ChatGPT 5.5

二、使用方式

1. 逐字稿整理或初步清稿（已使用本地工具或匿名化版本）
2. 田野筆記結構化（重新整理格式或分類段落）
3. 協助初步 coding（概念分類與標籤建議，最終詮釋由研究者自行判斷）
4. 查詢相關文獻（已親自核對原始文獻）
5. 參考潤飾意見並修改（文字最終由本人決定）

本聲明由作者自行填寫並確認，所載資訊均屬實。

後記



如果在冬天，一場場文化田野實習

郭天祐

人類學的田野工作不是去肯定我們的意見或理論，而是去參與、學習別人的能力、技術、概念與知識。我們透過觀察、請教與親身體驗別人的生活，讓自己與別人共同成長與延伸。這個學習的過程本身就有它存在的價值，不需要仰賴民族誌書寫來合法化它的意義，我們甚至可以說，民族誌只是人類學家在田野中成長的副產品。我們透過閱讀民族誌，來訓練自己如何去做田野？要注意什麼？不是倒過來。但歸根究底，你就是要學習一套去觀察、體驗與教育自己的成長方式。突破自己既有的框框來學習與成長是田野工作的目的，也是人類學對我們的挑戰，這個挑戰超越民族誌與非民族誌，也把人類學的知識取得與一般人的學習界限模糊。就這點來說，人類學其實就是一種無止境的學習。（林開世 2019）

三年一轉而瞬，臺大人類學系於雲林沿海的文化田野實習課程，也畫上了一個暫時的句號。在這三年中，我很幸運地分別以不同的角色參與其中——從一開始 112 年度懵懂莽撞的修課學生、到 113 年初出茅廬的助教再到 114 年偶發掉落的路邊學長和評論人。很榮幸接到郁茜老師的邀請，下文，將會是我對於這三年文化田野的繁思與雜想——關於文化田野實習、關於田野工作、關於田野工作的教與學、關於開放與潛力。



相較於考古學歷來都有集體發掘和田野學校的傳統，人們對於社會文化人類學田野工作的想像，似乎打從馬凌諾斯基陰錯陽差地在西太平洋小島落腳起，就一直有著獨身拓荒的印象。當然，隨著時代不斷演進和學科發展，對於田野工作的想像也不斷擴大和開放，不過「一人團隊」仍是田野工作的主流。

臺大人類學系的文化田野實習，另一方面，則是少見的社會文化人類學集體田野教學。在系上老師的帶領下，在經歷一個學期的課程後，一行人在某個冬天抵達某個聚落後，便是一連串緊湊的訪問、觀察、（被）拒絕、開會、溝通、寫筆記。十二天中，間雜著興奮、惱怒、沮喪、懷疑、欣喜、好奇等諸多情緒後，一眨眼，大部隊又陸陸續續和地方道別、離開了聚落、開始面對繁雜的資料和看似沒有盡頭的書寫、修改。迴還往復。

終於，一篇報告於焉成形。宛如人類學系的通過儀式般，度過了渾噩不上不下非此非彼的閼限時空後，大家紛紛開始準備畢業、實習、找工作抑或是備考研究所。

回想自己當初一樣是躊躇滿志地和組員踏入田野，有著龐大的野心想要和一些剛讀到的新理論做出互動和貢獻。但事後回望起來，或許真的是憑著一股初生之犢不畏虎的莽撞和當地人無限的耐心和善意，讓我和組員曉語仍能憑著不太輾轉（liàn-tóng）的台語蒐集到好像些什麼樣的資訊。但更珍貴的是，知道大家一起苦哈哈地在寒風中前行、在旅人驛站埋頭在筆電前一邊聽著同學當天的報告，儘管心神在好像打不完的筆記上卻偶能從這些分享中創造一些意外的連結。洗完澡後在三色屋的大廳聊天、吃著點心和彼此抱怨和打氣。

重要的是知道你不是獨自一人。一起探索、一起被罵、一起挫折、一起在每個冬日的清晨裡頂著寒風出門。後設地來看，儘管十天上下的田野充其量只能觸碰到地方社會生活的表層，但在知識生產上，可以見到不同的位置性、問題意識和個性，可以帶出一個地方這麼多不同的切角，儘管稚嫩、粗糙；另一方面，一輩子裡面，能再有幾次的目標，是好好地去建立關係、嘗試去理解他人呢？這場冬天裡嘗試深入遭逢與互動的，不只是和地方的人、也是和同學之間、和老師、和助教、甚至是自己的。



若以助教的角度來看這場田野實習，又會是另一番光景。

在冬日裡，一群人浩浩湯湯地搭著遊覽車，在小鎮裡興奮地走走停停、東張西望、探頭探腦，腆著臉向路人搭話，抑或是依循著過往建立的關係、帶著相似的問題不斷叨擾著友善的居民。

面對著自己稍微多認識些的地方，這個自己再度回來的小鎮。看著學生做得比去年的自己更好，一方面感到欣喜，一方面也暗自檢討過往的莽撞。可與此同時，因為和地方已經產生關係，是「回來」這個地方，有更多掛記與顧慮。擔心自己和同學們在不經意間跳進張力中、警戒著自己對於知識與權力的濫用，需要更全面地周旋於各式各樣的關係之間——老師與助教、助教與助教、助教與學生、學生與學生、學生與地方、整個團隊和地方……

需要去思考書寫的效應、學生們的收穫，甚至更進一步，田野工作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呢？當知道地方社會生活實在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參透的——文化的全貌觀、基礎資

料掌握、將現象鑲嵌回政治經濟歷史脈絡中。這些好像，都不是短期的文化田野實習能夠達成的，那，文化田野實習的意義究竟在哪呢？僅作為一個學系的成年禮，生產出的這些文字，能向世界訴說些什麼呢？

該如何面對無論是因為田野中的、寫作中的挫折，抑或是在與教學團隊或和組員中累積下來各式各樣的期待、想望、失落與怨懟？當我半隻腳踏入田野工作的教學後台後，觀看這場在冬日中的文化田野實習的切角又更加多面了。

作為初初有些田野工作經驗者，更能體會到所謂「田野工作是沒有辦法教的」是怎麼一回事：所有的行動和抉擇，都牽涉到每個人進入田野的不同位置，以及你自己的價值觀，田野過程中所採取的倫理立場抉擇不僅關乎知識論，攸關研究者的個人存在論基礎及其面對社會實在的基本姿態（鄭瑋寧 2015：228）。而這樣的抉擇不僅只關乎於個人，而是與田野互為主體的過程。或換句話說，「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都具有隨著他人的關係與歷史情境來建立與調整主體性與認同的可能」，因此「自我是關係性與相對性的」（林開世 2016：85-86）。

退一萬步來看，或許文化田野實習並沒有，也不應該承擔起什麼崇高的任務。這本來就是一場「教與學」的過程。期待做出什麼樣突破性的書寫，一方面是將地方社會生活的複雜性看淺，一方面也是對於學生不切實際也不應該的期待。

我想在冬天的這十二天，最重要的價值大概是，一個不得不需要去直接面對人群的機會。去看見真實的人、環境與社會，去看見不同的背景與機遇如何體現在人們面對

社會的態度之上。去因為冬天的偶遇建立起了一些預料之外的關係與聯繫。

看著後來回到地方發表，學生和報導人建立起的關係，乃至日後間或的聯繫，以及居民家中躺著的成果論文集，文化田野實習這種要求「置身」於現場的教學愈顯重要。

在如今科技快速變動的當下，一方面塑造了便利，可另一方面，卻也使得人們互動的方式更加疏離，也更動了人們的認識論工具，以身為度、具身的體驗面臨著被語言模型和演算法演替的風險。在這十多天中，無論目的，同學們都必須實際地與人互動，面容與想像不再是扁平的資訊，而是現實生活中想望、挫折、經歷、身體、情緒、歷史共同交織起來的產物。而嘗試去書寫這樣的故事，正是把那些模型之外的裂隙，那些複雜性與差異、實作與想像的細節、可能性與絕望、階級與性別的交織訴說出來。

或許稚嫩，但在如此的當下格外珍貴。

◎

到了第三年、也就是今年，我不再那麼密集地參與文化田野實習的教與學了。偶或關心今年助教團隊教學的進度，寒假時順道採訪，以及應邀擔任評論人。

隨著這場「田野實習」逐漸邁向終點，其所產生的效應到底是什麼呢？除了那些善意與禮物建造起一段段關係，拓展了雲林風頭水尾人們與臺大人類學系的關係外，還能生產些什麼呢？

正如地方想望著多重的未來，三年來修課的六十多個學生，也都陸陸續續各自地在路上前行著。一方面，這些稚嫩的文章為箔子寮、三條崙、下崙、飛沙、廣溝、四湖、口湖乃至臺灣留下了些故事與紀錄，同時也在地方與同學

們的身上都留下了改變與痕跡。但另一方面，我認為更重要的，是埋下了一個「不一樣」的種子。

誠然，從此刻的端點向遠方的時空望去，我們或許不是在一個最值得想望的當下。但田野工作賦予了我們一個可以想像「其他」的基石。三年的冬天，無數場交談、相遇、互動、實踐與草稿，記錄下了曾有過那麼樣的發生，或是知曉了那條未曾走上的路。當那些飄懸於生命中的經驗與思考在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共構時，我們都在夯實著那個構成我們之基礎。



在一切都不穩定且快速變動的此刻，未來無限的開放性難免讓人恐懼。但這個不穩定卻也是機會，在一切尚未成為定局的時刻下，文化田野實習帶給眾人的經驗，這些真實的相遇，成為了我們得以立足想望的基點、進一步撬動裂隙，或許我們真能走上那條值得期待之路。



如果在冬天，一場場文化田野實習。

參考資料

林開世

- 2016 〈什麼是「人類學的田野工作」？知識情境與倫理立場的反省〉。《考古人類學刊》84：77-110。
- 2019 〈做一個會遲疑的聆聽者〉。「芭樂人類學」，<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723>，2019 年 6 月 6 日上線。

鄭瑋寧

- 2015 〈情感、田野技法、存在與人類學知識〉。《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53(3)：211-252。

學做人？學做「人」。

盧佳秀

撰寫此文的當下，114 學年度文化田野的帳目基本上已全數處理完畢，各組的稿件也處理得差不多，待另一位助教穎欣辛苦排版後就能送印，預計十月蒞子寮夜巡時，帶回去分送給報導人們。至此，三年的文化田野即將順利告一段落，準備揭開下一篇章。

與此地的緣分，始於 111-2 學期呂欣怡老師開設的「海洋與漁業人類學」課程小田野，老師帶我們到雲林海邊的小村落，猶記得也是邀請蔡茂昌大哥進行導覽，了解「天下一家」的過去，及「烏倉寮」的重要意義。縱使對於學習內容已十分模糊，但我拍下揮手告別的蔡茂昌大哥，拍下普天宮廟埕，並在當天的社群媒體寫下「每一次田野，都是一次靈魂碎片的遺留」。彼時我心中還掛念著倉促結束 111 學年度高士考古田野的遺憾，思及時任助教學長提到他大學時曾經修習兩個田野，又深受此門課的小型田野感動，聽說下屆文化田野不僅由我當時相對熟悉的郁茜老師開設，老師也預計帶學生前往這個海邊小村落，「那何不試試看（修第二個田野）呢？」我想。

我是雲林蒞子寮田野第一年（112 學年度）的修課同學，當時我們組的研究問題是「當地人如何在資源有限的境況，為孩子拼補一個可期待的未來？」由於受到太多田野地（其他組）報導人及鄉親的善意，也感謝郁茜老師的賞識，天祐和我應邀擔任 113 學年度的田野助教，與蒞子寮再續前緣。這段期間，我隨著老師、天祐與同學們的研究腳步，逐漸熟悉此處的人情世故，建立更深的連結。在系上發表

會及地方發表會結束後，天祐另有安排而先行下車，我則因身分順利轉換（加入碩班），加上還想回去箔子寮看看，便選擇續任。爾後 113 學年度的修課學生穎欣加入文田助教團隊，師生三人展開 114 學年度的新合作。

文化田野助教具體而言要做些什麼？不同屆助教的答案不盡相同，肇因於不同田野地的特性、助教團隊各自擅長的事務而有差異，不過大抵能粗略分成教學與行政兩個面向，又因授課老師的教學策略、滾動式調整而有同學們可見及不可見的維度。

一、教學面

114 學年度主要的作業架構不變，仍舊是觀察、訪談、研究計畫三大主軸，沒有特別限制同學們的研究範圍及主題。其中，觀察作業每年都有不同的實行果效。112 學年度我們先是在水源校區的教室，對身旁的同儕進行短暫的觀察速記並交換討論，看到對同一場景時段下組間的不同詮釋後，才指派觀察作業；113 學年度則因颱風攪局，跳過課堂觀察，直接進行小組觀察作業；而 114 學年度人類學系甫搬到人文大樓，眾人對於新空間都充滿好奇，課堂練習便調整成讓同學們短暫地四散於大樓各處進行。有趣的是，部分組後續的觀察作業即是延伸課間小觀察的時長與頻率，有些組更錦上添花地短暫採訪其觀察對象，增加這份作業的可看性，卻也因此讓某些組壓力陡增，覺得自己被「捲」到，開始擔心是否做得不夠，產生對各項作業要求的困惑，困惑之下藏著學生們對分數（課堂及作業表現）的深刻焦慮。

作為曾經的學生轉任助教的我，因著完整走過一年文化田野課程，我理解同學對於分數等第的追求，以及源於

對生涯不確定而倒灌回來的、對自身能力的焦慮；這兩年，我也從老師調整課綱安排的角度，理解如何盡量在短暫的十六週，培養學生的長期田野能力。我想到 113 學年度文化田野結束後，郁茜老師與林崇熙教授討論時，林教授認為若課程能訓練／加強學生與其職涯所需技能的連結，或許就能增加同學們投入這門課的意願，不會覺得只是交差了事。文化田野的師生焦慮，某種程度上也是促使課綱調整的原因之一，相應的具體調整可以從 114-1 學期，由臺灣政經史切入介紹田野地取代閱讀方法論、相關區域研究論文，或是 114-2 學期引入 AI 輔助教學可見一斑。¹

即使課綱做了調整，這種結構性的焦慮依然存在。在講求效率、需要立即可見的回饋或成長的現在，人類學田野的慢節奏特性常會讓學徒們感到無所適從，進而迫切希望能快速獲得足以說服自己的答案。同學們即使閱讀 112 學年度和 113 學年度的論文集，透過先前修課同學的描述及網路影音資料收集，似乎能建立一個初步田野印象；然而對陌生地方（或甚至是陌生語言）²的不安、十六週課堂的快節奏與不由自主的同儕比較、課內外事項的焦頭爛額等，種種因素交雜堆疊，使得文化田野課程總蒙上憂慮躁動的灰。

這樣的躁動，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在田野移動方式。相較過去兩年只有建議盡量自備，郁茜老師相對強硬地希望同學們先行準備交通工具，除非真的借／租不到汽機車，

¹ 關於 AI 引入教學的部分，在芭樂人類學的網誌有相關說明，在此不贅述。

² 有些學生並不擅長或完全不是臺語使用者；而田野地許多相對年長的報導人，較習慣使用（海口腔）臺語表述想法。

才開放借用自行車。³對學生而言，因為有自己的交通工具，能更有效率地穿梭於田野地，擴大可移動範圍，增加研究主題選擇的多元；對老師及助教而言，則希望修正 113 學年度重複打擾同位報導人的境況，期待能勻出更多時間精力關心各組狀況。實際田野期間，仍舊有些意料之外的事發生，像是同學們寄機車的車行分散在三個不同的方向，需仰賴其他人協助接送；跟當地人借用機車卻忘記在還機車時把鑰匙插在機車上，使得車主趕緊在我們離開田野前過來追討；穎欣與我延續上個學年天祐與我建立的習慣，每天前往聚落祭祀中心祈求老師同學行車平安。

文化田野課程留給學生的實習天數其實並不多，上述種種交通安排，係為了發揮最大效益，114 學年度的文化田野去頭去尾只有留給同學九天進行研究，每天晚上的會議更是他們一天壓力最大的時刻；穎欣鑑於 113 學年度的學習經驗，認為需要提前與各組討論，幫助收束田野發現，他們才有機會在剩餘天數補齊田野材料。112 學年度當修課學生時，我總在想沒有研究計畫壓力的老師助教，每天在忙什麼呢？由於同學們都是第一次進行田野實習，對於觀察重點與訪談技巧都還需要磨練、需要他人給建議以調整得更流暢，因此郁茜老師會在每日與學生開完會後，再和助教群私下討論隔日有哪些組需要跟訪，盡量讓每組都能獲得一次老師及助教在旁觀察的回饋。⁴而老師也需要拜會各路人馬，持續經營維繫與田野地的關係，請他們包容初來

³ 風頭水尾的茆子寮的風，不分四季皆十分強勁，尤其到了冬天寒風刺骨，自行車往往被風給吹得左搖右晃，移動時間也相對拉長不少。因此去年考量安全及效率，部分組別若要去相對更遠的地區進行訪談，多仰賴老師及天祐的汽車接送。

⁴ 詳細流程可以參閱 113 學年度成果論文集，涂峻清學長的田野側記。

乍到的學生們；文化田野滾雪球式的報導人網羅手法，讓老師在與當地人寒暄過程中，了解還有哪些潛在報導人可能可以引介給學生。

此外，除了學生看得見的「老師或助教每日給予田野筆記的回饋」、「助教安排各組學生協助取當日晚餐並輪值打掃維護」抑或是「助教請同學協助寫共同感謝某幾位鄉親的大中小卡」，小至決定今天晚餐要訂哪間店，同學們有沒有記得回報打卡鐘，關心同學組內組間、同學與報導人間的人際互動，需不需要助教協助臺語翻譯，田野筆記有哪些他們沒有注意到的研究亮點，適應上有沒有需要協助的地方等，舉凡田野期間想得到的、想不到的食衣住行，又或者是事務性、情緒性勞動，都屬於助教群要煩惱的事。

不過，在如此高壓的環境下，無論是學生或助教，總能自得其樂找到一些紓壓的方法。113 學年度的大狗「阿黃」作為撫慰人心的關鍵，牠會快樂地回應眾人的呼喚，用力地甩著被打到後令人小腿疼痛的尾巴，偶爾調皮地跟進建築物內避寒，然後靜靜地窩在旁邊，讓同學「搓圓捏扁」，又悄然離去。隔年雖然沒有「阿黃」的陪伴，但同學們在田野期間互相關心打氣、討論遇到的困難，又或是在民宿會議室深夜交心，一起分工完成數張卡片封面、在普天宮 K 歌，與報導人建立「下次見！」的新連結等。這些彼此陪伴的時刻，也悄然支撐與緩解田野隱而未現的情緒張力，即便多數同學未來不一定朝人類學領域繼續鑽研，忘記課堂所授的各類知識，未來某日當有人提到「海邊小村落」時，期待茆子寮能成為讓大家會心一笑的溫暖回憶。

二、行政面

一門全員平安的田野實習課程，離不開天時地利人和，也與行前事後的繁瑣行政安排密不可分，仰賴一整個學校的協助。為了盡量減少修課學生的經濟負擔，便需要向學校申請相關經費，也因此，田野教學團隊共同花銷總要錙銖必較，以免左支右絀。

這三年的主要支出來源有三，首先是寒假田野期間的食住行保，上學期需要幫學生統一保險，訂團進團出的遊覽車、住宿及調查田野期間的移動方式；同學們完成成果報告後，要於系上及地方發表會進行公開發表，因此場地、餐食必須納入考量；最後要將學生基於授課教師、評論人、地方鄉親與助教們的回饋意見修改後的稿件，集編印製成冊，叮囑他們寄回田野地分享研究成果，為自己的書寫負責。前述之各種花費單據，不論支出項目為何，最終都需要進行一套繁瑣的核銷程序。黏存單製作完後，再勞煩系辦助教或計畫助教協助二次確認，送到學校主計。報帳過程總會有許多眉角與不熟悉之處，此時便仰賴系上前輩及學校單位的提醒，才能順利將一筆筆帳目送出。⁵

112 學年度及 113 學年度除了系上發表會，也移地各辦一場回到地方的成果發表會。不同於系上成果發表會參與人都是大學生及以上的師長前輩，同學們只要順暢地將已經大致完成的書面報告轉為投影片簡要說明並回應評論人的提問，地方發表會不僅移除評論人環節，更公開邀請各組報導人及鄉親前來聆聽，並同步直播供無法抽身的地方

⁵ 感謝蕙瑄助教協助處理寒假大部分的單據；感謝教東學長協助再確認學期間的其餘單據；感謝學校主計第一組李誠軒專員在報帳方式的仔細確認；感謝殷甲助教及 112 學年度的 Ataw 助教給予報帳流程的協助。

人士共同參與。113 學年度時，天祐與我有感於前一年同學大部分還是將系上發表會時、較多學術名詞的投影片版本原封不動地在地方發表會分享，我們認為學生應要轉譯生澀報告，轉成更益於理解的大眾版本，才能促進雙方更有效的溝通，因此我們請同學在地方發表會前一週與我們約時間演示，確認投影片編排及報告內容是否流暢易懂。114 學年度則採取合併系上及地方的發表活動，邀請雲林鄉親北上一同參與，流程則比照系上發表會的進行模式。

最後則是每年必出版的文化田野課程成果論文集。助教在收到學生在七月繳交的最終稿件後，要再進行最後的編輯確認。比如核對文內引用格式是否符合規範，對於敏感資訊是否都有做到妥善的匿名化處理，或是文句可以怎麼再調整等。113 學年度在天祐編輯排版整本論文集順利印製後，我們約了 114 學年度助教穎欣，一同在茆子寮普天宮王爺夜巡時，回訪田野地分送論文集給共同報導人。當地鄉親看到我們三人都十分驚喜，這種像是回家般的親切溫暖與熟悉，正是驅使我不斷回去的動力，也多了一份「有空要回去走走」的牽掛。

三、後記

「學做人，學做『人』。」是天祐和我在 113 學年度文化田野進行時，彼此最常聊到、對於課程目的的討論與感觸。這門課是系上大三學生從文化人類學或考古學擇一修習的實作取向課程，是第一次沉浸（且高壓）地進行短期田野，並將田野筆記轉化為正式論文形式的學習，實習如何成為一位「人類學徒」。另一方面，是因為文化田野課程高度仰賴個人社交能力，多數人都是被授課教師指派前往一個完全不熟悉的聚落，從零開始建立人脈，滾雪球式地

逐漸蒐羅願意受訪及被跟訪的報導人，跨出舒適圈與陌生人進行第一次互動；因此能否讓報導人願意相信自己、進而協助自己，是一門做「人」的功夫。

上個月底，是我在三年的茆子寮短期田野後，第一次不帶任何身分「回去放假」的時光。時逢數日連綿的大雨滂沱，我也因此慢下腳步，有機會與幾位因為寒假匆匆未能好好更新近況的報導人深聊。兩日在田野地咖啡廳的下午，分別有一組客人好奇地拿起我們擺放在咖啡廳的成果論文集詢問老闆，老闆便順勢讓我去介紹。我借用了同學們各式各樣的研究主題，試圖說明人類學文化田野在當代可以關心什麼議題，每提及一個題目，與當時同學們的互動便躍然紙上。

人類學的田野研究經常在不同的時間點產生不同的火花，而這趟橫跨三年的文化田野行，讓我得以一窺田野教與學的現場。從一開始的修課衝動，嘗試書寫自己看到的現象；兩年行政助教，從旁觀察他人如何摸索出自己的田野之道；到如今成為系上研究生，即將展開自己的田野研究，仍苦於不擅使用文字表述自己在田野的諸多感受。即便如此，我還是想繼續學做「人」，嘗試在一次次笨拙的練習與表達中，拼湊時光碎片，說一個好聽的故事。

慢不下來的田野

蘇穎欣

面前是我已經訪問過兩次的船長，他剛剛從漁港回來，我看著他疲憊的樣子，想要盡快把手上訪綱的問題問完，好讓他回去休息。船長就像前幾次一樣，不緊不慢地拿起茶壺倒熱水泡茶，我念出第一條問題。他拿著茶壺倒水的動作一窒，詫異地抬起頭，挑眉問我：「這問題你前天不是問過了，怎麼又問一次？」我頓時腦袋空白一片，不知道如何是好，我耳邊甚至能夠聽到自己心臟快速撲通撲通狂跳的聲音。剎那間，我睜大了眼睛，意識突然回籠，發現自己是躺在床上。我轉頭看去熟睡的滬青同學，大概花了 3 秒時間才意識到我可能是在作夢，但這個夢又太真實了，我有點搞不清楚是不是昨天真實發生過的事情。天還沒有亮，但我已經沒辦法睡個回籠覺了。我想既然都醒了，那就早點起來梳洗準備，還可以去吃個鐵板麵壓壓驚。(2025/01/11 田野筆記)

以上是我在 113 學年度修課時的真實田野筆記。密集田野間，在時間壓力下大家都馬不停蹄、車輪式地進行訪談，希望儘可能在這短暫的時間收集到足夠的田野材料。我的大腦每時每刻都在想，剛剛報導人跟我講了什麼？這又跟我之前在政府報告或者是網路新聞看到的有哪裡不一樣？以致於每晚我都是在想著田野的事情而入睡的。

這段密集田野結束以後，直到現在快一年半了，我還是時不時地會夢到自己回到田野地去問報導人問題。我偶

爾還會跟同學們說，茆子寮就像一個 RPG 的世界地圖，我成功解鎖後，可以隨時在夢中回去。

當我在第二年回到茆子寮，我從修課學生的身分轉換成助教。看著這些跟我去年一樣迷茫的大學生們，我又重新經歷了一次研究從零到一的困難。助教的行程其實跟修課學生的行程相差無幾。我們會跟著不同組別去做訪談，了解大家正在做什麼題目、訪談上遇到什麼問題。到了晚上，所有人再一起進行每日田野的進度回報。

第一年的我是被「快」折磨的人。但是第二年的我坐到另一邊，變成協助執行這套節奏的人。因為明天同學就要再出去田野，所以每晚必須回答出：「今天這些材料怎麼推進你的研究？下一步去哪裡？」現在再回頭看，我才覺得這樣的節奏其實很矛盾。人類學的方法論理想常把時間、等待、反覆接觸視為理解地方的重要條件，傳統民族誌也往往以更長的時間尺度展開。但文化田野課卻必須非常快。修課同學只能待在田野地不到兩週，必須在緊迫的時間中收集材料、整理資料，再把暫時的判斷說給老師和助教聽，讓我們「安心」同學們的進度。這樣的節奏很容易讓人焦躁。

在長期田野裡，一個暫時看不懂、想不通的材料或許可以先放著。但在密集田野裡，今天的材料幾乎立刻就要變成明天的行動。時間和行程可以被排得很滿，但關係本身卻沒有同樣的加速方式。

回想自己的經驗，我有一位報導人在不到兩週的田野裡回訪了三次。第一次比較像是單純訪談，我問問題、對方回答；到了第二、第三次，彼此開始熟悉，我也慢慢知道地方上誰跟誰有什麼關係、不同人的說法又是怎麼接在

一起。三次訪談加起來當然增加了資料量，但對我來說，更重要的變化其實發生在每一次訪談之間。前一次談過的內容，會改變我下一次怎麼問，也會改變報導人怎麼看我，願意跟我分享更多。

也就是說，密集田野的限制很明顯。有些理解就是需要靠時間慢慢累積，尤其是對人的認識、關係的建立，以及對地方關係網絡的掌握。但反過來說，時間短也不代表這十一天只能得到很表面的材料。至少在我自己的經驗裡，密集的行程反而讓我在很短時間內，不斷把前一天的材料帶進下一次訪談裡，再用新的材料回頭修正原本的理解。

Pink 和 Morgan (2013) 談 *short-term ethnography* 時，提出短期田野雖然沒有傳統民族誌那樣長的時間，卻可能透過更高的強度形成另一種認識方式。回頭看文化田野的十一天，我覺得很接近這種狀態。每天密集訪談、晚上整理材料，隔天再立刻帶著新的問題回到田野，形成一種高度集中的研究節奏。十一天下來，我當然不敢說自己已經多了解這片土地或人們的生活，但至少對自己關心的漁港發展問題，我確實累積了一套比進田野以前深入很多的理解。

我記得老師以前也提過，像臺大人類學系在大學部安排一段密集田野、讓學生真的從頭到尾完成一個研究，在海外的人類學訓練裡似乎並不常見。現在回頭看，我也越來越珍惜這種有點像「休克療法」的訓練。過程中當然有很多壓力，也有很多覺得自己不知道在幹嘛的時候，但最後真的可以從一個幾乎不認識的地方開始，慢慢找到自己的問題，跟人說話、整理材料，再獨立寫出一篇研究，還是很有成就感。那篇文章當然算不上什麼很厲害的作品，

但至少替那段時間的茆子寮留下了一點紀錄，也把那些願意坐下來跟我說話的人，他們對地方的理解、期待和失望，留下了一小部分。文化田野最後留下來的，也就是這些在很短時間裡遇見的人、聽見的話，以及之後仍需要慢慢理解的東西。

參考資料

Pink, Sarah and Jennie Morgan

2013 “Short-Term Ethnography: Intense Routes to Knowing.” *Symbolic Interaction* 36(3): 351-361.

田野的最後一哩路

一名 114 學年度修課同學

在讀臺大人類之初，我確實對文田有很多想像，而當這學年做了田野的想像落地後，我發覺除了田野地的居民會有相對剝奪感外，就讀臺大人類的我們其實也在臺大裡體會這樣的感覺。

之前我讀的是第一志願高中的人社班，我們一直自嘲自己是資優班實驗班體制內的弱勢班級，但其實我們一直享受政府的資源，無論是請各種社會科學、文學領域的教授來對懵懂的我們授課，導讀我們各方領域的世界名著，或是高二的專題撰寫和發表，我們都是不用像在人類學系這樣，為經費的問題殫精竭慮。甚至在高一高二我們都可以到集思臺大會議中心聽發表和發表我們的專題，相比我們能夠租到的臺大文康中心，是多麼高級的地點啊！但是當時的我們不會想到那麼多，沒有比較過不會知道當時最無知的自己，其實享受著最多的資源。

有了這段經歷，我便開始思考，在做比高中時更深入的研究的我們，為何相對於高中生，得到的關注、幫助會在體感上少這麼多？現在的我們在做的事，難道不是更重要嗎？還是喚醒高中生對於人社領域的關注就好了？我覺得臺大人類已經是臺灣裡面，資源分配相對較多的人社領域學科了，但歸根究柢是因為我們在臺大才能得到這樣的資源。在臺灣的社會科學領域得到的資源、關注，從以前到現在似乎沒有改變太多，到底是我們要求過多，還是真的太少呢？

感覺以上的感受差異也可以做研究了？不過我想要說的是，有了讀人社班又讀人類學系的經歷，讓我感受到這門課程處境的不易與不利.....也恭喜我們大家走到文田的最後一哩路。在用心的灌溉下，讓我們能夠深刻體會到人類學的價值跟能做到的事。

2026 年 6 月



電子版論文連結：<https://ntuynlin.org/>

- 書名：**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114 學年度 文化田野實習與方法成果專輯下冊
- 出版日期：**民國 115 年九月
- 出版單位：**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 聯絡方式：**anthro@ntu.edu.tw
- 作者：**張家瑜、朱昱威、鄭采宜、李僑諦、郭羽喬、余侑蓁、蔡詠潔、林宜臻、蕭則安、吳靖、黃予弦、林士譽、姜宥甄、王昱婷、吳俊達、王皓正、游聿堂、盧嘉宏、康瑋廷、陳旻心、廖德智、郭天祐、盧佳秀、蘇穎欣
- 授課教師：**黃郁茜
- 助教：**盧佳秀、蘇穎欣
- 封面設計：**張家瑜
- 內頁排版：**蘇穎欣
- 印刷：**經典數位印刷・臺灣大學店
- 經費來源：**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趨勢教育基金會「共作文明新趨勢」計畫

封面與封底設計理念

「風頭水尾」原為地方對環境的稱呼，在歷屆文化田野實習中持續沿用，至本屆以「再續」相承。它是地景，是傳承，也是未完的狀態。風無形，水無定，也恰如「理解」是在田野中的行走、訪談與書寫之中逐步生成。影像則取自田野行進時難以明確命名的某個角落。——張家瑜

